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三辑



JĪNG SHÉN FÈN XĪ YÁN JIŪ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三辑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研究.第3辑/霍大同,谷建岭主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418-5

I.①精… II.①霍…②谷… III.①精神分析—研究 IV.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7597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三辑

霍大同 谷建岭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18-5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½

定价:58.00元

主编

霍大同 谷建岭

副主编

居飞 秦伟 严和来 尹立 郑禹

编委

蔡婷婷 姜启壮 姜余 李娜 刘瑾 罗正杰 潘恒 石岩

陶杏华 许丹 杨春强 赵旻

本期执行编委

谷建岭 刘瑾 陶杏华 谭羽辰 何逸飞 吴张彰 袁梦蝶

目 录

霍大同精神分析专题

- 《精神分析笔记》发刊词……………霍大同 / 著 (3)
- 主体心理学……………霍大同 / 著 (5)
- 两类母亲、两类临床……………霍大同 / 著 (7)
- 从“天子诞生”的神话再看代情结……………霍大同 / 著 (14)

话语与精神分析专题

- 话语与精神分析……纳达莉·沙鸥 / 著 罗伦 / 译 陶杏华 / 校 (25)
- 精神分析中的话语：其能力与限制
……………达米安·居约内 / 著 刘瑾 / 译 (29)
- 话语所言远甚于主体所以为
……………让-皮埃尔·克罗茨 / 著 谭羽辰 / 译 陶杏华 / 校 (33)
- 对享乐的“过度感知”
……………安娜-玛丽·勒·梅西埃 / 著 孟翔鹭 / 译 (37)
- 主体在通向话语过程中的特殊性
……………韦罗妮克·马利亚热 / 著 石岩 / 译 (41)
- 从“Petit Prince”到独一无二的鲜活生命的蜕变……李梦慈 / 著 (48)
- 没有人对他说些什么……………伊丽莎白·古尼奇 / 著 李锋 / 译 (52)

精神分析的结束及之后

- ……………伯纳德·波歇黑 / 著 佚名 / 译 陶杏华 / 校 (56)
- 倾听孩子——儿童自由言说的多样性……………叶利鹏 / 著 (64)
- 怎样用话语触及实在? ……法比安·法热瓦克斯 / 著 吴蕤 / 译 (73)
- 修“辞”立“诚”——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一种会通
……………卢毅 / 著 (80)
-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溯源研究……………林媛 / 著 (96)
- 创造“撞击”的时刻——来自儿童孤独症的精神分析临床的思考
……………王莉 / 著 (103)

女性与话语专题

女性怎样才能谈论对她们来说谜一般的东西?

- ……………莫妮克·特科 / 著 赵旻 / 译 (113)

主体在实现精神分析时的空话与实话

- ……………雅克·拉康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16)

母亲“代言人” ……莫妮克·特科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25)

凯瑟琳娜……………弗洛伊德 / 著 石岩 / 译 (129)

一个女人想要什么

- ……………塞尔日·安德烈 / 著 鞠睿 / 译 石岩 / 校 (138)

为什么小女孩子们能说会道? ——语言和性化

- ……………莫妮克·特科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43)

辛格或转移之爱

- ……………塞尔日·勒克莱尔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154)

无言以对——对于一个少女的分析

- ……………米歇尔·维斯-维玲 / 著 鞠睿 / 译 石岩 / 校 (164)

男性与父性专题

- 男性与父性……………莫妮克·特科 / 著 罗正杰 / 译 (177)

- 男性身体：一种文化的产物？
莫妮克·施耐德 / 著 石岩 / 译 (183)
- 当前男性性的坍塌？对父性的影响是什么？
弗雷德·卢梭 / 著 陶杏华 / 译 (193)
- 对于父亲来说什么是恰当的距离？吉·丹纳 / 著 姜余 / 译 (203)
- 为了成为父亲的五个梦
菲利普·瓦伦 / 著 罗正杰 / 译 吴蕤、赵旻 / 校 (213)
- 不对称的切口理查德·阿彼波 / 著 张涛 / 译 (220)
- 被阻碍的雄性气概帕斯卡·阿苏 / 著 石岩 / 译 (234)
- 一位母亲梦中的父性与男性肖洪秋 / 著 (245)
- 从“鼠人”个案看男性与父性吴蕤 / 著 (253)

精神分析文献翻译专题

- 精神病：经由言语与转移的诊断丹尼·诺巴斯 / 著 张涛 / 译 (263)

其他

- 身体形象、字母和中文：引论许丹 / 著 (293)

霍大同精神分析专题

《精神分析笔记》发刊词

霍大同^①/著

《精神分析笔记》经过几年的酝酿，并在多方面的支持下，终于出版了。虽然她仅仅是一份小小的，薄薄的，既微不足道，又非正式的出版物，但她的问世毕竟意味着精神分析这一被西方人，乃至中国人视为典型的、纯粹的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结晶的学科，在几经周折之后，最终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破土而出，长出了她的第一株幼苗。

对于精神分析学说，我们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是学习与理解，老老实实、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地阅读、翻译和讨论精神分析的文字，尤其是弗洛伊德、拉康等精神分析大师的著作。通过这样的学习进而达到理解。不仅仅是全面、系统和准确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还要进一步理解精神分析赖以存在、赖以发展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与现状。

其次是解释与对质。首先是用理论来解释自我分析和自我被分析的材料，解释自己的这一个案，尔后再推广到对他人个案的分析上。以此为基础，再从这个个体发生层面进到中国文化的群体发生层面；从对个体的心理结构与功能的解释进到对群体的无意识与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的解释。这一解释实际上是一种对质，是将中国材料与精神分析理论做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对质，从而找出哪些是精神分析理论能够解释的东西，

① 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精神分析学教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主任。

或者仅仅能部分解释的东西，以及不仅不能解释甚至完全矛盾的东西。

由此就有了我们态度的第三部分：创造与发展。理论与材料相抵触、相矛盾，意味着理论必须修改，意味着我们必须创造出能够有效解释中国材料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从而发展、丰富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一个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亦因此种理论上的努力与突破而诞生、而发展、而壮大。

创立一个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当然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愿望。但它还不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愿望。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愿望应是：一个可能会有的精神分析的中国学派能够与其它学派（如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英国学派等等）一道，更进一步与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历史学和文献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脑科学和精神病学这样的生命科学的分支等的不同文明的、不同国籍的学者与学派一道，为建立一个真正有效地解释整个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和治愈因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而引起的人类的种种心理疾病的一整套方法与手段而努力、而探索、而奋斗——这实际上也是所有上述学科研究者共有的愿望！

而我们希望做的这一切，从学习到创造，均从这本小小的、薄薄的《精神分析笔记》开始。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是矣！

一九九九年夏谨记于

四川·成都·川大竹林村

主体心理学

霍大同 / 著

所谓的主体心理学或者以治疗室的临床为基础的心理学的，主要是指精神分析。之所以说精神分析是主体心理学，主要是指在精神分析的治疗精神疾病的实践中，是让病人或者比较准确地说分析者处在一个主体的位置，让分析者、让病人自己自由地诉说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在这种自由地诉说中，理解自己的困难所在，理解自己的精神疾病的根源所在。治疗师或者我们称为精神分析家的人首先是提供了一双愿意倾听任何言辞，任何话语的耳朵，一双充分开放的耳朵；其次才是在分析者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解释，以帮助分析者理解自己诉说的意义，而不是将病人、分析者当成客体，当成一个被动的接受治疗家、分析家的建议甚至命令的人。

正是让分析者自由的言说，精神分析发现了无意识。最先的发现者是弗氏。分析者在自由的言说中会出现语误、说错话，分析者在自由的言说中会讲自己的梦、会解释自己的梦，分析者在自由的言说会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与自己的症状的关系、自己所经历的创伤性事件，以及发病的情况。弗洛伊德因此将语误、梦与症状视为无意识的三大形式，从而天才地解决了在思辨心理学时期人们谈论无意识时所遇到的悖论：如果无意识是可以有意识地谈论的东西，那么它就不是无意识而是意识；如果它真是无意识的，我们就无法谈论它。弗氏的贡献在于我们能够通过无意识的变形：语误、梦与症状来研究无意识、理解无意识。

然而精神分析家们通过对分析者及对话误、梦与症状的研究所定义的无意识则是众说纷纭的：比如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像一口沸腾的坩埚，它主要由冲动与冲动表象构成；而拉康则认为无意识是有结构的：无意识像语言那样结构的；荣格则强调无意识是由一些先天的意象所构成，等等。

这些不同的关于无意识的看法，我们都将给同学们介绍。同时我们还要请大家做一个作业，做一个对自己的梦的分析的作业，帮助大家理解精神分析为什么是主体的心理学，无意识究竟是什么。

在客体心理学中所涉及的生理因素，在主体心理学中是以力比多、冲动等概念表达出来的。

在客体心理学中所涉及的社会因素，在主体心理学中则是以母亲在孩子的精神结构形成中的作用与父亲在孩子的精神结构形成中的作用这样的更具体的形式而出现。

人的存在不是像客体心理学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刺激，被动地对刺激做出反应的存在，而是欲望着的存在，欲望支配着人行动、支配着人去主动寻找刺激、支配着人去达成欲望。

两类母亲、两类临床

霍大同 / 著

在精神分析学中，把母亲称为“客体”，称为“爱的客体”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三至五岁的男孩子将母亲作为女人来爱，是一种乱伦的爱，因而父亲就干预进来，以阉割相威胁，迫使小男孩放弃对母亲的爱，转而认同父亲并承认母亲是父亲的女人，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孩子主体的人格结构的形成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解决之后；通过父亲超我的内化，孩子主体才形成他的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之所以将孩子人格结构的形成理解为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的结果，与他基本上是与成人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他所接触到的唯一的一个儿童的个案是小汉斯的个案，而且他并没有直接与小汉斯工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孩子的父亲间接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仅仅作为督导分析家参与了这一个案的工作。

然而他一直意识到儿童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性，他一直鼓励他的学生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与梅兰妮·克莱茵女士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了各自的儿童精神分析工作的。

安娜·弗洛伊德始终坚持自己父亲的立场，认为孩子的人格结构的形成是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因而同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的工作主要是教育。而克莱茵女士则相反，她认为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孩子仍然是有人格结构的，孩子在与母亲的互动中会形成躁狂-抑郁态。同时她引入了游戏的方法，使儿童的精神分析的治疗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与

弗洛伊德理论和临床的连续性，她保持了弗洛伊德的母亲是孩子的客体的思路，并进一步指出前俄狄浦斯情结中，孩子主体与母亲客体的关系是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关系。同时，她提出了“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的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观念对子。从而在根本上突破了弗洛伊德的母亲仅仅是爱的客体，母亲始终是好客体的观点。然而在克莱茵那里，母亲乳房的好坏与母亲的好坏都不是母亲本人的好坏，而是孩子所感知到的母亲乳房与母亲的好坏。孩子的这种关于母亲好坏的感知与实际上的外部的母亲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好乳房”与“坏乳房”，“好母亲”与“坏母亲”，“好客体”与“坏客体”基本上是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而非客观母亲的客观现实。一个外部的客观的母亲究竟如何，是被克莱茵回避了的。这种回避是有道理的。因为她仅仅同孩子一道工作，她所知道的孩子的母亲是孩子的话语中与游戏中的母亲，是孩子所感受到的、所理解的母亲。但是孩子所能感受到的母亲，与一个外在的客观的母亲有什么关系，显然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家所要回答的问题。

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提出来之后，孩子对母亲的主观感受才与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行为联系起来，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坏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坏的”，孩子将母亲感受为“好妈妈”是因为外在的客观的母亲的确是“好的”。因而母亲应该尽量做“足够好的母亲”，尽量避免成为“足够坏”的母亲。

在此意义上，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是精神分析发展中的相当重要的一步。因为当弗洛伊德将母亲命名为客体时，母亲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是一个被孩子所爱的客体，这一思路也被克莱茵所继承与发展，母亲不仅仅是被爱的客体，还是被孩子所恨的客体。但是只有在温尼科特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的提出之后，母亲才从一个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的主体。母亲是作为由自己的欲望所支配的主体来与孩子互动的。母亲是作为具有母性欲望的主体来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的。如果要，又该怎样塑造这个孩子，又该怎样培养这个孩子，在

这里母亲作为主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与“足够好的母亲”概念相对应的是温尼科特在其精神分析临床中遇到的母亲，她们是一些“不够好”的母亲，是一些“坏母亲”，是一些抑郁的母亲，是一些施虐的母亲。也就是说，是因为母亲“太坏”，孩子才进入到温尼科特的分析室的。因而孩子需要温尼科特的“抱持”。他在孩子的症状中看到了母亲的问题，并且希望通过精神分析的工作来解决母亲给孩子所带来的问题。他认为，因为母亲“太坏”，孩子不得不形成一个“假自体”来防御母亲的抑郁或者母亲的施暴，而分析家的抱持性的工作可以帮助孩子解构自己的假自体，弥补自身的自体结构的缺陷。

我们现在再回到弗洛伊德，他不仅强调母亲是孩子的，尤其是男孩子的爱的客体的，而且认为男孩子对母亲的爱是乱伦之爱，在父亲的阉割威胁之下不得不放弃这种对母亲的强烈的、超出伦理界限的爱，转而认同于父亲。这就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显然基于他所发明的精神分析的临床观察。其中一个个案就是小汉斯的个案。

小汉斯的父母都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而且小汉斯的母亲还曾经是弗洛伊德的分析者。这对夫妇一方面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养育他们的孩子，一方面对孩子的一言一行进行详细的记录。直到五岁时，被称为小汉斯的这个男孩均成长得非常顺利。但到五岁时，小汉斯的恐惧症突然发作，恐惧马，害怕马，害怕马咬他的手，害怕公共马车的马，害怕货运马车的马，害怕马摔倒等等。由于那个时代刚有火车之外，还没有汽车，因而马与马车是基本的交通工具，街上到处都是马与马车，因而小汉斯就不敢出门，只有待在家里。

小汉斯的父亲详细地记录了小汉斯的种种表现，以及他与小汉斯之间的讨论，并将这些记录交给弗洛伊德，听取弗洛伊德的建议，然后继续与小汉斯工作。最后小汉斯在接受弗洛伊德指导的父亲的帮助下，成功地摆脱了怕马的恐惧症。

弗洛伊德对于小汉斯的恐惧症的解释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因而恐惧他的父亲，害怕父亲会惩罚他。马仅仅是父亲的替代物，怕马就是怕父亲。同时马也代表母亲，小汉斯一方面害怕失掉母亲，另一方面又害怕被母亲所吞食。

如果我们将小汉斯与父亲的关系先放在一边，仅仅只考虑他与母亲的关系，则我们能够看到，问题首先出在小汉斯与母亲的关系过分紧密上，一方面是小汉斯太爱他的母亲，另一方面是母亲太爱她的儿子。但是，弗洛伊德将儿子与母亲的这种过分亲密的关系视为乱伦关系的看法则过于匆忙，过于狭隘，因为我们同样能够遇到女儿与母亲之间具有过分亲密的关系的临床。也就是说“母亲太好”，母亲给予孩子太多的爱，母亲溺爱孩子的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儿子，也存在女儿身上。因而用“乱伦”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情况就显得过于狭隘，相反用“溺爱”来表示才是合适的。“溺爱”就是将孩子淹死在母爱之中。在母爱中感到窒息的孩子会做出一些攻击性的行动来试图摆脱母亲的溺爱，摆脱母亲的控制，这样爱就转化成了攻击，转化成了恨。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由于男孩子与母亲关系过分亲密，因而父亲的功能就是要将男孩子与母亲分开，转而让男孩子认同于父亲。弗洛伊德将父亲的这一功能称为阉割功能。在小汉斯的个案中，小汉斯的父亲就起这样的作用。父亲的阉割威胁当然会导致孩子的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恐惧，弗洛伊德的解决方案是，让具有弱小自我的孩子认同于起着自我理想作用的精神分析家，从而使孩子的弱小的自我变得强大，从而顺利地接受阉割，顺利地离开母亲，认同父亲。

相对于弗洛伊德用性力必多与性冲动来解释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躁狂的、乱伦的、过分亲密的病理性关系的努力，拉康则另辟蹊径来解释这种关系。他注意到在六个月至十八个月的孩子那里，当孩子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时，会有一种狂喜，会去拥抱自己在镜子的形象。这时怀抱孩子的母亲，会指着镜子中的孩子形象说“这是你”，会指着镜子中的自己的形象对孩子说“这是我”。

孩子主体通过自己的在镜子中的整体形象来控制自己的身体整体的活动，并且通过对自己在镜子中的整体形象的认同来形成自己的自我。显然在拉康的镜子阶段的概念之下，孩子主体的自我是一个虚构的形象，是一个躁狂的与母亲彼者形象混淆不清的形象；需要符号父亲从符号界的水平上实施符号性的阉割，孩子主体才能够将自己的自我形象与母亲的彼者形象区分开来，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主体性，形成自己的符号性主体。拉康认为在我们这个父权衰落的时代，父亲对儿子所实施的符号性阉割总是不充分的，不足够的，因而需要精神分析家对分析者实施一个相对充分的、相对彻底的符号性阉割。

相对于弗洛伊德，拉康在吸收了客体关系理论的成果之后，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过分亲密的粘着关系从三至五岁提前到了六个月到十八个月，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而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是拉康在镜子阶段的概念中充分考虑到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在视觉的形象维度上的互动作用。而视觉的形象维度则完全属于精神活动的范畴。拉康试图讨论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纯粹精神性的互动关系，讨论纯粹精神性的孩子主体的人格形成过程，而将弗洛伊德的生物性的原动力、性力必多、性冲动等等概念放在了一边。

弗洛伊德与拉康在对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的过分亲密关系的临床做解释时，更多地是从孩子主体本身的情况出发的，要么认为是孩子的性力必多与性冲动推动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过分亲密的、乱伦的关系发生，要么认为是孩子的视觉吸引推动了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诱惑关系的建立。

然而在我们的临床中，我们发现孩子主体与母亲彼者之间的过分亲密关系的建立除了孩子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母亲彼者方面的原因。两者之间的过分亲密的关系的建立往往因为母亲太好，母亲是一位躁狂的、溺爱孩子的母亲，是一位不讲规矩、不讲原则的母亲，是一位既放纵自己又放纵孩子，不愿意对孩子说“不”的母亲。

孩子主体有在与母亲父亲彼者互动中形成自己的人格结构的精神需

要。孩子主体要通过接受母亲彼者传递来的人格结构而形成自己的一阶人格结构，孩子主体要通过接受父亲彼者传递来的人格结构而形成自己的二阶人格结构。因此孩子主体的问题与症状首先要放在与母亲彼者互动中，放在形成其人格结构的过程中来理解。客体关系理论所强调的临床，所强调的孩子主体的问题与症状，主要是由于母亲太坏，母亲不够好，母亲是虐待的母亲，是抑郁的母亲，母亲所给予的爱太少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孩子在主体的人格结构中的兴奋一极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过分抑制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孩子的精神需要满足不够而导致的，因而其症状与问题以抑郁为主。而在弗洛伊德与拉康所强调的临床中，则相反，孩子主体所出现的问题与症状主要是由于母亲太好，母亲不够坏，母亲是溺爱的母亲，躁狂的母亲，母亲所给予的爱太多而导致的，主要是因为孩子在主体的人格结构中的抑制一极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过分兴奋而导致的，因而其问题与症状以躁狂为主。

在临床中，一个具体的母亲彼者往往同时具有这样两类极端母亲的特征，一会儿太好，一会儿太坏；一会儿虐待孩子，一会儿又溺爱孩子；一会儿抑郁，一会儿躁狂；一会儿没有给予足够的爱，一会儿给予爱又太多；因而孩子主体也往往同时具有上面所说的那样两类问题与症状。

我们还要指出父亲彼者也与母亲彼者一样具有这样两种极端的类型。一种是太坏的、虐待的与抑郁的父亲，这种父亲差不多就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父亲；另一种则是太好的、溺爱与躁狂的父亲，这种父亲差不多就是拉康所强调的父亲。同样这样两种极端的父亲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具体的父亲身上。这就要求我们分析家也要同时具有两种工作方法，一方面要“抱持”，要“补不足”；另一方面则要“阉割”，要“损有余”。

精神分析家用最为开放的耳朵去倾听分析者的言说则是最大的“抱持”，最大的“补不足”；精神分析家对分析者言说的“断句”则是最基本的“阉割”，最基本的“损有余”。在倾听与断句的基础上才是精

神分析家的在话语水平上的干预，这些话语的干预既可以是支持性的、鼓励性的，亦可以是抑制性的、否定性的。

2016年8月15日
于成都川大农林村

从“天子诞生”的神话再看代情结

霍大同 / 著

【内容提要】通过对被我们命名为“天子诞生”的神话，即夏、商、周的第一位男性始祖，三皇五帝的三皇、汉高祖及孔子、老子、佛陀与基督诞生神话的介绍，我们重新讨论了代情结；并进一步指出代情结是孩子主体形成其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整个过程的情结，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则是孩子主体形成其性别化人格结构的情结，因而代情结包含了作为性情结的俄狄浦斯情结。

【关键词】天子诞生的神话 代情结 性情结 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

众所周知，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为了证明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临床的适用性，我在1987年在法国巴黎正式开始精神分析的临床训练与理论学习时，就利用自己曾经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古代史的优势，翻阅了大量的中国史料，以求在中国的文献中找到与俄狄浦斯神话类似的神话。

然而我的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我未能找到中国式的俄狄浦斯神话，相反我发现了大量的，被我命名为“天子诞生”的神话。这类神话，作为社会父亲、精神父亲诞生的神话，在发生的逻辑上要早于父亲已经存在，儿子杀掉了父亲的俄狄浦斯神话。这类神话更多地表现了母亲与儿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表现了从母亲到儿子的传递，而不是像俄狄浦斯神话那样表现了母亲作为女人，儿子作为男人的两性关系。在这类神话中，

我们看到的是母亲的母性欲望，而不是她的女性欲望，儿子的子性欲望，而不是他的男性欲望。更进一步，是当儿子成为父亲后所表现出的父性欲望，而不是他的男性欲望。

由于这类神话是关于社会父亲、文化父亲、精神父亲诞生的神话，因而它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乃至其它文明的社会、文化与精神父亲身上。具体地说它存在于中国文明的创造者三皇五帝身上，它存在于夏、商、周、秦、楚这些父权民族的第一个男性始祖身上，它还广泛地存在于秦朝以后的各朝皇帝身上，它存在于儒家理论的创造者孔子身上，存在于道家理论的创造者老子身上，它还存在于佛教理论的创造者佛陀身上，它也存在于基督教教义的创造者基督身上，它也存在于大量儒家、道教、佛教的著名人物身上。

我们所找到的这类神话的一个最早的完整的版本是《诗经·大雅》中标题为“生民”的诗篇。生民就是人民的诞生，讲的是周民族是如何诞生的。讲的是：

周民族诞生之初，有一位女子叫姜嫄。有一次她游于原野之上，踩到了大熊的足迹，内心就有所感动，从而怀了孕。然后生下了一个男婴。

尽管生产非常顺利，但是因为是在踩到大熊足迹而生的，她觉得这一婴儿是不祥的，因而将他抛弃在村庄的狭窄的街巷中，但是过往的牛羊均避开这个婴儿，没有将这个婴儿踩死。于是姜嫄又将她的婴儿扔到河中的寒冰之上，结果天上的鸟儿飞来用自己的翅膀将婴儿覆盖住。待鸟飞走后，这一婴儿呱呱的哭叫起来。于是姜嫄又将他扔到森林，在森林中伐木的工人，又将他保护起来，从而活了下来。

当这一婴儿长成少年后，他就喜欢种庄稼，也喜欢搞祭祀。

当他成年后，他漫游四方，找到了被称为“稷”的良种。从此年年丰收，周族人丁兴旺，日益壮大。每年秋收之后，周人都要祭祀姜嫄与后稷。

后稷是周人对这一发现“稷”的男孩的美称，类似于“稷王”，他是周民族的第一个男性始祖。

我们可以将这一以诗歌形式讲叙的神话视为戏剧。这一戏剧可以分

为两幕四场。第一幕是母亲的戏剧，它又分为两场，第一场是母亲怀孕的故事，第二场是母亲生产的故事。第二幕是儿子的故事，它也分为两场，第一场是儿子诞生后所具有的神奇力量，第二场是儿子的创造，这里是发现良种。通过儿子的创造，儿子变成了社会父亲。

一个关于殷商父权民族诞生的神话是：

商之开始时，有神女名叫简狄。她游于桑林之野，看见有玄鸟产了一枚蛋于地上。这枚蛋是彩蛋，有五种颜色，简狄拾起来，吃了它，于是怀孕，生下了一位男孩子。

男孩子长大后，创造了书契，因而被称为商契（xie）。

一个关于夏民族诞生的神话是：

有莘氏之女，名叫女嬉，她在砥山得薏苡而吞之，内心有所触动，因而怀孕。14个月后剖胸胁而生夏禹。因而夏民族姓姒姓。

上面的夏、商、周的第一个社会父亲诞生的神话是天子诞生的神话的原始版本。在这些神话的原始版本中母亲所接触到的生育客体是一些具体的实物客体，比如薏苡、鸟蛋，大熊的足迹等等。借助于这些具体的实物客体母亲怀了孕，生下了有神奇能力的男孩子。然后这些男孩们创造出了一些文化客体，从而成为社会的第一批父亲。

在有了社会父亲之后，人们创造出了男性的帝与天的概念。在帝与天的概念之下，人们又创造出大量的天子诞生神话的继发版本。这些继发的版本是真正的天子、天的儿子诞生的版本。比如我们有伏羲（又名庖犧）诞生的神话。

春皇是庖犧的另一个称号。在他所建立的国家有一个地方叫华胥之洲。当神母漫游在华胥之洲的上面时，有一道青虹围绕着神母。很长时间之后，青虹才消失。于是神母感到自己怀孕了。经历了12年才生下庖犧。

庖犧有长长的头，细长的眼睛，有像乌龟一样的牙齿和像龙唇一样的嘴巴，长长的白发一直垂到地上。有人也称他为岁星。

我们还有神农诞生的神话。

神农氏姓姜，其母亲叫任姒。游华阳时，遇到了一条神龙，有感，

从而生下了神农。

神农人身牛头，成长于姜水，有圣德。教育人民耕耘、务农事，因此称为神农。

我们还有黄帝诞生的神话：

黄帝的母亲叫附宝，一次，她看见一条巨大的闪电绕北斗星，其光芒照亮了整个原野，因而有感而怀孕。25个月之后生下了黄帝。黄帝很小的时候就能说话，样子长得像龙，有圣德。

伏羲、神农与黄帝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的三皇。在上述的神话版本中，我们能够看到母亲赖以怀孕的生育客体要么是奇异的天象，比如“青虹”，比如“闪电绕北斗星”，要么是龙。天象隐喻了天子、天的儿子的概念。龙则隐喻了龙子、龙的儿子的概念。合在一起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说，后世所谓的“真龙天子”的概念正是对这些母亲感天、遇龙而生子的神话的概括。

除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均有自己的诞生神话之外，在后世的皇帝中也经常有这样的诞生神话，比如关于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就有下面一则诞生神话：

高祖，姓刘，字季，父叫太公，母叫刘媪。一天高祖的母亲睡在大湖的岸边，梦到与神人相遇。此时，雷电加交，天色晦暗，刘邦的父亲去找她，看见了蛟龙伏在自己的妻子身上。随后刘邦母亲有了身孕，生下了刘邦。

因而刘邦高鼻而颜貌似龙，美须髯，左大腿有七十二黑子。当他喝醉酒时，常见有龙在其上。

除了三皇五帝与后世的皇帝们有这样的诞生神话外，孔子、老子与佛陀这些创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创立者们，这些精神父亲们也有类似的诞生神话。比如孔子：

孔子诞生之时。夜晚时有两条苍龙，从天而下，附在孔子母亲徵在的房间上，母亲因为做梦而生了孔子。有两个神女举着香露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降下来，奏起了钧天之乐，列队在孔子母亲的房上。

空中有一个声音说：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世俗。又有五老列于孔子母亲的庭院中，他们是五星之精。

孔夫子未生之时，有麒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玉书上刻有：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

这里的孔子诞生的神话，与前面的三皇五帝的神话的不同之处在于，三皇五帝的神话是母亲怀孕的神奇经历，而这里的孔子诞生的神话，则强调了母亲生产一刻所发生的神奇事件。

孔子没有当上国君，也没有当上皇帝，仅仅是一介布衣。但由于他创造了作为中华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因而被后世称为“素王”。同时他的父亲是殷商的后裔，而殷商属水德，故孔子又被称为“水精之子”。

同时，在这一孔子诞生的神话版本中，出现音乐，出现了话语，还出现了文字。

我们也有老子诞生的神话如下：

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他的母亲曾经见到日精下落，日精如流星一般飞入了李母的口中，从而有孕。历 72 岁而生。在这 72 年中，常常有五色云围绕着老子的母亲，常常有五行之兽护卫着她的房子。老子是在陈国涡水的李树下，剖开左肋而生下的，因而老子姓李。同时老子出生时头发就是白的，因而号称老子，老了的儿子。

这则老子诞生的神话很短，但它既包括母亲怀孕的一幕，又包括了母亲生产的一幕。母亲怀孕的一幕暗示老子是日精之子。而生产一幕中的剖开左肋而生，一方面是指老子是母亲难产而生的，另一方面是针对佛陀的出生而言的，佛陀是剖母亲的右肋而生的。在左上右下的中国传统的象征系统中，剖母亲左肋而生的老子是在上的，剖母亲右肋而生的佛陀则是在下的，更一般地说，它还暗示着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体系是为左、为上的，佛陀创立的佛家思想体系是为右、为下的。

上面所列举的父亲诞生神话都属于中国自身的传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神话。除了这些神话外，我们还能找到印度传来的佛陀诞生的神话。

比如：

佛陀的母亲饭净王夫人，在白天睡觉时，梦到自己乘坐在长有六根牙齿的白象上，非常的高兴，于是感而有了身孕。佛陀在四月八日从母亲的右肋而生。落到地上时，走了七步，举起右手说：天下没有能够超过我的人。说话之间天地大动，整个王宫一片光明。

佛陀有三十二相，十种好，身高一丈六尺，体皆金色，头顶有肉髻，脸颊如狮子，舌头长到可以覆盖整个脸面。手把千辐轮，顶光照万里。

关于耶稣诞生的神话，我们有：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到一个童女那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降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护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玛利亚于是怀了孕，并在伯利恒的客店里生下耶稣。

由于仅仅是靠天使传达的上帝的话语，玛利亚就怀了孕，因此有人戏称玛利亚是耳朵受孕。

我们显然要假设在西方的父权文明诞生之际，也存在着像中国父权文明诞生之际那样的以具体的实物作为生育客体的父亲诞生的神话。借助于这些原始神话，人们创造了上帝的概念，上帝就替代了那些具体的实物而成为了抽象的生育客体，成为了让母亲玛利亚受孕的抽象的生育客体和让儿子耶稣认同的抽象的认同客体。也就是说，上面的耶稣诞生的神话应被理解为，西方文明中的父亲诞生神话的一个继发版本。

在上述的天子诞生的神话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母亲的母性欲望。母性欲望的下限形式可以表述为，期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父母的欲望。而其上限的形式则可以表述为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伟大父母的欲望。

其次，我们在这些神话中看到是儿子们创造的业绩。他们发现良种，创造文字，创设新的政治制度和创建新的宗教或者新的思想体系，从而

从神奇的儿子成为了伟大的政治与精神父亲。儿子们的这些努力与创造均可以视为既是母亲的母性欲望的达成，又是他们自身的子性的成为父亲、成为伟大父亲的欲望的实现。

第三是生育客体，在父亲未出现之前，这些生育客体是一些具体的实物：大熊足迹、鸟蛋、薏苡等等。借助于这些客体，父亲得以诞生。当父亲的概念出现之后，这些生育客体变成了天、龙、上帝这些象征着伟大父亲的超越概念，成为了儿子们认同的、继承的客体。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生育客体类似于拉康的石祖与父姓的概念。但是在拉康那里，石祖是母亲的女性欲望的对象，父姓则是乱伦禁忌法则的代表。而在这些神话里，这些生育客体一方面显示了母亲作为女性的缺失，母亲不能单独孕育孩子，必须借助于第三者才能受孕生子。另一方面，这些生育客体起着儿子们的认同客体的作用，儿子们认同于这些客体而创造出文明之物。因此，这些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父亲的父性欲望。父性欲望与母性欲望一样，其下限形式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父母的欲望，其上限形式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伟大父母的欲望。

母亲的母性欲望与父亲的父性欲望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双亲的亲性欲望。这一欲望的下限形式保证了人类精神的延续与世代的继替，保证了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从前一代到后一代的传承。这一欲望的上限形式则保证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代际传承的基础，推动了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变异与发展，推动了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复杂化与丰富化。

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从上一代到下一代的传承是在父母与子女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子女在接受父母的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人类的基本的精神疾病、精神问题与精神冲突均应纳入到这一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传递、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来理解。这正是我们的代情结概念所要表达的东西。

受天子诞生的神话的启发，我们还进一步将亲代的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传递与孩子主体形成自己的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孩子在出生甚至在子宫中通过与母亲的互动，形成

了自己的一阶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第二个阶段是孩子三、五岁时，父亲的介入，孩子在与父亲的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二阶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也是在第二个阶段，孩子主体形成了自己的性别化结构，形成了孩子主体作为男孩的或者女孩的性别化人格结构与认知结构。

而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仅仅是孩子主体形成其性别化精神结构过程中所出现的情结，亦即性情结。也正是因为这一情结是一个在二阶精神结构形成时出现的情结，是一个二阶的次要情结，因而，它就并不必然出现在中国的代表着集体无意识的神话系统中。同时这一神话出现在希腊乃至西方文化中的事实，或许还表明在西方文明中，俄狄浦斯情结以一种强的形式而存在，以一种显性的形式而存在。而在中国文明中，这一情结则以一种弱的形式而存在，以一种隐性的形式而存在。

而代表代情结的“天子诞生”的神话广泛地、大量地存在于中国的神话系统中，则表明代情结在中国以一种强的形式而存在，以一种显性的形式而存在。在西方，基督诞生的神话的存在一方面清楚地表明了代情结的存在。但另一方面，此类神话在数量上相对稀少的情况则又表明，相对于中国而言，代情结在西方文明中或许是以一种相对弱的形式而存在的，或许是以一种相对隐性的形式而存在的。

更进一步，无论这两个情结在东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形式是怎样的，代情结在东西方文明中都是孩子主体在与父母互动中形成其一、二阶精神结构的整个过程的情结。而作为性情结的俄狄浦斯情结则是孩子主体形成其性别化人格结构的二阶情结。也就是说，代情结将性情结包含在其中是由东西方文明共同的人类精神结构的发生、发展与变异的逻辑所决定的。



话语与精神分析专题



话语与精神分析

纳达莉·沙鸥^① / 著

罗伦 / 译 陶杏华 / 校

我曾经举办过一次为期十五天的讨论班，迄今已有六年，在这个讨论班上，尽管存在着语言的障碍，但我认为，图示、图表和扭结能更简明地在语言障碍之外被传递，以此方式，我展开了拉康的基式。在没有话语的情况下，基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被完整传递，这有点像拉康阐述它时的赌注。拉康还一贯地强调，即便在最抽象的数学领域，研究者也是通过被言说和被想象的阐述进行沟通的。这些基式所传递的信息触及另一个难题，正如霍大同教授让我注意到的那样，这是多少与数学和拓扑学的构建相关的流畅性方面的困难。为了方便操作，这些基式需要一些基础数学知识（事实上是很少的），但作为一个额外的困难也让人扫兴。总之，我们认为，为了读拉康，务必做出自己的一份尝试，甚至那些“可完整传递的”的合理基式也可能会提出一些问题，并要求主体的迂回。在这段用于学习旅居的日子，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既感受了大学的生活，也参观了成都和近郊的一些地方。在道教氛围的山上，还与一些学生一起散步。另外，关于这次会议的想法，我和霍大同都已经有了些时日了。

在这次研讨会上，精神分析将会以完全不同于基式的方式被讨论，

^①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教授。

似乎是以现象学的方式：精神分析是一种话语的经验。在精神分析中，可被作为明显事实而被接受的是，人们在言说。拉康从1953年的文本“话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就开始——它标记着其教学活动的开始——邀请我们去探究这个最明显的事实。

话语是在那个言说着的主体那边的，而语言则在社会、大彼者之地点这边（主体应在这里找到其位置）。而主体与其交谈者都要遵从同样的语言法则，这就涉及到了主体间性。拉康在其最初的教学认为，分析是在两个主体之间发生的，这一关系旨在从想象轴所引起的干扰中抽离出话语的符号轴。我们由此进入沟通交流的领域，其明确的表达是：“人类的语言构成了一种交流，发出者以翻转的形式从接收者那里接收了其自身的信息。”^①由此，旨在被解释的欲望本身被定义为大彼者的欲望，由大彼者唤起和产生。

这样的一种关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人们遵从于同样的法则，因而相互理解！但是，拉康指出，这样的立场削弱了解释的重要性，并且有把分析家自身价值（患者理应去适应）作为现实标准的危险。

很快，与主体间性相反的是，拉康强调分析家与带着痛苦、症状和请求而来的分析者之间的不对称性。分析的关系不能被构想为仅仅是符号性的，而应仍然是一种纯粹的话语关系。

实际上，分析家支撑着转移和转移的爱，分析家此时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假装物（semblant），客体的假装物而存在。在拉康的理论中，这一原初客体被一个字母——小a所指示。选择一个字母来指示这个客体，可被解释为担心会陷入对客体关系的种种误解中。在某一刻它使人着迷，把转移关系引向最为早期的婴幼儿期关系上。在拉康看来，这对于圈定欲望问题仍是非常不够的。

小a，在能指中处于拓扑学中洞的位置，被分析家具体化为分析的时间，它是冲动、所有冲动所围绕的圈子。我们将在这次研讨会的大量

① J. Lacan, *Écrit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p.898.

案例中发现，在话语和身体之间，这一联结是非常关键的，它要求着分析家的在场。

由此，在以下意义上，精神分析中的话语这一非常宽泛的主题是非常临床的：它以不同的方式（每个人有其方式）询问那些更经常是“以精神分析为导向的心理治疗”的实践者。其实，了解绝大部分的治疗属于心理治疗的范畴或是应用精神分析的范畴（其目的从根本上是治疗性的），不无裨益。这并非是说精神分析是毫不费力的（其有效性主要是基于与分析家的相遇）。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发现就没有精神分析的存在。分析家，根据其话语的不同关系，允许患者将他自身的陈述从对享乐的（想象或实在的）粘连中解脱出来。我们将在今天晚上的一部有关孤独症的电影中看到，这一话语的不同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人们所谓的“纯粹精神分析”要求更长时间和更确定的参与，即愿意达到对小 a 处的享乐地点的剥离。这个位置是实在的位置，它逃脱了话语，但我们可以下决心去命名它（通过一个最经常是与分析者的历史相连的能指），在被命名时它就变得可被接受。因此，分析的结束由案例本身的一种重构和满足（并非仅为认知范畴的满足）所标记。正因为如此，拉康向那些想传递某个东西（与良言之伦理 [une éthique du bien dire] 相符）的人提出了通过程序的建议。然而，这个通过并不遵从客观的标准，不可以被量化；如果想要逐条地规范、限定、证明分析家所要表明的东西，我们会看到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譬如儒教中对忠诚的苛求也不仅仅是由一场考试来决定的。伦理的立场并非通过社会结构来得到保证和获得其有效性的，这从根本上是私人化的事务，尽管涉及到许多的壹（uns），正如同拉康派分析家所熟知的“由自己及其他几个人授权”。在我看来，这一存在于分析家话语和欲望之中心的伦理维度，是贯穿这次研讨会的中轴线。

感谢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主任霍大同，六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举办一

个研讨会的热情，与我一起组织了这次会议，开启着对拉康的深入学习。感谢赵旻，为我们将在一起工作的这些天做出最好的安排而进行多次沟通；感谢谷建岭，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化我们与大学的合作关系。

迫不及待地要想见到其他参会的中国同行……

精神分析中的话语：其能力与限制

达米安·居约内^① / 著

刘瑾 / 译

【内容提要】本文从拉康的教学出发，分别描述了拉康的两种主体的概念：完整的主体，写作S；以及划杠的主体，写作\$。与这两种主体概念相连的，是不同的主体的话语，前者的典型形式是所谓创立的话语，即大彼者保证了主体之创立；而划杠的主体遭受的切分，源自于“能指的活动”以及“说话”本身，因而产生了“欲望与话语的不相容性”。由此，我们可以讨论话语在分析中的作用，以及其限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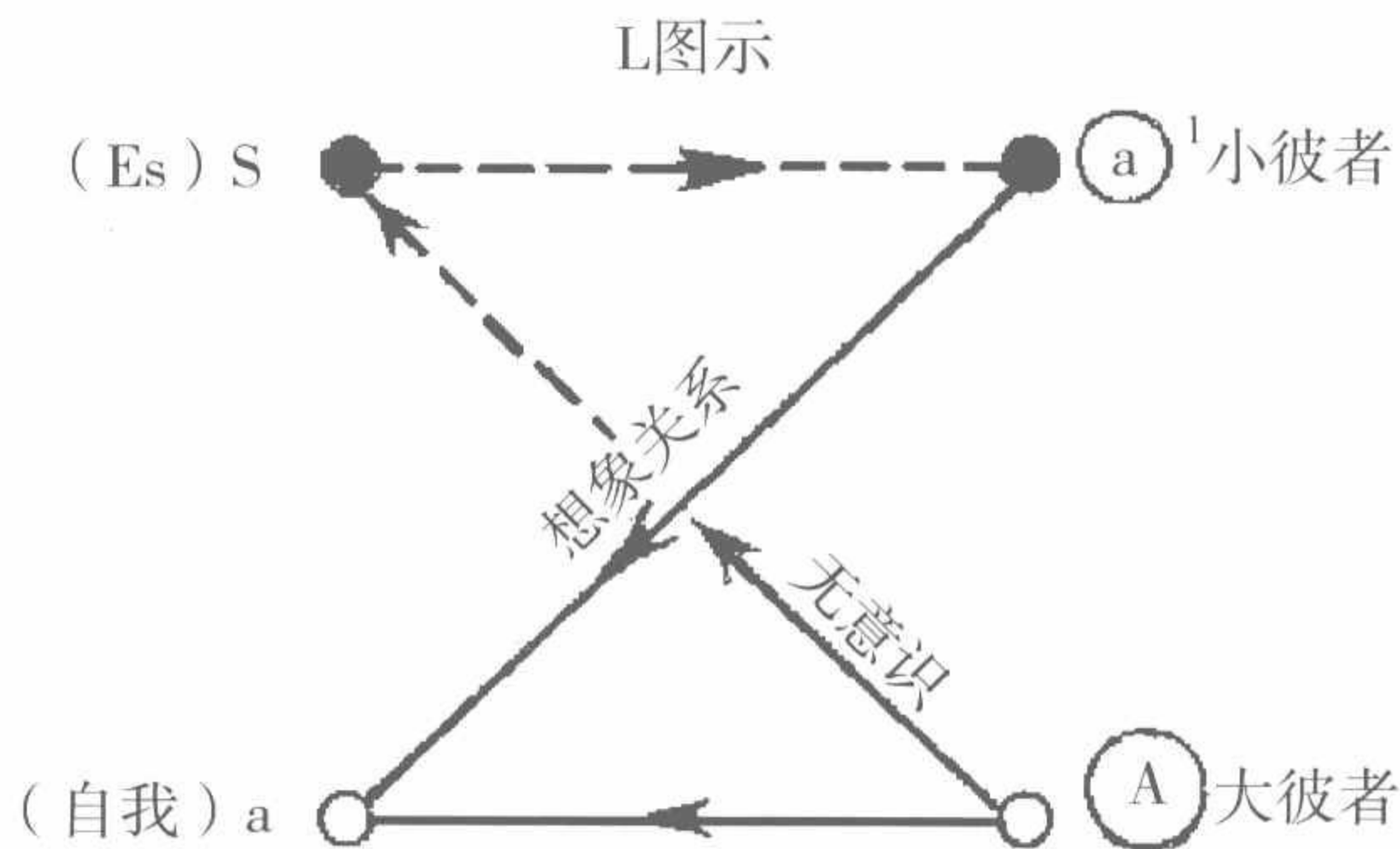
【关键词】主体 划杠的主体 话语 欲望

我要感谢我们中国同事们的接待，它允许我们从话语的主题出发，交流我们的精神分析实践。作为巴黎八大精神分析系的老师，我和法比安·芬瓦克斯非常高兴这次相聚还得到了大学的支持。作为介绍，我打算驻足于拉康教学的一个关键时期，即50年代后期，来讨论精神分析中的话语，其能力与其限制。他在那时引入了他的划杠的主体（\$），即言说主体。这一主体与自身分离并缺乏存在与统一，与之前的大写S不再有任何关系。拉康说由于大彼者，那个没有划杠的S能够找到其身份和存在的能指。主体的两种不同的降临，其结果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的概念。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副教授。

作为大写 S 的主体

作为大写 S 的主体，我们在拉康著名的 L 图示中找到其描述。他在图中对立了两个轴，并将之描绘为两个区域：想象与符号。^①



在符号的限定轴之上，你们会发现完整的，“未划杠的、鲜活的、存在的”主体，^② 他与大彼者——大写的彼主体——有着关系。这一关系被认为是辩证的、主体间的，而在那儿展开的话语被认为是实的、真的，它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于在想象的轴上所展开的关系（空的话语）。

1956年，拉康提到这种实的话语的两种典型形式：与伪装相联的谎话和欺骗，以及特别是创立性话语。^③ 我们感兴趣的是第二种，拉康在那里参考了认识的辩证法（科耶夫对黑格尔的重读）。著名的例子是：一个主体对大彼者说：“你是我的妻子”，或者，“你是我的导师”，因而就将其视作为了某个地点，这使主体有可能反过来定义他自己。在我们的例子中，分别是“丈夫”或者“弟子”。拉康告诉我们，如此，大彼者“应该被认出，以便你们能够使自己被认出”。^④ 如此，主体看

① 例如可参看拉康第二个讨论班的第19章，第284页。

② J.-A. Miller, *Conversation d'Angers*, p. 107.

③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II*, p. 47.

④ *ibid.* p. 62.

来不能直接地命名他的存在；他能这样做，是因为有大彼者作为中介和保证。正是通过他的话语活动，主体才得以创立、出现，他因而同时承认，大彼者反过来能够获得他的存在、他的身份的能指。相反，如果他不承认，如果需认出的大彼者被排斥，^①那么这就是精神病，在话语的水平上，其结果就是所谓的谵妄。^②

作为划杠 S 的主体

一年之后，1957年9月，《字的机制》出版。拉康的主要参考变成了索绪尔和雅各布森。此后，对能指活动的理解基于能指在所指之上的算式，此二元将代替由主体-大彼者的符号对子所构成的二元。从隐喻和换喻的机制出发，能指的决定性如今被凸显出来。1958年7月，在“治疗的方向”中，我们有了第一个关于划杠主体的定义。他所遭受的切分（Spaltung），源自于“能指的活动”^③和“他说话”^④这一事实本身。此外还涉及，一个主体被一种想诉说他的欲望的意愿所推动，即使存在着“欲望与话语的不相容性”。^⑤

拉康要引入这个新的主体，其先决条件是大彼者成为一个地点——大彼者作为能指的宝库，那里始终缺少一个能指，该能指固定住欲望而不将之与请求相叠合。大彼者因而是不完整的，其自身带着一杠，拉康后来在59年的第六个讨论班中进行证实，那时他说：“不存在大彼者的大彼者。”^⑥至于话语，在58年的年终，拉康事实上将之放置在请求的旁边，因为分析家、大彼者那边的回应是缺位的，这因而导致另一个维度——欲望维度的突冒。而被切分主体的话语是否能够表达这个欲望仍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II, p. 64.

② ibid.

③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 p. 439.

④ J. Lacan, «La direction de la cure», in *Écrits*, p. 634.

⑤ ibid.

⑥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 p. 353.

是未知的。

话语的限制，对于治疗的后果

在“治疗的方向”一文中，拉康强调“自由话语”，它既区别于对所有意义开放的自由联想，也区别于实的话语，后者会给出捕获真相的错觉。这示意我们，（自由话语）所针对的正是欲望。不过，如我们所强调的，拉康在同时指出，欲望的能指总是逃脱被切分的主体。就像雅克-阿兰·米勒所表达的那样：“在其话语中说我（je）的主体不能在其欲望中说我（je）。”^①

从此，分析的运用在于显现不能说出的东西。围绕着这个“不可能说”的点，欲望在转动（作为“在缺^②的换喻”^③），被划杠的主体（在缺的主体）也在转动。此后的问题在于接近消失的点——拉康也说是“一个缺位的地方”^④。

就这样，跟随拉康此刻的教学，我们以某种方式从“话语的能力”来到了其“限制”，对一个言说主体的分析路线本身也随之改变。一段治疗的初期通常伴随着某种缓和并获得某种知道，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可以清理出一个不可能的点、一个剩余，那时主体应该与之和解。

① Jam, *Clinique lacanienne*, cours du 9 déc. 81.

② 法文为 *manque à être*，译作“在缺”，与“缺在”（*être manquant*）相对应。——译者注

③ J. Lacan, «La direction de la cure», *Écrits*, p. 623.

④ J. Lacan, «Remarque sur le rapport de Daniel Lagache», in *Écrits*, p. 666.

话语所言远甚于主体所以为

让-皮埃尔·克罗茨^① / 著

谭羽辰 / 译 陶杏华 / 校

【内容提要】本文从拉康的“话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出发，介绍拉康对语言结构、话语和话语功能的研究，从多方面阐述“话语所言说的内容远远超过主体以为自己所表达的那些内容”，证明“话语首先是享乐，而后才是交流的媒介”。随后分析享乐、话语与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说明享乐、享乐话语的作用及其对精神分析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精神分析 话语 享乐 身体

“没有话语，就没有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一心想要忘记这点之前，拉康重提了它。弗洛伊德的继承者更倾向于阐述一些由解释（精神分析家用它来进行操作）而获得的知识。对主体而言，这些知识意味着意义的边界，即话语的意义预先就是被设定了的。

① 精神科医生，曾任斯特拉斯堡医院住院实习医生。实践精神分析已42年。从弗洛伊德事业学院成立之初，便是其分析成员，并在其领导层任职20年。曾是雅克·拉康成立的巴黎弗洛伊德学院成员。在巴黎-圣丹尼斯（巴黎八大）临床科和波尔多临床科任教。同时也是世界精神分析协会成员，（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康派学院的成员和新拉康学院成员。

话语先是享乐，而后才是说话的媒介

在一个分析中，只要主体在说话，那么澄清的意图总是存在的。不被澄清的剩余之物也会继续存在。总存在着假定的、无穷尽的和从未停止存在的意义。拉康在其教学的奠基性文章“话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①中，通过阐述由语言结构而开启的知识，从而谈到话语及其功能。有些内容是话语所说的，有些内容是人们听到了却不止他们所理解的那些。但也有一些因为人们在讲话而听不到的，但仍然出现的内容。

首先，拉康使用了区分所述和陈述的结构语言学。他提升了能指逻辑的价值。语言范围的探索 and 多重意义的获得，在其结果产生的同时，却让某种剩余的东西留存下来。这个剩余首先与想象有关，并且通过注定要去揭示其真相的符号运作而得到处理。它可能最终是作为一种不可消除的实在而被接受。在那里，分析家的行为（其沉默的在场不可缩减为意义）找到了它的位置。在话语的经验中，这一通道围绕享乐（这个概念接近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晦涩的满足而发挥着作用，它的在场超过了那些被言说出来的东西。

拉康是从空话和实话^②之间的对立出发的。实话首先有利于主体的“实现”，却会损害空话。“实现”所致的枯竭促使人们思考话语中空的，也许不是那么带有欺骗性的东西。在话语中存在没有被言说的、没有被理解的和没有被传递的东西。有些东西见证了无声的在场，尽管这些沉默是要在大量的言说、意义和影响等中去理解的。

拉康说过，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力地重复道，话语并不首先是用来交流的。它不仅仅用来澄清隐藏在言说中的意义。诚然，这些维度是存在于言说中的，但也有某些东西在言说之外。话语来自身体，没有身体就没有话语。更进一步说，通过不被理解的、沉默的、在“想说”

① J. Lacan, *Écrit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p.237-322.

② J. Lacan, *op.cit.*, p.247.

之外的和弥漫的噪音这些东西，话语证明了身体的在场。

拉康在他最后十年的教学的开始，就提出“享乐蕴含在最细小的话语行为中”。^①话语首先是享乐，然后才是言说的媒介。在所预想的传递、所有想要表达的意义之前，它首先包含着“想-享乐”。话语-享乐使得身体在场，因为它在说，而不仅仅是被看见。^②米勒关于拉康的演讲就提出把“言说着的身体”作为无意识之“实在”的基础。对于弗洛伊德在其时代所强调的文明之不适（被命名为不可缩减的文明之缺憾），那些实在之无意识的东西如今有了一种特殊的回响。因而就有可能将这个不适与言说实在之不可能性相联系，与言说着的身体层面上的在场相联系。

话语-享乐的影响

话语首先是用于享乐，而后才是用于交流，这对精神分析的走向造成了一些影响。拉康说这曾是弗洛伊德的发现。^③满足蕴含在最细小的话语行为中，而不在于其意义中。这一点可以在梦中被更好地观察到，在梦里话语完全是独自起作用的。惰性，对所有解释意义尽可能的不服从，这些都证明了推动人去言说（而又不能完全言说）的某个东西的存在。弗洛伊德发现，梦的意义即是欲望。不过弗洛伊德用来命名梦之“脐点”^④的东西包含着一个不可理解的东西。与拉康一起，人们可以把这个脐点与享乐相连，后者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被传递。享乐确实存在于最流利的话语中——它看起来是为了交流某事。但是享乐本身并不被交流。它从身体处为主体制造了一个地点（其建构如同一个凹陷的空）。拉康

① J. Lacan, «La psychanalyse dans sa référence au rapport sexuel», conférence donnée à Milan le 3 février 1973, in Contri G.B.(ed), *Lacan in Italia 1953-1978*, Milan, La Salamandre, 1978, p.69.

② J. Lacan, «Le stade du miroir», in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p.93-100.

③ J. Lacan, *op.cit.*, note 3 ci-dessus, p.69.

④ S. Freud,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Paris, PUF, 1967, p.446.

的主体，他称为“分裂”的主体，被一个能指（为了另一个能指）所代表的主体，无身体不能构建。此构建不会导致一个全部，而是付诸行动。如此，对分析实践而言，它成为了实在的支撑物。

从弗洛伊德开始，人们就说，精神分析开始于实践。话语首先是享乐的媒介，它证明了享乐的身体，后者给话语提供支撑。拉康提到了他的起点，先前的大彼者，那是话语的地点。从那时起，这个大彼者就在享乐的身体中找到了它的起因。享乐是在话语中被运载的，而话语看起来是朝向大彼者的，是源于大彼者的，因为言说可以从大彼者的角度而被解释。但是，推动言说的是享乐，对此，弗洛伊德是通过冲动和力比多（在言说着的身体这边）来展开这一领域的。

像享乐这样的话语行为并不会使意义的构建失效。对主体来说，这些构建试图考虑的是他根据何种形态来安排他的症状——在那里，他将面临实在。话语中有的是一些行为的东西加入到意义中，即使这一加入更多地是在那里打洞。这些东西在那里工作，作为一个超越的维度而被制造。享乐试图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摆脱惰性、障碍和扭曲。这些在言说之间持续存在的不可言说给赋予主体以风格和标记（signature）。意义从歧义中浮现。属于每个人、每一症状的无法言说，看起来正是主体独特性的标记。

对剩余、总是抗拒以及无法言说之实在的关注，对不能在话语中被表达而完全作为“肉身”出现的东西（既是无可穷尽的，又是异质的补充物）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是享乐的话语，隶属于言说的身体的话语在精神分析中所引入的东西。

对享乐的“过度感知”

安娜-玛丽·勒·梅西埃^① / 著

孟翔鹭 / 译

【内容提要】本文围绕一位有视觉障碍的女性分析者的个案展开。通过对自己工作失误的描述，她将一些早年经历中关于双亲的视觉享乐的记忆与工作中的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在分析中的言说，她的视觉享乐以及工作失误的能指歧义得到了呈现。正是这些能指的歧义让我们能够看到分析者症状的无意识根源。

【关键词】能指 歧义性 享乐

在法语中，“感知/收取”（*percevoir*）这个词既可表示看到和也可表示收钱或收益。我将跟你们谈论的这个年轻女人在银行工作。在分析中，她将会连接感知/收取（*percevoir*）这个词的两种意思。

在分析过程中，她出现一个症状：当她感到被要求在业务上证明自己能力的时候，面对着各等级职位的其他男人女人们，她只能看到这些人的半张脸。

我们一同看看她历史中的两个关键时刻：

——6岁时。她母亲正在看电视。她躺着并且从床上看到一幅影像，一个大人拽着一个小女孩的头发。她听到尖叫声并问她妈妈发生了什么。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母亲回答说这是一个犹太小孩。这个时刻以谜一般的方式经常回到她记忆里。难以抹除的影像强调出目光的重要性：母亲看电视的目光，孩子看母亲所注视的影像的目光。伴随着尖叫与母亲的答复，声音也呈现出来，它通过能指固着于吸引母亲兴趣的东西：被人拽着头发的犹太小女孩。这个场景固着下来，是因为这个女病人在此感觉到某个吸引她力比多的东西。孩子的视觉享乐和母亲的视觉享乐扭结在一起。但是，女病人始终处在看到这一影像的震惊之中，只能翻来覆去重复讲这个通过连接着“犹太小孩”这个能指而构成创伤的场景。这个能指意味着享乐的不可道的内容。

——另外，这个受父亲偏爱的小女孩非常早就注意到她爸爸对女人有种“贪婪”的目光，而且她青春期都忙于辨别哪些女人能讨他父亲欢心。通过认同于父亲并把性欲、目光、口唇性（oralité）扭结在一起的方式，她老是盯着女人看。

在由第一次与男人的欲望相遇——当这个男人触摸她肚子的时候——引起的恐慌之后她进入分析。她所欲望的东西让她害怕，而且她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她的上级没有给她奖金那天，她很消沉，之后几个月，以前那个出色的她不断抱怨，时不时停下工作并且去一个精神科医生那儿求医。我并不关心她的这些尝试，也没有探讨她为了从眼科医生那里弄到一个眼底检查而采取的手段。她自己也说，她知道医生不会查出什么。事实上，只能看到半张脸的症状并不关医学的事。

有一天，当她又在抱怨这位负责人的时候，我使她注意到她所做的是把自己当成那个“jouive”^①。她很吃惊并不知所措，然而她的确听到了：“享乐-想要”（jouis-veux）。抑郁停止了，她理解到她使自己变成了受害者。

之后很快，她来分析时解释说她花了一天时间给银行的一些客户打

^① jouive[ʒwiv] 的法语发音和 jouis-veux[ʒwi-vø] 几乎相同，和 juive [ʒqiv] 相近。juive 是法语单词 juif 的阴性，在上下文背景中指：“犹太女孩”。——译者注

电话，是为了告知他们，由于银行预扣款的一个失误，他们将会被退还多收的（trop perçu），这是由于失误，银行从他们的账户上收了一笔钱。这一天，通过不断重复“多收的”（trop perçu）这个词组，她理解了这些词与她自己有关。她明白了自己的症状对应着一个经常侵袭自己并且被她防御的“过度感知，过度兴奋”。她说，很久以来在她母亲那儿看到的正是这种过度兴奋，但是她也补充说：“每当我被性欲牵涉的时候，对我来说这就如同对我父亲的享乐的一种过度感知。”接下来一次分析，她说：“这个过度感知击中了我的眼睛……”

此个案向我们展示了语言如何寄生在身体中。视觉器官被爱若化，由视觉冲动所驱动的目光胜过眼睛的官能用途。弗洛伊德 1910 年在他的“精神分析概念中视觉的精神性紊乱”^①一文中解释了这一点。他指出视觉成为被压抑物表象的支撑：曾经不想要看到的某个东西被看到了。拉康对我们说，目光帮助癔症主体通过自己的症状提出自身存在与自身性别的问题。我们也于此看出对拉康下面所说内容的那种确认：冲动，是身体中的回声，因为那里有一个讲述（dire）。^②

阐释抓住主体历史中一个能指，因而也是他话语中的一个能指，并且阐释玩的是歧义性。这种歧义不以事实为目的，而是通过在犹太女孩 / 享乐-想要（juive/jouis-veux）的表达中引起回响而瞄准主体享乐的位置。是什么在被说与被重复的内容里被享乐？通过谈论享乐 / 享受-意义（joui-sens），拉康创造了一个新词。一旦这个女病人理解到她的抱怨里包含一个享乐——对在母亲目光下被粗暴对待的犹太小女孩的认同之享乐——她就处于一个与她所说内容不同的位置。相对于抱怨的所述（énoncé）而言，她的陈述（énonciation）所处位置之谜更重要：也就是她为什么面对这个负责人——她把这个人想象为享乐她的全能女

① S. Freud, *Le trouble psychogène de la vision dans la conception psychanalytique*, «Névrose, psychose et perversion», PUF, 1973, p. 167-173. 亦可参考 Jacques-Alain Miller 的评论, *Biologie lacanienne*, Revue La Cause freudienne, N° 44, Edition Navarin Seuil, 2000, p. 41-44.

②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XIII, *Le sinthome*, Editions du Seuil, 2005, p. 17.

人——的时候采取受害者的姿态？相比于分析中展开的话语，这种位置上的改变允许她从偶然性中抓住那个在工作里突然出现的表达。在冲动的层面上，她把“多收的”理解为支撑着“jouive”的位置的东西。这是主体来自无意识的回应。她过多收到 / 过度感知的东西，正是对投向这个被粗暴对待的犹太小女孩——将会成为她幻想之关键——的目光的享乐。幻想可以这样被陈述：“一个小女孩被粗暴对待。”不想要看到的东西恰恰关涉到冲动和女性性。

女病人认识到，在她的性抑制背后隐藏着母亲的享乐令人恐惧的诱惑力。她也理解了，在她青春期激进行为背后——根据她自己的表述，驱使她为父亲“猎捕”女人——隐藏着欲望和受它折磨的担心。法语“猎捕”意味着为了杀死并吃掉动物而追捕它们，但也指追求女人。她尽力使父亲来谈论她——伴随这样的监督或者教育，她认为这样能够激起父亲的“贪婪”。这个癔症主体维持着从父亲视觉的一口的享乐所感知到的东西，但是却冒着忽视她自己作为女人之生活的危险。

如今，她称为“我眼睛的症状”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与自己的家庭罗曼史以及俄狄浦斯意义隔开一段距离后，她说到：“我还会谈论我的父母，但是我现在甚至不晓得我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分析仍在继续，它对准这个女性主体超越——她感受到其假装维度的——能指的享乐。

主体在通向话语过程中的特殊性

韦罗妮克·马利亚热^①/著

石岩/译

【内容提要】需要是身体固有的元素，为了生存，需要借助请求才能够得到满足，前提是主体与大彼者之间具有一种通过语言而得以建立的关系。进入话语的那个时刻，主体借助能指来指示自身，从而使自身像是一个主体。在这一主体性建构的操作中，不仅仅必须将自己算进去，也要把自己扣除出来。孤独症的主体被吸进大彼者之内，这也是其相较于所谓“正常”主体的特殊性。要使孤独症主体从自己稳定地封装于一个包裹在囊中的躯体状态中脱离出来，需要藉助与他们有着某种特殊关系的客体。

【关键词】主体 大彼者 话语 孤独症

说话是怎么回事？说话假定了主体与大彼者的关系。对主体来说，是什么构成了这个大彼者的基础？主体怎样通过语言构成自己，怎样将语言与身体链接起来？说话又有什么用？

为了让主体与大彼者、与世界的关系得以建构，就必须从大彼者那里获得一个基础性的批准，由此主体通过语言而和世界建立一种关系，且这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与世界相协调的。为了生存，所有的人类主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体都被迫借助大彼者：他要满足饥饿的身体，他就哭，首先是呼唤一个彼者（小写的彼者），由此，这个彼者带着客体而介入，而客体将能够平复他机体的紧张。这个彼者（大写的彼者）是占有客体的母亲，她说话、解释、试图用客体来减弱孩子机体的紧张，也通过词和话语来安抚这初生的身体，她带着些爱意地为他祈愿其它东西，她附加在需要的满足之上的，是更为原初的、谜一样的东西：即她的欲望。扎根于身体的需要，必须穿过能指的隘路。

儿童很早就选定位置，并且构建自己的大彼者。为了生存下去，他必须承认他终归需要借助于请求。从那时起，对大彼者的修改就摆在眼前。他要进入赞同大彼者的欲望之谜这一运动和复杂性之中，同时又不带着过大的焦虑，以便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他要想办法用这个最初的大彼者来获得自己那部分享乐。

在主体的生命中，进入话语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键的时刻。主体要抓住语言并让它变成自己的，去说话并且重复它。

这是 fort-da 的时刻。弗洛伊德谈过他的孙子玩的这个重复性游戏：扔一个卷筒让它消失，然后再拽回来，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伴随着两个能指 Fort 和 Da。这个游戏试图符号化母亲的去和来，并且让主体浮现出来。

但是，拉康在《讨论班 11》中说，不要忘记那个卷筒，因为这个游戏推动了其他东西而不是母亲的消失。这个客体——卷筒，被 fort-da 的重复所标记，以另一种形式指示主体，它意味着他的身体的一截试图挂载到一些能指上。^①

因此，被命名是不够的，某些东西避开主体，分裂主体，并使其成为其话语的主体。这是一种企图，想要让一个根本的缺失得以存在。可以看到两个维度：被划杠的主体的维度以及（有着他的洞的）大彼者的维度。

拉康说：“在儿童那里，有些东西还没有被结构所完善、推动，也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p. 60-61.

还没有在结构中被区分出来。”^① 这需要时间。

为了让主体能够进入话语，就必须不要混淆所述（*énoncé*）和陈述（*énonciation*）的层面。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说，当我说话时，我还没能说出我想说的，而一旦我说出了，它就已经不是我之前想说的话了。因此，话语就有两个层面，如拉康的图所指出的两个层面，不要把所述和陈述混淆在一起。当我说话时：我说，而这个说，说出了超出我所说的东西。无意识处于这个超出的部分中。

同意使得自己表现得像一个主体，这完全就是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可以为主体而拥有它的曲折故事、历史、挫折。因为说话的那个人，他为了表现得像一个主体，就必须与大彼者分开，但首先要把自己算进去。这是一个困难的操作。儿童为了获得一个足够好地建立的主体性座位，必须接受其分裂，由此某些东西逃离了他。拉康说，这可能会花上几年的时间，并在两条线之间徘徊：所述的和陈述的线。

在这一主体性构建的操作中，他不仅仅必须要将自己算进去，也要把自己扣除出来，为了主体存在，要把自己算进去并且给自己命名。必须注意到，儿童的句子中有些毛病：我有3个兄弟，保罗、欧内斯特和我。^② 拉康说，所有都在这了。为了命名自己，主体需要把自己扣除。这一操作对人类主体来说在一个话语的行动中进行。

孤独症主体的特殊性

然而有些主体不同意这样。这是一个处于黑暗之中的实在。大家注意这些母亲们关于自己的孤独症儿童所说的话，比如，我们听说过，在严重的孤独症个案中，她们的孩子从出生起就不停地哭，什么都无法让他们平息，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还有一些母亲说的相反：我的孩子非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p. 101.

② *ibid*, p.92.

常安静，不哭，我从来都不知道他饿了没有……当我认为他可能饿了时才让他吃，他又睡着了。

存在之深不可测的抉择！借助或不借助于请求？每一个孤独症主体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他们的独特之处令他们成为研究对象。最常见的是，被分类到一类障碍中，这些主体成为训练的对象，有时是暴力的训练，以便训练至达到社会可以接受的标准。

在对孤独症原因的研究过程中，陪伴着这些主体的精神分析家们被指控，说他们将孩子们的困难的责任归结于他们的母亲。孤独症被认为是一种与母亲相关的疾病。在欧洲，父母们对此非常愤怒，并且联合起来建立组织进行抵抗，不让精神分析家们接待孤独症儿童。

然而，30年来，由于拉康的教学以及米勒的解读，精神分析家们向前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东西。就这方面的工作，我所了解到的是：主体要构建自己的人格。他需要构建言说的存在的模式。孤独症者是一个无法实施这一必要的操作（被语言所代表）的主体，即：同意“由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来代表主体”。这一操作被拉康命名为异化，它构成了主体与世界以及与话语的关系，然而并非没有接受失去某些东西：失去一部分存在，以及失去无法触及的享乐——“a”。

如果主体与语言的关系的这一操作无法实现，我们就会遇到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个案。孤独症主体被吸进大彼者之内。他是被说的。他从中挣脱出来的办法是构造一个自己的孤独症罩子——对他的生存和存在而言不可缺少的边缘。而在这之前，是语言穿透他、享有他。他也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说话，他被语言机器化。他只能接受别人向他说话，或者他向大彼者说话。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主体闲逛、不说话，所能说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叫喊。其他的孤独症者会不断地重复同一个音节或者刻板的句子。还有一些会纠结于完美的知识。这些主体完全屈服于对“壹”的纯粹重复。因此，这些东西必须服从于一个绝对的、永恒的秩序，并且没有什么能够将其打乱。因为无法分离，这些客体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所有被主体投注的客体都变成身体的延伸。涉及的是怎样的身体？是一具

没有形象的身体，因为它没有被一个能指所代表，也没有与那些客体分离。然而，正是从这些客体出发，主体才能在这个世界上通行。

那么，怎样陪伴他们？怎样才能使得主体从自己稳定地封装于一个包裹在囊中的躯体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这就假定不让主体的新对话者成为陈述过程的直接目的。尤其是放弃使其成为话语和请求的目的。

孤独症者与某些客体之间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这为分析导向的研究指示了重要线索。孤独症主体与一个特定的、补充性的、被选定为爱若化的客体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结合模式。主体正是和这一客体封闭在一起。那么，怎样才能插入他的循环之中。怎样才适用于这一情况？正是从这一客体出发，他将从大彼者那里抽取一些新的客体，由此工作才是可能的。伴随着话语链，从一个客体到另一个客体。这些话语链将创造新的换喻链，并且允许孤独症儿童拓宽他与世界的关系。^①

回顾《开放的天空》

《开放的天空》这部电影是在“菜园”这一精神分析取向的机构拍摄的，展示并表现出与孤独症障碍的儿童的相关工作情况，不过这些儿童的孤独症性防御并不多。我们更愿意将他们放在儿童精神病一边。他们缺乏一种被语言（其发音和语法）所保障的、代表自己的方式，这些儿童被语言所穿透，身体难以进入语言。他们要应付让他们激动和焦虑的无限制性、无边界状态。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特的。不过它也展示了怎样陪伴他们找到解决办法。阿美娜在别人叫她、等她回应的时候无法说话。在工作坊中玩扮演游戏时，她只能用手指来表示数字，以便找出谁第一个开始游戏。^②当面对请求时，她变得僵硬，

① Laurent Eric, «La bataille de l'autisme», Navarin-Le champ freudien, p.101.

② 在工作坊中，领导者首先会出一个小谜语，由第一个猜中的孩子来演示出这个谜题，孩子可以指定一名成人陪着他来准备一幕短剧，随后在众人面前表演。这次的谜语是有关数字的。——译者注

再也无法发出一点声音：哑了。然后她就用自己的手指比画出数字，让别人说出来。然而，在玩扮演游戏的场景中，她能够表现并且具现这个将她穿透的大彼者。

爱丽森被一些性化的词汇所穿透，这些词侵占了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没能足够地构建为一个形象，身体是碎片化的，而她害怕失去这些碎片，以及过多地停留在她身体中的那些客体。她试着将拼图拼整齐，就如同她试图在玛里亚纳摆放的摄像机的注视下将自己拼起。当她做饭时，有虫子从材料里面爬出来了。鲜活的生命总是随时准备出现。不过，在其他人的陪伴下，她借助在自然中找到的那些客体来应付，并且这些客体一点点地解开面纱，让她起了好奇心，并且没有焦虑。

让-于格难忍高温，说：“是太阳让我出汗。”在这句话中，主体的位置没有被确定。他被让他出汗的太阳所穿透。有一次他发作时陪伴着他的玛丽，提议保持沉默、不说话。她清空了在他那边过于在场的大彼者。让-于格安静了下来。由此，和别人之间的一个亲近联系得以建立，关于他身体上遇到的困难的一个交流得以建立。他重新集中注意力到他所特别关心的那些客体——连环画上。

伊万，他在音乐工作坊时非常兴奋。别人建议他写东西，他也这么做了。他试图用写下的笔画来讲个故事：“小红帽向狼大喊大叫因为你想要她的饼，她的饼不想要我吃它，不过我已经吃了它，他就对我说啊！”他的陈述没有按照语法规则组织。我、你、动词、客体，所有这些都是混乱的。这个短故事是在他的身体出现一次巨大的骚动之后写出的。然而，伊万试图说话，并且试图用笔画来重新组织身体、抓住它。某些东西被重新聚集起来。他平静了下来。人们发现，在音乐工作坊中，音乐怎样组织他的身体；不仅仅是音乐，还包括间奏或儿歌：即重复的东西。在这部电影的开头，所有的都溢出了边界，这个孩子自己倒奶时都不看杯子边。然而，三个月之后，他和别人的关系变得有礼了。他可以给每个人都倒饮料，就算是一边倒一边说话也不会把饮料溢出来。不过，他做的要比这还要好。在最后一个场景中，伊万坐在他的床上画画，还在

膝盖上着色。他瞥见玛里亚娜和摄像机，然后一边着色一边哼着一首歌：是被很好地结构化的一系列能指。人们感受得到这首歌的旋律，但是歌词不那么容易让人理解。注意到玛里亚娜的认真态度，伊万挺直了身体。他看着玛里亚娜，问道：“你知道这首歌吗？”玛里亚娜注意听，但是没有直接说熟悉；她只是有点熟悉，但不是非常熟悉。句子已经能够被组织起来。它被投出，并且在“大彼者”中找到了填充材料，不是随便哪个“大彼者”，而是一个不知的、缺失的“大彼者”。伊万继续，然后说——我已经唱了这首歌！之后他重复这首歌结尾的叠句，因为玛里亚娜不熟悉。他又为玛里亚娜复述了重复的部分，并强调叠句中的最后一句：“我爱你已经很久很久，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在说的时候他又用一个手势来表达一个意思：“就是它！”他说：“你忘记歌词了！”之后还有一小段对话。伊万能够提问题，安排周围，分清谁是谁，在和别人对照下知道他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他的身体着陆了。在关系中以缺失为支撑的爱的维度显露出来。现在他有一个身体，并且能够说出自己的话：

伊- 你有没有一个爸爸？

玛- 有。

伊- 他住在你那，在你家？

玛- 不住在我那。

伊- 你一个人住？

玛- 不，我有个男朋友。

伊- 他叫什么名字？

场景结束。

从“Petit Prince”到独一无二的鲜活生命的蜕变

李梦慈^①/著

【内容提要】本文呈现了一个孤独症的个案。来访者表现出目眩神迷的举止、可怕的呐喊、意味深长的自残。因为孤独症的主体难以通过语言被直接触及，专家组通过精神分析背景下的活动疗法与来访者进行了工作。通过身体上的梳理和无意识的语言交流，来访者逐渐打开了自己封闭的外壳并进入语言。

【关键词】孤独症 活动疗法 语言

这是一个漂亮的少年，他有一头像小王子一样的金发，不动声响地乍然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是我受聘到医学教育研究所后第一天遇到的第一个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围巾，一端在前，另一端搭在肩后。他的身体被一个宽大的皮带缠绕着。他裹在一个超大的外套里，步伐漂浮。他的肩垫竖向地屹然挺立着。远远望去他像被悬挂起来一样。

很快我就得知他是个盲人。他的父亲贴在他身后帮助他慢慢向前走。他有自残倾向，于是他的身体一直被束缚着。接下来很快我就发现他不说话，可是他会发出可怕的喊叫声。

有关他的过去我不愿多说，可是我想说说最让我困惑的几点。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自从三岁以来，他只能缩在一个狭小拥挤的空间，钻进厚重并且外面裹着绷带的被子里才能入睡。他不能接受和他父亲的分离，也不能忍受父亲的迟归，哪怕是仅仅一分钟。有的时候，他嘴里会发出一些像语言的声响，他处在一种奇怪的激烈状态之中。

他任何时候都戴着一顶头盔。他的双手被布皮带捆着，固定在身侧。他的脸上有条绷带，顺着脸颊一直缠绕到耳侧。他有过严重的自残历史，好几次被输血抢救过来。他右耳与肩头无休止猛烈地摩擦，这曾引起过人们各式各样的猜疑与诊断研究。众说纷纭，神秘莫测。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画面，他不再是圣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了，而是蒙克画中的呐喊或是梵高的耳朵被包扎的自画像。

在询问了负责照顾他的疲惫不堪的教育专家和组里其他的年轻人后，我总结了这个孩子的三点特征：目眩神迷的举止，可怕的呐喊，意味深长的自残。

不用很长时间我就知道了，这个小王子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孩子，所以这对我们研究所有着名副其实的利害关系。这些年以来，他的父母放弃了大大小小的交流会议，他们只在必需的年终总结会上出现，签署孩子在研究所继续接受治疗的同意书，指定他们期待的日期和对话人。好像有人怀疑他们对孩子承受的痛苦不闻不问，也有人打算向相关机构发报告。也好像有人说他们阴谋策划解雇这个或那个教育专家，或至少好几次命令这些专家换组。

与孩子父母的交流工作是极其珍贵的，也特别脆弱不稳固，还有潜在的冲突。于是我必须制造出很多的偶然遇见，我必须言行举止大方得体，敬之如宾，进而慢慢地接近他们，重新提出与他们进行谈话的要求。我必须一再阐明我们的交谈只是简单的微不足道的闲聊，只是为了帮助我的工作，因为我不了解孩子的情况，这才得到了他们的首肯，使得我能询问面前这对深爱着、了解着自己孩子的父母。我们都希望能有效果，期待着新东西带来新的进展。最终他们向我倾诉了孩子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渐渐从无到有，而后从普通的社会关

系向着更良好的方向转变。

捆绑孩子在法律上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很多的文件要签署。从接管这个孩子以来，我一直都在遗忘签署这些文件，而研究所的所长总是能把杂乱无章的大小事务管理得井井有条。她事必躬亲，严以律人，每次不厌其烦地追着我签字。她曾问我哪里行不通，终于有一天我也问自己，在我那顽固不化的遗忘症背后，是不是因为“有些东西是行不通的”。

我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查看了“海阔天空”的录像片，我们对“几个人一起探讨”的交流方法比较赞同。于是大家都抽出了时间，围在一起谈论各自遇到的孤独症孩子的情况。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开怀畅谈，但是必须和大家一起谈。于是针对每个孩子的个人化方案就渐渐产生了，根据孩子们的进展情况再进行相应的调整更新。

专家组里的活动疗法治疗师，是一个不引人注目和自称“见识最少”的人，他提出了颠覆我们之前说的所有传统疗法，代之以他的领域里的一个新方法。这个方法叫“温柔梳理疗法”。这是用刷子每天几次在孩子的四肢和后背上梳，梳的时间不能太长。倘若没有精神分析论的支持，这个疗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梳理的人必须作为这个不可触碰的、被束缚着的孩子的同伴，然后通过一个无意识的物体媒介与这个缩在自己龟壳下的孩子接触。很多人都自愿参加，于是一个轮流值班表便定下了。这种接触必须要悄无声息，准点准时，要给他包裹住全身的被保护的感受。我们孤注一掷，决定用这种新疗法，等待着未来不可预知的效果。

活动疗法治疗师约见了孩子的父母，并请他们参与这个温柔强制疗法。孩子的母亲还从她工作的地方挪用了外科的专用刷子给我们。参与这个疗法的很多人当中只是单纯地梳，并不期望别的。只是身体对着身体，最平定地在他身上慢慢梳理。这变成了一种“梳理语言”。每个人都会对他“说点什么”，有些人会一言不发，有些人会滔滔不绝，或描述他们的梳理动作。直到有一次有人无意中对他说了，他一定很难过因为他祖父刚去世了。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母亲因为“缺少”言语（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向他表达和解释祖父的去世）而没告诉他这件事。

现实中亲人的去世，母亲的缺少言语，我们治疗组的一系列劝慰，这三个方面不期而集，千丝万缕缠绕成结，促成了他病情缓和的前奏。

如今他的叫喊少了，有时他还会低声哼唱，或者一一说出歌剧的名字。和有些人相处的时候，他也不用被捆绑着了，那个刷子也被存放在某个抽屉的最深处了。

这个年轻的少年有时还会让我们重新在他耳朵上打绷带，甚至有时候他需要一天打上好几次绷带。当他不清楚身边的动静的时候，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呼喊特定的人的名字，并询问“发生了什么”。他喜爱儿歌、文艺歌曲和“高雅的音乐”。他会说“妈妈去上班”，他会谈论他在海边的假期（法语中母亲和海是同一个发音）。他会用词语描述海浪和风暴。他的父亲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带他去听歌剧。

如果我们过多地赞美他，他会大叫或者剧烈地摩擦他的耳朵。

他刚刚满 18 岁，他的材料被转到了成人寄宿中心，他和他的家人已经去参观了几个。他说“真难过”。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鲜活主体的话语。

没有人对他说些什么

伊丽莎白·古尼奇^①/著

李锋/译

【内容提要】在一个与母亲的自杀相关的幻觉产生之后，来访者得了其症状，并随后开始了与分析家工作。本文试图呈现几个分析中的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与该分析者的个人经历，尤其是与其母亲相关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藉此，我们可以看到分析者与父母亲，尤其是母亲的关系如何影响到分析者的爱的客体选择。

【关键词】母亲 男人 命名 升华

在他十岁时，他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自杀，但过后“没有人对他说些什么”。

符号界在实在界中的返回

C先生，43岁，是一个画家，当他来见我时已经有四年处于一种难以克服的“抑郁状态”。他不再能够画画，而且觉得自己无法应付所有的爱情关系或者性关系。他沉浸在一些阴郁的想法中，被母亲的自杀所纠缠，总觉得自己在其中也有过错，试图也走上同样的道路。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但是，创伤的后果在那件事发生 29 年之后才得以显现，那年他 39 岁，与共同生活了 20 年的妻子离了婚。他妻子尽管有怀孕困难的问题，仍然想要一个孩子，社区机构建议他们可以收养一个孩子。于是他就离开了她，和所有曾经赋予他的生活以意义的东西切割开来。正是在接下来四年间的漂泊中，母亲自杀的实在性在一个视幻觉中回归了：他确信母亲的尸检照片可以在当时警察的调查卷宗中找到。自此之后，他从来就不怀疑这个东西的存在，尽管他列举的目击证人——他的妹妹否认了这一点。这样，如同拉康所所说的，在符号界中被排除的——“没有人对他说过什么”——在幻觉的实在中返回了。毁灭他的这种沉默属于拉康所命名的父姓^①的彻底脱落，这是精神病的起源。

这个初步的幻觉现象发生在他对父系家族进行调查时，他的母亲正是在这个特别具有病理性的家族中自杀的。他询问了所有可能解释发生了什么的人。他想给这个他承受了 30 年的、在沉默之后返回的灾难赋予意义。有人向他指出在“自杀的场景”中，他曾经试图减缓喝了农药的母亲痛苦，但是他对是自己导致了母亲的死亡的确信并没有因此改变。

此外，他还向所有偶然碰到的并愿意倾听的人讲述自己的痛苦。这些倾诉和它们所引发的建议越来越具有一种侵入的和迫害的特征，特别是当有人向他推荐一个分析家时。

目光与沉默

从首次治疗开始，他就表现出，面对面的分析家的目光使他无法讲话：他一开始带着如释重负的叹息，逐渐地蜷缩到扶手椅中，以至于把身体折叠起来，用害羞的手势遮住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话。当他之后转移到沙发上时，他终于找到了一种分析家能够听清的表达方式。他从一种被他人的目光淹没的享乐中摆脱出来后，开始讲

^① J. Lacan, «D' 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p.558-577.

述自己的故事，很快表现出“将词语和事物进行连接”的快乐。精神分析的设置的效果首先表现在他重新开始绘画并寻找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

他重新找到了那种在和母亲说话并在“她的目光下”画画时所感到的喜悦。事实上这个创作的场景和他的童年的一个关键时刻具有相似性：有一天，母亲的目光在他身上投注了一个欲望。在她正在创作的一幅壁画上，她为自己的儿子保留了一个位置。他在母亲创作的风景画的一个角落中在画一个房子：某一天，他曾经在母亲的画作当中。

这是他生命中在母亲身边时的关键时刻，回忆仍然是模糊的：在他那边没有留下任何话语。迷恋于他的美女（母亲），他尽可能不离开她，经常以母亲配合提供的各种借口逃离学校。他甚至逃了学校的阅读课；所以，尽管他来自一个传统而有教养的家庭，阅读对他而言直到今天依然是困难的。

他从没有和她一起吃过饭，作为家里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和保姆一起睡在客厅的内阳台，母亲则在客厅和朋友一起抽烟喝酒，打发时间。他的父亲则是忙于商务旅行，他对自己的妻子并不比对孩子更感兴趣。C先生想不起来在童年和父亲的任何交流，甚至是在母亲自杀之后，他的父亲也无动于衷，并没有对C先生讲任何话。多年以后，这个父亲向C先生承认了自己也曾依恋他自己的母亲，就像一个小情人一样。

孩子-画家

C先生在重新开始绘画后，在治疗中马上谈到的是，很难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存在：“如果我是一个画家，那么我就不可能是一个男人”，有一天他这样说道。他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孩子-画家”。他试图接近的一些女人所提出的请求，让他感到惊慌失措：“她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既然他不能要一个孩子——由于缺乏对父亲是什么的参照系，“他不知道对女人的身体能做些什么”。于是“他梦想一种纯洁的天真的爱”来逃避母亲留给他的孤独，也为了赶走脑袋中纠缠自己的母亲被解剖的

尸体的幻影。

因此，当他试图接近一个女人，以便证明自己是一个男人时，他常常把这种相遇缩减为一种友爱关系中的亲密交流。

精神分析使得他能够走出那种向他偶遇的任何人讲述他的生活的漂泊状态。分析治疗成为了一个地点，使得那些纠缠他的观念变得有序。首先他需要限制那种淹没他的、在倾听他的言说的分析家之目光下的享乐。转移到沙发上就代表了这种切割的过程。然后，重新开始绘画成为了他对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关键。

分析家因此能够支撑那曾经有命名力量的事物^①：他的母亲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中赋予他的位置。这是一个他充分占据了的位置，以便确认自己的艺术家的身份——多年后人们承认他是“主动教学法”方面的艺术家，然后可以在一个艺术学校中工作。

“是一个画家”的命名，给他提供了在绘画中升华的途径，在那里生命的热情得以显现。这个命名同样产生了一种围绕他的作品销售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关系。

因此我看到这个命名具有作为脱落的父姓的增补效果。^②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XI, «Les-non-dupes-errent», leçon du 19 mars 1974, inédit.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XII, «RSI», leçon du 15 avril 1975, inédit.

② J. Lacan, «D' une question préliminaire à tout traitement possible de la psychose»,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p.582.

精神分析的结束及之后

伯纳德·波歇黑^① / 著

佚名 / 译 陶杏华 / 校

【内容提要】本文呈现了一位分析家人生不同阶段的四段分析，所述对象在四段分析中取得了某些进展，得到了所谓的“通过”。到分析的结束，所述对象认识到总有一些死胡同，一些无法“通过”的东西，那正是呀呀言语在个体身体上留下的印记。呀呀言语的创伤本身就在言说，词语撞击着身体，而我们平时无法触及它。呀呀言语的创伤支撑着主体的享乐，背后是圣状这一不断重复的症状之身体根源。

【关键词】通过 死胡同 分析的结束 呀呀语言 圣状

四段精神分析与决定性的通过

前三段分析

他的第一段精神分析持续了七年。他一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百日咳，这险些要了他的性命，并给他留下了终身的肺部后遗症，引发重复感染和慢性咳嗽。他时常想自己的心理状况是否增加了发高烧的频率。1975年，他是精神科一年级的寄宿生，他的第一位太太怀上了他们第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一个孩子，她因妊娠期不可抑制的呕吐而住进了医院。同年，他发现了家族中父辈的一个秘密：他的母亲是战争中死了丈夫的寡妇，他的父亲是她的第二任丈夫，他的父亲不是独生子，其七岁时一岁的小弟弟夭折了。

1982年他结束了这第一段分析，并对自己察觉到了基本幻想^①而感到满意。同时他第一次收到了分析的请求，开始做个案控制（即督导），并在“弗洛伊德事业学院”（ECF）登记其工作。这时他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太太，生活很美好。

他的第二段分析开始于十年之后。他十一岁的儿子患有被认为不可治愈的癌症，导致一条胳膊的截肢和长达数月的化疗。在充斥着恐慌焦虑的两年过去之后，他儿子痊愈了。从此，他就有了一个不容易改的口误：当他说“自从我儿子生病以后”，总说成“自从我儿子去世以后”。他隐隐感觉到自己有死的欲望。他的第二位分析家直截了当地问：“您是不是太着急了？”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这就是他症状的最初命名。

这难道真的是一个诅咒吗？他父亲家族四代中的第二个孩子（总是男孩）总会夭折或处于死亡边缘。于是他的幻想在逐渐形成：一个孩子会死。他的想象逐渐变得苍白。

生活继续着。

他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直接反应是心脏病复发。与分析家的短期负转移使他明白，在死亡面前大彼者是不坚实的。于是他开始了第三段短暂的分析。他的症状归根结底都来自一个词：着急 (*pressé*)，以及与之相似的词语：觉得胸闷的、拥挤的、压制别人的等。比如，婴儿急着取悦妈妈就用闪电般的速度拉扞扞并作为礼物送给她，成年以后就用忙碌来掩盖不可能的存在。症状在慢慢减轻，但依然不够，着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013. p. 30 et 434: Le fantasme est inconscient. C' est la défense du sujet par rapport à une détresse primordiale.

急忙碌的男人掩盖了症状的根源。第三段分析停在了“女人”这个词上。这个词指出了实在之赌注，同时也把分析引到死胡同，所以有必要向深处挖掘。

生活仍在继续……

第四段分析

肺部手术后留下的伤疤使之成为一个由语言划下的深刻印记。一个症状在他的身体上不断地出现。他儿子的又一次生病引发出有决定意义的歧义性：呀呀言语癌症 (Cancer de la langue)。

这个发现使他再一次躺在分析家的沙发上，这次他的决心很坚定：使这个一再重复的实在明了化。这段分析像是在转移之下的滑梯 (toboggan sous transfert)，滑梯的底部有一个跳转。这段分析的主要特点是针对那些无意义的字符和名称。这里想说的是意义已枯竭。

最后这段分析的第一个梦将其赌注和阵地放在了身体层面上。“在一堆废墟上躺着一个无意识的裸体，不时有痉挛，好像他被枪击中，像金甲部队^①电影中的镜头一样。”超出电影中的与持枪女人搏斗而濒临死亡的情节之外的，是身体在此是独自享乐的。

这同时又引出两个梦，并为第三段分析结束时的死结“女人”找到突破口。他把这两个梦命名为关于女性性的梦和关于无底洞的梦。这些梦说明了女人对她本身来说也是陌生的。拉康曾说：女人不存在。

之后的两个梦明显指出，呀呀言语留下的痕迹是被话语和冲动客体掩盖着的。感叹词的梦^②能充分说明他有多笨，总想在清除一个污点的同时掩盖它，结果是一贯的失败。

① Film de Stanley Kubrick, 1987.

② 我在画一幅油画，描绘一个污点。一个朋友在远处叫我。我走出几步后发现我的油画在谁都能碰到的地方，我想起我的儿子年龄还小，可能弄坏我的画。我立即返回，已经太晚了。

“笨蛋”我冲他吼，然后就醒了。我产生了死亡的欲望。我的神经症像变戏法一样把有杀伤力的能指变成死亡欲望。真正的笨蛋是我，因为我总想遮盖污点。

划线的梦^①是说有一个洞，它由一划产生。那里就有了根本性的一杠。拉康理论研究的主体是能指的主体，是一个空的集合，就像死去了一样。于是就出现了知识上的洞。

通过 (La Passe) —— 这个词是死胡同 (impasse) 的反面

如果什么都是死亡的、寂灭的、虚空的，那么支撑人类生活下去的正能量是从何而来呢？

在一次分析后，他在与分析家的谈话中出现一个口误：把事件 (élément) 说成食物 (aliment)，分析家指出他至今为止从未提过的口唇期冲动。

然后出现了摔倒男人的梦。他跟一个朋友一起下楼梯，朋友摔倒，一个声音响起：“让他自己站起来。”法语中，动词摔倒 (tomber) 和名词坟墓 (tombe) 非常相似。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词之间的歧义性。

以上提到的口误和摔倒男人的梦很自然地引出了主人能指 (significant maître) (主人能指，主人一词在无意识中起主导作用)。入殓师，意思是装殓和埋葬尸体的人。他在一次分析过程中提到这个词。分析结束后，他走向门口，从衣架上取下外套，后面很安静，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听到分析家打开等待室的门叫下一位分析者。他转过身去，分析家当天穿着暗色衣服，在走廊的微光下，背后是等待室的门，他面对着墙僵硬地站着，模仿入殓师的样子。分析者走出去时是惊讶的，如释重负。

这个哑剧 (pantomime) 是一个决定性的解释，它把这个主人能指从整个能指链上分离出来，把口腔冲动与死亡冲动分开。对身体的摧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单词：Souffle (呼吸，

① 在我面前放着一张西班牙北部的地图，我的分析家从我身边走过，用黄色水彩笔在一堆瓦砾上划了一道，城市的名字是 Llogar，在 O 上有个重音符号。分析家抢了我的智能手机，我失去了搜索信息的途径。我变得很焦虑，想要回手机。他不言不语，轻蔑地扔给我一个坏掉的儿童玩具手机。这个时候我醒了，马上联想到 Llogar 这个词是 lugar, lieu, llegar, arriver 这几个词的组合，重音表示：你到这个地方了。字母 O 是一个被重音划杠的零。有一个空洞，它由一划产生。

或叹息)。他立刻用俳句^①(haïku)的形式写出来。在接下来的一次见面时他把它放在分析家的办公桌上,并说这个词自己是这么写的(Voici ce qui s'est écrit)。他并且加了一句:这就是支撑我做分析家的力量:对存在的假象要谨慎对待(Souffler avec tact sur les fictions de l'être)。

入殓师继续组成大彼者和客体 a (objet a)。它曾掩盖了圣状(sinthome),^②其晦涩之处从此之后充满光亮。这就是他生命中的正面要素。

一个月后,他在去特拉维夫的飞机上突然病倒,他醒来时发现自己依靠氧气瓶呼吸,与一岁时的状况类似。回到家后他还开玩笑,而亲人们却心有余悸。但很快他又觉得丢人,并意识到把不受控制独自享受的身体呈现给别人是多么的不知羞耻。他立刻把这种身体现象叫作九验法(preuve par neuf)。他意识到要谨慎地玩这种死亡游戏,并承担责任与后果。

作为通过程序的候选人,其结果是获得学院分析家(AE)的命名。这意味着三年之内,他必须在弗洛伊德事业学院(ECF)讲授他从分析的结束以及临床的“通过”中所学到的、关于从分析者到分析家的过程。他把第一次演讲命名为冲动的贪婪,来解释呀呀言语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呀呀言语癌症。

通过之后

我现在用第一人称来叙述。

就这样,分析家与分析者的联结关系在这个实在之洞上被解除了。我与学校的转移关系得到了更新。我现在的任务是分享我分析结束的逻辑,以及用这个独特的实在(呀呀言语的创伤痕迹)来展现我的能力,从此不再模糊,我自己是责任人。

这是对永远无法痊愈的实在之末端的制作、提炼和命名的工作过程。

① 一个影子 / 在阴影里 / 在后面 / 无法表达的 / 无声的 / 无凝视的 / 融化的 / 呼吸 / 一个男人站起来 / 他离开 / 活着 / 他笑了。

② 圣状(sinthome)是不能分析的、不能治愈的那部分,就像被分析过的症状的物质根源。

唯一能指与身体

一次大型会议之后，我做了超越通过的梦 (le rêve d'outrepasse)，就像苏拉热叫他的油画为黑之上 (outrenoir)。这里，outrepasse 是指超越通过（程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提到一个在生活中自称为水晶人的分析者，因为他的身体脆弱到能指的触动就会引起爆炸的程度。在18年中我们每周见一次面，但我在在这个过程中只说了三个单词，最后我只剩下无声的微笑了。此时，听众席里有骚动，我正要回答，雅克-阿兰·米勒先生说：您等一下再回答。用一句话总结这个梦：他们不知道呀呀言语的创伤本身就在言说。”事实上，词语撞击着身体。只是平时我们无法触及，因为精神组织用生活所必须的假装和假想来掩盖它。

尖叫出来

Troumatisme 是拉康发明的新词，是创伤和洞两个词的组合。造成“Troumatisme”的事件并不是在我一岁时的生命造成威胁的百日咳，而是那时父亲死一般的寂静（寂静驻扎在死亡所在之处）、母亲的焦虑不安与我发烧身体之间的相遇。而我肺部这一物 (La chose pulmonaire)（物，意味着难以形容和表达）使得家庭中每个人深受创伤，并把他们紧紧拴在一起。它会在我母亲看到挂氧气瓶的孩子时发出的焦虑而令人窒息的尖叫时再次返回。孩童时期，我听到母亲在等待父亲晚归时发出的同样的尖叫，因为她怀疑我父亲出了车祸或已经不在人世。二战时期，母亲因同盟国的轰炸而受伤，她的第一个丈夫在囚禁期间因肺病去世。从此，闪电将要带来的雷鸣总能使母亲感到极度恐惧，她双手捂着耳朵，把头钻进衣柜里不敢面对。这种尖叫以凝缩的方式表达了这样的诅咒：一个孩子会死。

入殓师这个决定性解释的效果在于哑剧的无言和无目光对视。当分析家用身体表现能指入殓师时，他装出呀呀言语的创伤，他无言地支撑着这个标记所隐藏的关于享乐的东西。

蒙克的“尖叫”画的是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嘴巴大张，两手捂着耳朵，

目光惊恐,完全陷入无助的孤独中。尖叫不是来自寂静,而是制造寂静。“尖叫对准的正是寂静。正是从寂静中出现最亲近的存在、一直等待的存在,而这个存在一直都在那,这个临近……它正是享乐的无法忍受的逼近。”^①这就是呀呀言语的创伤!

从尖叫到叹息

在我做分析家的第二年突然出现的尖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表现出伴随我生活的超我的野蛮。在整个分析治疗过程中,分析家都在对比沉默与大声喊叫,直到结束。

无论是我或我母亲发出的尖叫,都是单独的,它止住了呼吸。尖叫-叹息 (cri-souffle) 的野蛮书写是身体之事件,圣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就是我症状的身体根源,去书写圣状,这是真正的嗜好。这里字符缩减成一个标记及一个功能,然后圣状引出整个症状群并给出意义。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让它浮出水面,使得认同性的 S1 能指跌落。这些 S1 能指无意识地在**大彼者**那里被选择,因为它们能反映出最初的标记。著名的人殒师就是最重要的一张牌。

我的不可掩盖 (inoxydable) 的微笑是享乐的痕迹。是蒙克作品的活人版,还是相反的?我指的微笑是**超越通过之梦**中提到的。

从一开始就是生命战胜死亡,一直到最后。所剩下的就是尖叫-叹息和怎样应对。制作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每一次命名都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一环扣一环,一旦松开,主体就陷入无休止的歧义性中拔不出来。”^②在**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梦中出现了**无底洞**,^③在周围,有着从来不会是完整的数字编码。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 *D'un Aure à l'autr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p.225.

② Laurent Eric, «L'impossible nomination, ses semblants, son sinthome », Cause du désir numéro 77.

③ 我忘记了今天的分析治疗,我想乘坐下一趟火车,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又找不到钥匙。死海的手抄本在瓷瓶里。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最后一个展厅,是一个圆形图书馆,墙上刻满了人名和注册号:数不尽的数字和字母。正中央有一个无底洞,上方是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这时我醒了。想起今天没有分析。我起床了。

生命的提炼

分析结束时我轻松满意。它帮助我在享乐方面迈了一步，但是并未结束。主体需要一直寻找下去。所以，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快乐就是最直接的反应。

症状就这样减弱并美化了。这就是对生命的提炼。这也是分析者唯一最真实的东西。享受快乐与性无关，而是在最彻底的孤独中被体验。

倾听孩子 ——儿童自由言说的多样性

叶利鹏^①/著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在儿童精神分析的临床接待中，对于不同的孩子自由言说的多样性，分析家应该如何理解和回应。

【关键词】儿童精神分析 自由联想 言说

与癔症女人们的相遇，让弗洛伊德从催眠、暗示、按压等技法中脱身而出，发展出自由联想的技术，进而奠定了精神分析的基础。

当埃米·冯·N夫人说“保持安静，不要说任何话，不要碰我”^②时，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被弗洛伊德听到了。弗洛伊德的伟大也正在于此，他把话语权交还给分析者，让精神分析家处在倾听的位置。

自由联想是“将浮现在脑中的一切——无论来自一特定的元素(如字、数字、梦的影像、任何表象)或自发地出现的——不加区辨地完全表达出来的方法”。^③

在与成人的分析工作中，成人一般是在自由联想的状态下，用话语来言说，但是与儿童工作的时候，儿童的言说不仅仅限于话语层面，形

① 叶利鹏，男，湖北襄阳人，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预备分析家，研究方向是儿童精神分析和女性性，临床工作中主要接待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以及成人分析者。

② 弗洛伊德：《癔症研究》，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12年，第43页。

③ 尚·拉普朗斯、尚-波腾·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词汇》，沈志中、王文基译，行人出版社，2000年，第245页。

式也更加灵活、更加丰富。

梅兰妮·克莱因作为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之一，认为“儿童的自由表达形式是游戏”，她“提供给他们一些小玩具，把儿童的游戏看成是他们内在生活的象征表达，可以和成人的自由联想相比拟。”^①温尼科特在与儿童工作的时候也发展出了“随写随画”的技法，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与儿童工作时，也用到了绘画、胶泥、游戏等技术。

我在与儿童的分析工作中发现，儿童的自由言说，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会通过游戏，绘画，做胶泥，讲述梦，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行动化等等形式表现出来。

和孩子工作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在预备性谈话的时候就告诉他，这里可以谈论自己的痛苦，烦恼，开心的，不开心的，或者任何他想到的，包括他的梦，也可以画画或者做胶泥，游戏等等。同样的话语，在每个孩子那里激起的東西是不一样的，有些孩子很快就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想到的，自由地言说下去，但是更常见的是不知所措，不知道说什么，当然，这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特别是当孩子是被老师推荐或者父母带来而又没有告诉他为什么的时候，甚至是被“骗”来的时候。

因此，通常在预备性谈话的一开始，在做完自我介绍，并且介绍这里是做什么的之后，我会邀请孩子谈论他们是否事先知道来这里见我，这是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并且让他体验到这里是一个不同的地点，一个言说的地点，一个可以接待他话语的地点，同时也让父母体验到对于孩子主体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与接待。如果他们说没被事先告知（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会请他们谈谈他们现在对于被推荐或者被带到这里的想法，在这之后，我会请他们的父母也谈谈为什么带孩子来见我，当孩子在工作室听到父母讲述他们的困难或者期待时，他们会听到父母的焦虑，父母的欲望，并且当他们听到关于自己的个人历史或者关于家族的历史或者秘密的时候，会对自己所处的情势有一个理解。这对于接下

^① 梅兰妮·克莱因：《爱，罪疚与修复》，吕煦宗译，心灵功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新版，第2页。

来对他们的单独接待意义重大。首先他们得到了父母的授权，这让他们单独和我们工作时更加自由，不会背负太多的罪恶感，而且当他们自己同意和我们工作时，他们也有个人被接待被倾听的欲望，能够一定程度上与父母的欲望拉开一个距离。这些为接下来的自由言说打开了可能性。

接下来我想通过几个个案来呈现儿童自由言说的多样性：

1. “我想画画”

我有一次单独接待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我说我们开始吧，看他没什么反应，于是我问他今天有什么想和我说的，他两手插兜，有些紧张，过了一会，他看着我，指了一下桌上的画笔和纸，然后对我说：“我想画画”，我回答：“好啊，那你可以开始了”，于是他就开始画画，在画画的过程中他慢慢放松下来，我就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他画，他画的时候很认真，很专注，当他画完以后，他把笔放下，然后还是不说话，过了一会，我对他说：“如果你画完了，你可以告诉我”，他看了我一眼，说：“我画完了”，我看他还是没什么继续讲的意思，于是请他可以就刚才画的画说点什么，这个时候他就用手指着画，给我介绍画的都是什么，而且讲的过程中会把画的内容用他自己的方式讲出来，讲到某些地方，他还会笑起来。以后的每次工作，他几乎都是一开始就说要画画，画完以后给我讲画的内容。再往后，他有时会先玩一会游戏，边玩游戏边给我讲游戏里面发生的事情，有时还会邀请我参加他的游戏，扮演他指定给我的角色，在游戏结束后，他有时又会要求画画。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地通过他给我讲他的画以及他的游戏的内容以及联想，来理解他的幻想，他的恐惧，他与手足之间的竞争，他在班级里遇到的困难；借助于转移，我慢慢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无意识冲突，以及他是如何通过绘画和游戏来理解和厘清与父母的关系，与手足的关系，以及创造性地找到处理自己的困难的方式的。和他的工作，让我理解到孩子会用绘画的语言来言说，绘画本身是他们无意识地表达。当然，这个孩子在游戏

的时候以及邀请我参与进去时，也用玩游戏本身以及游戏中的话语来言说。

2. “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吧”

我接待的另一个孩子，每次一进来，坐下以后，先沉默一会，然后笑着对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吧。”我回答：“好啊，开始吧。”于是他开始给我讲笑话。他的笑话是这样的：“老师问小明一加一等于几，回家以后小明问妈妈一加一等于几，妈妈正在打牌，就说一加一等于滚开，小明去问爸爸一加一等于几，爸爸正在看电视，就说一加一等于老子揍死你，小明问爷爷一加一等于几，爷爷正在上厕所，就说一加一等于屁屁。”当他讲完以后，我问他：“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笑话的啊？”他说：“小明好傻啊，好笨啊。”接下来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在接下来的几次工作中，他还是在一开始就给我讲一个笑话。起初，我理解不了他为什么给我讲笑话，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和我说什么，甚至一度考虑，他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的呢？就是为了给我讲笑话吗？同时我也在思考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他是否理解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的？那个时候，我的耳朵是聋的！我根本没听到，也没听懂，并且主观地认为笑话不是该在分析室里讲的。我对他，对我自己都有些恼怒。幸运的是，他还是继续来，我还可以继续接待他，直到在他讲到第五个笑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讲的笑话都是一个结构，这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的耳朵不聋了！我听懂了一点了，于是在那个时刻，我对他说：“叶叔叔发现你讲的笑话都是在说一个孩子如何不被父母、长辈或者老师理解，让这个孩子很痛苦。”他惊讶地看着我，过了一会，说：“是啊，我每次和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说话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讲的话没有意义，都让我一边玩去。”这个时候，我才理解到，在我与孩子的转移关系中，他把与父母的关系转移到我身上。在最开始，我像他的父母一样，觉得孩子讲的东西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还会对他恼怒，直到我听懂了他所说的，感受到他的痛苦的那一刻，他才不用再重复用笑话的形式给我讲。后来，

他邀请我给他讲一个笑话，我想了想，说自己暂时想不到什么笑话，他还鼓励我，说可以模仿他讲的讲一个啊，我听到后更加尴尬，但是告诉他：

“叶叔叔不会讲笑话，也许不会讲笑话的叶叔叔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得益于与这个孩子的工作，我理解到孩子在与我们工作中说的一切一定都是有意义的，有其内在的逻辑或者无意识的运作，虽然开始也许我们不懂，但是只要我们再耐心一些，把自己的耳朵打开，而不是有选择有判断地封闭自己的耳朵，那么某个时刻我们就会有一个理解，进而工作也会有些进展和突破。

3. “我能在这里唱歌吗？”

我接待的一个害羞的小女孩，刚来的时候，和我说话时声音特别的小，几乎听不见，当我告诉她声音可不可以大一些的时候，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她看着我说：“我用写的吧”，当我同意以后，她就用笔在纸上画画，画一会以后还会在上面写字，当我请她讲纸上的内容的时候，她还是不说话，继续用写的方式回答我。后面的几次工作，她就经常不说话，只是用笔在纸上写，与我交流。我当时觉得因为自己的愚蠢，让这个害羞的孩子更加地封闭。后来我试着鼓励她除了用笔写，也可以试着用嘴巴和我交流。最开始她还是很难开口，直到有一次，她进来以后坐下来，然后说：“叶叔叔，我能在这里唱歌吗？”我愣住了，但是马上反应过来，回答她：“唱歌？可以啊！”这时小女孩很开心，然后从座位上站起来，告诉我她要站着唱歌，然后她就开始唱，我发现她唱歌的时候声音很清晰，而且比说话的时候声音大很多，于是等她唱完以后，我告诉她：“叶叔叔觉得你唱的很好听，而且你唱歌的时候声音很清晰，而且声音很大。”她听到我说这些，有些害羞，但还是很开心。这次工作以后，她每次过来就能够用比以前大得多的声音和我交流了。与这个孩子的工作，让我进一步地理解到对分析者主体言说形式的自由选择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开放与尊重，这样才不会封闭分析者的言说，才能够让分析者的言说自由地流淌。

4. “你怕不怕我从这里跳下去？”

我接待这样一个孩子，在一次工作中走到窗户边，当时窗户是打开的，他背对着我，对我说：“你怕不怕我从这里跳下去？”我对他说：“你可以用嘴巴说。”他说：“如果我有三长两短，你就要负责任，你就要赔钱。”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在这里，所以我出了事，你要负责任。”我说：“那你和我说说关于责任，你会想到什么呢？”他说：“以前都是我负责任，如果和小朋友做错了事，老师会惩罚我。”在接下来的一次工作一开始，他就跑到窗户边，问我：“你怕不怕我跳下去？”我说：“你用嘴巴说吧。”他说：“班上同学打我，让我很痛苦，让我想跳楼。”在接下来的一次工作中，他走到窗户边，问我：“你怕不怕我跳楼？”我说：“你可以用嘴巴讲，叶叔叔在听。”他说：“前两次只是想想，这次是真的准备跳。”说完还站到窗户边的架子上，我对他说：“你可以过来，可以用嘴巴讲你的痛苦。”他还是站在那里，我于是对他说：“如果你在班上或者家里说你想跳楼，会发生什么？”他听完以后就走过来了，对我说：“我不敢在班上说，因为如果我说了会被同学告老师，会被罚写500字。”过了一会，他又说：“我在班上说的时候同学们幸灾乐祸，还有同学说跳啊，你怎么不跳啊。我恨他们，我想让他们跳楼。如果我在家里说我要跳楼，爸爸妈妈会打我。”在接下来的一次工作中，他站在窗户边，问我：“你怕不怕我跳楼？”我说：“你可以用嘴巴讲给叶叔叔听。”他说：“如果我跳楼了，你会难过吗？”我说：“我会难过，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他说：“是啊，我也再也见不到你了。”说完，他就走过来了，然后手里拿了一根棍子，轻轻地往我头上敲了一下。我说：“你不能打叶叔叔哦，你可以用嘴巴说。”他又用棍子敲了自己几下，然后突然躺在地上了，过了一会儿我看他没反应，我对他说：“你怎么了？”他没理我，过了一会儿才站起来，很高兴地说：“我刚才在装死，哈哈。”我说：“哦，原来你在装死啊。”和这个孩子的工作，让我理解到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太过于沉重的痛苦会封闭孩子的话语，他们会用行动来表达，来求救，当接待这些孩子时，

我们需要用语言来接待孩子的行动，让他把身体的冲动或者行动化转化为语言。当他能够用话语来言说自己的痛苦的时候，他们就和封闭他们的东西拉开了一个距离，进而理解和符号化自己的行为。

5. 十万个为什么

我接待的一个小女孩，在和我工作时，很长一段时间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地球小，太阳大，太阳在地球的里面，我们还能看到太阳吗？地球为什么是斜的？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最开始为什么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很多东西都是白色的？为什么男孩的头发和女孩的头发，男孩的衣服和女孩的衣服不一样呢？嘴巴是用来做什么的呀？为什么学习好的都很瘦？胖子是不是特别懒呀？有没有人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呢？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大象用鼻子喝水为什么不会被呛到？大象会上树吗？树为什么只喝水啊？是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科学家发明的呀？是不是复杂的东西是科学家发明的，简单的东西是普通人发明的？……这个小女孩问了很多很多问题，最开始的时候，对于她提的这些问题，让我感觉很困惑，也理解不了她在说什么，而且对于她的提问，我该如何来回应也很纠结，一方面，我觉得仅仅从知识层面来回答是不够的，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把她提出的问题都当成一个隐喻的话，我暂时又想不到如何用另一个隐喻来回应她的隐喻。当然，最开始和她工作的时候，我是把问题抛回去，请她来讲，问她对于提出的问题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她最初的反应是不知道，也没有什么联想，于是我邀请她画画，请她把提出的问题画下来，当她画完以后，再请她讲对于画的东西的联想，这个时候她对于有些问题，会说出一些想法来，慢慢地，她谈到这些问题她问过她妈妈，她妈妈有的能回答，有的查手机，但是告诉她的东西她觉得还是不懂，当听到她说出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在我和她之间，转移发生了，通过提问题的方式，她把她与母亲的互动呈现给我，而且当她能够讲出这些的时候，她变得放松下来，身体能够很放松的靠着沙发，偶尔也会有些笑容了。虽然有些进展，但还是不够，她接下来还是

问我很多问题，还是在重复着以前的模式，直到有一次在工作中，当她提到爸爸妈妈长得不像的时候，借这个机会，我和她讨论了关于她爸爸去世的问题（在第一次接待她和她母亲的时候，她母亲用小纸条告诉我她父亲两年前因病去世），她也在这次工作中讲到她知道爸爸的去世，但是对于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奶奶和一个小朋友给了不同的说法，而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她很困惑，也问过母亲，但是母亲总是含糊其词或者不予回答！这个爱提问的小女孩，正是用提问的方式来言说她的痛苦。也许对她来说，感受到了母亲没有处理好丈夫的去世，进而对于父亲避而不谈，但她又很想理解关于父亲的事，同时又要保护母亲，于是采取了问其它很多问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疑问。她用提问来想要获得一个“知道”，一个关于父亲的“知道”，一个关于母亲为什么无法言说的“知道”。这也让我们看到，主体寻找关于自己主体性的知道是一种自我救赎，他们会用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疑问和痛苦，这些需要被听到、被接待。也只有在被接待的环境里，他们才能够逐渐地去言说，用他们的方式言说，与沉重的东西拉开一个距离，进而去理解在个人历史中发生的事情，去消化，去哀悼，去理清。

与孩子们的工作也让我思考：孩子的自由言说有什么共性吗？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样独特的方式来言说呢？也许拉康对于话语的解读能够在这一点上对我们有所帮助。

“在拉康这里，话语包含，但又不只是个体的言说（所以它与言语的内容无关），同样地，它也包含，但又不只是共时态的语言结构（所以它也与语言学意义上的纯语言形式无关），相反，它是刻写在言语行为之中且决定着言语行为的意义效果的东西，是运用语言结构但又不限于语言结构的东西，它是言语的传播或者流通形式，所以在范围上要大于单纯的言语或者语言结构本身。……拉康不是把言说行为理解为个体对语言（结构）的具体运用，而是理解为语言结构在个体身上的运作。”^①

^①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95页。

和孩子的工作，让我理解到不同的孩子会用他们很独特的方式来言说，我们需要打开自己的耳朵，去试着理解和倾听他们的痛苦。当他们感觉到被倾听、被接待，有一个人懂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慢慢打开自己的话语，与自己的痛苦工作。

感谢与这些孩子的美妙相遇……

怎样用话语触及实在？

法比安·法热瓦克斯^① / 著

吴蕤 / 译

【内容提要】本文从拉康建议建立的“通过”制度切入，以“渡者”倾听“过者（passant）”的陈述并将之转述给“通过”委员会来考察“过者”个人的分析为引子，确认了话语可以触及实在这一事实。作者借助个人的分析经历，呈现了分析者如何由说一些自己想说，但却完全对其无知的东西，逐步转变为能够在自己的话语中真正地厘清与大彼者的关系，并认识到剩余享乐对自身意义的状态。

【关键词】“通过” 话语 实在 大彼者

为了反对隶属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精神分析家协会中存在的等级化，拉康创造了“通过”制度。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只承认那些和协会中的分析家结成团体的分析家。这个团体以每周三次 45 分钟的会谈以及和某位协会中的成员的督导为前提。拉康则想和这样一个预先建立的、金字塔式的道路分开，后者使得隶属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各个协会接近于弗洛伊德在其著名的《群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中分析两种机构：教会和军队。为了拆开团体程序假设的等级制度，拉康说到“分析家仅仅对自己授权”并向其在 1964 年建立的学院建议“通过”程序，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巴黎八大精神分析系副教授。

它允许当事人评估：他的分析已经完成了，他已在分析中展现了他的历程，以及这个历程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结果。拉康不希望，候选人以直接面对评审或者“通过”委员会的方式做报告，然后委员会研究和讨论候选人的情况；拉康希望传达是间接的，且称这个向机构介绍自己的人为“过者”，过者分别见两位渡者，在两名渡者面前详述其历程和证言，由两位渡者负责向“通过”委员会陈述他们所听到的内容。这个间接见证的目的在于，通过有力地强调过者的言说以及最大化地中立渡者的整个理解或自由联想，从而有利于过者陈述的传递。拉康有数学的模型和基式的途径作为其传递的模型，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而且这对于精神分析的教育同样有价值。同样必须指出的是，“通过”的间接传递结构，两位渡者负责传达过者的证言，符合第三者的结构，而这是弗洛伊德在其关于“妙词”的文章中指出的：就像弗洛伊德的妙词那样，过者传递的证言必须是向“通过”委员会讲述一个“出色的历史”。这个证言不仅仅是以第三人称表达的，而且因为这个过者隔离了支配其存在的主人能指，从而证言变成了一段出色的历史。

如果“通过”委员会认为，过者已经能够考虑分析在他自身之中所实施的转变，如果主体能够超越比如症状撤出所致的局部转变并触及到实在的点，如果主体能够传达，从其基本幻想中出现的享乐的坐标出发，他所找到的解决使其陷入死胡同的东西的任何办法，那么，委员会就可以命名这位过者为学院分析家，这个称号有三年的有效期，在此期间这位学院分析家（AE）将会在给他称号的精神分析学院的团体面前，说明这些“精神分析的关键性困难”。

在提及我的证言中一些重要点之前，请允许我指出，“通过”的设置和实践是怎样允许拉康让精神分析离开弗洛伊德留下的理论和临床之困境的。在其最后的文本，《可结束的和不可结束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确定了对他来说构成了（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分析的最后地平线的东西：他称之为“阉割的岩石”。对男人来说，它被解释为雄性抗议，因为男人面对着阉割威胁、面对着失去他的携带着所谓石祖器官的雄性

位置。对女人来说，它通过阴茎羡慕而被解释，而弗洛伊德将阴茎羡慕看作是拥有石祖的欲望。对女人来说，阉割焦虑的整个临床被解释为对失去她的“是石祖”（因为她没有石祖）之位置的焦虑，所有连接于失去一个大彼者的认可和爱的症状，都涉及到对石祖位置的保证。在其最初的教育中，雅克·拉康借助欲望的主要能指，即石祖，形式化这两个位置，并重新抓住它们。他用对于男人来说是欺骗，对女人来说是面具的术语，否定了“是石祖”和“有石祖”这两个位置。与他即将在享乐的理论化中发展的东西一致，他随后认为，石祖的意义不允许接近享乐的整体，并且通过考察对于享乐来说更为广阔的地平线，相对化了石祖的功能。将客体 a 提升为“剩余享乐”的客体，以及在基本幻想构成的实在的窗口上对这个客体的陈述，是拉康的兴趣向超越了独一无二的符号界的维度延伸的结果。“通过”的设置与其理论制作是同时代的。

一个很可能是白痴的命运

在 2015 年 5 月，我结束了长达 25 年的分析，并且在同年 9 月进入“通过”。我介绍了我从 19 岁开始的分析历程，那时我的第一次分析已经进行了 6 年。谁引领我进入精神分析的呢？我没有选择学科：很多东西让我感兴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没有做出选择，那就是接受了一个丧失，并且丢掉了选择权。我没有接近女性，也没有选择一位让我快乐的女性。从第一次会谈开始，第一位分析家就确定了我的一个特征：我的目光悲伤，它显示出我对于生命悲剧感的某种倾向，和围绕着我的某种沉重。

很快，关于我的抑制的中心问题开始冒出：我认为大彼者有能力知道并且看到所有我应该能够做的事情，这理由足够让我不去行动并推迟我的欲望。我一直处在我母亲非常关心的目光下，在下课之后的下午，我花了很长时间和她在一起，给她讲我童年的小小艳遇。在相遇变得可能的时候，即青春期，我推迟了欲望和行为，这可能让我进入我最为欲

望的东西。我出生的时候难产：脐带绕颈三圈，产钳助产和肺部感染。医生愚笨地对我父母说，我可能是一个白痴。我的所有发展都被小心地关注着，并且在大彼者的请求中，我自己解读了这个期待，而我很早就通过一个重要的言语禁忌来回应这个请求：我不能读某些字母，尤其是西班牙语中“r”的卷舌音，并且将“r”这个音发成其它的音。这个对于大彼者请求的尴尬回应后来有其它形式，但是一开始是围绕我的言语困难。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向大彼者展示，我并非白痴；这个大彼者一直用其目光跟随我，这反而加强了 my 抑制。我后来在分析中构想，“白痴”变成了主人的能指，它支配了我的存在，因为我无法从中抽离：通过填满这个能指的空白，我吸引着母性大彼者的注意。并且我会通过重复来玩弄这样一个循环：通过向她展示“我不是白痴”而补足大彼者。

这第一个分析，以及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允许我去解决第一轮的问题：我可以选择学科，可以坚持到底，并且选择了一个女人。但是在基本幻想中我和大彼者的核心关系并没有被触及。带着一半的满足，我离开了这个分析。想知道更多的我来到巴黎，和第二位分析家见面，在这里人们实践着短程会谈，而它尤其引起我的兴趣。这个分析允许我抓住我是怎样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持和大彼者的连接的：我固着于它。我出生的困难提供了模子，后者在之后允许我建立和大彼者的关系：成为一个不完美的对象（objet）^①，一个有点缺陷的石祖，并且因此吸引大彼者目光和关注。事实上，展示“我不是白痴”特别允许我这样：将我安置在大彼者的目光中，且因此固着于大彼者，也将大彼者固定。这不是直接在分析中发现的，而是在控制分析中发现的，在那里，为了给我的控制分析家以强烈的印象，我陈述我在分析中获得的主题的构建、我对诊断的假设、我小小的理论产品，而我看到了一个回应，它允许我构建这

① 我将“objet”全部翻译成“对象”，原因是原有的翻译“客体”值得商榷。——译者注

样一个“窥视-肛门”的循环：我的控制分析家以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移开了他的注视，并处在一个古怪的姿势中，这让我的目光悬置起来，失望于没有能够固定他的目光。我不仅仅尝试吸引他的目光，因为我从我的伙伴以及我和他人的关系中理解到，我还寻求固定他们，将他们抓住，如同人们握在掌心的某物一样，如同我想控制思想一样。对这个循环的揭示可以使这种和对象的关系有一个松动，一种去固着，给我在和对象的关系中以更多的游戏和开口。

和话语的关系是这个循环中心：通过认为和话语有一个轻松关系，我很可能通过最初自己的困难，轻松抵达了一个空话，抵达了一个话语的超速运行，在那里，通过说我想说，但却完全对其无知的东西，我常常丢失了话语的缰绳。分析产生了一个对这个关系真正的转变，并且允许我真正在我的话语中，允许我居住其中。

晕 眩

在揭示这个循环的同时，一个身体事件开始显现并被放置在特定的状况中：当我在一个开放空间登上高处，或者当我乘坐的飞机穿过乱流区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晕眩。这种感觉以一种潜伏的方式，在近几年存在着。我记得第一次清晰出现的时候，是在得知我妻子第一次怀孕几天后。这是在将我强行从长期自恋的位置分离开，并将我提升至符号功能高度的时刻。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痴迷于一些飞机而非飞行：一些大型飞机；并且为了将我和异化（aliénation）^①的大彼者分离，在没有超越幻想的尝试中，我在几个小时飞行中怀着成为机长的观念。我对于飞机离地的物理学和机械学的法则一无所知：事实上，我是以野蛮的方式脱离大彼者。

① 这里的法文术语“aliénation”，一般国人对其是按照马克思理论中的术语来翻译的，即“异化”，但是拉康用这个术语的时候，并非（仅仅）用的这个意思，但是这篇文章并非就这个术语的专门讨论，为了避免读者理解的困难，我还是选择了常用的意思。——译者注

想象范畴（*imaginaire*）^①滋养这些幻想。在这些我痴迷的幻想中，想象范畴被分析所穿透。因此我丧失了大彼者的支持，而我想固着于它。这样，晕眩的出现，是作为一个实在的标志：这个丧失已经发生，从此以后我必须在一个脆弱平衡中前行，并且必须不靠大彼者而站立，但之前我在大彼者之中找到了支撑的。我必须处在这个新的高度，从此以后生活的实在将我推至了这个高度，我却没有了之前所找到的支撑。这就是我感受到的东西，它是通过离开 25 年的分析和通过将这个脆弱的平衡变成允许我走自己道路的力量，如同在分析结束的一个梦中出现的东西那样：我走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上，我遇到了一只巨大的未知动物，这是一只在大道中间打盹的熊或者龙。我停下来，看看它，然后继续我的路，我有点被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画面惊到。醒来后，我将这只路中的巨兽联想为：从梦中出现的剩余享乐对象、肛门对象中拔出的意义，如同我几天之前决定完成我的分析并将之陈述给“通过”的一个结果。

丧失了所依靠的大彼者，剩余享乐对象也抽离而去，我只能前行，并保持在这个分析让我获得的新的脆弱平衡之中。在我迎接这些在分析中与我相遇的各种主题的方式当中，有了某种柔韧性，而之前我有一种刻板地黏着于彼者的言说、固着于它的倾向。这样一种想要全部理解、全部都说、全部解释的倾向，它带给我干预的风格和我接近彼者的方式某种沉重感：在获得某种放松之后我能够察觉到它。对肛门对象的放松，它的去固着，给予了我一种风格，它表达为某种行动的自由。

一个梦定位了在分析结束中我相对于大彼者的位置，梦的背景是我对“通过”证言的构造：“我开车在一条很大的林荫大道上。我被一个警察叫停，他扣了我的驾照，而我不知道我触犯了哪条法律，在梦中，我怀疑这个警察不是真的，而且还是一个诈骗犯。我继续开车，我穿过我出生城市的大道，来到巴黎的小路上，在那里，我吃惊于没有驾照还能继续开车。我身处醋商小路上，这是在我家旁边，随后我醒了。”最

① 和“l'objet”同样的原因，我将“l'imaginaire”翻译成“想象范畴”而不是“想象界”。——译者注

开始一些有趣的联想的方向指出，我能够在没有大彼者的执照的情况下开车。我穿过了有着大道的我的家乡，来到了最狭窄的地方，准确来说，法语总是我的载体。有趣的是，我醒来认识到，醋商小路……这是拉康^①！那是“我的家”！

① 拉康来自一个醋商的家族。

修“辞”立“诚” ——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一种会通

卢毅^①/著

【内容提要】拉康提出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其核心是让主体“不要在其欲望上让步”，也就是要主体在行动上保持对其欲望的忠诚。由于把言说视为人类主体最本质性的行动，拉康在此基础上提出“好好说话”的伦理学，进一步明确了分析语境中主体的伦理性就体现在坦诚直言其欲望上。在此意义上，精神分析可被视为这样一种过程：通过让分析者的言辞发生从“空话”到“实话”的转变，从而实现一种面对自身欲望真诚和忠诚的态度。无独有偶，在儒家传统中其实也蕴含着与之相似的一套“修辞立诚”的伦理学。由此可以设想，旨在让主体“从心所欲”的精神分析实践，和以成为圣贤君子为目的的儒家修行工夫，二者之间似乎有某种默契相通之处。通过二者的比较会通，将有助于为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扎根和本土化发展找到其思想文化层面的适宜土壤。

【关键词】辞 诚 拉康 儒家 伦理学

① 卢毅（1988-），男，江西丰城人，精神分析家，四川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精神分析方向硕士，复旦大学-巴黎一大联合培养外国哲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精神分析与东西方哲学。目前主要研究课题：拉康的欲望伦理学。已发表的学术成果见于《精神分析研究》、《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等著作刊物。

一、“好好说你的欲望”——拉康精神分析伦理学的一种表述

我主张：人可能为其感到有罪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他的欲望上让了步，至少在分析的视角下是如此。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伦理学》^①

在《精神分析伦理学》这一期研讨班上，拉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系统阐述了何谓他眼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概而言之，这套伦理学完全有理由被称为一套“欲望伦理学”，其核心内容就是要主体别在他的欲望上让步。拉康说“我所谓的‘在其欲望上让步’总是在主体的命运中伴随着某种背叛”，^②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主，主体真正的伦理维度就体现为在行动上保持对其欲望的忠诚。在拉康看来，面对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依然冒死埋葬王兄的安提戈涅，这个义无反顾、舍身取“欲”的英雄形象，就是这样一套伦理学的化身与典范。

拉康当然清楚古代悲剧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距离，他也并没有因为赞颂安提戈涅而号召每个人都去实践这种悲剧性的壮举。相比于壮丽的悲剧与神话，拉康真正感兴趣和关心的始终是属于精神分析自身领域的问题，也就是作为“言说的存在者”（或简称“言在”）的人类主体的问题。至少在其思想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拉康都对语言和符号功能的重要性进行了无以复加的强调，以至于在他看来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这在根本上不同于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因为在奥斯汀看来，只有某些言说是行动，而拉康不仅把一切言说都视为行动，而且还认为言说才是人类主体最本质性的行动。

这样一来，要求主体按照其欲望来行动的精神分析伦理学，就在分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6, p.368.

^② *ibid.*, p.370.

析语境中找到了切实可行的落脚点，按照欲望行动也就具体化为按照欲望言说。因此，拉康后来在此基础上提到的“好好说话”的伦理学，与之前所说的欲望伦理学就并非彼此不同或互不相干的两套伦理学，毋宁说前者是后者在分析语境中的一种具体落实，因为在分析情境中主体最主要的行动就是言说，主体的伦理性进而也就体现为对其欲望的坦陈直言或“招认”。然而，分析经验却表明主体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按照拉康的说法，主体在进入分析后开始说的往往都是“空话”(parole vide)，而“空话是就其此时此地要与其分析家所做之事而言的，主体在那里迷失在了语言系统的机关中”，^①“主体在其中徒劳地谈论着与之相似到难分彼此的某人，却从来都没能承担起他的欲望。”^②另一方面，分析的目的则是最终把这种“空话”转变为“实话”(parole pleine)，因为“实话实现了主体的真理”。^③拉康表示：“毋庸置疑，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病史中，涉及的不是现实，而是真实/真相/真理(vérité)，因为它是一种实话的效果，它通过把将要到来的必然性的意义赋予过去的偶然而重新整理了这些偶然，如同把它们构成了一点自由，而主体就凭借这点自由呈现出这些偶然。”^④通过用作为治疗过程指引与动力的病史取代“此时此地”的分析，用癔症式的主体际性(intersubjectivité)取代强迫症式的内主体性(intrasubjectivité)，用符号性的诠释(interprétation symbolique)取代对抵抗的分析(analyse de la résistance)，实话将开始得以实现。^⑤

具体而言，“空话”究竟为何是空洞的？又是什么在根本上实现了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p.61.

② J. Lacan. *Écrit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p.254.

③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 p.61.

④ J. Lacan, *Écrits*, p.256. 这里提到的自由就是“自由联想”的自由。拉康曾在别处论述到它与“实话”的关系：“说真的，在分析中受邀说话的主体并未在其所说的东西中展现一种很大的自由度。这并非因为受到其联想严格性的限制：这些联想无疑压迫着他，但它们更多是通往一种对他而言会是痛苦的自由言说、一种实话。”(ibid., p.616)

⑤ Cf. ibid., p.254.

从“空话”到“实话”的这种转变或过渡？在“言说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这篇著名的“罗马报告”中，拉康在正文的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了“主体在精神分析实现进程中的空话和实话”，并且一上来就开宗明义地交待了分析中分析家与分析者的基本处境：

自称为治疗、培养或探测执行者的精神分析只有一个媒介：病人的言说。事实的显而易见不是忽视它的理由。然而每个言说都呼唤回应。

我们指出没有不带回应的言说，即便它遇到的只是沉默，考虑到它有一个听众，这便是它在分析中功能的核心。

但如果精神分析家不知道言说的功能是如此运作的，那么就只有忍受言说更强烈的呼唤，而如果在其中首先被听到的是空洞，那么他会在自身当中感受到它并且会到这言说之外去寻找一种填补这空洞的现实。

他因此为了在主体的举动中发现主体没说的东西而去分析主体的举动。但为了得到主体对这未说之物的承认，他得谈论它。于是他重拾言说，但在这来自其自身虚无的回音面前，这言说却因为只不过回应了他失败的沉默而变得可疑。

但是，跨过主体言说之空的这一呼唤是什么呢？它呼唤其基本真相，透过它还闪烁着更卑微的需要的呼唤。然而，它一上来就是在试图诱惑彼者的含混缺口中的空本身的呼唤。诱惑的手段有主体的奉承，还要押上其自恋的丰碑。^①

换言之，从分析一开始分析家就面临一个考验、一个陷阱，分析者喋喋不休的“空话”呼唤着、诱惑着他给出回应。尽管主体在其言辞的空洞之外始终还呼唤着他自己的真相或真理，但由于被想象的小他者所捕获，困在自恋镜像中的他首先呼唤的却是空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表明：“对空话的一个回应，哪怕是赞成的回应，往往也会通过其效果表明它比沉默更让人受挫。涉及的难道不更多是一种内在于主体话语本身的挫折吗？主体在其中并不投身于对他自己的这种存在越来越多

^① ibid., p.247-248.

的剥夺中，……他最终承认这种存在从来都只是他在想象界中的作品，并且这件作品动摇了他内心的所有确信。因为在他‘为了一个小他者’而重建该作品的过程中，他再次发现了让他把它‘作为一个小他者’来构造并且总是让它注定从他手中‘被一个小他者’夺走的基本异化。”^①

在拉康看来，主体在此所经历的这种基本异化的产物就是自我，并且表示“我们的理论家们现在用承受一种挫折的能力来界定它的力量的自我，就其本质而言是挫折”。^②换言之，与通常的观点相反，拉康认为自我不仅不是承受挫折的东西，反倒本身就是对主体的一种挫伤。在刚才那段引文下方，拉康本人以注释的形式给出了具体说明：“它处在一个同时既是实践上又是理论上的偏离的十字路口。因为把‘自我’等同于主体的学问，就是把想象的隔离和对本能的掌控混为一谈。由此就导向了治疗操作中的判断失误：像这样在许多因自我的结构过强而引发的神经症中强化自我，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路。”^③

从上面这一系列说法不难看出，“空话”和“实话”实际上分别代表了自我水平的言说和（无意识）主体水平的言说。由于主体相对于自我是“离心的”，^④自我水平的“空话”相对而言同样也就偏离了主体的真理和欲望，到头来只是让小他者的享受得到了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对这种话语没有适宜的回答，因为主体会蔑视一切搞错了的言说。”^⑤

由此观之，从“空话”到“实话”的转变，实际上是主体言说层面的变化，这在分析中并非是通过人为的强制或暗示实现的，而是通过某种沉默或“不干预”来进行的，通过让“空话”因得不到回应而彻底落空，从而让“实话”这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言说得以涌现。在“治疗的方向”中，拉康对精神分析治疗的方向所做的简明扼要的界定，同样也可被视

① *ibid.*, p.249.

② *ibid.*, p.249-250.

③ *ibid.*, p.250.n.1.

④ Cf.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I: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8. p.16-17; p.60.

⑤ J. Lacan, *Écrits.*, p.250.

为这套“好好谈欲望”的伦理学的纲要：

1. 言说在其中具有一切权能，治疗的一切特殊权能。
2. 远非以把主体导向实话或连贯的话语为规则，而是让他自由地尝试这么做。
3. 这种自由是他最难以忍受的。
4. 请求正是分析中被悬置起来、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分析家不能给它任何满足。
5. 不对欲望的坦陈设置任何障碍，主体朝着这个方向受到引导甚至疏导。
6. 在最后的分析中，对这种坦陈的抵抗只在于欲望和言说的不相容性。^①

简言之，分析家在这里的职能是通过沉默让分析者的“空话”消散而显露出隐藏于其下的“实话”，通过悬置分析者的请求而沉淀出蕴含于其中的欲望，最终使得分析者对其欲望的坦陈或“招认”的抵抗降至最低，仅剩欲望和言说之间构成性的、不可化约的不相容性，从而最大程度实现主体在言说这种行为中对其自身欲望的坦诚和忠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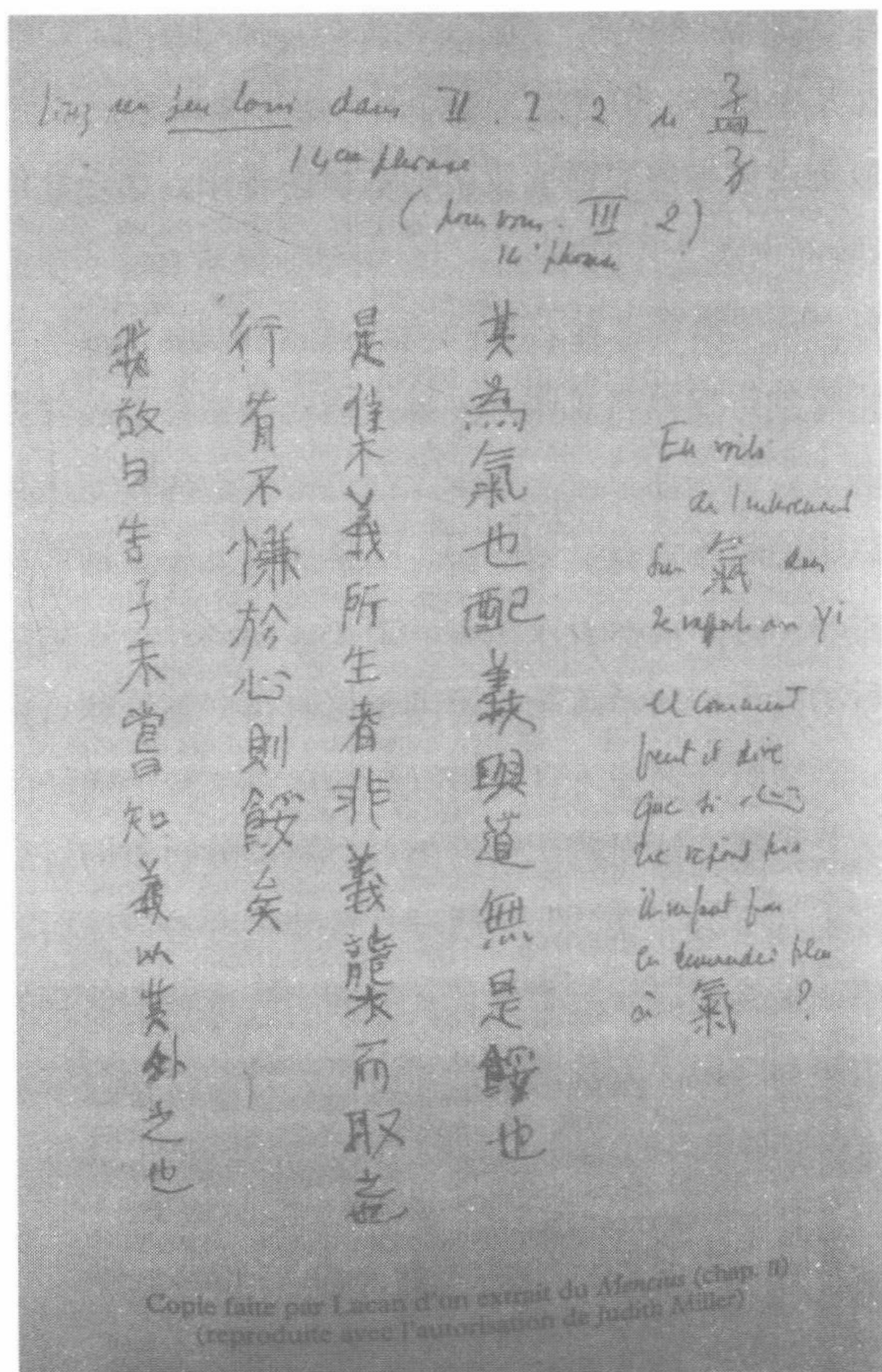
二、“修辞立其诚”——一种儒家伦理学的建构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周敦颐：《通书》

由于拉康在某种意义上把精神分析的本质视为上述这样一套伦理学，因此当人们探讨拉康精神分析在异域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时，自然就要考虑这种文化土壤中是否有可能与之对接的伦理学要素，以便能够更加

^① *ibid.*, p.641.



平顺地实现某种“嫁接”而非生搬硬套的强行植入。具体到中国思想文化语境中，儒家传统似乎成了最理想的一块“沃土”，而孟子则始终是拉康与中国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的一座桥梁。^①

一如海德格尔对庄子的青睐，拉康对孟子的钟爱也是一个尚待开解的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拉康对孟子思想的兴趣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

① 据说蒋介石曾出于好奇而找心理学家萧孝嵘做过几次精神分析，效果不佳，蒋公因此便断言精神分析是个错误，因为它与儒家思想不合。精神分析与儒家思想是否相合暂且不论，但至少蒋公洞见了精神分析要适用于中国人须先与儒家传统进行对话。可惜的是，熟读《孟子》的蒋公并不知道精神分析领域有拉康这号人物，更不会想到同样对《孟子》下过工夫的拉康会率先发起精神分析与儒家传统的这场对话。

伦理学上的，无怪乎他会在《精神分析伦理学》具有总结性的最后一讲中两度提到孟子，而不单纯是为了批判他。^①值得一提的是，通晓汉语的拉康曾经亲自手书过《孟子》原文，而其中一段正是孟子论“知言”、“养气”与“集义”的著名章节：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何谓知言？

曰：诋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②

在这段引文中，孟子首先澄清了他所说的“不动心”与告子所谓的“不动心”的差别。他同意告子所说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而不同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进而表示“志”对于“气”应具有统帅作用，否则“气”对“心”将会产生消极的反作用。孟子在此明确区分了“心”/“志”和“气”形上形下两个层面，并认为在“心志”（即“良心”、“本心”）

① 相关论述详见拙文“‘天理’与‘人欲’——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一种可能对话”（待发表）第一部分。

② 《孟子·公孙丑上》。

层面于己不合的东西不必去“气”的层面寻找，因为良心本体才是根本，去气的层面找原因只会是舍本逐末；另一方面，当人在言辞方面出现问题时，就不得不去心志上找原因，由此可知在孟子看来“言”更多出于“心”而非出于“气”。接下来，孟子道出了自己的长处，就在于“知言”和“养气”。“养气”的工夫实际上在于“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长”的“集义”，由此实现“以志帅气”；“知言”则是知道“诌淫邪遁”四种不正之辞各自的弊端。孟子此处虽未明言，但不难推断这四种言辞正是“以气动志”所致的“放失其心”的后果，或者说人言辞不正的根源就在于他的心志不正，相反心志端正的人则不仅自己能“正言”，而且还能“知言”。如此一来，孟子在此虽然没有直接给出“知言”或“正言”的方法，实际上还是暗示了这和“养气”一样，最终都要落脚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的“集义”这个不二法门上。

尽管如此，“集义”仍然是一个太过笼统的说法。不过在儒家传统中，孔子已经在言谈之间给出了不少“正言”的具体标准：

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

非礼勿言。（《论语·颜渊》）

言思忠。（《论语·季氏》）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

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

言中伦。（《论语·微子》）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仁者其言也切。（《论语·颜渊》）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

不难看出，孔子眼中的“君子之言”主要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道德（义、礼、忠、德），二是中庸（时、中伦、不躁、不隐、不瞽），三是朴实（与“巧”相对），四是谨慎（讷、切、慎）。实际上，这些特征恰恰也都是儒家传统中圣贤君子的品性，因此“正言”的根本仍是“正心”、“正德”，心正德正则言自正。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在其道德实践中就此不再强调言辞层面本身的修行工夫。实际上，毋宁说“以德正言”和“以言正德”构成了一个必要的良性循环。“以德正言”固然重要，但“正言”本身也是“正德”的具体方法，倘若言不足以正德甚至悖德，那么德本身也就不再有继续正言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其中就透露出了“正言”的必要性。也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提出“修辞立其诚”作为成就圣贤君子的必要门径。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①

按照孔子在《文言》中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是君子成就事业的条件和凭据。关于“修辞立其诚”这一说法本身，北宋大儒程颢有过一段精彩的解说：

明道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仔细理会。言能修省言

^① 《周易·文言》。

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①

程颢认为“修辞”既可指修砌辞藻的“修饰言辞”，也可指修心正言的“修省言辞”，而在“修辞立其诚”中，指的无疑是后者，并且二者一“伪”一“诚”，判然相分。他进而表明之所以要“立诚”，是为了君子在茫茫大“道”上有立足之地，不诚无以立，唯有“居仁由义”才可“修齐治平”。反之，正如其弟程颐所言，“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②在这点上，朱子完全赞同二程的解释，所以也说：“修省言辞，诚所以立也；修饰言辞，伪所以增也。”^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周濂溪说圣人所言并非一般的话语，而是“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的至真至诚的“道”，相比之下那些只会玩弄文辞而无诚敬尊“道”之心者，都不过是虚伪鄙陋的小人。

在“修辞立其诚”这个说法中，“辞”指的无疑是人的言辞，但“诚”意味着什么，似乎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而后来孟子对“诚”的论述实际上开辟了后儒理解“诚”的基本格局：

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④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

①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端伯师说》。

② 《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杂著·颜子所好何学论》。

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

④ 《孟子·离娄上》。

求仁莫近焉。”^①

在这两段引文中，“诚”主要就践履工夫而言，不仅是对自身的真诚、坦诚，而且也是对“道”的虔诚、忠诚。与此同时，当孟子说“诚者，天之道”时，这里也已经有了将“诚”形上化、本体化的端倪。诚如阳明所言：“‘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②在孟子之后的先秦儒家经典中，对工夫层面的“诚”的论述主要见于《大学》，而“诚”的形上化和本体化则在《中庸》里达到了高峰。

《大学》主要在“正心诚意”的层面上谈“诚”：“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③显然，“诚”在此指的就是与“自欺”相对的真诚，就像厌恶恶臭一样厌恶恶，像喜好美色一样喜好善。在以孟子意义上的“性善论”为本的儒者看来，这种“好善恶恶”的真诚态度其实是人人有之的本然状态，只是因为后天行为上的放纵而在某些人身上逐渐丧失，因此要通过“以诚思诚”的工夫来恢复这种状态。

《中庸》虽然也在工夫层面谈“诚”，但显然更多继承了孟子“诚者，天之道”的形上思路，突显了作为道体或善之本体的“诚体”，也就是天下“至诚”：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故至诚如神。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

① 《孟子·尽心上》。

② 《传习录上》。

③ 《礼记·大学》。

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①

北宋的周敦颐继承了《中庸》对“诚”的这种形上化、本体化和神圣化，在其所著的《通书》的一开篇就大谈“诚体”：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②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③

由此可见，到了周濂溪那里，“诚”已被等同为化育万物、成就万物的“神”。它不像希腊神话或犹太教传统中的神那样多少是人格化的，倒更像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里的“神”，只不过它并非不变不动，而是“静而无静”、“动而无动”，大化流行、生阴生阳、各正性命。如此一来，圣人之所以为圣，之所以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④就在于通过自身“立诚”的工夫体悟、契合了作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的“诚体”。这样一种为天地立命立法的“诚”，可以说是对儒家“天理观”

① 《礼记·中庸》。

② 《通书·诚上第一》。

③ 《通书·诚下第二》。

④ 《周易·乾象》。

或“天道观”的一种具体表述，而蕴含着真诚、坦诚、虔诚、忠诚的“诚体”，也就成了儒家至高无上的“天体”、“理体”或“道体”的一个具体面向。^①

三、言“欲”与言“义”——一种会通的可能

带着对儒家“天道”或“天理”的这样一种理解，再来探讨拉康在《精神分析伦理学》的最后为何提出孟子那里“来自上天的法则”就是安提戈涅所化身的“欲望的法则”^②这个问题，显然会更富有成效和意义。

首先，必须明确到底何谓孟子所说的“来自上天的法则”。实际上，孟子和孔子一样罕言“天道”，更未直言“天理”或“天则”、“天律”等，因此无法断定拉康所说的“来自上天的法则”具体对应于《孟子》中的哪个词或哪部分内容。不过，这似乎不太妨碍义理上的理解，因为孟子已经把“天”视为宇宙的道德本体，把“天之所与我”的“心”视为人的道德本体，但二者的分别只是描述角度上的，本质上天人并不相分，“天体”即“心体”，或如陆象山所言“吾心即是宇宙”。这“天体”、“心体”或“诚体”会像康德那里的实践理性一样给人颁布道德法则，“仁义礼智”四端便是其基本内容。因此，尽管目前不清楚拉康说孟子谈到的“来自上天的法则”具体对应于哪个词，但它所指的无论如何都只可能是“居仁由义”的道德法则，除此之外孟子再未谈到任何“天之我与”的法则。

其次，再尝试来理解拉康在何种意义上说孟子那里的“来自上天的法则”就是他眼中的“欲望的法则”。笔者在别处已经区分了儒家传统中的“自然欲望观”和“伦理欲望观”，并且表明它们和拉康的欲望伦理学有共通之处的，是蕴含在孔子“我欲仁”、“子欲善”、“从心所欲不逾矩”等言论中的“伦理欲望观”。素来被儒家视作为头等大事的“立志”，其实也可以被理解成“明欲”，因为主张“杀身成仁”的儒家和

^① 对周子《通书》中“诚”的道德本体论解读，可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部第一章第一节。

^② Cf.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 p.375.

颂扬“舍生取欲”的拉康一样，都把欲望达到的道德目标置于一切利害算计之上，把伦理原则置于功利原则之上，都挺立、凸显了伦理主体的维度。尽管在对“人欲”的具体理解和界定上仍有差异，但在二者都不约而同地把“从心所欲”视为人最理想的道德状态的意义上，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至少有了交流和会通的可能，拉康把孟子这位道德圣贤与安提戈涅这位悲剧英雄相提并论也有确实的意义。^①

综上所述，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儒家的传统思想中，都各自蕴含着的一套“修辞立诚”的伦理学。一方面，拉康寻求主体真理的精神分析实践，旨在通过修正主体的言辞而实现对其自身欲望的真诚、忠诚，从而使主体得以诚恳地讲述、谈论其欲望，并最终尽可能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按照其欲望来行动；另一方面，儒家成就圣贤君子的修行工夫，则主张让人修省其言辞而恢复对其良知本心的真诚、虔诚，进而体悟到本心即包蕴着仁义道德的“诚体”，由此最终迈向“由仁义行，非行仁义”的理想状态。最终，对拉康而言，人的欲望或许才是人最诚实的良心；而在儒家圣贤眼中，仁义道德则成了一种崇高欲望的对象。^②

参考文献：

1. J. Lacan,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A], *Écrits*[C],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2. J. Lacan, *La Direction de la cure*[A], *Écrits*[C],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
3.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5.
4.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II: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① 参见“‘天理’与‘人欲’——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一种可能对话”（待发表）第三部分。

② 拉康学说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会通，显然只是一项刚刚起步的工作，仍有太多地方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澄清和疏通，所幸这不是一项完全白手起家的工作。如果说拉康是循孟子“东来”，那么牟宗三则是借康德“西去”，这一来一去之间，已然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线索。如果说牟宗三与拉康这两位二十世纪东西方思想界的巨人未曾交锋是场遗憾，那么所幸凭借孟子与康德这两座桥，人们或许可以在《精神分析伦理学》里听到《心体与性体》的回音。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1978.

5.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VII: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1986.

6.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

7. 卢毅：“‘天理’与‘人欲’——拉康伦理学与儒家伦理学的一种可能对话”（待发表）。

“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溯源研究

林媛^①/著

【内容提要】拉康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号，实际上是想回到弗洛伊德早期对无意识的基本发现中。拉康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论述“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的理念。他的能指与所指的概念来源于索绪尔，但对于能指重要性的理解，更得益于列维-斯特劳斯、博厄斯。他们所带来的影响使拉康对精神分析学无意识概念做出了根本性的再思考。这一思考与拉康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直接相关，也有利于更好地从结构的角度的去理解分析中无意识的言语。

【关键词】无意识 语言 结构主义 拉康

弗洛伊德前期提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拓扑学理论。他在《梦的解析》中提出著名的“梦是通往无意识发现的‘要道’”。从梦所析解出的，并且为原过程之构成要素的机制（移置、凝缩），亦出现于其它无意识形成物中（失误行为、口误等）。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中经常遇到的一些现象，如梦、失败的行为（口误及笔误）、俏皮语、双关语等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用浓重的笔墨对之进行探讨。他之所以会被这些

^① 华南师范大学精神分析与法国哲学方向在读博士，四川大学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专业硕士、华南农业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与教育与咨询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高校心理健康与教育心理区域中心（五山及周边）负责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社会工作师。

现象所吸引，原因就在于这些现象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它们都表现出某种语言障碍。根据弗洛伊德，当我们的显意识在那些压抑性的有害思想或欲望上不太警觉与活跃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察觉到无意识的运转。对于拉康来说始终是要将语言学领域的新发现应用于精神分析领域，以求“回到弗洛伊德”并最终破解无意识之谜。拉康认为弗洛伊德早期将无意识与语言相关联的看法才是正确的，所谓“回到弗洛伊德”，其根本就在于“恢复弗洛伊德思想的语言学基础……回到弗洛伊德思想的本体论基础”。也只有沿着语言的维度才能“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提出“本我-自我-超我”拓扑学理论模型。从其后期作品中强调“自我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无意识”这一论断来看，无意识问题始终是精神分析学的核心问题。

结构主义运动时期雅各布森的结构语音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等结构主义的思想理论对拉康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隐梦变作显梦的过程叫作梦的工作”，而拉康将雅各布森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到了一起。梦的工作的第一个成就是“凝缩”。比如弗洛伊德曾提及他梦见过一种植物，而“植物”一词实际上对他来说代表着多项含义，如他从前写过的关于某种植物的文章、教授和他美丽的夫人、名字是 Flora 的患者以及他妻子所爱的花，等等。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凝缩作用与语言关系密切；“对梦中无意义词语的分析尤其能揭示出梦的工作中的凝缩作用”。梦的工作的第二个成就是“移置”，移置作用的结果就是在梦中将单调抽象的表现转化为形象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将抽象形式的梦念转变为形象的言语，因此梦的工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抽象思想寻找到合适的言语。所以拉康认为《梦的解析》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语言的论述，例如其第一章的第一个句子就是：“梦是一个字谜”，也就是说语言的结构是梦的意义的根源。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式的凝缩与雅各布森所说的隐喻过程的形成相似，而移植则与转喻过程相似。他说：“‘凝缩’是能指的重叠结构，隐喻在此可以找到自己的领域，……‘移植’这个德语词更接近于换喻所展示出来的意指作用的转移。”弗洛伊

德描述的支配无意识之原初过程的前两种机制恰好对应于决定语言效果的最根本的轴线，即隐喻和换喻的功能。正是在此基础上拉康提出了“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这一论断。

1916年，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人们对于现实的了解最终是围绕着他们对语言符号的社会使用而运转的，言语是不对理解人类现实无关紧要的东西”，不亚于一场人文社科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在索绪尔之前，语言学研究首要关注的是语文学与词源学，也就是追溯词语的历史和由来。辉特尼把语言看作与其它社会制度一样的一种社会制度。索绪尔认为辉特尼是对的，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对于人们使用什么符号来说，符号的性质是无关紧要的。为了使人感到语言是一种纯粹的制度，辉特尼曾很正确地强调符号有任意性的性质，从而把语言学置于它的真正轴线上。

索绪尔从言语活动整体中区分出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个因素。人类天赋的不只是口头的言语活动，而是构成语言的机能——即与不同观念相当不同的一套符号。要言语为人所理解，并产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索绪尔摒弃了语言意义的命名论和观念论的思想，从整体论的角度来分析意义的产生，他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总体系统”的概念——这个系统管控着人们可以言说的东西，而人们对于它的规则却始终是无意识的。“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语言是一个封闭系统，系统内各要素的意义不取决于任何外部的东西，而是取决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它们的价值不是由内容决定，而是由系统中与其它要素的关系决定。它们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索绪尔说：“语言的能指更是这样：它在实质上不是声音的，而是无形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它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语言的实体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联结起来才能存在，如果只保持这些要素中的一个，这个实体将无法存在。”索绪尔的“关系决定意义”的观点体现了现代主义对世界的

一种全新观念。根本没有“独立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客体是由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的，这一观点触发了结构主义的兴起。

1950年列维-斯特劳斯应古尔维奇之邀为莫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写了著名的“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借助莫斯的地位与威望，在赞誉莫斯成就的同时，全面推出了其关于社会结构与象征系统的思想。他的这一创造性阅读对于后来的结构主义运动来说影响深远。德贡布称赞这篇“导言”为法国结构主义的宣言，弗朗索瓦·多斯则称之为结构主义的“纲领”。在“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言”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莫斯看到了各种巫术现象与语言现象的相似性，即它们都处于无意识思维的层面，都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意识象征系统，进而认为莫斯让我们看到了结构语言学才让我们看到的東西，即语言的规律在无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在“导言”中，列维-斯特劳斯提及，在1924年莫斯在向心理学家们发表演讲时，就将社会生活定义为“一个象征关系的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被认为是一个象征系统的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第一层次上排有语言、婚姻规则、经济关系、艺术、科学和宗教。”这是一个通过自我与他人关系界定的有结构的世界。莫斯旨在探寻一个社会的象征性的根源，构建一个关于象征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主体性是无可比较和不可交流的，主体的和客体的在无意识的平台上相遇。无意识行动的法则总是在主体的担忧之外，这些法则的发展决定了感知的各种模式。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莫斯关于巫术的研究，提出“无意识”在语言学中的重要性，也提出要在“无意识范畴”的概念和“集体思维范畴”的概念相互混淆的平台上，尝试着去探寻意义。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结构语言学使我们了解到：无意识是存在于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中间项，精神生活的基础现象将生活条件化，存在于无意识思想的层面。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这个区分直接启发了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他认为从各地收集来的神话虽然都有其各自独特的表述，就犹如言语一般，但是这些神话在其基本结构系

统上又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就是神话的“语言”。因此神话和语言都来自一个共同的人类思维的普遍基础，都反映着人类思维的本质。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一旦莫斯把无意识与象征系统联系起来，他就可以把无意识概念与集体思维范畴相互融合在一起。只有从无意识这一维度出发，一种根本的象征系统理论才是可能的。通过研究原始人的象征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无意识与象征之核的直接关联性。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最复杂的关系之一，语言可以被视为文化的产物，一个社会所使用的语言是整个文化的反映，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语言也可说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众多构成成分之一。正如泰勒关于文化的著名定义所说：文化是内容丰富的复杂体，包含工具、制度、习俗、信仰和语言。语言可以被视为文化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主要通过语言学习我们的文化——辅导和教育孩子靠话语，斥责和夸奖孩子也靠话语；语言行为同样表现为文化的一个条件，因为文化的构建跟语言的构建十分相似，两者都是通过对立的关系和关联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靠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所以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视为一座地基，专门用来承受那些虽然有时比它更复杂，然而跟它的结构同属一个类型的结构，这些结构正好对应于我们从不同侧面看待的文化。

列维-斯特劳斯把无意识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将无意识定位成集体思想的一个范畴，无意识充满了象征，甚至是构成一种基础的象征的事物。就像语言、社会是一个自动的现实，象征比那些它们所要象征的东西更要实在，能指先于并决定着所指。列维-斯特劳斯在“历史与人种学”一文中这样说：“人种学关于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性质这种独创性观点，早就是泰勒一句格言的产物，只不过泰勒提出的方式仍然是含混的和模棱两可的。”这说明在人类学领域内，认为集体现象具有无意识性质的观点是有传统的，莫斯只不过承续了这一传统。

另一位人类学家博厄斯通过把文化现象与语言相似地对待，预见到语言学思想后来的发展以及人种学的未来。博厄斯清楚地指出语言现象

相对于其它集体现象的独特性：“看起来在语言现象与其它的人种学现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语言分类从未进入意识，而在其它的人种学现象中，尽管同一个无意识源头占据着支配地位，但这些其它现象总是能够进入意识，而且产生二次论证和再次解释。”他还认为“语言过程的无意识性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各种人种学现象，这一点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后来他又具体指出，这种独特性表现在，语言概念或范畴的形成是完全无意识的，是根本独立的，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语言学表现出来的巨大优势就是已经形成的各语言范畴整体上总是保持为无意识的，由于这一原因，导致这些范畴形成的各种过程就能得到遵循，而不会出现二次解释的误导性的和干扰性的各种因素。”博厄斯提出语言的规律是在无意识层面起作用的，不受说话者的控制，因此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现象进行研究。正是博厄斯的语言作用无意识论沟通了莫斯的巫术象征系统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及其前身结构语言学。博厄斯使列维-斯特劳斯看到了，语言作为集体现象不仅是无意识的，而且唯有语言现象这一特殊的集体现象才是完全无意识的，因为其根本规则（如分类）从未在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因而，对于语言的分析手法（如结构的分析手法）才是分析无意识现象的唯一有效的手法，这一点又影响了后来的拉康。

1953年，拉康在“罗马报告”中就无意识（现象）的结构展开论述，指出症状完全可以在一种语言分析中得到解析，因为症状本身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症状和梦一样，不但是象征性的，根本上都是无意识的。拉康后来直接称“梦和症状是无意识最原初的一些现象”。拉康在《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中表述说：“我们必须在分析的交流中听到这里所涉及的象征界。尽管问题可能在于一些实在的症状、一些过失行为，但是它无论被怎样写入我们不断从中发现并重新发现的那个东西之中，也即弗洛伊德将之当作其基本现实而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中，都仍然并始终涉及的是一些象征，一些被组织在语言中的象征，因此它是从能指和所指的链接开始起作用的，此种链接即是语言结构本身的等价物。”

拉康进一步表达了无意识具有结构型的思想：“无意识是主体之中的某种象征汇集，我们应该把这一汇集设想为总是具有结构的，是根据某种秩序被组织起来的，而这一秩序就是情结。”拉康一直认为那些症状，在某种像语言一样具有结构的东西之中总是有一种正好关于人类组织的暗含的东西，在这一东西之中，其运转的这种或那种元素将像能指一样进入游戏。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验在无意识之中发现的是整个语言的结构，他继承了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各布逊在这一问题上的反索绪尔立场，不仅把无意识的结构比作语言的结构，而且还把它比作言语的结构，拒绝只从静态角度来理解无意识结构。

如果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是一种关于无意识的辞说，那么这种辞说便依赖于某种总是超越其自身的东西。拉康的作品就是说出这种无法言说的东西的一种尝试，拉康试图经由语言的结构来表达某种始终超越语言自身的东西，亦即：无意识欲望的领域。而对于拉康而言，语言与言语的区分恰好对应了精神分析中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他认为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而他者的话语就是一整套约定俗成的规则，“语言的法则无意识地支配着个人有意识的语言行为”。

创造“撞击”的时刻 ——来自儿童孤独症的精神分析临床的思考

王莉^①/著

【内容提要】儿童孤独症在中国目前有增加的趋势，国内对孤独症孩子的接待主要还停留在孩子语言和行为习惯的培养和训练层面，笔者试图借助精神分析的理论，在临床实践中进行更深层次的接待，促进其精神的整合、主体性的建立：精神分析家携带着丰富的力比多能量的目光、声音、话语，逐步成为孤独症儿童的彼者；建立他们和彼者的爱的关系；帮助他们抓捕语言，达成和外部世界的关系，离开孤独症。为此目的，精神分析家必须创造出各种最为温情和富有情感性的互动方式：儿歌，游戏，动作等等。这些方式看似简单，实则是精神分析家经过深思熟虑并根据每个孤独症儿童的特质，来耐心引入一些可能在孩子心灵产生想象界和符号界连接的机会：文章中形容为“撞击”的时刻。这些时刻非常重要，它让孩子有可能离开孤独症的空：完全的实在界，从而进入到实在界、想象界、符号界的“三界整合”的正常精神状态，成为有语言能力和情感能力的正常孩子。

【关键词】孤独症 分离创伤 主体欲望 身体的实在 力比多能量

在儿童孤独症那里，实在界过于优先，想象界和符号界则非常微弱，

①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专业会员。

甚至指向空。这涉及的是生命初期婴儿的精神整合，而此整合依赖于提供给婴儿的其母亲在场的质量。以下有限的临床个案所展现的是：孩子在婴儿期和母亲的暴力的分离创伤；母亲完全抓捕婴儿实现和婴儿的精神融合；母亲因产后抑郁而无意识地强烈拒绝孩子；以上三种情况导致孩子进入到孤独症。这些只是孤独症可能的原因中的有限部分，这里选择这些临床资料并不是要讨论儿童孤独症的原因，而是要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之上讨论临床接待的意义。

三岁的林在一岁时离开在城市工作的父母，由奶奶带回老家。这是一个巨大的分离：离开温柔的妈妈、很爱他的爸爸；断奶；被奶奶带去的地方是说另一种话语：客家话^①。爷爷是村子里的铁匠，性格暴躁，奶奶说话声音很大，动作也很大，总是不停地大声说话。

第一次的面谈爸爸妈妈和奶奶都在场，这个漂亮的小男孩眼睛明亮，却完全不看人，沉浸在自言自语里：“大众，福特，丰田”，他重复着很多的汽车品牌 and 型号，在儿童接待室里搜寻着玩具车；或者找到有字母和数字的卡片，重复读出那些字母，数字。他的发音很清晰，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而对于在场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反应，也不回应任何对他说的话。他这儿那儿地寻找着有汽车、字母和数字的东西，不管是实物还是画在墙上的。当大人要让他做什么，比如穿鞋，比如坐下，需要按住他，因为话语好像完全没有进入他的耳朵。他在家里的消遣就是看电视和儿童游戏机，没有选择性，来者不拒。在这个过程中他学会很多广告，当看到相关的东西出现时，他就大声重复背诵那些广告，并浮现出愉悦的表情，乍看起来好像是个非常幸福的孩子。

妈妈告诉我孩子在一岁前会看人，会伸手，对爱抚有足够的反应，而两岁由奶奶带回父母身边时，人们发现孩子完全不理人了。在面谈的过程中奶奶不停地大声说话，林的父亲则大声地呵斥她让她闭嘴。通过说话和动作可以感觉到奶奶一直有很强的兴奋性，而对婴儿来说，照顾

^① 客家人所说的话语。客家人是中国历史上为躲避战乱而迁徙的族群，分散在中国的南方地区，多聚居，保留有和汉语发音完全不同的自己的发音。

他的人总处于兴奋中会带来一个太喧闹太动的精神环境，这是不利的。林的父母自己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让奶奶安静一些。当我建议完全断掉孩子的电子类娱乐，奶奶提出如果孩子因此痛哭到脱水怎么办，我回应她：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就给他补水。（一周后她告诉我孩子对此的哭闹程度完全低于她的预想。）

我开始接待林的时候工作频率是一周两次，多数时候妈妈也在场，偶尔爸爸在场，极少数时候奶奶在场（奶奶在场的时候工作难度自然更大）。在首次面谈结束前我已经对林认真地介绍了我自己，解释了接待他的原因，和我们工作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足够细致的引入的话语，所有的工作对孩子而言都如同在打哑谜。

我引入一只手心大小的玩具猫作为工作的开始。我对林介绍这只小猫，它身体的一些部位，让林去摸这些部位（需要拉着他的手去摸，因为在工作的前三个月，他对小猫和我的话语完全没有反应），我也会用小猫的爪子去触摸他的手、耳朵、脸、鼻子等等，所有这些触摸都是伴随着温柔的情感性的话语：这是林的小手，可爱的小手；这是林的耳朵，这是林的小腿等等。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向他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小狗，差不多也做类似的工作。我也会唱一些简单易懂的儿歌，让他拿着铃鼓摇动，有时候是和他一起摇。工作的一部分内容是他最喜欢的玩具车，这个时候他会说很多话，但是只说品牌和型号，自言自语，而我则把他手里的汽车拿过来看，对他说：王阿姨现在也认识这辆小汽车了，因为林告诉王阿姨了，林是多么喜欢这辆小汽车啊！这些起初的工作进展相当缓慢，但是可以感觉到一个变化：最初林完全不在意我出示给他的东西，也完全不在意从他手里拿走什么东西，你拿走就拿走，他没有任何反应，马上去拿另一个东西，一段时间以后拿走他手里的东西变难了，他会握紧它，被拿走以后他也不会马上去拿另一个东西，而是试图从我手里拿回去。这个时候我会说：我多么喜欢它啊，多可爱的小汽车，我想把它留在我的手心里，你也喜欢它吗？你想拿回去是吗？这种游戏我每次都会做，他从一开始的立即跑开慢慢转向站着听我说，重要的是，这种时刻他偶

尔会有投向我的目光了！

有一次他把一个很小的玩具车开着从桌子上掉下去了，我对着地上的小汽车悲哀地说：多么可怜的小汽车啊，林这么喜欢你，可是你掉下去了！这个时候林重复着：小汽车掉下去了，小汽车掉下去了！眼泪在他的眼睛里打转，他流着泪继续重复着这句话。我说：王阿姨看到林哭了，小汽车掉下去让林多么难过啊！

这个情感性的生长为下一个时刻打下了基础。有一天我带来一个手掌大小的黄色毛绒玩具鸭子，他专心地在桌子上玩着几个小汽车，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鸭子。当他把一个小玩具车向着我的方向开过来时（在工作几个月后我注意到他总会把玩具车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开过来），我拿着鸭子对着这辆小汽车说：哎呀鸭子，你是不是会吃了这辆小汽车呀？

我的这个突冒（来自我的无意识，引入一个足够分量的东西以便和他的创伤相遇）让林非常震惊，他紧张地看着我，我继续说：哎呀鸭子，你不应该吃掉林的小汽车，他多么喜欢它呀！

林爆发了，他泪如泉涌，浑身发抖，他泣不成声地说：鸭子吃掉小汽车，鸭子吃掉小汽车！小鸭子不吃小汽车，小鸭子不吃小汽车！他跑到我的面前，仰着头，满脸都是泪水地对我说：鸭子不吃小汽车！

接下来的一次接待，林一进来看到鸭子，就又哭起来，重复说鸭子不吃小汽车。他蜷缩在妈妈的怀里哭着。我对他说：“王阿姨看到林多么痛苦啊，哭得多么伤心啊，因为他多么担心鸭子吃掉他喜欢的小汽车啊！这让王阿姨想到当你一岁的时候，很小，你奶奶带着你离开妈妈爸爸回老家，当时你是多么伤心啊，多么想念妈妈，想吃妈妈的奶啊！而且奶奶说的话是你不懂的，声音又很大，你多想回到自己的家，回到妈妈身边啊！”这个时候他紧紧地抱着妈妈，哭得更加厉害，发出痛苦地抽泣声，我继续说：“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妈妈不会让林离开了，妈妈和爸爸都和林在一起了，会好好保护林，让林慢慢长大。”这时妈妈也说：妈妈会好好保护你的，不会离开的，妈妈好爱你！

我继续让小鸭子出现在接下来的几次分析里，每一次他都对它做出

反应，或者哭泣，或者把它扔到地上，最大的一次反应是一边哭着说王阿姨把小鸭子扔掉，然后自己拎着它走出接待室，把它放在客厅角落里的其它玩具下面。而每一次我都对他用话语说出他对小鸭子的感觉，他的担心，他很小时候经受的痛苦，和现在我们大家对他的喜欢和保护。

这个阶段每次林都有很多泪水（对此我深感心疼和歉意）。伴随着由小鸭子引发的强烈情感，在这个阶段里他逐渐找回了投向我，投向他妈妈、爸爸的目光和话语。他越来越多对于人做出反应，开始回应请求和提出请求，也开始表现出依恋和妒忌。

回溯整个接待的过程，一开始是显得毫无进展的关于身体的话语和触摸，接下来是耐心地围绕着身体的实在，引入触觉同时引入词语，带着爱的情感的词语和触摸，一次次、无数次轻柔地“敲击”处于实在界的孩子，呼唤着，也等待他发出回声；借助于“喜欢”、“爱”、“可爱”这些饱含情感的声音的词语的触摸，让孩子获得无意识的身体形象的感觉（从小猫小狗的身体到他自己的身体），这些初步的建设为下一个时刻打下了基础：当小鸭子带来的关于爱的客体缺失的痛苦被他抓捕到时，这个由想象引发的痛苦的情感撞击到压抑在实在界里的在婴儿期和母亲暴力分离的创伤，而在这个时刻“不要小鸭子，把小鸭子扔掉”这样的话语冒起了，主体的欲望得到了一个很充分的位子！

在儿童孤独症的接待里，分析家充分的身体、情感和话语的在场缺一不可，另外孩子的父母（主要是母亲）的在场也是这个“治疗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这能提供给孩子足够安全的氛围，让他能够接受来自彼者精神的“进入”，另一方面，母亲通过精神分析家对自己孩子投注足够的欲望，自己薄弱的主体性也得到投注，同时，母性的欲望得到修复。因为在这样的治疗之前，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处于无比的绝望和孤独状态，母亲自己（涉及她自己婴儿期所得到的精神滋养）也非常需要这样的在场。

分析的设置依然是父性的，约定的工作时间，付费，而工作的内容，却始终用亲性来围绕，这有别于其它的精神分析接待，因为在这样的接

待里，我们面对的是空，我们所做的是让它“于无中生有”，我们呵护这个一点一点生长出的“有”（它刚开始是很弱的），等它长得足够结实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进行其它分析所理解和处理的“分离”的问题。

亲性完全不等同于融合。我举出一个三岁女孩的例子：这个孩子长相犹如小天使，可是她完全没有投向他人的目光，不带有表情，说着人们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外星语”。她的行为以冲撞为特点，飞快地爬上椅子或者桌子，飞快地抓起笔，用力在纸上乱戳，突然又跑到另一个地方，抓起别的东西，有时候说着我们完全不懂的话，对任何人没有任何注意；当她停下不动的时候，她就投身到母亲的怀里，蜷起身体。这个孩子的妈妈则完全地“牢牢抱住”她的女儿。当我发现并且提出她这种过分的“紧握”时，孩子的爸爸完全同意，他反映一直到现在，连给孩子调奶这样的事他都几乎得不到允许。母亲几乎不允许其他人靠近孩子，当我询问原因时母亲回忆到，孩子在医院刚出生时，被抱走了几个小时，那个时候她强烈地感觉到有人要偷走她的孩子（尽管当时她知道可能是抱去做新生儿的护理），因而感到极大的恐惧，以后她总担忧孩子会出什么事情，想方设法总和孩子在一起，为此孩子出生以后她就放弃了工作。

这涉及孩子母亲自己的创伤。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在计划生育的年代，她感受了所有家庭成员对她毫无遮拦的失望，并且爷爷奶奶一直坚持要把她送人，而在她之后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是受到家人欢迎的男孩，她一直生活在对家人的敌意和被送人的巨大恐惧中。她感觉自己一无所有，而且结婚后被诊断出不孕症，治疗很久以后才得到这个女儿，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孩子是她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东西，她自然时刻紧张地“把握”着她。

身体和精神的过分的粘着产生了融合的效果，导致这个三岁的孩子精神上完全还没有诞生。这个女孩的孤独症原因很清晰：母亲无意识里要和女儿融为一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没有人能偷走她，才能确保她是安全的，才能完全拥有她！所幸的是现在孩子严重的病理性让这位母亲清醒了过来。事实上她很快成为理解力很强的母亲，她理解到自

己的病态焦虑，丈夫也大力支持她鼓励她，他们一起积极配合分析家做了对她来说很困难的工作：和孩子身体上逐步减少粘着，开始更多用话语和目光交流，并且逐步分床。

亲性指示着情感整合的能力，带来足够的精神表象，而融合却只带来实在的身体这一个现实。停留在母亲身体里的孩子，没有表情，没有情感，没有内外之分，没有精神表象，只有冲撞和蜷缩，或目光空洞地说着的“外星语”。精神分析的接待依然是一点点通过引入客体，用情感支持触摸和词语，让实在的身体得以被想象化和符号化。我描述一个她的接待里的一个时刻（是在和她工作半年之后）：当我唱舒伯特的《摇篮曲》时（我把歌词稍微改动为：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小熊，妈妈爱你妈妈喜欢你），抱着小熊的她向我走过来，看着我，我向她招招手，她走到我的身边，把脑袋靠着我的手臂里，露出幸福的微笑。从这个时刻开始，她能回应我的要求，比如能跟着我唱出歌曲里的一个字，看一看摸一摸玩具小猫小狗，慢慢地能多说一两个字。她最初学会说的两个字是喜欢，三个字是：喜欢你。逐步地她越来越少说她的外星语，越来越多地学会说话，而且能加入其他孩子的一些游戏。对她妈妈而言，最高兴的是孩子会看着她叫妈妈了，这让这位母亲的身体和精神活力，也很明显地得到了生长。

在这个个案里，恰好是词语切分了完全混淆的身体实在和想象，而分析家爱的情感则支撑了母亲和孩子两方面的分离。

我接待过一个五岁的北方男孩，其母亲的产后抑郁（产后抑郁是母亲自己命名的）导致了他的孤独症。这位母亲自己描述“生了他之后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一件事情：给他喂奶”。直到第一次会面，母亲依然用冷冷眼神看孩子，用没有感情的话语说孩子，牵孩子的手也是生硬的。这个孩子的刻板程度很深，在开始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用手背用力击打地板，同时发出嚎叫。在这个分析中，我比对其它的个案更多地关注母亲，这个极度需要滋养的“小女孩”。每次开始我都邀请她说说孩子的情况，也寻找机会赞赏和鼓励她。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之前没

有目光没有表情，刻板重复的男孩出现了一些精神的活力，我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笑（出现表情和目光是从这时开始），笑出声来的时刻：我唱《洋娃娃和小熊跳舞》的歌，唱到“小熊小熊点点头”，我自己夸张地点头，示意他也点头，他开始点头，那个时刻，他一边点着头，看着我，一边咯咯地笑，而且笑个不止！如此地快乐，简直是狂喜！这个狂喜的时刻让我联想到拉康所说的婴儿在镜子中认出自己的镜子阶段的狂喜，我认为这是同样的狂喜：以爱的客体的在场作为支撑，身体实在的享乐、无意识形象的激发、词的登录这三界整合了，主体由此确认了自己的存在，“认出自己”。这个时刻正是主体的存在的时刻，或者我可以大胆地称之为“类镜子时刻”？因为这个时刻的出现同时带来在临床上可观察到的一系列孩子的发展：有了快乐或者悲哀的情感，开始有了拒绝，开始学习说简单的词语：喝水，小狗，小猫等（开始的半年完全没有对词的区分，半年后开始逐步区分小猫小狗等词语），变得较少用身体撞击地板，嚎叫慢慢消失。

我以“撞击”这个词作为主题，原因是在孤独症儿童的临床接待中我如此深刻地感觉到情感性的能量的重要。目光、声音、话语、触摸，这些都必然充满力比多能量，孩子只有能够接收到足够的这样的能量，才能作为力比多的客体，完成自己的精神整合。拉康说：“语言使人离开他的自然。”而在孤独症的临床里，我们也看到正是分析家携带着丰富的力比多能量的话语不断撞击孤独症孩子的黑暗实在界，以及分析家支持着孩子和家长的极度的耐心和信心，让孩子的主体性得到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保持连续性的建设。这些和孩子的心灵不断相遇，让孩子的主体能逐步开始登录在话语上，让孩子的主体（首先孩子是作为爱的客体，然后是作为欲望着爱的主体）在如同撞击产生的光芒里逐步诞生，并且朝向生命活力的方向不断生长。



女性与话语专题



女性怎样才能谈论对她们来说谜一般的东西？

莫妮克·特科^① / 著

赵旻 / 译

在源头上，以多种方式被说之物来自无法被说之物 (Ungesprochenes)，在留待言说的意义上，后者仍不是被说之物。

——马丁·海德格尔

因为说话，像母亲一样说话意味着在没有帐幕的地方栖息。

——保罗·策兰

2016年的这一期讨论班紧接上一期的题目“女性与母亲”。我们把这次的工作主题定为女性与话语并非偶然。实际上，不论二者有怎样的联系，我们都把社会学、文化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那些论点放在一边，以便关注我们自己的领域，即无意识。

对我们的工作来说第一个基础参照轴，就是弗洛伊德的发现的基础，以及随后拉康的教学的基础：对人类这一物种来说，其特殊之处就是其作为一个言在这一处境。不论男人或女人，我们在这个世上都被“语言”所浸透，也无可避免地被先在于我们的那些能指所标记。男人或女人，我们将语言化为己用，并且进入到话语的维度。

①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

如果像拉康所说“无意识像一门语言那样构成”，那么，分析的实践就是谈话疗法的实践。因此只有从“谈话”疗法的经验出发，我们才能够试图去详细阐述这期讨论班中将会遇到的问题。作为分析者，我们将逐渐体会话语的介入怎样摆脱我们的症状的“词”并打开我们生命的僵局这一过程。作为分析家，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现在沉默与话语的交错中可以暴露出多么丰富的内容。

话语栖息在我们的身上，并且我们栖息于话语之中。从拉康的“话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和领域”出发，我们来探索什么是实话，什么是主体对其陈述的承诺。话语为呼求并且要求大彼者的参与。我们还将触及母亲为了孩子所承担的“代言人”的功能。不过，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承担这一功能的吗？这也将会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

正是与所谓“癔症性”的女人的话语工作，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他等待她们对他说“一切”，然而她们却带着她们身体的症状说。

我们将一起来重拾弗洛伊德最初的案例之一的那些元素，好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作为一个女人会倾向于谈论她与她身体相处的困难。难道不是为了掩饰她们无法被描绘的性别，而她们说话的身体却没有词来说它？人们说疯狂的女人们不停地说，或者她们说是为了什么都不说，这难道不也是另外一种勾勒她们无法符号化的女性性别的尝试吗？

我们还可以思考，为什么是一个女人，在对一个男性医生的讲话过程中，和他一起发明了谈话疗法。

“能说会道的小女孩们”，这是我们第三篇文章的标题，能说会道难道不就是一种摆脱母亲的掌控的方式吗？没有阴茎这一器官，对男孩来说就标记了他和母亲的身体的区别。小女孩们是否是利用话语的石祖崇拜来登录进入石祖功能的普遍性中，并且挣脱与古老母亲的融合/混淆？

过于实在，女性的身体也是沉默的组织。对一位青少年女性的治疗将允许展开讨论沉默的问题，它近乎于将创伤性家庭秘密加密的缄默症。

这将是我们的第四篇文章。

最后，跟随着塞尔日·勒克莱尔写的“辛格或转移之爱”，我们继续工作，来理解，在转移中，一个女人作为女人怎样能够与话语相遇。

主体在实现精神分析时的空话与实话^①

雅克·拉康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内容提要】精神分析的假设在于所有的话语，只要存在一个倾听者，那么即便是沉默，也是一种回应。然而话语本身是一种空，分析家时常受到诱惑去回应分析者话语之空，这样反而丧失了真相。拉康在本文警告分析家不要陷入对分析者话语内容的执着，不要试图用“心理因果”来理解分析者的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明白辞说的本质，用悬浮性注意的方式倾听主体话语中的能指。这是因为精神分析谈论主体的历史并不在于话语背后说指涉的现实，而是过去的话语在当下的在场，这种在场的真相需要一个倾听者的断句为其赋予意义。

【关键词】辞说 空言 主体 无意识

让我说出真的和不变的话。

——《内在的慰解》第45章：不可轻信他人及言辞小疵

随你说^②。

——“因果主义”思想的格言

不管精神分析自以为是治疗的手段、培训的手段，或是探测的手段，

① 翻译时部分参照了褚孝泉翻译的《拉康选集》。——译者注

② 也有“总是原因”的含义。——译者注

它只有一个媒介：病人的话语。忽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不能被原谅的。然而，所有的话语都要求回应。

我们将要证明，即使碰到的仅仅是沉默，只要有一个倾听者，所有的话语都是有回应的，而这里正是话语在分析中的功能的关键点。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家不知道话语的功能是这样的，那么，他只会更强烈地感受到要回答的呼唤。如果最早听到的是空，他本人将会感受到这个呼唤，并且会在话语之外寻找一个现实来填补这个空。

这样他最终会去分析主体的行为以便找出他所没有说出的东西。但是，要获得供词，他又必须说出这些东西。这样，分析家就又获得话语，但是这时话语回应的仅仅是其沉默的失败，是从自己的虚无中感知到的回声，因此是可疑的。

但是，跨过主体言说之空（vide de son dire）的这一呼唤是什么呢？是呼唤基本真相，透过它还闪烁着更卑微的需要的呼唤。然而，一上来它就是在试图诱惑彼者的含混缺口中的空本身的呼唤。诱惑的手段有主体的奉承，还要押上其自恋的丰碑。

“这就是内省！”内行叫道，他很清楚其中的危险。他承认，就算他穷尽其好处，也肯定不是尝到其魅力的最后一人。很可惜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浪费。否则他来到你的躺椅上，你会听到许多有趣而深刻的东西。

奇怪的是，虽然在分析经验中最先遇到的正是这样的人，分析家还是会指望内省。因为一旦押上赌注，就会失去所有你以为在掌握之中的美妙事物。必须交代，好处似乎不多，但是这个人的另外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会呈现出来。刚开始他觉得这很蠢，然后就会默默无言好一阵子。这很常见。^①

这样，他就知道了由合意的幻想所鼓动的滔滔不绝的、自言自语的幻景和这无处可逃的辞说的强迫工作之间的区别。心理学家有些幽默地，治疗师则有些狡猾地称之为“自由联想”。

① 这一段是1966年重写的。

因为这当然是项工作，那可以说它需要学习，直到在学习中看到这一工作的培训效用。但是，如果这样使用它的话，它培训出来的除了技工还能是什么？

那么，这项工作是什么呢？让我们来检查它的条件，它的成果，以便更好地看清它的目的和益处。

顺便要说，*durcharbeiten* 这个恰当的词相当于英语中的 *working through*，却让我们的翻译者束手无策。尽管我们语言的一位文学大师给他们提供了穷尽语义的练习：“推敲已有百遍，继续重新推敲……”，然而在这里，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理论告诉我们有一个三元组：挫悵、攻击性和退行。这是一种表面上容易理解的说法，甚至可以让我们免去真正的理解。直觉的快速理解本就值得怀疑，更何况它已被广泛接受。如果分析突然发现了它的弱点，它也将会赞同不向感性求助。感性是个辩证无能的禁忌词，还有动词“理智化”，二者的贬义反而使这个无能成为优点。这两个词将在语言的历史中留下一些疤痕：我们对于主体^①是愚钝的。

我们最好是探究一下这个挫悵来自何方？来自分析家的沉默？对空话的回应本身，尤其是赞同的回应，常通过其后果表明这比沉默还要让人感到挫悵。挫悵是不是主体的辞说本身固有的？主体是否总是越来越剥夺他自己的这一存在？如此，努力真诚的写照不会令无条理的思想变得更少，努力改正也做不到点明其本质，支柱和防御也无法阻止它的地位动摇，自恋的压迫令气流通，最终他承认，这一存在从来仅仅只是他想象的产物，而这一产物让他毫无确信。因为，在他为一个小彼者所做的重建工作中，他重新找到了这样一个根本的异化——这一异化让他像一个小彼者那样构建，并且让他注定要被一个小彼者所遮蔽。^②

我们的理论家们现在把自我定义为承受挫悵的能力的力量，它就其

① 1966年写的是“在心理学方面”。

② 这一段是1966年重写的。

本质而言就是挫悵。^① 它并非是主体的一个欲望的挫悵，而是他的欲望在其中异化了的一个客体的挫悵。自我越是发展，对于主体来说其享乐的异化就越深。因此这就是二度挫悵，并且就算主体在辞说中把挫悵的形式重新带回到被动形象中——主体在镜子的炫耀中变成了客体——，他也不会满足，因为即使在这个形象中他达到了完美的相似，他在此看到的还是彼者的享乐。这也是为什么没有适合这一辞说的回应，因为主体把所有干预他的误认的话语都看作是蔑视。

主体将在这里体验到攻击性，这种攻击性和欲望受挫而产生的动物性攻击毫无关系。大家对这一说法感到满意，却掩盖了另外一个让所有人全都不那么愉快的说法：奴隶的攻击性，用死亡欲望来回应工作中的挫悵。

由此我们就理解到，所有通过否定辞说的想象性意图的干预，都拆掉了主体曾构建来满足这些意图的客体，并理解到这个攻击性是怎样回应这些干预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抵抗的分析，而这样做的危险马上就显现出来。这已经被头脑简单的人所指出，他所见到的从来只是那些主体幻想的攻击性意义。^②

这样的人，毫不犹豫地为“因果主义”分析方法辩护。这种方法的目的是用对主体往事的精巧解释来改造主体的现在。他的音调中都透露出他想要摆脱的焦虑，因为他不得不想到他的病人的自由取决于他的干预的自由。就算他用那些方法有时候能对主体有益，影响也不过就像一个让人兴奋的玩笑，我们不会被它吸引更长时间。

① 在这里，存在着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偏离。因为将自我和主体的纪律等同起来，就是把想象性隔离与对本质的控制混淆在一起。由此，会导致在治疗导向方面的判断错误：即将目的指向强化“自我”，在许多自己的结构已经过强的神经症那里，这条路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是已经读过我们的朋友米歇尔·巴兰写的，对于患“早泄”的主体来说增强“自我”是有益的吗？因为这允许他继续悬置自己的欲望。不论怎么考虑，恰恰是因为他的欲望被“自我”的想象性功能所悬置，主体才有短路行为，精神分析的临床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与对伴侣的自恋性认同有关。

② 在我们1966年的导论结尾处赞扬过的工作也是如此。接下来会指出，如果它能够被某一特定类型的干预所加强，那么攻击性仅仅是分析的挫悵的一个副作用：因此，它并非挫悵-退化这个对子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当下”（*hic et nunc*），有人认为分析的活动就限于此。实际上它可能是有用的，只要分析家在当下所揭露的想象意图不被分析家从它被表达的符号性关系中拆下。关于主体的自我（*moi*），在那看不出什么来，自我是不能被他用“我”（*je*）即第一人称的形式所保证的。

“我成了这样仅仅是为了变为我能够成为的样子”：如果这不是主体的幻景所做的常设的关键点，在这里又怎么能获得进展？

由此，分析家在追捕主体的姿态（甚至是静态）的内在秘密时并非没有危险，除非将它们当作无言部分而纳入他的自恋性辞说中。即使是年轻的分析家都已经敏感地注意到这个危险。

危险不在于主体的负性反应，而更多在于他被捕获在一种客体化中；在由他的异化所更新的一个身份中，他的静态，甚至他的雕像都同以前一样是想象的。

与此完全相反，分析家的艺术就是要悬置主体的确信，直至最后的幻景都消耗殆尽。并且需要在辞说中强调它们的撤销。

不论这样的辞说实际上显得多么空洞，它也只是从表面被理解时才如此。这证实了马拉美的话，他将语言的一般用途比作货币交换，就算是货币的正反两面都被磨光了，人们还是“默默地”传来传去。这一隐喻足以让我们想到，即便辞说被用烂了，仍然有令牌的作用。

即使辞说不传递什么信息，它也表示交流的存在；即使它否认事实，它还是肯定了话语构成了真相；即使它是用来欺骗，它还是把希望寄托于证词。

况且，精神分析家自己很清楚问题在于要将辞说的哪一“部分”领会为是值得注意的话。最好的情况下他是这样做的：将一段日常生活的叙述当作一段寓言，让优秀的倾听者注意，将一段漫长的演说当作直接的感叹，或者相反，把一个简单的口误当作非常复杂的陈述，甚至把默默的叹息当作是对绵绵涓涓闷愁悲思的替代。

同样，恰当的断句给主体的辞说以意义。而当今的技术把一次会谈的结束仅仅视为是时间上的暂停处，与辞说的脉络无关。这也是为什么

会谈的结束能起到格律划分的作用，这完全具有干预的价值，以便加速推进至决定时刻。并且这就表示我们要将这个�从它惯常的用途中解放出来，以便将它用于技术中所有有用的停止。

如此，就可以实现退行，而退行不过就是在辞说中现实化了由一个“自我”在其结构解体的每一步中所释放的那些幻想关系。因为毕竟这一退行不是真的；它仅仅是通过音调变化、措辞转变、“言辞小疵”而在语言中表达出来。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也不会超过成人假装“幼稚”地说话这一程度。如果将与客体的当下关系的现实归因于它，再将主体投射到一种异化的幻觉中，就只不过是转嫁了精神分析家的托词。

因此，没有什么比试图以所谓主体现实的试验性接触为指引更让精神分析家走入歧途的。这种被直觉主义的甚至是现象学的心理学用烂的套路，在当代的使用中获得了症状性的扩展，即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稀释了话语的效果。但是，在由于其自身的规则而排除一切实在接触的关系中，它的强迫性价值会明显被提升。

年轻的分析家们或许会因为这一手段所包含的琢磨不透的性质，而任凭自己被强加上这一套。然而，他们将会发现为了尽量做到，没有比通过接受控制本身更好的办法了。从与实在的接触角度来看，就算是这些控制本身的可能性都是一个问题。相反，控制者显示出第二种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是说，控制者认为经验对他和对受控制者一样富有教益。因为受控制者显得禀赋不足，某些人就更认为由于无法沟通，他们就使自己的技术秘密变得更加难堪了。

这个难解之谜的原因是，受控制者起了主体的辞说的过滤器，甚至是折射镜的作用，由此呈现给控制者的是一幅立体照片，显示三或四个音区，控制者可以阅读由这一辞说所构成的乐谱。

如果受控制者能够被控制者放在与“控制”这个不详的词（它有一个更好的替代“督导”，只不过是英语词）所意味的位置不同的一个主体位置上的话，那么他在这一活动中所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将是学会将自己放在第二主体性的位置上，而这从一开始就是控制者的位置。

在此他找到了那条经过认证的道路，从而获得分析家的发散的，甚至是漫不经心的注意力，这是经典的表述，只不过表述得太过于粗略。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清楚注意力指向的什么：我们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证明，所指向的当然不是一个超出主体话语的客体，而某些人强迫自己一直盯着这个客体看。如果这被当作分析的道路，毫无疑问，它就要借助其它手段，或者说它就是唯一一种禁止手段达成其目标的方法。

在分析家的能力范围内的唯一客体，就是将他与作为“自我”的主体相连的想象性关系。他无法消除这一关系，但是他可以利用它来调节他的耳朵的流量。生理学和《福音书》一样都指出这样使用耳朵是很平常的：“充耳不闻”。换句话说，就是用耳朵来检测应当被听到的东西。因为没有别的耳朵，没有什么三只耳、四只耳来实现人们所希望的从无意识到无意识的直接的超-听觉。我们将会谈到怎样思考这种所谓的交流。

之前我们是从最费力的角度，即空话的角度来讨论话语的功能。主体似乎徒劳地谈论某个人，他和这个人相似得让人无法区分，而这个人将永远都不会与他一起承担他的欲望。我们指出了在理论和技术中不断贬低话语的价值的源头就在那里。而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扶起这个倾倒的沉重磨轮，它本就只能充当分析运动的方向盘，也就是说，个体的心理生理因素实际上仍然被排除于它的辩证法之外。如果将分析的目标定为修改其固有的惯性，这就是判给自己运动的假象，在此假象中，某种技术倾向似乎就满足于此。

如果我们现在把目光投向精神分析——在它的历史中、个案讨论中、治疗进程中的——经验的另外一端，我们将会发现与“当下”的分析相对立的是作为治疗进程的指示和动力的既往史的价值，与强迫症内在主体性相对立的癔症主体间性，与对抵抗的分析相对立的符号性解释。实话在这里开始实现。

让我们来检查它所构成的关系。

我们要记住，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创造的这种方法，在它诞生之后

不久就被布洛伊尔的一个病人——安娜·O——命名为“谈话疗法”。注意，正是与这个癔症患者的探索性经验带领他们发现了所称的创伤性致病事件。

如果这一事件被理解为是症状的原因，那么用话语表达一者（在病人的“故事”中）就决定了另一者的解除。人们立即从心理学理论中借用了领悟这一术语。这个词有着令人生疑的诱惑力，我们把这种怀疑视为针对一些显而易见的解释的有益规则。在这个时期，心理学的偏见反对人们在口语表达过程中所认识的东西，比如与其声息（*flatus vocis*）不同的另一个现实。无论如何，在催眠状态中，表达和领悟是分开的，这就足以修正关于它的那些效果的概念。

但是，为什么行为主义的扬弃（*Aufhebung*）勇士们没有在这里举例说明他们并不需要知道主体是否回忆起了过去的任何东西？他只是讲述事件。至于我们，我们要说，他说出了事件，或者，在法语中这个词会让人想起潘多拉的故事，不是关于那个或许需要重新关上的盒子，而是他将事件放入词语中，或者更确切说是放入了史诗（*épos*），他在当中用现在时态讲述他个人的起源。这发生在一门语言中，语言允许他的辞说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而且，语言也假定了同时代人的现时辞说。正因此，“史诗”的朗读可以包含某个过去的古语辞说，甚至是外语辞说，甚至还能够伴随着表演者的所有活力在现时继续下去，然而其方式是通过一种间接的辞说，即在故事线中被单独放入引号内，并且，如果要上演，场景内不仅需要合唱团，也需要观众在场。

对过去的癔症性揭露所具有的歧义性，并不完全出于其内容在想象和实在之间的摇摆（因为它同时位于两者之中），也不是因为它是欺骗性的（因为它给我们展示了话语中的真相的诞生，并且我们由此面对一种既非真也非假的现实）。无论如何，这就是它最让人烦恼的问题。

因为这一揭露的真相，正是在场的话语，它在当前现实中被见证，并且以这一现实的名义建立了这一真相。而在这一现实中，只有话语见证了过去的力量的这一部分。在事件发展的每一个十字路口，这个部分

都已经产生偏离。

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用来衡量治疗完整性的既往史的连续性条件，与伯格森修复时间的神话丝毫不相干。这个神话人物每一个时刻的真实性将会因为没有综合之前所有时刻的细微变化。对弗洛伊德而言，这里涉及的不是生物记忆，不是直觉主义的神秘化，也不是症状的记忆错误，而是回忆，即历史，使天平放置在对历史事件的确信这唯一的支柱之上，对过去的猜测使得对未来的承诺摇摆不定。毫无疑问，精神分析式的既往史中涉及的不是现实，是真相，因为实话的效果将过去的偶然事件重新组织，同时给了它们以未来的必然性的意义，这些必然性由些许的自由所构建，主体因此使它们在场。

无意识是我的历史中留着空白或填了谎言的一章：它是被查禁的一章。但是，真相可以再被找回来；通常真相已经被书写在别处。即：

——在丰碑上：并且这是我的身体，也就是说神经症的癔症核心。癔症症状在此展现出语言的结构，并被解读为一种铭文，它一旦被接受，就算是被毁掉也无损其庄重。

——也在档案资料里：这些是我的童年记忆，当我不知道它们的来源时，它们也是难以被理解的。

——在语义变化中：这回应了我所特有的词汇的储备和词义，也回应了我的生活风格和我的个性。

——在传统中、甚至在神话中，以一种英雄化的形式传递我的历史。

——最后，在痕迹中。被篡改的章节在与前后章节的衔接中无可避免地一定会留有歪曲的痕迹。我的注解将会重建其意义。

母亲“代言人”

莫妮克·特科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内容提要】婴儿的出生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已经成熟，只有通过母亲——外部世界的代言人，婴儿的精神结构才能逐渐得到建立。这个过程也正是儿童逐渐进入语言，并被语言所建构的过程。而语言最初的进入是通过母亲的言说，母亲的话语支撑起了婴儿的身体，也构建起了婴儿的内在世界。同时，婴儿在回应中也获得了母亲这个大彼者之处的语言，并且得以发展出自己的能指。

【关键词】语言 母亲 大彼者

我从皮耶拉·奥拉涅那儿借来了“代言人”这个词。奥拉涅在《解释的暴力》一书中写道：“这个词指的是，在精神的结构化中被归为母亲的辞说的功能：这里的代言人是就这个词的字面意思说的，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上，婴儿就是通过她的声音而被一个辞说所支撑，这个辞说一遍又一遍地评论、预言、安慰他整个的表现……但是代言人，从代表的意义来看，也是外部世界的代表，而讲给儿童的辞说讲的是法律和约束。”

她直接讲给他听，她将他放在声音和语言的浴缸里，还有她的儿歌或歌曲或者仅仅是她说话，母亲的声音实际上将胎儿和婴儿浸入话语的天地中，在有生命的存在的领域中，这是其人性的区别性特征。母亲对

婴儿说话，同时也是在说婴儿。她评论他的现在，高声地梦想他的未来，给他的动作、姿势、哭泣或叫喊赋予意义。她用她的词来告诉他所经历的、还未能思考的东西，并且逐步给他的各种经历赋予人形。每一个在实践母性功能的母亲或个人都会像是没有思考一样谈论婴儿、对婴儿说话，母亲就给孩子洗了话语澡，就像是她自己的母亲对她所做的一样，她继续传递下去，而这从人类存在之初就开始了。通过她的话语，她将他从感觉世界中拽出来，使之进入词和表象的世界，她为他奉献，不过，同时她也强加给他她对生活以及他的经历的知识。她把词加在物上，他将把这些词变成自己的，直至他通过自己使用语言而发现词不是物，换句话说即他发现能指的任意性。

但是，在最初无能为力的那段日子中，他被放入话语，也被话语支撑，并且因为他还不能说话，那么他最初就是被话语所说。某些人会长时间、甚至他们的整个生命都会保存这一经历，它已不再是支撑性的，而常常是侵入性的。人们也可以看到，当人们向儿童们提问，且期待母亲替他们回答时，儿童会盯着母亲的嘴唇；他们理解语言，但是还不能自己说话……大家也可以理解，在儿童、成人或精神病人看来，他们还不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说话，同样，大彼者的话语侵入他们，尤其是在听幻觉的情况下：他们是被说的。实际上，对小人儿来说，人们说他或者人们对他说话都是不足够的，还需要人们把话语作为礼物给他。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构建孩子的是和不》）中写道的，我们可以假设在第一个时刻，母亲自己作为所有来自儿童身体的东西的阅读者，并且我还要加上一条，解释者。人们可以假设，正是因为通过她为他所陈述的东西，通过她假设他所感到的东西，在他的身体上，从最初的混沌出发，关于他独特历史的那些文字开始在身体和精神之间书写。在身体和精神之间，在温尼科特非常正确地命名为精-身（psyché-soma）中，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身体，除非这个身体而被话语所标记。尽管如此，我们也可以自问，在母性大彼者和婴儿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她或他长大成为一个癡症性成人时，最常见的恰恰是身体说出被排除在词的界域之

外的东西。当我们研究弗洛伊德的第一批个案时，这是可以提出的问题之一，即癔症的语言和话语的问题。难道不是因为，母亲尽量好地适应于从婴儿那里发出的所有东西，婴儿才会一点一点地构建他的感觉、知觉、情绪的字母表，并且将它们与允许他表达他的苦难、记忆、幻想……的那些词联系起来。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照料的大彼者的功能中，在命名身体和乳儿所体验到的需要的那些词中，也在母亲给予婴儿来平息和满足这些需要的东西中，她已经把他引入了话语的领域。还可以假设，她倾听然后回应、还有解释他的哭泣或叫喊，这就把婴儿引进请求的领域。通过把自己当作他常常向其大声提出要求的一个地点，通过倾听他所说出、但还未能陈述的东西，通过借出自己的词，她接纳他、将他卷入词的世界。每一次母亲倾听婴儿的方式，每一次她回应他的方式，都有对言在的赌注，这将会逐渐开启他的欲望的独特性，难道不是吗？^①然而，分析家和沉默的或孤独症的孩子、或者和拒绝说话的成人所做的工作不也是如此吗？而有时候和那些有着符号化困难的病人也是如此，我们将我们的词借出，以便允许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词。正如米歇尔·维爱玲的那篇个案文章，以及塞尔日·勒克莱尔的文章以另外一种形式所做的见证，转移之爱允许分析者从尝试猜测她的分析家的那些能指出发构建自己的辞说。

母亲不仅给婴儿带来对话以解释叫喊、哭泣、表情、姿势或运动，还用她的动作或词来回应他，并且，当他开始牙牙学语时，她还会在他发出的声音中找出那些最初的词的模式。当他愉快地念“嘛嘛嘛”的时候，她将它当作“妈”，进而当作“妈妈”，对法国孩子来说，或者是“miam”，是说“很好吃”的最早的方式。同样，她将从“啵啵啵”或“叭叭叭”中听到“爸爸”。最终，她向他说出的或者她因为他而说出的爱的语言、有时也有拒绝或恨的语言，这些语言放置了一些词语在他因被

^① 在这里我所参考的是拉康的需要-请求-欲望三角。

欲望和被爱而感受到的安心和高兴之上，但也在相反的悲痛之上。甚至对小家伙而言，从母性大彼者那里来的所有爱的剥夺、所有拒绝的行为、所有恨的动作，将其排除在话语的维度之外，并且仅仅制作出悲伤和沮丧的经验，这些经验袭击或破坏身体和精神的紧要连接，对构建精神生活而言是不利的。皮耶拉·奥拉涅非常准确地指出“很明显，生活强烈要求一系列需要获得满足，对此婴儿还无法自主获得：但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强烈要求对精神需要的回应，没有这个，就算婴儿都是早产状态，他也将会完全可以选择拒绝生命。”作为代言人，母亲回应精神的需要：她的话语用来救助乳儿的悲伤或者绝望的狂怒，不仅仅通过她给他一个人类的且人性化的回应，此外也通过这个话语的礼物——这个充满活力的东西，它对儿童的精神来说就如同奶水或照料对他的身体成长来说是一样重要的。

儿童与母亲一起被卷入言在的世界中，她允许儿童离开纯粹实在的世界，而这是难以想象的，她逐步给了他工具，去想象化和符号化他的外部世界带给他的那些东西。通过在他们二者之间放入话语这个第三者，她将他登记在人类的世界中：都是言在。

是否一位母亲作为女人而保证了这样一种功能？这个问题，我留做我们的讨论。

凯瑟琳娜^①

弗洛伊德 / 著

石岩 / 译

【内容提要】从一位偶然相遇的年轻女性癔症患者的案例出发，弗洛伊德论述了关于性创伤与癔症精神病理机制之间的联系。最初的性诱惑经验可能并非一开始就是创伤性的、致病性的，而是在主体的性成熟期，在主体回溯性的记忆之下才成为创伤性的，从而受到压抑并被转换成癔症症状。而中间的这一段时间则是一段潜伏期，或是“精神加工的时期”。正是透过这段时期，创伤经过制作而转换成症状。

【关键词】癔症 潜伏期 性 创伤

在 189-年的夏季假期中，我去上陶恩山旅行，企图暂时忘却医务工作，尤其是想要忘记神经症的工作。我几乎达成了目标。一天，我选了一条避开大道的路爬山，这座山以其景色和经营有方的山中小屋而闻名。费力爬到山顶后，我觉得精神为之一振，放松了下来，深深地被辽远景色的美丽所折服。我沉溺其中，以至于刚开始听到：“先生是一位医生吗？”还没有反映过来。但这确是对我说的。这是个看上去比较阴郁的女孩，大概 18 岁，她曾经招待过我用餐，女房东叫她“凯瑟琳娜”。从她的衣着打扮来看，她不像是个仆人，而肯定是女房东的女儿或者亲戚。

① 译自《弗洛伊德文集·卷一：癔症研究》，据英文版和法文版有所修改。——译者注

我反应过来后回答道：“是的，我是医生，但是你怎么会知道？”

“先生在访客本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我想医生先生是否有点时间……，实际上我的神经有问题，我去L地看过一位医生，他给我开了一些药；但是我并没有好。”

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遇到神经症——因为，这个健壮的、结实却不愉快的女孩，不可能是其它问题了。在6000英尺以上的这个高度遇到神经症，对我来说真是有趣；于是，我就问她怎么回事。下面我就叙述留在我记忆中的我们之间的谈话，并且我没有改变病人的方言。

“好，你感到怎么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过气来。不总是这样，但有时发作，让我认为我会窒息。”

乍一看，这似乎不像是神经症症状。但我很快想到，可能她所描述的是一次焦虑发作：她从焦虑感引起的感觉症候群中选择了气短这一症状，并且过度强调这个单一因素。

“请坐这儿吧。当您‘喘不过气来’是什么感觉？”

“这种情况总是突然发生。开始时像是什么东西压在我的眼睛上。我的头变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声，而且我感到头晕以至于几乎倒下。然后有某种东西压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喉咙没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喉咙挤在一起，好像要阻塞了。”

“头呢，有没有其它什么情况？”

“是的，有锤击感，足以敲开它。”

“发生这些时您不觉得害怕吗？”

“我总是以为我要死了。总的来说我是勇敢的，自己到处走——进地窖，到处爬山。但是，一旦它发生，我就哪里都不敢去；我总是以为有人站在我的背后，会突然一下子抓住我。”

所以，实际上这是焦虑发作，是一种癔症性的“先兆”——或者，更确切说是一次癔症发作，其内容是焦虑。没有其它内容吗？

“当您发作时，您想到什么吗？是否会总是想到相同的东西？或者

您看到什么东西在您面前？”

“是的。我总是看到一张可怕的脸以吓人的样子看着我，因此我感到恐惧。”

这也许是得到病情实质的最快途径。

“您认得这张脸吗？我的意思是，您确实在什么时候看到过这张脸？”

“不认识。”

“您知道因为什么而发作？”

“不知道”

“您第一次发作是什么时候？”

“两年前，当我仍然和我伯母住在另外一座山上时（她曾在那里经营一座山中小屋，我们18个月前搬到这里）。但是之后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要尝试进行一次分析吗？我不能冒险把催眠术移到这么高的地方进行，但是或许我能够进行简单的谈话。我应当尝试猜一下，或许侥幸能猜中。我常常发现，女孩子身上的焦虑是恐惧的后果，而这恐惧是当她们初次面对性欲的情景时在她们纯洁的心里产生出来的。^①

因此我说：“如果您不知道，我将告诉你我对您的发作的看法。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候，您一定看到或者听到了一些让您非常窘迫、且十分不愿见到的事。”

“天啊，是的！”她回答道：“那时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兰西斯卡。”

“关于那个女孩的什么事？您能告诉我吗？”

① 这里作为印证的是我初次认识到这种因果联系的一个病例。我曾治疗过一位已婚妇女，她曾受复杂的神经症折磨，而且一再否认她的疾病是由于她的婚姻生活所引起的。她反驳说，当她仍然是个女孩时，她已经有焦虑的多次发作，每次发作直至昏倒。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我们更加熟悉后，一天她突然对我说：“现在我要告诉你，当我是个女孩时，怎么会有多次焦虑发作的。那时，我通常睡在我父母隔壁的一个房间，门是开着的，而桌上的夜灯常常亮着。因此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父亲与母亲一起上床，听到一些使我非常兴奋的声音。从那时起我开始发作了。”

“我认为可以对医生说任何事。好吧，那时，您知道，我伯父——就是您已经在这见过的我伯母的丈夫——在科格尔经营一个小旅馆。现在他们俩离婚了，而且是我的过错他们才离的婚，因为是我讲出他和弗兰西斯卡有不正当的关系。”

“您是怎么发现的？”

“是这样的，两年前的一天，几位绅士来爬山，要些吃的。我伯母不在家，而一直负责做饭的弗朗西斯卡哪都找不到。我伯父也是哪都找不到。我们找了所有的地方，最后阿洛伊斯，一个小男孩，我的堂弟说：‘哎呀，弗兰西斯卡肯定在我父亲的房间里！’我们俩都笑了；但我们并没有想什么坏事。然后我们就去我伯父的房间，发现房门锁了。我觉得这很奇怪。然后阿洛伊斯就说：‘过道那儿有个窗户，我们可以往房间里看。’我们去了过道；但是阿洛伊斯不愿意到窗户前，还说他害怕。我就说：‘你个傻小子！我来，我一点都不怕。’那时我是什么坏事都没想。我从窗口向里看，房间很暗，但我看到了我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他躺在她身上。”

“哦？”

“我马上就离开窗户，靠在墙上，简直透不过气来——就像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一样。眼前一片漆黑，双眼紧闭，脑袋像是被人敲打一样嗡嗡作响。”

“当时您有没有告诉伯母这件事？”

“哦，没有。我那时什么都不懂。我只有16岁。我不知道害怕什么。”

“凯瑟琳娜小姐，如果您现在能记得当时在您身上所发生的情形，即当时您第一次发作时在想什么，这对您会有帮助。”

“好的，如果我行的话。但是我那时非常害怕，以至于什么都忘记了。”

用我们“绪言”中的术语来讲，这就意味着：“情感本身产生了一种催眠状态，随后其产物从与自我-意识的联想性联系中分离开来。”

“告诉我，小姐。您无法呼吸时看到的头会不会就是弗兰西斯卡的头？就像您那时看到的。”

“哦，不，她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而且，那是一个男人的头。”

“或许是您伯父的头？”

“我没有看清楚他的脸是不是那样。房间里实在是太黑了。而且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可怕的表情？”

“很对。”

(思路似乎突然中断了。或许她其它的故事中能够出现些东西。)

“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

“哦，他俩必定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因为他们不久后就出来了。我整天都感觉很不好。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然而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工作了一整天。在星期一早晨，我又感到头晕，我病了，躺在床上，三天一直作呕。”

我们经常把癔症的症状学与象形文字做比较，在发现某些双语的书写后，我们能够解码这些象形文字。在这里，作呕这个词意味着恶心。所以我说：“如果您是后来三天都作呕，我相信这就意味着在您向房间里看时，感到了恶心。”

“是的，我确实当时觉得恶心，”她思索着说，“但我恶心什么呢？”

“也许您看到某些裸体的事情？他们那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

“太暗，什么都没有看到；另外，他俩都穿着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是什么令我恶心就好了！”

我也没了主意。但我让她继续说下去，请她告诉我发生在她身上的事，自信地期待她恰好能想到我需要用来解释病情的材料。

她继续描述她最后怎么告诉伯母她的发现。她伯母发现她有变化，并且怀疑她隐瞒了某些秘密。接着就发生了伯父和伯母之间很痛苦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孩子们听到许多东西，从许多方面开阔了视野。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听到则更好。最后她伯母决定带着孩子和侄女搬到现在的小旅馆里，留下她伯父和弗兰西斯卡在一起，那时弗兰西斯卡已经怀孕了。然而，在这以后，让我惊讶的是她中断了这些思绪，并且开始对我讲另外两件较早的事情，比这创伤早两三年。第一件事是这个伯父对她本人有性侵犯，那时她仅仅14岁。她描述她曾经如何与伯父一起在冬

天到一个山谷去，在那里的小旅店待了一晚。他伯父在酒吧喝酒、玩扑克牌，而她感到困倦，早早去楼上的套房睡觉，当伯父回到房间时，她还没有完全睡着。后来她睡着了，又突然在床上“感到他的身体”而醒来。她跳了起来，对他抗议道：“伯父，您干什么？为什么您不待在自己的床上？”他试图安抚她：“继续吧，傻姑娘。你不知道这有多舒服。”

“我不喜欢您的‘舒服’的东西；您甚至都不让人好好睡觉。”她仍站在门边，已经打算逃到外面的过道上，最后他终于放弃，自己回去睡觉了。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床上，一觉睡到早上。从她所说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中，似乎她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次性侵。当我问她是否知道他想要对她做什么时，她答道：“当时不知道。”她是后来才知道的，她说她因为不喜欢在睡觉时被打扰才抵抗的，“因为不舒服”。

我有责任详细叙述此事，因为这对理解后面发生的所有事非常重要。——她继续告诉我以后发生的其它经历：她怎样再次在小旅馆里在他完全喝醉时保护自己，以及类似的事情。对于在这些情况下，她是否感到了后来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感受的问题，她肯定地答道每次她都感到眼睛和胸部有重压，但不像发现那件事时的强度那样大。

她在完成这一记忆的叙述后，立即告诉我第二件事，这是她注意到的伯父和弗兰西斯卡之间的某些事。有一次全家穿着衣服在堆草料的屋子睡觉，她突然被一阵声音吵醒；她认为她注意到她伯父——躺在她和弗兰西斯卡之间，正在转身，而弗兰西斯卡刚刚躺下。另一次，他们在N村的一个小旅馆里住下，她和伯父住在同一个房间，弗朗西斯卡就在隔间。在晚上她突然惊醒，看到门边有一个高大的白色身影，正要开门：“上帝，是您吗？伯父！您在开门要干什么？”“别出声，我只是在找东西。”“但是出屋得走另一扇门。”“我只不过是犯了个错误”……

我问她那时是否有些怀疑。“不，我什么都没想；只是注意了，但没有想到更多。”当我问她在这些时候是否被吓到了，她说可能是的，但是她不十分肯定。

当这两件记忆中的事说完后，她停下来，像是变了一个人。阴沉、

不高兴的表情变得富有生气，她的双眼明亮，显得快乐和兴奋。这时，对我来说她的病情也已经清楚了。她告诉我的后面一部分内容显然是没有目的的，是对自己在所发现的事情中的表现进行称赞。那时她已经有了之前两次的经历，但是不理解，而且从这经历中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当她看到两人性交的场面，马上就把新的印象和过去的两次记忆联系起来，她开始理解它们，同时排斥它们。接着就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即将产生结果的时期，即“潜伏期”。在转换症状出现后，呕吐就代替了道德和生理上的恶心感。这个谜就此解开。使她恶心的不是看到那两个人，而是看到那个场景时会想起自己身上曾经发生的事情。并且，如果全面来看，就只能是她“感到伯父的身体”那晚对她的企图的记忆。

因此，当她讲完自己的自白后，我对她说：“现在我知道当您向房间里望的时候在想什么了。您想：‘此时他对她做的正是那晚或其它时候要对我做的。’那就是您感到恶心的东西，因为您记得那种感觉，晚上醒来时感觉到了他的身体。”

她答道：“有可能是这样，让我恶心的就是它，那也就是我所想的东西。”

“再告诉我一件事。您现在已经是长成的女孩子，也知道所有的事情……”

“是的，现在我知道。”

“就告诉我一件事，那晚您感觉到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她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而是很尴尬地笑着，好像她已经被别人看透，就像某人不得不接受基本情况已经清楚，以及不需要说得更多了那样。我可以想象她后来才懂得的触感。她的面部表情像是对我说她认为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但我无法再深入。不管怎样，我得感谢她，因为对我来说，与她谈话比起我所在的城市中那些过于拘谨的女士们要容易得多。她们把很自然的事当作是羞耻的。

因此，这个个案已经清楚。但得稍停一下！在她发作期间、被恐惧抓住时，头脑中出现的是怎样的幻觉？它从哪里来？我继续问她这方面

的问题，而且，似乎随着我们谈话的展开她的知识也在扩展，她马上答道：“是的，我现在知道了。那个头是我伯父的头——现在我认出来了——但不是那次。后来，当所有纠纷爆发后，我伯父会无缘无故地冲我发火。他一直说是我的错：要不是我饶舌，他是永远不会离婚的。他一直威胁我说要对我做些什么；并且远远一看到我，他的脸就因为发怒而扭曲起来。我总是从他身边逃开，并且总是觉得害怕一不注意就会被他抓住。现在我常常看到的那张脸就是他发怒的脸。”

这一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个癔症症状，呕吐，已经消失；而焦虑性的发作仍存在，并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面对的这位癔症患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宣泄。并且实际上，当这发生后，她立刻就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伯母。

“您有没有告诉您伯母他对您性侵的那些事？”

“说了。不是那时，而是后来，当他们已经谈论离婚的时候。我伯母说‘我们暂时不提。一旦他在法庭上捣乱，我们就把这也说出来。’”

我很清楚，可能这就是最后的时期——当时家里有越来越多的争执，那时她伯母已不再对她的状况感兴趣，因为她伯母已经被争执耗尽心神。这个积累和保存的时期，给她留下了记忆象征的残余。

我希望这位在这样早的年龄就受到性伤害的女孩，能够从我们的交谈中有所受益。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讨论：如果有人断言，这个个案算不上是一个分析，只是通过猜测就能解决，那么我也无言以对。确实，病人认为我在她叙述的过程中插入的那些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她不认为它们是她所经历过的某些事情。我相信，如果进行催眠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假设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我现在将要尝试将其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式，如同 B……的个案一样。因此，我有必要赋予这两个爱若事件以创伤性因素的角色，而赋予发现的场景以附加因素的角色。相似之处在于，在前者的经历中，所产生的一个意识成分被完全排除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之外，但是被保存了下来。而在最新的场景中，一个新印象导致这个被隔离的感知群和自

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忽视某些奇特性。如同在 B……的个案中，产生隔离的原因，不是作用于自我的意志行动，而是自我的无知——它还未能应付性欲方面的一些经历。在这个角度来看，凯瑟琳娜的个案是典型的。在对以性创伤为基础的癔症个案的每一个分析中，我们都发现在前性欲阶段的那些印象并没有对儿童产生创伤影响，而是女孩或者已婚妇女理解性生活之后，这些记忆才获得创伤性的力量。精神群的分离可以说是青少年发展的正常过程；他们后来接受到的东西进入自我中，常常为精神障碍提供机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另外，我想要在这一点上提出一个疑问，即一个出于无知而造成的意识的分离是否与有意拒绝造成的意识分离真的是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们所设想的或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更不具备性欲方面的知识。

这个个案在精神机制方面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在于，那个发现场景，我们将之描述为“附加的”场景，也是“创伤性的”。它由其自身的内容所激起，而并非仅仅是唤醒了之前的创伤经历。它结合了“附加的”和“创伤性的”特征。但是，似乎没有理由因为这种重合而放弃观念上的分离这一概念，而在其它的个案中，对应的是时间上的分离。凯瑟琳那个案的另一个奇特之处是，我们长期以来所熟悉的转换——它是癔症现象的产物——并不是在创伤后立即出现，而是在潜伏一段时间后才发生。沙可倾向于将这个间歇期描述为“进行精神加工的时期”[精心制作]。

凯瑟琳娜发作时的焦虑是癔症性焦虑；也就是说，关系到每次性欲创伤所引起的焦虑的再生。我不准备评论我在大量个案中发现的经常存在的事实——即仅仅是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就引起处女们的焦虑情感。^①

① [1924年增注]在许多年后，我终于敢于掀开谨慎的面纱，揭示真相：凯瑟琳娜不是女房东的侄女，而是女儿。因此这个女孩得病是她自己父亲试图对她性侵的后果。在报告中，我对现在介绍的这个个案采用这样的失真是完全应当避免的。当然，从理解这个个案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失真与把一座山上的情景移到另一座山上是不一样的。

一个女人想要什么^①

塞尔日·安德烈^② / 著

鞠睿 / 译 石岩 / 校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究竟是因为性作为一种创伤导致了压抑，还是因为正是压抑使得作为性的东西得以表达。首先，创伤涉及到一种污秽、恶心的经历。其二，这个创伤经历恰好又是主体的历史中所缺乏的关键部分，但它也能使主体的历史变得明确。这个空并不等同于一个现实事件，而是被主体和大彼者之间的无意识幻想所填补的。借由安娜·O和埃米·冯·N的个案，本文阐述了这个创伤背后的无意识幻想如何受到压抑并连接到症状。

【关键词】性 癔症 压抑 创伤 症状

如果我们回头再来看《大纲》中谈到的艾玛个案，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压抑的功能是把先前仅仅只是不确定的感觉——就艾玛的经历而言，说到底是一种冷淡——变成一种性的享乐（带着这个词对言在而言的特殊意思）。因此，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压抑的能指进程的根本价值在于将实在性欲化。这表明，他将实在登入在意义流的揭示之中，这个“意义流”将在弗洛伊德之后的工作中成为石祖的意义。这个论断让我们在两个方面提出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被压抑物和创伤之间所建立

① 节译自 *Que veut une femme ?* 一书第 88-92 页。——译者注

② 法国精神分析家。

的过程中，是什么开启了性兴奋？什么是享乐的缘由？是因为能指本身被压抑？还是因为它所划定的空白被当作创伤，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升至性创伤的高度？其次我们要问的是，等式“被压抑之物=性”能否倒过来写为“性=被压抑之物”——对于人类来说，只有通过压抑，作为性的东西才能够被纳入表达之中。而后，我们将看看癔症的临床在这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什么。

在“癔症的病因学”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做了一些补充。

首先，他明确了创伤的定义。创伤由癔症病人的被压抑的回忆所勾勒。弗洛伊德说，这涉及到恶心的经历，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两次使用了“遇见尸体”这一个表达来描述它。对我来说，凸显尸体不是想表达一个偶发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或是众多形象中的一个形象。因为弗洛伊德在其它地方也谈它，例如在伊尔玛打针的梦中，其中有死亡和肉体的腐烂，即肉身形象的坍塌和败坏。这是要让身体不能再被当作人的身体。尸体承担着创伤的价值，不是因为它被剥夺了生命，而是因为它脱去了始终维持在人类关系中的面纱。这是一个不加修饰的肉体，由于这样一个实在的部分，身体也不外乎一件污秽之物。且不论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个例子的意图是什么，在《癔症研究》的埃米·冯·N的个案那里，遇见尸体确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事件。

其次，弗洛伊德再次检查创伤的问题和在联想链层面上压抑的问题，得出癔症的回忆如同家族谱系一样被组织起来。他接着就问：“我们跟着分析中揭示的这个联想的回忆链会走到哪里？”换句话说，如何倚靠被压抑之物的返回，倚靠主体的联想回溯到创伤？而创伤则处于回忆和联想之外。遍历这个链条，一环又一环之后，用《大纲》中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将来到一个“节点”，也就是两列联想的交汇点上。弗洛伊德说，这个脐点永远处于孩童时期最早的性经历的范围。然而我们所抵达的孩童期的那些场景，同样需要主体提供材料加在这上面。因为，这些场景构成了回忆和联想的拼图中所缺少的一块。缺的这一块，能够填补节点所指示的那个空白：“在儿童的拼图中，在所有的尝试之后，我们最终

完全确定，缺的这一块所对应的是空的空间，因为就差它来完成整个画面。然而它不规整的边齿却跟其它图块的边齿咬合在一起，没留下任何的空隙，没形成任何的重叠。它就这么跟幼儿期的场景混在一起；这些场景作为补充物，对联想的结构以及神经症的逻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唯有这个插件，让整个个案的起源变得清楚，我们甚至都可以说：变得一目了然。”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依旧认为这些需要推敲的场景真实地存在着（如同历史事实），关于整个基础幻想构建的问题便从这里开始。因为，弗洛伊德要想抓住的元素，在联想链中不会如此这般地存在，然而却与之相关。为了将它勾勒出来，他所开创的方法是让链条铺得足够远——用拉康派的话说就是：通过主体来产生其主人能指，以便获得类似“缺的那块的轮廓”那样的东西，获得一个边缘，来呈现洞。弗洛伊德用一个场景来填补这个洞，后来他在狼人个案中发现了它，它构建了主体的原始幻想。他补充道，这个场景，标志了儿童第一次性欲经验，而分析到最后，它只构成一个诱惑的场景。这让我们回到之前谈到的被动性和创伤的问题上。其实，对弗洛伊德来说，从来都不是儿童独自一人地发现了性欲，而通常是来自成人的传递：“在现实中，真正发生的，可能是一次疾病的传播，或者童年时打的一次针。”由此，联想链中节点的汇集引领分析家指出其结果：主体跟大彼者的关系（把他的享乐传染给主体）。这，便是诱惑理论的意义所在。

在第二个阶段，这一方法企图填补由压抑遗留下（或是说构建）的空白。压抑的价值在于，它是与女性性器相遇的隐喻。因为缺失的那一块恰恰就在那里——这将在接下来变得更为清楚。弗洛伊德围绕着这个洞构建了他整个的理论。由此，随着弗洛伊德的深入，压抑-创伤这样一个二元对子倾向于跟主动-被动的对子重叠，并且在男性-女性这样一个带着含糊其词的隐喻性对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弗洛伊德早期的文章所带来的这些问题在临床中已然存在，而且《癔症研究》已经获得一些成就。这些研究在时间上处于弗洛伊德著

作的早期，但我们直到现在才来仔细推敲。这是因为，我们在有了关于压抑和创伤的第一批理论后，再对之研读，这些研究将变得更为清楚。我们能够为每个被提及的个案从某个角度指定一个阐释性的名目，由此来解读癔症。因此，“埃米或恶心”也是一种引入方式，从埃米·冯·N的个案开始，一些思考就已经在接下来的压抑-创伤的问题中扎下了根。

令人吃惊的是，从跟弗洛伊德的第一次会谈开始，埃米便呈现出一个特殊症状：话语中的一个洞。事实上，她所说的——不如说是让人听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她的言辞链存在中断，这一中断十足地具象化了那个空白，弗洛伊德就将创伤定位于此。埃米的话语经常被痉挛所打断，造成口吃；除此之外，她还时常停住，用舌头发出的奇怪的喀哒声，同时她的面部呈现出恐怖和恶心的表情。

在结构中，这并非是一个例外症状。布洛伊尔在安娜·O那里就已经发现，安娜·O说不出话来，以至于只能借助于另一门语言而非母语才能将意思表达出来——她会四五种语言，否则她就在沉默中度过好几天。然而，这样的沉默得以出现的原因来自于跟身体的某种状态的相遇，更确切地说，出现原因是跟身体失去活力的部分的相遇：一只“睡着”的胳膊，或是一只“死去”的胳膊。一个名副其实的梦紧贴在这只胳膊上：

“她做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梦，有条黑色的蛇从墙上下来，爬向病人（安娜的父亲），要咬他。也许在房子后面的草坪中确实有几条蛇，小女孩曾经被吓到，现在这给她的幻觉提供了素材。她想赶走蛇，但是却像瘫痪了一样。她睡着时搁在椅子靠背上的右臂‘睡去’了，没有感觉，变得麻痹。当她看着右臂时，发现自己的手指变成了许多的小蛇，指甲就像是死去的蛇头。无疑，她曾经试着用这条麻木的右臂去驱赶蛇，因此，没有感觉和麻木就跟蛇的幻觉联系在一起。当蛇消失时，恐惧中的她试着祈祷。可是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她找不到任何语言可以表达，直到最后找到一首英语童谣，她可以用这种语言继续思考和祈祷。”

安娜·O突如其来的沉默，类似埃米的中断，只是后者更具有针对性。我们可以说它们都与洞有关，与空白有关，实在便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

话语中。它所涉及到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空，更是一个无法命名的东西的呈现，它强迫言辞链中断、中止。埃米在她所构建的幻想中给予了一个想象的表象：一个小男孩因为被人塞到嘴里一只小白鼠惊吓过度而死。她所构建的这个幻想基于一则报纸中的社会新闻。^① 这只塞进嘴里以至于强迫她沉默的小白鼠，它所掩盖的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两个案例中，非常清楚的是，症状通过对石祖意义的一个真正增值来回应创伤。在安娜·O那里是她跟“死亡”的手臂相遇，这只手臂变成了蛇。在埃米那里是一只小白鼠的故事……

① 报纸仅提及小男孩被虐待，但没有说到小白鼠。

为什么小女孩子们能说会道^①？ ——语言和性化

莫妮克·特科 / 著
石岩 / 译 古维兰 / 校

【内容提要】本文给出了一个在母亲面前保持沉默，以及性别身份认同出现困难的小女孩多丽的个案，并借由这个个案，探讨了女人与语言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女人的性构成了女人特殊的言语。女人的言语不仅仅像男人的言语一样组成了社会关系，它同时也是一种母性功能，将儿童登陆进入母语中。此外，女人的言说涉及到口腔 - 舌头的冲动，这种冲动可以与石祖的享乐联系在一起。同时这分享乐也涉及到女性性化的过程。

【关键词】言语 石祖 女性欲望 性化 享乐

我想要用这篇文章来触及拉康的思考：“所有是语言的东西，都与性别有关，但恰恰是性关系无法计入其中。”

我们还要加上，他所命名的“逻各斯的领域”打洞，这标记着性化身体的一个缺失。女孩和男孩都一样被性化，都承受石祖的影响，因为对两性来说仅有一个能指。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言语没有给我们任何与性别有关的技巧。

① 法语原文用的是习语 *la langue bien pendue* 来表示能说会道。其中“*langue*”是言语，也有舌头的含义；*pendue* 有悬挂、吊、上吊的含义。——译者注

在随便给了这篇文章一个我所喜欢的题目之后，而且文章中或许还带着在我还是巴黎弗洛伊德学院的一名年轻分析家时对弗朗索瓦兹·多尔多的转移，我发现自己几乎哑口无言。我对自己说，就像人们对小女孩们说那样，在冒险上路前，最好嘴巴还是紧点，或者最好三思而行。^①

我发现，我这个充满野心的题目前面横着一个真正的困难，即我要留在言语（langue）的领域，而不侵入辞说（discours）的、语言（langage）的或话语（parole）的领域。

我可以通过展现多丽的个案来描绘这个困难。在治疗中，多丽在放弃她的男性认同的时刻，完全改变了她与话语和语言的关系，但是我不敢说改变了和言语的关系。当多丽来 PMI 进行咨询时并不真是一个“洛丽塔”。这是一个衣着打扮“怪异滑稽”的可怜的小女孩，弄了个锅盖头的发型，紧紧抓着母亲的裙子。多丽在薇薇安（患有一种遗传疾病）之后出生。对母亲来说，她应该叫丽露，是《第五元素》中拯救世界的英雄。她母亲和孩子们的名字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薇薇安，患病的孩子，被称为“痛苦之子”；多丽，是“拯救之子”，后来她那位没有多少好心的婆婆让她知道，多丽是玛丽亚·德洛丽丝（Maria-Dolorès^②）的昵称。她于是就有了两个“痛苦的”女儿。难道作为一个女人有多么痛苦吗？而一个男孩，耶利米，即使带着悲哀的先知的名声，也被认为是“快乐之子”。多丽也可以被称为是“恐惧之子”。她什么都害怕，害怕身体接触，害怕语言、人、噪声、黑夜、动物，以及她的那些噩梦。

在工作之初，她很像男孩，然而，在治疗的某个时刻，她说了一个梦：“那正是我之前期待的东西：我是一个妈妈。”不过，这还没有将她放在女性一边。她似乎生活在两个场景中：其中一个是她正在演出，她用一种酸涩的嗓音说话，同时观察大众的反应，她听着自己说话，她的话语似乎是讲给一个目光，而不是给一个彼者：调动的是客体小 a，即

① 法语的表达中，字面意思是说话之前舌头先在嘴巴里打七个卷。——译者注

② Dolores 的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痛苦。——译者注

目光和声音。在另一个场景中，她是一个英雄，毫无疑问就是丽露的副本，著名的拯救者，为了她的母亲而扮演拯救者：她把他变形为蜘蛛侠，虽然还是个拯救者，但是带着她自己的能指的印记。

在治疗的某个时刻，对蜘蛛侠这个拯救者的认同似乎支撑了她，但家里却一团糟。之前不说话的多丽生气、叫嚷，尤其是不断地和母亲顶嘴，指责母亲，变得放肆。这是变得“能说会道”以便摆脱大彼者的欲望的一个必要过渡吗？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过渡，虽然毫无疑问也是必须的；多亏了蜘蛛侠，这个她自己的拯救者能指，在再次思考它之后，她放弃了这个过渡性的男性认同，而这个男性认同给了她在家里说话的力量，这让我明白她不再需要它了。

尽管在家里她可以夸夸其谈，在外面她仍然是受抑制的。就此我对她说这样一个想法：“毕竟，腼腆，或许是你做一个女孩的方式。”而且，当多丽说“我不想再做一个男孩”的时候，她的恐怖症减弱了。她开始谈论她的爱人，她终于栖息在她的身体里，并且变得优雅漂亮。酸涩的嗓音消失了；她的声音很平稳，在给别人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饱含情绪，用词也非常精妙。多丽的治疗带给她一段路程，不仅仅与症状、恐怖症有关，而且这段路程伴随着她在话语和语言中对言语的使用方法的改变，以及她与她的性化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条道路是通过“能说会道”来从母亲欲望的掌控中脱身而出？

如果言语是语言学的对象，至少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的对象（拉康大量利用索绪尔语言学来将精神分析重新放回到符号性的轨迹中），那么，我们的领域就并不是拉康最终命名为 *linguisterie*^① 的领域。对索绪尔来说，言语是语言能力的社会产物。

然而，拉康在《继续》讨论班上提出，言语是“语言的多种支撑”，并且强调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歧义的关系。“在所有描绘言语之特征的东西中，歧义恰好是可能做得到的”，例如，歧义能够允许我提出“能

① 在法语中，语言学是 *linguistique*，拉康创造了这个新词，用来表示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相近。

说会道”这样的隐喻来进行工作。一位女分析家说，分析的言语，是为了和词做游戏的言语。

在《精神分析家的知识》（1971年11月4日以及12月2日）讨论班中，他告诉我们言语和性之间的开口。从其著名的“没有性关系”出发，他强调：“男人和女人，是实在。关于他们，我们没有能力在言语中说出一丁点和这个实在有丁点联系的东西。尽管如此，言语是关键点，而在言语的领域中，话语的活动是关键。”

然而，在《圣状》讨论班中，他向我们提及，根据言语，性别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区分。男人是能指观念的携带者，然而，特别是对起源于拉丁语的那些言语来说，是女人造就了呀呀言语（lalangue），并探寻能够指引两性之一朝向言语的“义肢”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个动人的假设超出了我们的拉丁语。拉丁语是一门教士言语、明显是男性的专长，它统治思想、宗教、司法、社会领域，从此出发，女人还是从生命的韵律、身体的隐喻和语调的旋律开始建立了——拉康说“孕育了”——言语。

是不是说这些女人，可能曾经就是一些能说会道的小女孩，她们曾经需要创造言语，不仅仅是从官方的言语出发，而且是从私人的言语出发，不仅仅从法律的、神的和男人的言语出发，而且从快乐的、话语的、物之具体的言语出发，不过或者也从欲望和爱的肉欲出发？

在那，我们可以再次找到索绪尔所说的东西。通过区分言语和话语，我们将社会的和个人的东西区分开来，把本质的和附加的、或者说或多或少偶然的東西区分开来。我不打算沿着话语的非本质的想法走下去，不过我将要说锻造一门言语需要偶然。

或许，如果女人们“孕育”了我们的言语，那么一门言语就不仅仅组成社会关系，而且给予身体以相异性。是否因为她们是女人，并没有都处于石祖享乐中，并非都处于能指功能中，所以她们才需要在她们和彼者之间把言语之线撒到过于实在的身体和没有名称的性器官上？是否也是因为她们是母亲，而母性功能不能缩减为照料的大彼者的母亲功能，而是同时要让儿童登录进入言语、母语中，让他能够占用言语以便进入

话语？显然，对于实施这一功能的一位母亲来说，她是否马上就将儿童当作一个言在，是主体的命运的必要条件。

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论言语，探索它们所隐含的知识。这个知识超越了关于女性的全部偏见。我从法语的“小女孩子们能说会道”开始。《法语习语词典》没有告诉我们这句话源自哪里，仅仅是将会道（bien pendue）等同于：尖锐或锋利。

“会道”，或许，就像汉斯的“尿尿的小东西”（Wiwimacher），当他的阉割焦虑减轻时，可以被说成是“会扎根”（bien enraciné）。把下面移置到上面，这就是癔症的秘密？就算她们能够“把自己的舌头给猫”（意译就是哑口无言）——爱说闲话的人很少喜欢这么干，她们也不会就此失去它。防御，以及 / 或者升华，这是女人使用舌头的方法，也就是谈论她们和阉割的关系的方法。

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她们在言语中的根是什么？是不是和男孩的不同？在俄狄浦斯期后，在青少年期会不会改变？按照弗洛伊德漂亮的表达，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小女孩“变成女人”的时期。

关于能说会道的肉体方面的隐喻，难道不就是说，对一个女人来说，舌头延长了身体，而对于男人，舌头疏远了身体？

在嘴巴的围墙内，活动的舌头没有在性器官-嘴的表象中留下痕迹：“贪得无厌的器官-洞”，它就像米歇尔·蒙勒莱（Michèle Montrelay）所写的，“将世界还原到最为古老的冲动法律中”。

我的好奇心带我去在其它言语而不是我的母语那里寻找，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一点那些语言。

在西班牙语中，这可以被说成是 las niñas tienen la lengua filosa，靠近尖锐、锋利那边。

在英语中，是 to wag one's tongue，“流畅且持续地摆动舌头”，这种表达方式影射动物及其贪得无厌。这也是米歇尔·蒙勒莱的评论中所提到的“贪得无厌的洞”……

在德语中，是 Die Mädchen sprechen tüchtig，仅仅提及流畅和能力，

它含的恶意最少。

我们要注意，西班牙语中的 filoso 也等同于活动；弗洛伊德肯定说，无意识只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小女孩们的这个主动的舌头，被人们说成是饶舌。她们用它来确保有权谈她们的秘密，同时还不需因此而放弃话语。如果它所表现出来的活动是一种石祖特征，那么它是否也就把她们放在了男性一边？

汉语有两种表达方式：长舌妇，意味着多嘴；以及伶牙俐齿；是不是因为她们和母亲的原初关系是“过于酸的葡萄”，小女孩们因为长期不快而留下了牙齿？是不是女孩们在不满足感中经常感受到的羡慕也会把她们的牙齿磨得更加锋利、暴虐？

俐齿……再次涉及尖锐、锋利那一面，再次突出已经在其它语言中所表现出的这个方面。毒蛇的可怕舌头也距此不远。从舌头到牙齿的这条线唤起了口腔施虐的一面，克莱因说，这在小女孩们那里构成超我的温床。

在汉语习语中，当涉及到鸟的时候，指的更多是女人而不是小女孩。人们有时用鸟脑袋来指女人，但同时人们也用鸟指言语和音乐的接近，尤其是当母亲们和她们的宝宝说话时，这时语调、韵律、节奏和词一样起着作用，而在这个语言之海中，词逐渐作为特征浮现出来。在言语的早期，或许旋律比其所携带的意指更重要，这是将儿童浸入大彼者的辞说的澡盆，他将在其中抓住一些音素，然后抓住一些切断流动的词，由此他将之变成“他的”言语。

在这个时刻，男孩和女孩的应对方式是否不同？就两性来说，这个创建的时刻所涉及到的的是大彼者的享乐中的一个切口，以便进入石祖享乐，而石祖享乐关系到语言的存在吗？弗洛伊德曾经提出，儿童在进入性化的第一种形式——即有或没有被去势的形式之前，“小女孩就是一个小男孩”。如果说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与安排了语言功能的石祖享乐打交道，从而我们按照性别、按照与享乐的不同关系而登录在男性或女性一边，那么是否具有进入言语和占有言语的不同方式？对于所有言在，

脱离身体的石祖享乐把我们与最初的享乐拉开距离，同时要求我们在母亲的享乐中做切口从而占有言语。在与石祖的关系中，处在拥有它的一边，或是缺乏它而欲望它的一边，这对于我们与言语的关系、登录进入言语的方式、使用言语的方式有何影响呢？

男孩和女孩在玩游戏时所用的语言似乎显示出什么。这么说可能有些概括，自然也有例外。男孩们玩耍时，他们的词注释着他们的动作，组织着他们的空间——在这个世界中动物、交通工具、机器人、战士将会实现他们的壮举、完成他们的战斗并展现他们的意外事故。他们更倾向于自言自语而不是对话，他们说他们的阴茎崇拜、他们的行动力和操控生死的战斗力。

女孩这边，她们说的话常常引起对话。作为商人，她们要求她们的顾客说出商品以及他们的欲望；作为女老师，她们安排谈话、操控沉默；作为母亲，她们同样地让剥夺性母亲或填补性母亲说话。为了存在，她们是否需要彼者最终来保证她们的身份？她们常常比男孩们更早掌控舌头和括约肌，她们谈论对成人的认同——作为掌控的理想。她们是不是在面对性别差异的严酷现实时从舌头上找到了石祖性补偿？她们是不是利用它且滥用它以便通过话语来重获失去的享乐？

弗洛伊德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格言来总结女孩和阉割的关系：“她看见，她明白，她想要它。”他将之称为“阴茎嫉羨”，同时认为，将阴茎等同于孩子，能够成为这一愿望的解决方案。他这么做并没有考虑女人的方面，因为这样只能把女人设想为母亲。就阴茎嫉羨来说，除了在很少的情况下，她们并非是想要拥有阴茎这样一个真实的器官。有一些小女孩把假须放在她的三角裤里；另一些小女孩发现自己没有它后就去摸兄弟的那个器官，然后狂吼：“他，他有它！”另一个分析者说到，在和兄弟用一个澡盆洗澡时，她母亲说阴茎是“小门闩”：“拔啊拔，拔出门闩，栓钉落下……”^①看到性器官的差异，她们有时会觉得失去了宠爱，

① 出自17世纪法国作家夏尔·佩罗的《佩罗童话》。——译者注

但是她们是否真的是围绕着拥有它这一欲望而得以结构的？我试着在这次论文集的另一部分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玛蒂娜，之前的课程中我提到过的那位精神病儿童，在一次治疗后，脱光衣服，跟在我的花园里碰到的两个男孩比生殖器。

不过，一般而言，她所觊觎的最多也不过是石祖力量？生孩子的能力也是石祖力量的众多形象之一，而且毫无疑问能说会道也是石祖力量的另外一种形象。所以，所有的小女孩都需要从向大彼者请求客体的想象性请求出发，走到符号化其缺失这一步。

小女孩的能说会道，不就是她们登录进入石祖享乐的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吗？因为说话，所有的主体都与之有关。那么，按照弗洛伊德漂亮的表达，当她们变成女人时，她们和言语的关系又会变成怎样？她们会像萝拉那样，放弃经由能说会道的结构化通道吗？或者，换句话说，是否一个小女孩在走向“并非全部”的道路中改变了言语？而“并非全部”特定是女性享乐的特征。

在着手处理这一非常微妙的问题之前，我想要在小女孩和母亲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稍作停留。这是个理不清的关系，即使我们试着用词来理它。然而这个关系在认同、爱的请求和分离的尝试之间不停地摇摆。能说会道是不是就回应了成为母亲的爱的石祖的义务？快速且熟练地进入言语是不是就会带给女孩以母亲的爱和关注，而女孩害怕失去这些她很少得到的东西？

不过，获得言语，主动地栖息在其中，玩弄其力量，不也是摆脱古老母亲的一个手段吗？由此也就压抑了大彼者的享乐。玩文字游戏、脑子转得快、顶嘴的小女孩们是无礼的、粗鲁的，但与萝拉一样，这并不能将她们和母亲的距离拉远。没有阴茎来和母亲相区分，她们难道用言语来和她分离。幸好，说话可以用来诱惑父亲，诱骗他，因为她们感到他对辞说非常敏感。饶舌的她们寻找对话，但是她们常常感到自己碰到界限，这就像最初当享乐浸透整个身体时、在身体还未受到语言的冲击之前的感觉。实际上，在她们进驻言语的方式本身之中，不也携带着这

个原初享乐的痕迹吗？因为没有那个器官，她们在阴茎崇拜中的登录要比男孩的登录少些保证，除了“造人”之外。

现在我们来最后一点，即女孩与父姓，尤其是与父亲的姓氏——既是父亲的名字，又是石祖的隐喻——的联系。当女人们选择结婚时，常常会失去父亲的姓氏，当她们成为母亲时会全部失去，因为经常是她们的后代带上了她们的伴侣的姓。对女孩、对男孩来说，姓氏，这个“父姓”，分隔了享乐与母亲的身体。但是，对男孩来说，它认定他的男性血统，然而对于一个女孩，如果它把她登录进入父亲的谱系，就只能通过这个姓的失去而认定她是一个女孩。如果说，一个获得姓氏是为了传递它，另一个是为了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石祖享乐，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赠予这一方面的差异将会突出两性中的每一方与言语的关系的不同？在男人一方，他们夸夸其谈，这是因为在男人和言语之间还有他的性器官，它能够通过词的使用而区分出自己，而女性一方则用饶舌或者沉默来回应阴茎的缺失。对许多女人而言，能说会道仅仅是一个过渡，这可能是一个必须的过渡，以便隐喻化与阉割的关系，与母亲相分离，并且升华原初享乐。然而，一个女人与词的关系难道不总是与身体更近、更深入实在（是她自身的一种延伸）、也更加冲动性（我们说的是她与言语的关系）的吗？

无论如何，解剖学上的区分，在性化方面不能为主体带来任何确定性。就算是一个小女孩在她的身体中遇到她缺少那个东西，就算是她知道她被剥夺了那个东西，这也并不足够。她必须抛弃她知道她被剥夺的东西。因为身体器官的缺失在言语中对应着女性能指的缺失，那么她在言语中找到了怎样的支撑？这个缺失并不会阻碍她们——她们通过和男人不同的另外一些途径——进入隐喻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允许言在作为一个主体而得以登录在言语的一般基础之上。

这个表象的缺失和大彼者的享乐、**SA**、女性的额外享乐之间有什么关系？额外是投给大彼者的，而石祖享乐处置的是壹。这个享乐和女性进入言语并且使用言语的方式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在石祖享乐中，一

个女人被看作全然是言在，然而她还被小彼者的享乐和享乐的大彼者所环绕。毫无疑问，我应该从这些问题开始谈论女性的言语和性化。但我还是留待其它场合再谈。

现在我来讲一下文章开始谈言语和分析时提到的那位女分析者；她非常关心言语。这和她自己的症状、职业生涯、兴趣并非无关，不过她的这个兴趣也是一个转移现象。所以，我听所有她对我说的话时都没有太过注意，因为即使她不接受，我和她对那些话必然有点分歧。

根据记忆，我将标出会谈的三个时刻。第一个时刻，她告诉我，实际上对她而言事物仅仅只有在“重一”的形势下才得以存在：重读，重想，重找。令人惊讶的关于客体的无意识知识。对她来说，这不是辞说。她直接和词打交道，这会让她突然嘀咕，“阿呵 呵重”（Ar re），然后像一个小宝宝一样笑，这个笑声就像是在喉咙底来回打转的呵呵声。

在治疗中的另外一个时刻，她谈及了在她父亲玩弄否定的方式（与其说他使用，还不如说他不使用否定）中她的快乐以及她的骄傲。就像这样：以“我们什么时候再见？”的方式制造出“我们什么时候不见？”，他还说“我们不再见了吗？”我用“不见，还是走错路了^①？”打断了她的快乐。他父亲玩弄否定的方式让人心烦，这对她与母亲的共生联系、对她的同性恋性取向、对她和言语的联系又有怎样的影响？

最后，在另外一次治疗中讨论阴性，她大谈特谈用词的快乐，突然，她那最难以忍受的症状出现了：觉得在咽喉那儿和锁骨上端的身体里有个洞，这引起一种极大的焦虑感。这个症状已经消失很久了，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它和断奶晚有关，真可以说是把乳房从她那夺走了。我们没有再回到这个话题，不过，她问：“小孩子吸奶时舌头放在哪？”她自己回答说：“放在乳头下边。”

在言语和舌头之间的这个治疗过程，是否与拉康在《焦虑》讨论班中所做的评论产生了共鸣：

① 原文是 Dévoir, ou dévoyer, 二者发音相似。——译者注

“这个器官，其最初的功能是呼吸，被一个空所支撑，它进行呼喊的力量允许它具有有效存在的功能。这是否就是女性欲望的预兆，女性欲望构建在一个身体形象上，而这个身体形象从来都不完全缺乏原初的口腔性。”

辛格或转移之爱^①

塞尔日·勒克莱尔^②/著

石岩/译 古维兰/校

【内容提要】精神分析的过程就是要让死冲动变得清晰，这种冲动就是要杀死主体之内在孩子的无意识表象。这个过程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哀悼，对这个与主体的愿望、忧伤、希望扭结在一起的孩子的死亡进行哀悼。这种哀悼包含的就是阉割的操作。女性的阉割与原初压抑处在同一层面，即女性承认“丧失”从而认同女性身份，而男性的阉割则如同次级压抑一样被建立，拒绝“丧失”从而以“父姓”重新说出。精神分析的辞说就是要确定这个主体的位置，而这个位置的确定需要透过转移来完成。本文藉由辛格的转移，讨论分析如何揭露死冲动、如何哀悼死去孩子的问题。

【关键词】死冲动 无意识表象 转移之爱 哀悼

精神分析的实践的基础是，不懈地努力以使得死冲动变得清晰：死冲动要杀死神奇的（或恐怖的）孩子，一代又一代，它见证了父母们的梦想和欲望；只有以杀死最初的、古怪的形象为代价才有生。每个人的诞生就印刻其中。这是无法实现的，却是必须的谋杀，因为如果我们不去杀死不断复活的“神奇的孩子”，就丝毫没有创造和欲望生活的可能。

① 节译自塞尔日·勒克莱尔的著作《一个被杀的孩子》。

②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

为了活下来，就必须杀死自我中关于新生儿的专横表象——以便让另外一个逻辑出现，这个新逻辑由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谋杀的不可能性所支配，并且人们要真正讲话的每个时刻、人们要开始去爱的时刻，都必须再次犯下这一罪行。

分析家的工作是坐在椅子上倾听分析者，这其实也是启动且经历他自己和这个原始自恋表象（我用神奇的孩子形象所形容的就是它）的关系；所启动的，是要丢掉这个我们所是的、极端熟悉的表象、我们身上的新生儿，以便永不利用它，所经历的，是顽强的死冲动——它使我们向欲望的辞说敞开。

神奇的孩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无意识表象，比所有其它表象都更深入地与每个人的愿望、忧伤，以及希望扭结在一起。在儿童那显而易见的现实中，这一表象几乎毫无遮拦地显示出我们所有的欲望的实在。它让我们着迷。我们既离不开它，也抓不住它。

否认即死亡，因为没有活下去的理由；而假装活着，这是判定自己不要活。对每个人来说，都要杀死一个孩子，并且要一次次反复进行哀悼——哀悼失去一个完满的表象、一成不变的享乐，就像是熄灭一盏灯，这是为了这盏灯能够点亮，而且在深夜时熄灭。没有一次又一次反复地对他所曾是的那个神奇的孩子进行哀悼的人，一直处于混沌之中、处于乳白的光芒之中，处于没有阴影也没有希望的等待中；但是他却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和暴君形象清算了自己的账目，他就这样丢弃了自己的天资，还认为在享乐的统治面前自己是个强大的英雄。

所有的家庭“秩序”，尤其是社会秩序，都要承担起考虑这个找不到的或失去的、幸福的、崩溃的、荣耀以及无能的形象的责任，然而，实际上“秩序”所做的仅仅是嘲笑我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秩序”能够免除我们自身的死亡：即便受到战争或宗教的荣光的祝福或安排也是一样。不过，我们非常清楚第一次死亡——我们出生那一刻所闯过的死亡，我们还不断地谈论它，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体验我们所曾是的这个神奇的或恐怖的孩子之死，而这个孩子是生下我们或看着我们生下之人

的梦中的孩子。杀死父母，即使这很必要，还不足够，必须杀死孩子-王的暴虐表象：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就已经受到了无可避免的第二次死亡的束缚，别的，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我们在这里再谈一下最典型的无意识表象，我想说的就是原始自恋表象。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可以更加清楚地说出对这个表象的哀悼所包含的是什么：涉及的是进行阉割的操作。……神奇的孩子的原始自恋表象因其代表石祖的杰出价值而获得令人着迷的力量。……原始自恋表象的“丧失”的经验，如同所有的无意识表象，都按照解剖学背景而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登录。不论假设女孩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的性器官的存在，问题都以阴茎的缺少这一说法被提出：它是已经失去了？与所感知到的相反，它会不会长出来，像她所认为的母亲的阴茎那样？早晚有一天，她都要承认她缺少阴茎这个事实。如果人们认为，原始自恋表象的“丧失”构成了真正的阉割，那么可以说，对缺少阴茎（这构成了她的性别特征）的这一发现，在女孩那里将要登录为对必要的丧失的确认，以便在话语的冲突领域找到空间来展开欲望，这个空间被意识系统与无意识系统的顽强对立所决定。再进一步，如果人们考虑精神分析让大家理解到的，有关断奶期口腔客体的“丧失”经验，然后是肛门客体被体验为是抛弃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就可构想，当女孩的“石祖”期结束时，会登记一系列与丧失、分离或缺乏同质的经验，也可以说，她自然会在由阉割所支配的无意识结构中找到位置。对经验的这种安置受到解剖学背景条件所限，促使女性和阉割操作有着一个直接的关系。由此，它和原初压抑的操作处于同一层面，并且只投注了少许次级压抑（压抑的本来含义）；被意识所拒绝的、构成“次级”无意识被压抑物的那些表象，因而没有“原始”的（原初压抑）无意识代表重要。……以某种方式承认“丧失”，也就是说，承认无意识表象的优先决定性，由此，意识表象以及它所产生的概念装置的魅力就消散了。这些词被留给女性，除了它们的意义功能之外，还有它们的无意识代表、享乐的能指的价值，这将构成她的“女性话语”。她还在这个与阉割的直接关系中找到了支撑、支撑性的认同

过程，在对某些女性的特点或形象的所有次级认同之前，这一过程首先会无意识地确定她为女性。

对男性来说正相反，石祖期的经验，及其衰落会中断一系列丧失所具有的同质性：由于他拥有阴茎，就更容易说服自己所有人都有丧失石祖，而且他和所有男人一样都拥有石祖。这一混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加强并坚定了次级压抑。通过次级压抑，无意识代表所表现出的阉割的真相将会被更强有力地否认；再者，这还顺带防止了儿童对失去阴茎的恐惧。男性辞说，也如同次级压抑（一般意义上的压抑）的辞说一样被建立，因此明显是作为对阉割的拒绝、对无意识的误认、并且因而是一种放逐享乐的方式。男人不论有什么，都有着固执的强大幻觉——他没有被去势，并且是石祖的某种形式的拥有者，因为他具备一个阴茎。男性坚持意识表象的优先性，坚持词的意义价值，以无法根除的企图——制作一个普遍的辞说——来构思概念系统。实际上，这一辞说仅仅起着遮挡无意识辞说的真相的功能，遮挡阉割无法回避的根源的作用。在他的经验中，只有当撞上“阉割的岩石”的暗礁时，他才被迫倒回去探寻他之前建构的现实，以便重新找到他被放逐的实在的土壤。更确切地说是他的母亲或者他的起源。他重新发现的正是以“父姓”说出的母语，他最终行走于他诞生的土地，没有附着点的石祖鲜活地存于此。当女性揭露霸权倾向，反对男性辞说的压抑功能时，她的抗议并非没有理由。然而，这涉及到的是压抑的辞说，不容置疑的权力的辞说：与所谓的男性中心主义辞说完全相反，它只能通过对阉割的承认而组成。

与解剖学上明显的限定相关，“性别因此就以进入辞说的一种模式为特征”，以根本的主体性位置为特征，它从石祖的结构异质性出发而得以构建。男人，其身体具备一个作为石祖能指单位的客体保证的阴茎，他将“我”建立在分离了无意识代表和意识表象的切口中；这个位置抛弃了石祖的另外的、客体的部分，这个位置它是不可确定的。就这样被不断制作的男性的位置，它所保存的关于阉割的无意识概念仅仅是那个在意识表象和无意识代表之间的切口，而没有考虑石祖和无意识代

表之间的分裂，它通过简化地假设被当作能指的这两个术语在结构上的一致性而抹去了这种分裂；这一男性位置的效果，是要通过对意识表象的超投注来支撑阉割的现实（当然意识表象是从孕育它的无意识表象中截取的），并且因此赋予它得以支撑的意识理性以优先性。男性的命运将会一直都带着其简化假设的完全强制性的抵押标记，并将借此反对他的理性的所有诡计，去不停地重新寻找石祖的另一半真相、其内在欠缺，以便实现阉割。

没有什么能够让女人将石祖缩减为一个纯粹的能指。她用无意识代表来支撑被赋予特权的投注，这一投注是对无意识的功能统一体和（作为客体和享乐的原因的）石祖之间的区别性分裂的承认。女人话语中的“我”处在无意识代表的功能统一体和石祖之间。但是，通过这一主体性位置，女性力求减少这些系统的差异，以便在意识秩序中让词和表象的能指价值占上风，而牺牲它们的意指价值；相应地，这些秩序的混淆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能指的享乐的价值，并强迫它赋予石祖的客体功能以特权，以作为享乐的唯一保障。这就是女性的命运——想象“一个”石祖，因为她太过于了解（特指的）石祖的奇特之处和短暂性了。

精神分析工作在对性别的这种研究中所引入的要点是，性的确定是一种辞说行为、一个根本的主体的位置，这显示出，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普遍辞说：因为没有未经性化的辞说。同样，辞说的空间自身也被分为男性系统和女性系统，它们从阉割开始区别开来，因为阉割决定了与石祖关系的半个真相。辞说，在它们的“源头”中就带着性别分裂的标记；设想它们可以维持在“纯粹状态”就太过简单了。但是，不论它们各自的优势是怎样的，通过它们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相互混杂，它们都会构成我们长期以来所发现的“双性性”；我们还要说，对每个人来说这一混杂甚至会颠倒其性别辞说的“自然的”主导地位。

.....

有关我兴趣的最微弱的迹象都逃脱不了辛格的注意：在我的办公室中，她敏锐地一眼识别出天然金粒，或者晶洞中神秘水晶的闪光；从我

的著作中，她成功地解开了某些幻想性创伤，正如她努力从我杂乱无章的桌子上找出我所关心的问题或者我的计划。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比她更认真、更敏锐的分析家了。在这位“30岁的女性”的身上（与数字的亲密让她非常早就对科学有着隐密的崇敬），直接体现出她“研究员”的使命所要求的東西。她将我的那些能指标记当作珍贵之物并用她的秘密电脑收集起来，用来支撑和承受她那些汹涌的表象流，并且滋养她对爱的渴望。通过她所识别出来的、我的那些欲望幻想的代表，且不论这有没有道理，她试图如贾斯汀通过他父亲的能指的格子所做的那样，在空间中打开一个缺口来叹息、休息、避风。在她的脑中，那些词不停地遮蔽数字，这是一项孕育生命的丰富工作；为了更好地谈论她的期待，她想象将自己的前额贴在我的壁炉的大理石上、贴在我的桌子的木头上，就好像她想要将它贴在我的手心，这些恰恰是在沉默的时候，这时候我的责任是帮助她把话尽量说出。

由于无法成功地支撑自己（如果不尽最大的努力），甚至不能站立，辛格就一直维持着她的一些东西，她保持着婴儿般的姿势和声音——似乎没有人会再这样做，她留心她的兄弟们，简单说就是她懂得去阐释他们的死路，她就像是唯一一个能够把努力出生的人引向死亡之门的存在。似乎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口令（*mots de passe*），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一些“名令”（*noms de passe*），这是新生儿或去世的父母的名字；像个亲人一样，她知道我的亲人们的周年，并且探寻我的家系，宣称在她家就做不到这些。弗洛伊德、布尔或爱因斯坦不能当我们共同的祖先吗？她想要在我处于“俄狄浦斯期”的年纪时认识我；面对她所投射的我四岁的形象，我无法继续“抵抗”，我的一本正经的体面样子就连最后一丝都化为粉尘。在没有伪装的笑容中，我找回了这个年纪的庄严——深切地理解爱的欲望，以及由此而遭受的痛苦。通过点亮了眼睛或声音的这种微笑，另一只耳朵打开了，最终在悲怆的形式下，“不存在”的不幸、仅仅作为无而诞生的不幸能够以真相之声被说出。在两条线之间，在两个词之间，不能说话的人、婴儿，不如说是可爱的小天使，最终让不能

被说出的话“在场”。在此，转移得以建立。辛格用形象的说法谈道：“您的微笑在您的脸上，我的痛苦在您的脸上，您的痛苦在我的脸上，我的微笑在我的脸上。”

我不相信关于没有表情的面具的中立化错觉，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保护自己不被指责为诱惑。分析式的倾听利用了这个沉默点，这个点也构成了转移的地点；在这里上演的，是给一个关于排除逻辑的实在的智力行为提供空间，它是超越代表（représentant）之网的一个通道，穿过镜子的一条路。分析家的在场、仁慈、中立、沉默，这些仅仅是对这个非-抵抗点的不合适的、粗略的阐述。分析家的精神分析中必须至少已经无保留地与这个非-抵抗点相遇过。人们矛盾地称之为意识的获得，人们把它描述为主体的到来或者是接受阉割，而对于分析家完全可以要求的東西，正是他有着“说出想要说的东西”的经验，有着词隐藏了决定性的阴影的经验，有着它们呈现了正在穿越它们的网的主体的经验。有经验，指的是在幻想的重复中，发现这些幻想的新的起源种子；在我们的知识中，疏通所封闭之物；在我们的分析者所经历的事情中，毫无保留地承认那些刺痛他们的事；总之，就只是协调不可协调之物，执行词-形象的死亡，并且毁掉无意识代表的全能，这些操作对实现主体的（再）出现来说是必须的。在压抑这一普遍工作的支配下，所有的基本家庭单位、所有的团体、所有的社会“秩序”都参与进这一工作，那些词不停地重新变哑：鲜活的话语仅仅维持在对无意识代表这一问题的一种谨慎关注之上，尤其是对暴虐的原始自恋代表的讨论之上。

这里揭露出谋杀孩子的幻想的另外一个侧面：通过把孩子命名为一个“婴儿”，压抑的辞说被理解，因为他一个字都不说，因而就不恰当地把他称为不说话的人。确实，对君主、父母和所有的教师来说这样很简便，即每一个“主体”仅仅是忠诚的重复者，即每一个孩子都不会用关于真相的一个话语而打乱压抑的秩序：“闭嘴，你不知道你说了什么”；所谓的精神分析家用自己方式重拾这种东西，他会威严地命令：“说吧，我懂你说的！”然而，在他还没有说出这些话很久之前，孩子就在狂喜

或狂怒、微笑或喊叫中直接表达说话的意思。不论怎样，必须要变“乖”都是一种妨碍，就恰如一个形象：带着所有善意且自觉地犯下的第一桩谋杀，而其结果——不说话的或鹦鹉学舌般的婴儿的形象本身，将持续不断地待杀，以便透过这一迷惑性的形象而重新找到代表再生之力、起源之力、生育之力的东西。

我作为精神分析家的根据就在这个点上被表达出来，即关心话语的“起源”（阉割、原始场景、死冲动）。这一关心无法忍受任何距离，因为我确实被它所支配，而且这也确实不是我能够逃避的选择，或者我能用科学的另一客体来替代的选择。因为，我投身于精神分析的经验，我遇到总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孩子般的、对起源的“好奇心”；即使我有其它手段可以满足它，也不确定我能比孩子更好地理解，哪怕我迫切且坚决地追寻这个问题：在再次体验到的创伤中再次寻回的那些记忆，用对科学的进步的理解、用拉康的算法理解俄狄浦斯的简图，我不停地回答它直至冒险结束它。然而，仅仅在我倾听分析者的这个缺口这一范围内，我是一个分析家，通过这个缺口，话语不停地诞生并再诞生，欲望的空间也是如此；仅仅是在这个地点，才能够听到主体的被切分的声音，并且说出分析者的“原始场景”的独特性：他的“起源”，即他进入词秩序的独特方式，他与原初客体的那些沉默的关系的独特配置。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家，就是停留在缺口处，以便让它一直张开；事实上，保持鲜活，这样一种欲望、兴趣，让我们“进入分析”：对我、对他、对她、对每个人来说，它怎样说？它怎样欲望？

精神分析的历史和弗洛伊德的英勇事迹必须首先从这个不屈不挠的“好奇心”来开始阅读，从“走向没有人踏入的冒险旅程^①”，这将不可避免地踏入被禁止的领域之边界，欲望在那里诞生。弗洛伊德沮丧地写道：“对我最公正的惩罚是，任何未经探索的精神领地，我作为第一批人进入其中，却没有写上我的名字，或者没有服从我的法律。在斗争的

① Freud,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PUF, p. 387 ; G.W., II-III, 457.

过程中，我看到遭受失去灵感的威胁，我向天使祈祷放弃……一直以来所做的^①。”冒险不能够通过委托而进行；只有全心全意才能进行。在写完《释梦》的时候，弗洛伊德谈梦说：“这个工作完全属于我，没有其他工作能比得上：这是我自己的肥料，我的作物，再者还是 *nova species mihi*。”^②“对我自己身体的（解剖学的）准备 [涉及下身、骨盆和腿]，即我在梦中所承受到的那些东西，就是我出版的书所包含的对我本身的分析^③”，是关于释梦、欲望的秘密。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分析家能够抵御堵塞住他倾听的缺口这一危险：分析的组织不能，它的宿命更多是，在考虑保卫弗洛伊德的发现的过程中，保证消灭所有的好奇心；作为话语的字面保证的系统的系统阐述也不能：这个必要的登记（语法化、数学化）不能保证获取其他那些“登记”——无意识代表的登记，却相反可能会尽力去取代它；分析家的分析也不能，对它的追求是不确定的，将不能保证反对阴险的掌控或“结束”的幻想所造成的自我堵塞的效果，例如，其非常常见的形式是坐在扶手椅上。

我往往发现我书写的方式、描写的方式、还有分析进展的方式，就像我的实践一样，带着我的幻想的看法，并且能找到我的命运中具有决定性的某些能指的痕迹；不过，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的那些词中间，透过我的辞说的规则，在我的干预或我的沉默中，梦脐位置还是自由的，夜晚的那些门还是开放的。贾斯汀在这个地点要说的是，他的父亲欲望开垦土地，并且正是通过这个根本的幻想，他扎下了辨识岩石的激情：在这个地点也能够发现母亲的欲望的沉默。辛格在这个地点将要说的是，正是游荡的记号和无法睡眠，让她逐渐衰弱，这让她感受到保证孑然一身、没有幻想的父母、没有他们的话和他们的缺点的重压；在我的倾听的沉默中，她平息下来；在她所感到的我的欲望的那些代表中，她扎下根。

① Freud, «Lettres à Fliess», in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 1, n° 134, p. 283 ; G.W., 341.

② Freud, *ibid*, 1, n° 107, p.250; G.W., 300.

③ Freud, *L'interprétation des rêves*, PUF, p. 386 ; G.W., II-III, 456.

在治疗活动中启动精神分析就包括这个赌注：对话语的起源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一参与是缓慢地前进、创造、变化，与扶手椅表面上的静止不动相反：与以沉默的倾听所做出的迎接相反，正是不间断的辞说逃避并且勾勒了他的客体，也回应了对他的起源的不断的疑问。灵敏的耳朵让迷失在词以及词的间隙中（确切说是在话语间^①）的身体介入。这是应当的、必须的条件，并且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分析将会冒着仅仅只是一种观念的制作的危险。并且与冲动的现实不相干，在鲜活的话语中词-形象就是冲动的现实；这是应当的、必须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转移就不会成为真相的无可替代的地点，而仅仅只是一个强大的暗示性掌控的机会。

所有分析者在精神分析中所投入的，正是他的希望，不论这个希望是多么的模糊，都是希望多少能够通过他那些症状之外的其他形式来摆脱、避免他的压抑的辞说；这并非不承认对真相的需求，我们的运作也包括它，通过它可以开启转移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坚持不回应请求，并且真正地维持我们对欲望的倾听。

① 原文 *inter-dit*，音同“禁止”。——译者注

无言以对^① ——对于一个少女的分析

米歇尔·维斯-维玲^②/著

鞠睿/译 石岩/校

【内容提要】本文借由一名沉默的少女的个案，论述了女性与言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中的特殊工作方式。这名少女的沉默意味着一种无符号化、无思，分析家借助分析者对父亲的谈论，打开了分析者言在的缺口。并且分析家借助分析者父辈的历史，将言语借给了分析者，解除了分析者的沉默，使得无意识中压抑的创伤历史得以流动起来，得以传递下去。

【关键词】青少年 女性 沉默 言语 假设知道的主体

描绘青少年期特征的，正是说话这件事，说话，是为了跟同龄人日以继夜地交流、建立关系、连在一起。用手机、Facebook、微博、微信（Wechat，chat 在英语中意味着闲聊）、sanpchat 等等不断地“聊”：“你在那？你在哪？”如此必不可少的话语首先且尤其是对自己、对相同的彼者讲的。这个彼者能理解，因为他被设想为跟自己“相同”。这是一个封闭的对话……在两个同类之间。在交流中，他们说的话毫无特殊之处，常常是些陈词滥调。这样的交流不是为了什么事情而仅仅为了确认

① 原标题是 «buter sur les mots», 意为“在用词上遇到了困难”。——译者注

② 法国精神分析家。

对方在那里。如果对方在，并做了回应，那么，我存在。言说，便是存在。因为话语来自于一个在者。在青少年期这非常重要，它关系着他的生命、他这个人赋予意义。

在年轻女孩子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就能看到，所有的这些闲聊都镶嵌于随着女性问题而展开的沉默的边缘。说话，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寻求建立属于她的位置，就像维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一本书中所说的“属于自己的房间”。因此每个女人都要与一个新的孤独做斗争——她还没有找到话来谈论新孤独。

一般情况下，敲开分析家门的青少年们发现，话语在催促他们，它们催促他们的欲望，他们感到也许能够找到某些还不知道的东西，事后，又发现这些东西从根本上都是早就知道的东西……有些人在这个催促所隐含之物面前退缩了，下次就不再来了。而有些人会在许久之后再提出请求。

现在我将向你们讲述的这个女孩子叫维尔吉尼。在日常生活中，她跟所有青少年的行为表现都一样。在多次分析中，她都沉默不语。她的沉默在言说，而她要让我听到这个沉默。跟很多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她并没有选择逃跑。维尔吉尼每次分析都会来，三年以来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

她让我觉得很棘手：她沉默，却紧紧地抓住分析不放，我相当不知所措，和她一样不知所措。

我在医疗心理教育中心接待维尔吉尼的时候她十五岁。这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混血儿。她关注自己的衣着，穿的牌子是她这个年龄的许多青少年都选择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忧伤，她柔弱的姿态，她不那么确定，甚至是模糊的在场。

在她母亲的建议下她来这里做咨询。这个母亲认为她的女儿“压力太大”，很焦虑。母亲没有跟女儿一起来参加第一次会谈，因为太忙。我并没有坚持让这位母亲一起来……这也许是个错误。

一开始，维尔吉尼便强调她并不同意自己母亲的看法，并认为：她来做咨询是因为口吃；要说的话在她口中打转、冲突。这让她觉得在跟同龄的女孩子们聊天时并不舒服。她希望我们能赶快把她的这个症状给解决掉，因为她在别人跟前讲话的时候感觉很羞愧。第一次的会谈在长久的沉默中进行，她告诉我如果讲外语的话就不会口吃。口吃是从六岁的时候开始的。

当我跟她确定下一次的约会，向她建议我们下次谈谈她所抱怨的问题的意义所在的时候，她非常的惊讶，原因是她一直认为我是正音师！在开始的时候，在她的问候中表现出明显的轻蔑，尔后就是很长的沉默。她后来选择了接受，因为她“无言以对”。我高声重复了一遍她的这个表达，强调着我收到了一句话，这句话远远超出了口吃这个表达。

她很好地理解了我的这个建议：维尔吉尼用了一个隐喻“无言以对”，来替换口吃这个表达就是明证。在要纠正的症状和传达信息的症状之间，她开辟了一条通道。一个等待解答的谜语暗示了一个等待被阅读的无意识的知道。转移恰恰建立在这个词上。

“对上”（buter）是法语俚语，意思是杀，毁。必须要“对上”谁？这个词中所包含的暴力将她送入了一种必须远离的对消失的焦虑中？她感到自己是被摧毁的，她是否有毁灭的意愿？为了说话、为了活下去，必须要杀戮和摧毁吗？我所听到的是：绝境，对生命没有投注，死亡。然而，我产生了另一个联想，与性有关。因为“碰 / buter”这个词在“推倒 / culbuter”这个词里面。后者用来形容男性的性，带着一定的暴力，意思是：“跟一个女人发生性行为”。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对于这个年轻的女孩来说也许重要：她的名字“维尔吉尼”可以追溯到“处女 / 维尔吉”这个词。对所有懂法语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一次的会谈中所敞开的东西很快就又关闭了。维尔吉尼表现得抑制、沮丧，甚至这两者同时存在。她每次都来，像是十分投入，然而却变得沉默。就像一首诗中说的：“无法在唇上舞的，将去灵魂的深处燃烧”。

数月以来，她每次来时嘴边都挂着微笑，跟我面对面坐着，纹丝不动，对我略带嘲讽，或者欣赏涂在她脚趾上的新指甲油（这是她告诉我的），或者就一言不发。整个分析就这样持续，要不然，她就跟我抱怨她的口吃变严重了。

在沉默中，呈现在大彼者目光下的是她的身体。这是一个比口吃——一个将她带向自己的声音、一个受阻的声音——显得更为醒目的方式，它对身体形象有所影响，这个形象在她看来应该是变了形的。

一方面她要求我帮助解决她的这个困难，另一方面她向我表明我无法办到。假设知道的主体（*sujet-supposé-savoir*）的神话在这里根本不灵，或者说它太灵了，分析家已经来到了一无所知的主体（*sujet-qui-ne-sait rien*）上了……实际上是几乎一无所知。这是经常挂在青少年跟成人的对话中的：“你随便说，我就是不听……”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常常对自己有种不确信，有种受伤的自恋，有跟人无法分担的孤独和内心深处的绝望。

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分析家应该常常处于一种中立的介入位置。聆听她的沉默，看到她沉重地一动不动是让我最难过的事情。她激起我的防御和抵抗。我恼怒的行为、我的无力、我想让她讲点什么的努力，这些她肯定都看在眼里，它们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的沉默，难道不是对大彼者——这个分析家所化身的角色——可靠度的怀疑？她探寻着对此人讲述是否可靠。拉康说“只有某人的信任，才能让话语存在”。我也想到，她等待着我说话，表明我也参与其中。因此，该我张开嘴巴……也许也同样地遭遇词上面的失败。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向她表明，如果说分析家要处理知识和真相，那最重要的是他有着这样欲望。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空间，在其中能够让她的问题和话语浮现出来。

面对着沉默的青少年和孩子，多尔多告诉他们：分析的地点是一个可以保持沉默的地点。有种方式叫作：不把沉默和不能说话等同。尽管有我的话语、我的鼓励，然而她的沉默却一直延续着……她继续封闭自己。需要找到一条出路，就像下象棋的时候那样。而这个出路，她和我在很久之后才找到。

有句话可以很好地总结这第一阶段的工作，“我等待一切，然而我一无所求”。

我想到了弗洛伊德最早的病人。所有这些少女——埃米·冯·N、安娜·O、杜拉，当然还有年轻的女同性恋——都有口吃的症状，舌头打结，失音症，沉默症。也就是说，这些事件损害了她们的辞说，洞穿了她们的话语。同时，她们难以处理以第一人称、阴性来表达的这样一种主体性。对弗洛伊德而言，这里涉及的是否是作为女性的特征之一的、无法命名的形象？一个在言语中打洞的实在，一个类似死亡的实在。事实上，“女性的位置”和“与性器官的无法表象相连的沉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关系。也许因为这样，我们常常指责妇女们的饶舌。也许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女人常常抱怨男人们不跟她们讲话！弗洛伊德在他关于选匣子的文章中，把这个沉默跟死亡并列。

沉默在分析中具有各不相同的特点。沉默，可以被考虑为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做准备；它是话语带来的阴影。在我看来，我们或许可以认为，维尔吉尼的这个沉默，这个对话语的保留，在话语本身意味着某种威胁的时候出现。确实，损害了自恋的口吃妨碍了她说话，在词上栽的这个跟斗剥夺了她的话语，让她毫无余地屈服在大彼者的目光下。这样一个言说的抑制源于自恋。与此同时，我认为在她那里，她是想避免话语带来的危险。在《癔症研究》中，弗洛伊德注意到，当主体靠近“病理核心”的时候，他们便不再说话。创伤威胁着话语。创伤对于话语来说是一个死亡、摧毁、分离的形象。从第一次分析开始它便在那里了吗？在她那里，它是如何关联到女性性的呢？

无-符号化、无-思（non-pensé）已经侵入到维尔吉尼的沉默中。我们可以说，她的沉默是实在的形象之一，就处在等待中的话语的中心！需要依靠转移才能够在此刻打开一个主体性的空间，并符号化从未听到过的东西。在事后，我们才能够理会这个沉默的内容。

不止一次，在注意到这种鼓动不会对她造成侵犯的情形下，我请她说话。她第一句话说的是，她只会回答我的问题！回答问题，对她来说

代表着她在这个第一阶段中的话语。而我寄希望于通过这项工作，她会逐渐开始构建她自己的问题。构建自己的问题，是一个经常出现在我们与病人之间的工作，不管是这个病人是青少年还是成人。

她告诉我她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母亲的籍贯是意大利。她跟母亲有许多的冲突。她的父亲曾有中国籍。她非常喜欢她的小妹，但不太喜欢年长的两个姐姐，特别是大姐。这个大姐是个学生，一天到晚都监视她，然后“全部报告母亲”。“就像我有两个妈一样”。她用单调的口吻说，这时她并不口吃。说实话，在她说的过程中我几乎从来都没听到过她有口吃的时候。好像在分析里面，舌头又可以重新代表相异性、一个第三方的地点了。因此，让舌头产生不协调和变质的口吃，对她来说并非是非存在不可的，她并不是非要通过口吃来获得承认。

维尔吉尼向我抱怨她母亲：她母亲的话语让她“晕头转向”，让她“上头”；母亲向她发飙，曾经因为她不按时回家就禁了她的手机一个月……她母亲跟她自己的家人再也没有联系，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她的小孩上。维尔吉尼同样向我抱怨她父亲：一年中半年都不在家，因为他长时间滞留在中国。她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些什么，她也“不在乎”。她说他经常一人在家待着，除了有时候跟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讲话之外，不跟任何人讲话。我让她注意到，她在分析中的沉默跟她父亲的沉默是否不无相关。她用否认回答了我，说自己跟他没有任何可说的！我还让她注意到一个事实，第一次会谈的时候她母亲没有陪她来，是否对她造成了她以自己的名义去说的困难，因为她没有被应当预先存在的母亲的话语所引入。

我的感觉是，在这个家庭中，不管这个家庭的性质是什么，交流被缩减成仅仅是为了应对需要。同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家庭中的“私”话是什么？当然，他们都讲法语。我们可以认为，正是法语消除了一直被流放，或冻结在其他语言中的情感……反正，不管是父亲的中国话，还是母亲的意大利话，都没人说。它们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而被排除，这表明着传递的欠缺……历史的欠缺，不仅如此，跟它一起被驱逐的还有“呀呀言语”。我们可以询问，维尔吉尼的母语是什么？

在这个家庭中，女人们发飙，互相充耳不闻，父亲保持沉默。他的在场就像幽灵。而肩负真理、允许每个人的主体性流通起来的话语遭受了损害。维尔吉尼有着双重的封闭：父亲的沉默将她推向了母亲和姐姐的魔掌，因为她铮铮有词地说过她是“两个母亲的女儿”。她分离的困难跟这个母亲身形的重影密切相关。需要补充的是，父亲的沉默中独特而具创伤性的分量似乎联系到的是其它的东西。一般来说，双亲的欠缺让青少年的独立化变得非常困难。

在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对她非常的温柔，但是自从她的青春期开始，这个关系就结束了，是她最小的妹妹接替了她，获得了父亲的关爱。当她开始成为一个少女的时候，孩提时候的父亲便不理她了；他收回了“对她的特别关注”。毫不奇怪，这使维尔吉尼敌视他。但是我们注意到，她的敌视是多重决定的：当她六岁，小妹妹诞生时她就曾经感到过被她父亲所忽略，而且……当然还有她母亲。她的口吃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可以假设，在她妹妹出生之际，口吃的出现建立的是一个强烈的回退，回到她难以舍弃的口腔爱若。

对于她的父亲，维尔吉尼有种带着愤怒色彩的轻蔑。她告诉我，“真的，这不算什么”。我觉得她向我说起的的是一个飘荡在屋子里面，或者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的一个鬼魂。维尔吉尼知晓他离去是什么时候，但是永远都不知道他回来是什么时候……她因此保留着独自占有母亲的愿望，因为竞争对手已经走了。

然而某个无法忍受的东西打扰了她：她父亲随便进入她的房间，将她的私人物品移动位置。这个“进入”的父亲让她乱伦的幻想获得了质地。我们能够再次想想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打垮这个乱伦幻想才能容许我们重建自己的房间。

看吧，这差不多就是那么多次的长久沉默的会谈中的内容！当我失去耐心（失去耐心，经常是我面对维尔吉尼唯一的办法）之际，我便让她跟我讲讲她在高中的生活……或者我建议她给我讲她做的梦……

这样，她便又回到口吃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她联想“对上”这个词。

对她来说，“对上，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对上嘛！”，她并没有听到这个词的歧义。我于是让她注意到“对上”这个词也有“杀”的意思。她受到一击，什么都没说，像是被吓到。“杀”这个能指，不仅将物放置在等待命名一边，同时更重要的是把物放在与死亡和出生的问题有关的一边。存在着毁灭性，同时我的干预指向的是她自己所说的东西，指向的是她所认出的并重新送入冲动的动力学循环中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次分析中，她告诉了我她的一个噩梦。准确地说是四年前的一个噩梦，然而对她来说仍历历在目：“一个漆黑的夜里，我独自一人，我必须穿过墓地。周围都是坟墓，我很害怕，我在寻找出口。在墓地的入口处，有一个女人，圆睁着双眼。”这个梦的讲述证明了一个主体性的转变：她第一次承认有谜一般的知识在起作用。这个梦未被忽略，成为了一个转移的梦。通过梦中的这个圆睁着双眼的女人——即分析家的传递或者中介，她才允许自己去知道。这个创伤性的梦将我们带向了僵化和抑制之所在。对我来说，这个梦带她去面对死亡、死亡的沉默、死人的沉默以及对其父亲死亡的沉默。跟这个梦一起，她能够开始做一个哀悼，哀悼自己对父亲话语的期望。这个沉默，这些沉默，她都实施在了自己身上。她对上了它们，由此产生了她关于女性认同的问题。在父亲的沉默和注视下，怎样当一个女孩子？不被注视意味着不再被爱。这个首先由母亲所开启的自恋化，因为缺乏父亲的话语——作为第三方中介化的父亲的话语——在她那里成了一张平面图。于是我们能够开始去讲述死者，甚至是让死者去讲，他们因此“出没”在话语的大彼者中。话语为他们挖了安睡的坟墓，让他们这次死得安宁，以便不再叨扰生者的自由……

这个梦似乎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于是我请她为我多讲讲她父亲，这让她非常惊讶。她的沉默少了一些，世界变得丰富起来，像这样的句子出现了：“我以前认为……”，“我那样或这样做了……”她回忆起口吃的出现是在她的妹妹出生之际。

她向我述说到，她的父亲不仅是回中国工作（她始终不知道父亲的

工作是什么，这一直都是个问号……)，而且也是回去看他自己的母亲。她在巴黎见过一次祖母。她们之间无法交谈，因为都不懂对方的语言。在讲这个的时候，维尔吉尼提起了她的叔叔，父亲的兄弟，他也在法国，他是父亲唯一的谈话对象。她无法命名这个没有任何人懂的语言，她母亲不懂，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懂。她认为这个语言是汉语。她是否对这个语言感兴趣？她是否对中国感兴趣？肯定不，因为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虫到处都是，她很害怕。并且学习这门语言太困难了，而且，学它干什么？”

他父亲往返中国的这个问题构筑了一条历史的线索，她由此有了些依靠。有些时候，分析仅仅变为她向我汇报她父亲又从中国回来了，或者她母亲接到了从那边打来的电话。然后，新近又有了些新的梦，关于屠杀：要么是她杀了人，要么是她被杀……总是被男的所杀，她说。在高中的学校，在班上，当她被指明要讲点什么的时候，她总是非常窘迫和不好意思，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

然后，接着，她开始询问她父亲跟中国的关系。他向她讲了些自己做的进出口贸易，并且有今后定居在那边的打算。她还了解到他父亲在柬埔寨出生，至今还有家人在那里。对此十分吃惊的她，开始在地图上寻找柬埔寨这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一次分析中一言不发。

也许我过于着急了点！当我知道了这个父亲是一个柬埔寨华裔，寄居法国，这就让我想到了高棉屠杀事件。于是我向她讲了一点这个“历史”，在柬埔寨发生的事件，这是在1975到1978年间红色高棉当政的时期……她没做任何评论，默默不语。但这是第一次，沉默变得与以往不同，如果要我说的话，这次它获得了生命。对于维尔吉尼来说这段柬埔寨的历史联系到的是她父亲的历史。一段被遗忘和被重建的历史事实摆在那里。在这里压抑不是由遗忘构成，而是由传递的断裂构成，父女的关系建立在这个断裂之上。我这次对高棉屠杀的提起，解除了关于父亲的创伤的沉默。这次，传递变得可能，变得被符号化。某个致命的重复的东西得以休止。

她开始在网上搜索关于红色高棉的信息。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去向父亲询问。这个男人感到惊讶、困惑，然而因为自己的一个孩子以这种方式走近了他而感到了宽慰。他于是告诉了她，自己的父母亲在屠杀初期攒了所需的钱，让最大的两个儿子逃往法国。一去不返！她母亲和几个表兄妹幸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全部死亡。

跟她父亲一起，通过编织这个故事，她因此也解除了父亲的沉默，实施了一次不同世界的分离（生者和死者之间，家庭与作为主体的她之间……）。她因此能够把自己定位为这个男人的女儿，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母亲的女儿。通过这种方式，她的历史篇章得以流动起来，过上她作为青少年的生活，从此能以自己的名义去言说。

跟青少年工作，我们经常需要做的是认出：在痛苦的中心，常常存在着死胡同、来自于彼处的异化，它们加诸于他们的精神生活，就像鬼魂一样。米歇尔·蒙特雷（Michèle Montrelay）在她的工作中提出了以下看法：“这样，无意识对它的继承者来说变得透明。并不是因为高兴，它才存在，才到处传递。我们经常在治疗中这样解释。恰是因为痛苦、焦虑、孩子的死亡、灾难、乱伦，这些所有处于言语之外的东西，僵化在了铅一样的沉默中。如果这个继承在一开始没有处理，它将直接反映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并不是说维尔吉尼在之中生存，而是它就是属于她的。

在讲述的过程中你们也许已经察觉到了，我在跟维尔吉尼的工作中，并没有去收敛对沉默的利用。在跟青少年的工作中，这并不是一个很正统的工作方式。我们要去讲些什么呢？在这种规律的和沉默的面对面的工作中，它也许就可能就变成了工作的杀手。在跟某些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有必要去讲讲自己的能指。跟维尔吉尼的分析就是这样，我在“对上”这个词上面做了一个双关语的游戏，尽管在她的言说中没有什么理由让我这么做，但对她来说，某个东西却因此而开启了。也许，这里面存在着暗示的成分！然而这个时期的青少年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如果“铅砂掺不进金子”的话，他们就举步维艰。这个比喻是弗洛伊德在描述精神分析的工作的时候说的。

同样的情况。在这个工作中，我建议的另一个能指是跟父亲相关的。对我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符号化呈现出某种缺乏，那儿留下了一个空白，正是在其中缺失打开了朝向欲望的道路。

参考书目：

弗洛伊德：《癔症研究》(1895)。

《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1913)。

拉康：《文集》(1966)，“言语和语言的功能和领域”(1953)。

Montrelay M.：《阴影的意义》。

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



男性与父性专题



男性与父性

莫妮克·特科 / 著

罗正杰 / 译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们，成都小组为这次的研讨会所找的主题非常有意义，我们在成都的学生、现在在巴黎的人和法国分析家之间，花了数月时间对这个主题进行了有效的交流。这种对相遇的准备可以为称为“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通讯会员”的团体提供现实性和稳定性，并且为我们的共同引证以及我们的差异提供对照，而事实上这些对照的内容相当丰富。

我们不知不觉地、有意无意地多次将“男性与父性”这个标题，说或写成了“父性与男性”，而这扰乱了我们思考的习惯。显然，使其中某一个处于主要能指的位置，会带来不同的制作工作，但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在这里展开。是什么衔接了男性与父性，或者说什么能够支撑我们思考这两者的分离，这是卢梭的报告所针对的内容，它们对我们而言既不熟悉也不轻松。我们很期待未来几天中我们的工作与我们成都同事的工作的对质和交流。

关于会议的标题，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将简要地与你们分享一段简短的个人经验。在发出这篇文章去翻译的同时，我重读了与霍大同交流的那些邮件，这些邮件都是关于我们将要提出的这个主题的问题，邮件里的命名更多是“父性与男性”，于是我很焦急，因为我错给了巴黎同事“男性与父性”的标题。在过失和遗忘之间，这个我看作是错误的

东西让我立即想起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关于雅典卫城的记忆混乱”——在这个文本里，他自己分析了一个类似的经历，他将之联系于他与自己父亲的关系，以及儿子超越父亲之困难。至于我，在写这个前言时，显然这个混乱的时刻以及我曾遇到的相关困惑的时刻，让我返回到我父亲那里，特别是已过去两年多的他那突然的死亡那里。因而这个已渗透我的想法被证实了，在强烈的石祖中心主义家庭的构成基础上，我从这个父亲的女性部分那儿得到了我无意识的爱，可能还有我的分析家的命运。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如同双性恋那样，男性和女性并没有直接地以男人/女人或父亲/母亲来编排，并且一个女孩可能有其父亲的女性特征，一些男孩有时也能在他们母亲身上（像在父亲身上一样），发现他们的男性能指。

也许在那里我走得快了些。从以下想法出发，我将首先进入我们工作的主题：如果父性首先与指定有关，那么这个指定需要母亲方面的一个动作，即通过给孩子一个父亲，她将自己的阉割作为礼物给了孩子。这个礼物更经常地在家庭中或是在母亲和孩子间悄悄实现，但有时也在分析的工作中实现。分析家见证了它对孩子的焦虑及症状的巨大影响。

在这里，我想起一个由于转到借宿学校而与母亲分离的小男孩。令人担忧的是他缺乏孩子气、明显地拒绝生活，这尤其表达在他死一般的苍白当中。很长时间里，儿科医生和我在我们会诊的框架下接待他，我们认为他与母亲的分离让他没了生命。我们并非全错，但所涉及的不是这样实际的分离，而是缺少允许这个孩子将此分离进行符号化的基本要素。在一系列的分析中，母亲终于详细地讲述了她所感到的辛酸以及想要放弃的想法——在她每次想到孩子的生父在孩子出生的时刻抛弃了他时。这让她成功地说出她的儿子没有父亲。当分析的工作允许她为了孩子而命名他的生父时，这个男孩成为了话语的孩子，尽管他一直与他的母亲分离并且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的父亲，但他终于能够定居在他的生

命中。

即使这个礼物没有以明确的方式被送出，但母亲已经在她与孩子之间凿出了语言的间隙，主体因此能在能指的关系中找到父性隐喻的书写。我想到在一个女分析者治疗的某个时刻。鉴于她的历史，我让“丢失”（perdu）这个能指产生回响。与之对应的是“债务父亲”（père dû）这个形象，这个形象纠缠着她爱情的失败和她的女人生活的深不见底的痛苦。她的父亲通过其“坏男孩”的特点和他外在的光辉地位制作了一个可欲望的但不承认她的男人形象。她的继父只有痕迹淡薄的父性，且其男性性因为可怕的外婆而消失殆尽。在一个父亲和一个继父之间，这个女分析者将这两个父性形象的能指都寄托在她的爱中：一个是男性特征的携带者，由于他的缺席而被理想化；另一个形象像男人也像养父一样，被缩减到微不足道。尽管，这个父性被破坏，这个女人却懂得用她对语言的爱来制作父性的隐喻，这在其职业活动中给了她一个显著的才能。在她的治疗中正是这个同样的语言的爱让她能超越父性的所指，允许她在分析中灵活地玩弄父亲的能指（p..）、（per）、（pair）、（paire）等等……，我还要说的是我们开始在一起围绕这个能指做游戏，以使她与男人的联系以及她的痛苦强度能够有所改变。

我与你们分享这些临床的证据，因为我认为他们的症状正是围绕这个“债务的”父亲并作为他们生存的可能性而被建立起来的，事实是，只有在话语中或语言中，有关“父亲”的东西才被给予他们。通过一位并不承认他的父亲取得进展是不容易的。这个小男孩的工作使我发现，对生活的阻碍不是分离而是符号化的缺失，一个或一些父姓给了可以符号化的途径。那位女分析者，从没有停止过试图通过其症状或者通过痛苦来表达，她到底多么缺少一个被母亲承认的男人的爱，这个男人爱拥有女儿身份的她，并同时通过把他的姓给她而为她承担其父性，也就是说通过说她是“他的”女儿。在比那些男人还男人的“女强人”的这个谱系中，她还缺少的是，在她的男性性中留个位置给某个男人，这就可以给其女性性以机会。

一个“债务的”父亲表现为一个典型的请求：爱的请求和认识的请求。然而整个分析的工作在于“父亲”在主体所凿开的这个间隙、这个缺失中给欲望着的主体他的位置。在主体的方面，这个请求可能形成症状，尤其是癔症症状——其原因与其它的石祖追回形式相同。然而，如果“父亲”没有来为母亲和孩子登记这个缺失，那么主体回应了结构的问题，却不能回应进入语言也无法回应进入欲望的问题。

在母亲的完备性之中，父性首先与间隙差异有关，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退缩。隐喻的作用是用来登录石祖的，它如同缺失的能指。然而，父亲的在场或缺席、这个男人承担而不认同于这个功能、以及他如何具有其男性性、对其女伴来说其男性性是或不是欲望客体，这些都将不仅给予神经症甚至倒错者以形式，还将扭曲一个男孩可能将构建和维持其男性性的方式，这是我们此次相遇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是阿苏女士的工作所带给我们的。

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的名言“身体结构，即命运”。莫妮克·施耐德报告同样由这句名言开始。这句话很明白，而且整个弗洛伊德的建构就是在说，生为一个男孩或女孩对于确定是男人或女人是不够的，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在一个被给定的普遍文化中，性别的认同是通过对阉割的制作而得以构建的。对于一个女孩而言，其与阉割的关系中的一部分能够在母性中找到解决办法，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同，但在这个“被完全描划的女性性命运”的领域中，我并没有完全遵循他。

这不是对称地思考从男性到父性的关系的问题，而更多的是思量从哪些因素出发，父性具有了男性性的命运的形式，或者换个说法，在哪些条件下男孩的俄狄浦斯问题让他不仅仅成为一个男人，而且也同样在对自己父亲的认同和与其关系的解结之间具有了父性。

在《可结束的和不可结束的分析》文本的最后几页中，弗洛伊德指出，一个男人的分析的不可逾越的点——如同一墩原岩——即所谓生物性地“反抗他相对于另一个男人的被动的或女性的位置”，或者引用阿德勒的术语即“男性抗议”。另外，他很恰当地命名了这个请求，我在

这里并不将其称为分析的不可逾越的墩，而称之为症状，即一个男人接受他被动的或女性的一部分的不可能性。然而，如果这个离开其受伤的或叛逆的儿子位置的男人，能平静地接受社会关系所涉及的同性恋部分，能够在与女人的女性性相遇时不会有太多恐惧，也能够足够地占据他父亲的位置，这个代价并不过分不是吗？一个温暖的父性，一个合适的距离，这正是吉·丹纳的主题，在一个临床片段中，当父性的意象成了暴君的形象时，他让我们理解：为何给予作为阉割代理者的想象父亲过于强大的位置会导致不可终结的分析。

成为父亲，将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男人在面对父性时会退却，或者他们的同意仅仅是为了爱一个向他们请求成为母亲的女人。菲利普·瓦伦将从他的一个病人的梦出发，让我们理解在转移中，这个病人如何从其相对于妻子及父亲的位置的改变开始，能够承担起他的父性……。如果一个男人仅仅靠其阉割来支撑他欲望者的身份，那么对于成为父亲的人来说，这个阉割就将产生回响，就在小男孩必须放弃形成他的母性能力，以便进入到他的男性性的时候。母性在其肉体力量中最为经常地表现为一部分女性性的自然实现，而同样肉身化的父性，在这个生命起源的性交中，相对于身体的实在却表现为一个丢失、一个生育，符号化为一个传递和债务的问题，这正是理查德·阿彼波的工作所强调的。

传递和债务的问题也许不仅仅是男性权力的成果和信号，因为对于男人而言，孩子有时候成为了他的爱的客体直至形成一种近乎激情的关系，成为了他的自恋的延伸。作为他的谱系和姓氏的可能持有者的一员，孩子也许是抵御死亡的城墙，这比对一个女人而言更甚。总之，如同弗洛伊德提醒的那样，这正是恋童癖的全部问题，他是“爱若的客体”。

在拉康的RSI讨论班期间，他给我们留下了以下评注：“一个父亲不享有尊重或爱的权利，除非是在所谓的爱、所谓的尊重被指向‘债务父亲’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变成引起他欲望的客体……”这个评注难道不让我们想到：对于一个男人而言，父性能成为他的性欲望

的隐喻，同样，拉康谈论的母性，对于男人而言，如同一个女人的爱的隐喻？

为了给报告和讨论留下时间，我就以以上内容结束我的开幕词。

男性身体：一种文化的产物？

莫妮克·施耐德^① / 著

石岩 / 译

【内容提要】弗洛伊德以仅仅在男性身体上出现的“部分”——阴茎来定义男性。男性的定义虽然确与生殖力相关，但更多却与权力领域有关。在男性与女性身体上，因血液流动而导致的器官形变本质上并无区别，女性也同样拥有生殖力。割礼、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对男性的描述也暗示着男性身体的确立是基于文化中男性更接近于权力的能力，而非基于男性的身体结构。

【关键词】男性身体 性器官 能力 文化解读

通过把身体结构假定为命运——弗洛伊德模仿拿破仑写出“身体结构，就是命运”——弗洛伊德似乎创立了一种建立在客观性之上的方法。身体本身成为了指挥。我们马上就能注意到，这个身体并非是指其整体性，而是指其诸多标志。有一个仅仅在男性身体上出现的“部分”——阴茎——被赋予特殊意义。女性没有因身体的某个特殊之处被定义，而是因其在与男性身体的对比中的缺失而被定义。在《精神分析纲要》中，弗洛伊德增加了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在遭遇阉割威胁并“看见”女人性器官的情况下，男孩会确信女人的缺失，“这个性器官竟然真的缺少最有

^① 法国精神病学家。

价值的一个部分”。^①弗洛伊德认为，这一知识的获得对男孩来说是“他幼小生命的最大创伤。”

忽略睾丸

当对一个知识的获得发生在创伤深处时，它会伴随着失明现象。孩子描述其性器官中对他来说最为重要之物的方式让弗洛伊德感到非常惊奇：

“此外，令人惊奇的是男性生殖器的另一部分，即阴囊及其内容物引起孩子那么少的注意。根据那些分析，人们根本不会猜测除了阴茎之外，男性生殖器官还包含什么东西。”^②

因此，弗洛伊德想确定男性或女性优势与哪种身体结构有关：是医学学习时教给他的身体结构还是在倾听病人时听到的他们描绘的身体结构？在《幼儿性理论》中，他考虑了儿童或青少年对一些术语的注意所引起的问题，这些术语既与性器官的身体结构有关，也与生理学所关心的隐喻有关。它是被家庭语言的固有幻想所支配的生理学：

“一个小女孩听到同学说，一位丈夫给了他妻子一个蛋 (Ei)，她在肚子里把它孵了出来。听到这个说法的另一个男孩把这个“蛋”当成了俚语中指睾丸的词，他就绞尽脑汁地想知道阴囊里的东西是怎样不断再生的。”^③

毫无疑问，把引用的这两段话联系起来会清楚些：可能是为了避免“蛋”所带来的危险——经常消失却又再生的危险，因此弗洛伊德才倾向选择阴茎作为男性优越性的唯一代表。

与拥有睾丸连在一起的危险与自我获得权力不相关，而与生殖领域相关。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与变得有男子气相连，一种功能是个体

① *Abrégé de psychanalyse*, Paris, PUF, 1967, p.62. *GW XVII*, S. Fischer Verlag, 1941, p.116.

② *L' Organisation génitale infantile*, in *La Vie sexuelle*, Paris, PUF, 1969, p.26. *G.W.*, VII, p.187.

③ In *La Vie sexuelle*, *op.cit.*, *ibid.*

提升在群体或城市的地位以便获得权力；另一种功能与生殖力有关，且通向父性性。不同语言的特定词汇常常将两种功能分割开来。拉丁语就是如此，它给予 *pater* 一个与法语词“父亲”类似的含义，用其复数 *patres* 表示行使政治功能的“元老院议员们”。当男人承担生殖功能，是生殖功能的承载者时，他们则令人惊讶地被命名为 *proletarii*。阿兰·雷伊在他的《法语历史词典》中引用奥古斯丁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个名称：“负责生孩子的无产者（*prolétaire*）”；“无产者”实际上和“多产的”（*prolifique*）有相同的词根。

这就分化出两种男性性的观点，一种被附属在政治权力的角度上，允许男人们获得移归给 *patres* 的尊严；另一种被限制于在社会空间中占据更低位置。被赋予第二类侨民的只有生命的权力，在迪梅齐于印欧文明中遇到的教士、战士、生产者三等级制度中，他们处于底部。一个巨大的差距分隔开了被交给第一等级的垂直性与倾向于土地的态度，土地被留给了生产者，或奥古斯丁所说的“无产者”^①。弗朗索瓦丝·埃里捷^②提出分隔开秩序领域和生命领域的区分标准，以此来部分地思考这个与生殖天赋相连的等级功能：

“因此，不是性器官，而是生殖力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做出了实在的区分，而男性的统治……从根本上是当女性受孕时对女性生殖力的控制、占有。”^③

同时一个假设出现了，它既建立在生物学领域之上，同时又产生了要处于政治-社会领域的呼唤：

“埃里捷写道，女人有生殖力、有创造力、创造生命；相反，宣布秩序、规定界限、决定身份、参与政治被看作是男人的权限。”^④

①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当时确实战火四起，由于缺乏兵员，他们把无产者招募入伍，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人穷得买不起武器装备，因此倒有闲暇生儿育女。”——译者注

② Françoise Héritier, 1933 年出生，法国人类学家，她被列维-斯特劳斯视为其接班人。——译者注

③ *Masculin/Féminin. La pensée de la différence*, Paris, Odile Jacob, 1996, p.230.

④ *ibid.* p.230-231.

当拉康提出“父亲的法律”的理论时，难道他不是重拾灵肉二元来作为性差异的基础吗？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提出一种相似的二分。他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翻转”——基于一个“决定”——的假设，把父性性安置在 Geistige（理智的、精神的）秩序中，并把母性性放在 Sinnliche（感觉的、感性的）领域。^①

男性之谜

尽管弗洛伊德在他生命的某一时刻的确同意了两性差异的社会化概念，他仍然质问从截然区别出发的二元思维的正确性——我在《男性谱系学^②》中将之称为“双刃逻辑”。他谨慎地对二元模型进行质问；把他的兴趣指向男性特权与一个秘密策略有关的情况。

弗洛伊德在《论自恋：导论》中就问及了阴茎的外表和国王权杖的外形——在埃里捷的评论中，这个外形铭刻了男性与政治的同源——之间形象的相似关系。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论及对于疾病所引起的变化的研究时，有一段话中加入了对于勃起特点的一个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特别敏感的器官的外形会产生某种变化——处在兴奋状态中的生殖器，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这时它充血 (blutdurchströmt, 字面上是“有血流通过”)、肿胀、湿润，集中了多种感觉。”^③

对“血”的“流动”的强调使男性的勃起与女性的表现（同样是出血）之间有了联系；因此差别在外部是女性出血的情况，在内部是在皮肤下面的“血流”。

男性不但一上来就强制规定了他与女性方式的不同，而且，在涉及勃起的问题上，人们也看到它与女性诸多变化的结合。弗洛伊德报告的“伟大成就”^④的梦就是如此，它把勃起和女人分娩联系起来：

① Freud, *L'Homme Moïse et la religion monothéiste*, Paris, Gallimard, 1986, p.218.

② Monique Schneider, *Généalogie du masculin*, Paris, Aubier 2000 et Flammarion, 2006.

③ « Pour introduire le narcissisme », in *La Vie sexuelle*, Paris, PUF, 1960, p.90.

④ “成就”德语为 Leistung, “木条”德语为 Leiste, Leiste 也指腹股沟。——译者注

“这位男士梦见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他是一个孕妇。这种处境让他觉得很难受……。床后挂着一幅地图，地图的下沿由一根木条 (Holzleiste) 撑开。他抓住木条的两端把它扯下来，结果木条没有碎，而是沿着长的一边裂成两半。这样，他感到轻松了，并且帮他分娩了。”^①

尽管在梦的书写中男性性被放在开头，即梦的叙述从“Der männliche Traümer”（雄性梦者或男性梦者）开始，可是这个男性性一上来就受到威胁，因为这个梦者梦见自己是“怀孕的女人”。梦者自己给出的解释无疑构成了一种企图，即企图通过在两种位置间插入一个时间上的分隔——与通往自由之路的第一个阶段有关的怀孕——来使自己安心。这个“伟大成就”与可以摆脱这个位置的事连在一起，它被理解为单纯的途径：“他将扯裂木条解释为一个伟大成就，多亏它他才通过脱离女性位置而从难受的处境中（在治疗中）被解救出来。”按照这种解读，在他背后有一个“女性位置”的危险。他被视为被从这个危险中“解救”出来。

然而如果我们注意梦的叙述的最后几个词——“帮他分娩了”，那么另外一种解读也是可能的。德语给出了一个不确定：“er hat ... die Geburt befördert”。Geburt 这个词同时指出生和分娩。如果强调这一点，“雄性梦者”就被认为经历了通常的性别分工中属于女性的一种体验。注意弗洛伊德报告梦的这一段，这个梦可能迫使我们回到可以命名为男性性的狭义理论的问题上；这种理论不接受男性与女性的标记之间有重叠。弗洛伊德的一个弟子费伦齐摆脱了这个理论规定，并把勃起视为从男人的性器官中产生出来的权力。就此，我们看到用于指示性差异的标记有一种交错。如果我们注意梦的下文，其它地方也显露出这样一种交错：

“这一荒谬细节——木条不仅裂开，而且还是沿着长的一边裂开——找到了解释：梦者回忆起双倍和破坏的联结包含着一种阉割的暗示。梦经常通过在与欲望相反的意义上展开异常命题——手中握着两个阴茎的

^① *L'Interprétation du rêve*, Paris, PUF, 1957, p.352-353. SA p.401. Analysé par M.Schneider, *Généalogie du masculin*, op.cit. p.161-167.

象征——来表现阉割。”^①

弗洛伊德提出的解释带来一条可以着手调查的线索；此外这也和弗洛伊德与弗利斯之间发生的讨论有关，后者见证了精神分析的建立。两人在研究双性性欲时都遇到了身体的雌雄两部分相互之间是否对称、身体组织是否基于双倍结构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引发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弗利斯考虑到身体的对称而选择了双性性，且延伸至双侧性，而弗洛伊德则拒绝把双倍原则用于男性。对他来说，只有女性身体是由对称原则所标定的。

恰好，在一次研讨会上，弗朗索瓦丝·埃里捷提出了与我刚才提到的“伟大成就”之梦的思考有关的一个解释。通过强调突然发生于阴茎的分裂的空间安排——一个“沿着长的一边裂成两半”的阴茎，她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梦和她在某些部落中遇到的习俗（割阳^②）有相似之处：为了有生育资格，这些男人必须要在阴茎上割一刀，好像生育的权力需要某种“柔弱”（effémination）。这个词是我从列维纳斯那里借来的，他假设在男性那里，伦理的获得建立在一个开口之上——从母“腹”出发而被隐喻化的东西的开口。

文化模式的交错

意识形态产生于各种文化，如果不凸显性别差异对源于意识形态的律令的依靠，我们能否理解性别差异？毫无疑问西方世界不常采用割阳仪式并非偶然，而这个仪式根本上是为了宣扬统治和征服的价值。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为出发点组织起来的整个人类学都走到怀疑西方仪式的霸权的地步。在这些仪式以“吐人癖”^③（anthropémie，源自希腊词 émein, 吐、呕吐）为基础的情况下，这位人种志学者把它们看成是“野

① Ibid. p.353.

② 割礼分为割阳（Subincision）与割阴（Clitoridectomie）。——译者注

③ Anthropémie 与 anthropophagie（食人癖）相对立，指用驱逐敌人来取代纳入敌人。故译为“吐人癖”。——译者注

蛮的”。

对差别的热衷不仅仅导致女性与男性分离，而且也导致在两性各自内部建立了定义明确的条条框框。按照杜梅齐尔^①的观点，与权力领域相关的诸多功能对应着最大的价值，而与生殖力相关的东西则都藏在底层，即生产者阶层。看起来，在这个暂时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对两性代表之物的破译之间可以建立起对应关系。历史学家的工作证实了每种性别的目的性具有多样性这个假设。在《骑士、妇女与教士》一书中，乔治·杜比^②曾指出三功能模式是怎样在中世纪运作的。我们知道，在父系体制下长子继承遗产，长子也被视为承担父亲道德遗产的人。其他的儿子，按其地位而被引导成为军人或圣职者，而教士被剥夺拥有女人的权利。杜比在天主教教士的禁欲责任和由教士负责颁布关于婚姻合法或非非法的法令——为避免骑士与妇女的婚姻遭遇乱伦的危险而需要禁止多少代内通婚——这个事实之间做了一个连接。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给予归属于男性的这个功能或诸多功能以普遍价值。在许多时期，在与“秩序”的必要性有关的男性解读与重视生殖力维度的另一个解读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在杜比所做的研究中，生殖力也被给予妇女，她们来到了先前被留给生产者的位置上。

此外，通过强调米诺安——迈锡尼时代伟大母神——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思考了历史改写的可能性。另外，难道仅仅是在女性的领域内我们才能发掘出曾作为文化压抑之客体的外形或功能吗？在我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里，我想要致力于研究男性的柏拉图式表象的丰富性。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假设有一个造物者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关于这篇文章只有如下的描述：女人的身体内关有一个无法找到出路的“野兽”（zoon），并且它会爬到喉部而引起歇斯底里。后继者极其

① 乔治·杜梅齐尔（1898—1988年），致力于研究印欧宗教神话系统，其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在于成功地发现了印-欧神话系统的“三功能结构”，即神职人员、战士、农业人员-手工劳动者。它们是王权、精力、丰产力三个因素的代表。——译者注

② 乔治·杜比（1919—1996年），研究中世纪社会与经济的著名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领袖人物。——译者注

精心地保留被关在和兽性关系中的女性这个概念，而男人被许给与灵魂有关的更高尚的功能。拉伯雷说实际上这个野兽在身体上表现出刺痒和颤抖，而在男人身上就没有这个野兽；在谈论女人的时候，他引用柏拉图的著作对隆迪比利斯说：“因为大自然在她们体内隐秘的地方放了一个野兽，而男人没有。”^①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当我重读柏拉图的文本时，我看到了一个惊人的关于男性的图像。男性与女性的差别正好在于男性拥有女人所缺少的东西，而这篇文章把这个东西定位于膀胱附近：

“正是这个出口，（神）通过一个洞使之与精华相遇，从前我们把这种精华称为‘种子’。这种精华具有灵魂，它找到一个空隙，因喷射的急迫渴望，它从这个空隙处流出，从而引起生殖欲望。这就是为什么，男人身上这一（性的）部位的本性是一个一意孤行的存在，是一种根本不听从理性（logos）的野兽，而它的那些被激起的渴望促使它想要支配一切。”^②

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男性结构中权力嗜好的一种关联，然而对权力的这种热情被视为是不理智的，是“对理性的违背”。与法国中世纪所出现的分配法相反，对权力的定位并不是不能与“生殖欲望”并存的。

尽管希腊文化是法国标准分配的起源之一，损失还是发生了，这个损失影响了男性一极。在基督教中我们可以看到，由教父们体系化的、更加禁欲的分配的开始。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把男性阴茎疲软的时刻解释为原罪的后果：亚当由于吃了夏娃给他的苹果而“不服从”，所以他的性器官就不顺从他：“不服从是对不服从的惩罚。”^③奥古斯丁补充道，“在犯下不服从的罪行之前并非如此。”在伊甸园时，男性器官被假设为能够服从其合法所有者：

① Rabelais,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1994, p.453.

② *Timée*, 91,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t.II, trad. L.Robin, Paris, Gallimard, La Pléiade, 1943, p.522.

③ Saint Augustin, *La Cité de Dieu*, vol.2,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4, p.177.

“意志得到了身体的所有肢体的忠实侍奉。为了最终的使命而被创造出来的身体器官会对着自然领域播种，如用手在地里播撒种子。”^①

成为“幕布遮盖的秘密”的，正是性器官对其主人的不顺从这个耻辱。柏拉图强调男性器官的突然竖起，与柏拉图的文章相反，在这里放在第一位的是无法控制的突然疲软。

在此我们看到了文化解读的多样性，尽管这些解读常常强调男性器官的不顺从。我现在对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做一个简述，以便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它讲的是“道教体系中的师父们”，其中就有老子。他能做到不提高唯意志论的地位，这是他思想中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无为并不是强迫人类与有为之物保持距离。其重点在于不要把唯意志的和程序性的过程当作行为准则。由此在（身体的或精神的）行为与建立在服从某个师父的基础上的过程之间有了一个区分。这样就有了一个与掌控模式的距离。

同样地，弗洛伊德想要在投入到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人身上实现的掌控理想，难道不是一种部分的解放吗？这建立在两种存在——反思的存在，和试图注意他脑中浮现出来的思想的存在——之间的可见差异上：

“在这两种情况下，必然都要集中注意力，但是除此之外，反思还要有批判，在察觉到一些思想后，批判会使他排斥其中一些……自我观察者只需要去抑制这个批判功能而已。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许多用批判方法无法捕捉到的思想就会进入他的意识。”^②

分析工作正是在这些“无意思考”的基础上工作的。因此就需要使所有唯意识程序都想要压制的一系列思维再现，并打开通往“无意”的道路。如果我们将特权赋予以控制为中心的男性概念，那么我们就是逼迫自己完全不考虑男性能力所勾勒出来的某个维度。在《治疗的开始》（*Zur Einleitung der Behandlung*, 1913）的诸多法译本之一中被擦去的一个权力是：

① *ibid.* p.185.

② *L'Interprétation du rêve*, Paris, PUF, 2003, p.136-137.

“分析家对症状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性能力相比；最强大的、可以创造一个完整孩子的男人不能在女性身体内只创造一个脑袋、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他也不可能选择孩子的性别。他可以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启动一个极端复杂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孩子与母亲分离。”^①

奇怪的是法译本没有提及受精关系中的男性。在“性能力”那里，德语版是 männliche Potenz，指的是“男性性能力”。难道这对应着“遮蔽”这种能力，就像在奥古斯丁那里那样？如果我们注意到在法语中“能力”一词，与一个男性存在联系起来的时候仅仅指社会能力这个事实，我们就明白了翻译的困难所在。为了让“能力”和性效能有关，就有了一个否定性中介；我们称为“无能”，一个男人无法实现其性效能。Bertaux-Lepointe 词典将“potent”译为“非性无能者”。后来拉康还给法语增添了一个外来词“potent”，来填补我们语言在这方面的空白。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德语词“Potenz”的翻译前面停下了；因为如果我们继续遵循德语的用法，男性性能力就要被命名为“Potence”（绞架）了。这个能指遇到的怪事只能解释为要通过参照规则来定位父性功能，而不是参照肉体领域，肉体领域则会被留给作为接替拉丁词“proletarus”的“生育者”（géniteur）。

在这个角度看来，谈论性器官的这些词不仅仅具有指称的权力，也有解释的权力。它们既要撤职，又要提拔。

^① « Le début du trait », in *La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 Paris, PUF, 1953, 2004, p.89. *GW VIII*, p.463.

当前男性性的坍塌？ 对父性的影响是什么？

弗雷德·卢梭^① / 著

陶杏华 / 译

【内容提要】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以来的几十年来，产生了“男性性的危机”这样一个社会学概念，越来越多的父亲以接近于母亲的方式对待孩子，许多人从中看到了男性的解体，甚至父性的坍塌。之所以存在着这个危机，是因为女性性是基本的，而男性性则需要习得，并需要被自身很好地承接；女性解放运动虽然合理，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男人与女人的相互混淆，两种性别之间的张力被弱化了。

【关键词】男性性 坍塌 父性 张力

目前流行说男人过得不好。男性的瓦解是以一种现实现象，还是一种纯粹意识形态上的构建？“男性性的危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描述西方男人几十年来（尤其是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以来）所经历的各种讨论与怀疑。这些运动导致了男性个体的社会角色的辩证的再次定义，它源自一种与男子特征和父性相关标准的演变。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病人那里被听到：它是主体的疾病？还是被媒体所转播的社会问题的反映？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巴黎第八大学心理学副教授。

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合（即使现实中的男人有时被缩减为冻粒子）。^①这是一个我们不能排除的事实。我们拥有父母其中之一的性别，这个事实对我们的发展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必须使之成为独特制作的对象。

然而，在近几十年中，人们看到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的位置变化。越来越多的父亲从孩子出生起就以一种等同于母亲照顾孩子的方式参与到对孩子的照料之中，有时还带着母亲的女性特征。在这些情况下，被弗洛伊德（同样也被克莱因、伍林科特等）援引的“母亲般的照料”这一概念如今应被叫作“母亲般及父亲般的照料”。许多人在那里已经看到了一种男性的解体，甚至是父性的坍塌。

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似乎丝毫没有减弱父亲在其作为法律组织者、发起者和代表者的角色中的符号性父亲的重要性，也没有减弱其在父姓方面所起的作用。与符号性父亲的较量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它可能以一种对主体的精神组织而言绝对关键的经验系列而出现。

当然，越来越可能的是，现实的父亲并不在，这或者是因为他被母亲故意排除掉了，或者是因为他事实上消失了。尽管如此，发展还是在进行着：主体会利用现实中家庭（以及/或者机构中）的不同的父性替代者，这将允许他努力捍卫符号父亲的位置。

从这些评论出发，我们可以询问男性和父性是怎样围绕着父性功能进行联结的，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父亲的位置是怎样的。

弗洛伊德最早对原始父亲在与儿子的关系中的无限制的暴力感兴趣，他用清晰的术语提出了性别差异和性化身份的问题。但是，其理论（多次核查和修改）尽管非常严谨的，却从一开始就激起了许多争论并使得精神分析家们分道扬镳。

对弗洛伊德来说，人类性欲是一种精神上的性欲——在那里，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相连、相对及相错，这构成了精神上的双性欲，并随着

^① 指男人的冷冻精液，比如通过精子银行，人工授精。——译者注

俄狄浦斯组织期达到顶峰。

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仅仅在发展完成了，到了青春期，性的极性才与男性和女性的极性相一致。他写道：“在肛门施虐的前生殖组织阶段，男性和女性尚未成为一个问题，占主导的是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对立。在接下来的阶段，即幼儿生殖组织阶段，存在着一个男性而非女性；对立在这里出现：男性生殖器官或是被阉割的生殖器官。仅仅在发展完成了，到了青春期，性的极性才与男性和女性相一致。^①”

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男性集主体、主动性和拥有阴茎于一身；女性则延续着客体与被动性。作为阴茎的逻辑产物而获得其价值的阴道，则继承了母亲乳房的遗产。

男性的危机？

当代的研究处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中：它着眼于男性性从社会中得以产生的方式。绝大部分作者认为，男性性是一种社会学习的产物。这种社会学习、社会化建立在朱迪斯·布雷（2006年）以彻底的社会结构主义视角称为“种类的操演”的东西的基础上：根据她的观点，“陈述”和日常行为的重复将会导致种类，即使这种操演是建立在某些约束它的规范之上。“在社会中，不存在着逃脱种类标准的东西。”当男人以重复的方式表现为灵活、严厉、情感的禁欲主义、克制和异性性爱等等时，这些人就被认为是“正常的”。重复是关键。以脆弱和短暂的方式被构建的同一性理应被重复，以便加强。

这种思考对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在角色和任务分配演变中起作用提出了疑问。性别定义的逻辑是：男人是因为他们做什么被称为男人，女人是因为她们是什么人而被称为女人。

或者，换一种说法，女性的身份是一个“底基”，男性性则总是要

① S. FREUD, “L’organisation sexuelle infantile”, in *La vie sexuelle*, Puf, 1970.

去获得的。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不能支撑其男性性的男人总被认为是“娘娘腔”，而不能支撑其“女性性”的女人被认为是“幼稚的”……

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强调说，男性性和女性性不能被分开来考虑，即使对他来说女性性似乎是首位的。根据这位研究者的观点，男性首先因为处于女性的对立面而得以构建和表达：“男子气概……完完全全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它面对女性性而构建，对于另外一些男人来说，它是通过反对女性性而构建，他们处在一种对女性的害怕中，并且首先是对自身的害怕。”（布迪厄，1998）^①布迪厄谈到了一种男孩们的“身心工作”，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剥离那些仍然留在他们身上的女性部分而使自身男性化。

我们参与了男性与女性边界的可能移置。

与丹尼尔·马赛里一起，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构成病理的更多的是男性的条件。总而言之，对我来说，当今的社会模式激化了他们的行为、感觉（牺牲情感）、对自身及对客体的控制、对胜利的竞争的意识观念，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男性个体采用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他们如上瘾般地封闭在一种病理行为中，如同对假定的男性价值的蹩脚模仿。”^②

大家很容易理解，我们曾经在之前的一个会议中^③谈到过的女性修改，它将会修改男性的建构。

这是否意味着，女人获得自由就必然会导致男人的疾病？这对我们而言似乎没有任何必然的性质。女人获得自由也同样让男人获得自由。事实上，她们为平等而战同样使得男人不仅仅拥有与孩子的另一种关系，而且也拥有与他们的感觉及其职业生活的另一关系。

但是如果相反，人们认为女人权利的推进打碎的是男人妄自尊大的

① P. Bourdieu, *La domination masculin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② Marcell Daniel, « Garçons/filles. La différence des sexes, une question de physiologie ou de culture ? » In *Adolescence*, N° 60.

③ F. Rousseau, «Vers un féminin au delà de la maternité», Colloque de Chengdu, Avril 2007.

位置（可能是构成了“家长制”之本质的东西），那么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某些人的疾病：他们失去了“男性特权”的部分，这让他们抵御女性。

男性性和父性是两个概念，它们相互吸引，但是不能混淆一谈。很明显，在父性之外还存在着男性性。可能的是，存在着没有男性（特征）的父性：父性的女性性有待研究。^①

当今父性是什么？

父性只有符号的保证，母性却有生物学的保证。在某些社会中，我们知道，舅舅起着父亲的作用。与拉康一起，我们区分三个父亲：实在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通过定义，他并不是确定的）；符号的，他正是法律的捍卫者；想象的，他是家庭故事的父亲，是父亲（同时也是母亲和孩子）的幻想性投射。通常，这三个父亲仅仅是一个人，即使每个维度能被区分。父亲是把这三个维度联结成一个独特整体的结点，这个整体保证了父性功能的一种重要性：它超越了纯粹的生殖功能，超越了个体维度，从而成为文化和社会的能指。正是这个结点赋予了父亲以坚固性及其效力。

理解这点将允许我们表明，“父性是被经历、被表现和被建构的东西”：因此，父性更多地是从一个社会学命题而不是从个人本身的角度被定义的。此外，父性停留在想象的或者未知当中的危险，如果它没有被命名为一个“第三方机构”的话：这个第三方机构最经常地会是母亲或者制度和科学（DNA 测试）。

因此，父性的位置必然在一个陈述的过程中被反复提到：对父性的认识不仅仅是一个 DNA 测试的事情。总的来说，一个父亲会承认一个生物学上不属于他的孩子，并且决定就那样生活。因此，不管怎样，人们不能简单地把父性降低到生物学水平上，因为它仅仅通过语言而得以

① Qu' Elisabeth Badinter situe du côté de la découverte d' un «moi nourricier» en soulignant «qu' il n' y a pas de différence entre pères et mères quant à la capacité de prendre soin de leurs petits», cf. E. Badinter, *L' un et l' autre: des relations entre homme et femmes.* p.257. Ed. O. Jacob, Paris.

保证。这个认识的问题也让我们回到母亲位置的问题上：如拉康提醒我们的，母亲为孩子指定了父亲，而且，她还必须在话语中承认孩子处在独特的相异性中（他绝不是完全属于她：若非如此，他就仍是一个遭受损毁的“融合之物”）。

只有“生殖父亲”是生物学上的父亲，不管知道或是不知道，想或是不想，接受或是不接受。因此，人们不能把他降低为实在父亲。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生殖父亲并不会自动地变成符号父亲——允许孩子作为主体而构建的认同点。

父性是随着姓的赋予和参考系的构成而得以建立的：出生，并不仅仅是离开母亲的肚子，是话语让我们成为女孩或是男孩。父性的观念并不会自动地联结到男性特征上。

通过给孩子一个姓，父亲在语言中接纳了他，并且给予他了一种精神上的身份。对父亲的认同将从两个方向上进行：为了孩子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精神之物，父亲必须能够从孩子身上重新找到他曾经所是的那个孩子。

对父亲来说，这将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通过接受其阉割而得以进行：

（他）接受他所传递的并不完全被采用，放弃他曾所在的神奇的孩子的地位（相对他自己的母亲而言）。

一个父亲只有接受了阉割才是父亲，这也就是说，他必须接受分离的必然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与死亡的相关性。仅仅是在这个代价下，他才能向他的孩子传递其文化传统，并使他登录在谱系中。

对父亲的认同将允许孩子整合时间，区分过去和未来，同时也使他能够处理死亡和代传承的表象。通过传递姓氏，父亲传递了他的历史和意义。

因此，人们也可以说，如果母亲的作用是孩子得以诞生，那么，“父亲的作用则是让成人得以诞生”。

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问题

我们从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双性化的生成的命题出发：“对一个人来说，主要的性别，即发展得更成熟的性别，在无意识中已经压抑了次要性别的精神表象；这就是为什么无意识的底基，即被压抑之物在每个个体那里隶属于另一性别。”^① 在一个男人那里，构成其男性精神表象的正是对其对立性别，即女性之物的压抑。为此，意识上已构建的身份与在我们身上被压抑的另一性别之间的紧张（有时是暴力性的，更多是投射性的……）总是存在。

怎样才成为父亲？通过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连结，以及在女人面前仍然是男人（以便她不仅仅是一位母亲）吗？

令人生畏的任务！

在与女人的相遇中，男人必须放弃认同女人。然而，对母性的寻找仍然是男人永恒不变的尝试；他坚持不懈地寻找女人之母性^②，这是他为了将自己构建为性化的人而已经排除了的东西。事实上，成为问题的是，他经常处在对母性的寻找之中（这使得他在现代家庭中仍然是一个孩子、一位兄弟或者另一个妈妈），在辩证的意义上，处在女性特征的寻觅中将使得他构建其自身的男性性。

我们做这样的假设：现在的父亲艰难地创造了一个可能的、父亲的位置，因为他们与死亡的关系变成了另一种：对他们来说，去冒险（的行为）已经代替了冒险（的行为）。

在很长时间里，男人都是为了了一些超越他的东西，如荣誉（也就是说，为了捍卫其姓氏、其名声等）而拿生命做赌注，在明知其结果的情况下，以某些完全超越他并缔造他的东西之名去拿生命来冒险。现在，在我们社会，我们更多地参与到冒险的行为中，追求速度、酒精浸润、吸毒等等，

① S.Freud, *La naissance de la psychanalyse*. PUF. Paris.

② J. Lacan, « Télévision », Ed du Seuil, Paris, écrit «*la mère reste contaminer la femme pour le petit l' homme*».

其作用是为了蔽塞、忘却，甚至是消除自己……

这将允许我们更好地理解，保证父性位置的困难是与保证成人在我们社会中的位置的困难是相关的。在我们社会中，“幼稚性”支配着精神层面，“年轻主义”则在社会层面占有统治地位。这也提出了父亲对于一种根本的不连续性的接受的问题。因为，人们可以认为，儿子必须以从符号上杀死其父亲（“成人应该从中存活下来”，伍林科特^①向我们指出），并且通过生一个自己的儿子的方式^②来“修复”他。如果这种符号的谋杀没有发生，那么，危险将是难以与其自己的孩子构建兄弟般的关系，甚至根本不想接受孩子。

对我们来说，似乎正是在这里，存在着父性的坍塌：男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父亲的位置中摆脱出来，而正是此位置保证了一个基础和一种传递。

此坍塌的性质是什么？

自从两个世纪以来，在一种必须且合理的（明确一下，以避免误会）平等趋同背后，我们参与了一个双重运动：对男人而言是与女人混淆的运动，对女人而言则是与男人混淆。但是，与此相悖的是，精神的双性化却变得更难以处理：在那里，每种性别都面临一种最原始的紧张（例如对男人来说，是对抗被固着在无意识经历中的女性所吸引这一事实）。这迫使每种性别都不断地进行斗争，以便找到并支撑其男性特征或是女性特征。紧张的消失（性别混淆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中）将导致身份层面上的重大疾病。如今，存在着对性别差异的否认，这将导致其重要地位的坍塌（这就是当前性别问题的由来）。然而，我们已经指出，由性别差异而导致的精神上的紧张是身份构建的基础。

而且，对差异的抹杀还会导致性方面的消沉：在那里还会找到什么？

① D.W. Winnicott, *Jeu et réalité*, Gallimard Paris.

② 以便“不朽”——作者在这里将此词拆分为“永远-谋杀”。——译者注

如果有机会的话，为什么还继续寻觅？还不如使用“替代商品”！以这种方式，性表象的一般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消除欲望。对男人来说，就其自身的结构而言，这种对女性所是的东西的想象性寻觅是一根刺（反之，对女人来说亦然）。正是这种永远不会理解的难受从我们身上逃脱了。我们唯一能够接受的逻辑变成了相似逻辑，即“同——”（要是人们都一样就好了，人们就会理解，是“一”和集体的诱惑把我们抓住了！）

事实上，当人们被缩减为对“购物计划”和“理发计划”之间的“臀部计划的管理”时，剩下的还有什么？什么时候对需要的管理已经将请求引向商品并且遏制欲望？此外，是否仅仅存在着性请求的坍塌，或更极端地，是性请求的抛弃？许多人没有或仅有很少的性关系，有时又对此有很高和很强烈的要求。兄弟般（或姐妹般）的关系就变成了性关系的替代。

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坍塌：

墙或一种结构的坍塌：这就是神经症所经历的（墙倒了还是没倒？）

地面的坍塌：这使我们陷入精神病的领域中。

因此，我们尝试做这样的假设：我们可能从曾是家长制的专制的不公正之必然坍塌（因此是神经症的）来到了地面的坍塌——即让我们站得住脚的东西（我们因此在精神病领域飘荡）。

很久以来，父性是在“权威父亲”的形象下被组织的。如果说它接近了父亲与孩子的关系，那么它的消失则经常以母性为模式。

许多作者向我们证明，父亲的某些东西已经死亡：这不仅仅是想象性父亲的某个部分？父亲的功能也许越来越经常地不被实现，然而，人性传递者的任务可以由每个能够符号化缺失的人来完成，也就是说能够放弃与孩子的母性关系——这是许多当下的父亲都向往的关系。拉康本人在其工作的最后就谈到了父性的复数化。

从这些思考出发，我们能够进一步说，父性，它既不是男人，也不是男性（特征），它是功能。

对于这种功能，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阐述：“正

是父亲深情的权威使我能够认识自己。它关系到一种最基本的支撑。没有这种支撑，我将不能获得任何的规范，接受任何的挫败，遵从任何的禁忌，自觉接受任何法律或道德。从根本上来说，原发认同隶属于权威，因为它被第三者的深情认识所构建，与恐惧和残暴相决裂（而正是后者威胁着残疾的早产儿即新生儿），并将之引入文化之中。”^①

最后，我们不该放弃男性性与父性功能之间的连结，应该允许这每一维度都展开关于它们的、人类学问题的多样性，并且，我们难道不该继续追问可能的神话学模式吗？通过这些模式，我们将不停地试图理解我们自身。

^① Julia Kristeva, *Cet incroyable besoin de croire*, Ed. Fayard.

对于父亲来说什么是恰当的距离？

吉·丹纳^① / 著

姜余 / 译

【内容提要】人们往往批评父亲的缺席，并申斥由此产生的问题，但父亲的过度在场，同样会造成问题。本文讨论了三种父亲位置在结构性分析中的亲缘关系，并从“在可利用父亲的条件下省去父亲”的分析企图中呈现了儿子如何依赖于父亲那里的石祖，如何接受从父亲那里传递的阉割，而这个阉割的功能假设了一个准度，这个准度如果只由父母中的一方所表达和性化，就会产生缺陷。

【关键词】父亲 阉割 准度 男人 石祖

主题之中

通常人们批评父亲的缺席、父亲轻而易举的放弃，与此相反，有时一个父亲对功能占有的坚持会引起儿子和女儿的症状。通过对某些治疗的叙述或者描述，我会着手讨论它们带来的结果，并试图接近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是一个父亲？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跟他孩子的恰当距离是什么？尤其对于儿子来说，当父亲表现了一个过度的在场时，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后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果？

另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是，这时他作为男人传递了什么？

这就是与大会主题相关的我们的定位，对我来说，它是科学的共同体中一个原创而且新颖的主题：父亲和男人！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承认父亲的功能不是提前就写好的；我们必须承认它在切口中甚至在其分离的功能中假设了一个准度。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如果没有跟父母中的另外一方一起或者仅被那一方所表达和性化，这个准度会有缺陷。因此在第一个分析那里，准度是起作用的第三者，它假设了要去适应和猜测在场的各种张力。然而这种计算很少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因为生活总是幸运地有令人惊喜的大奖，当然也有不幸。

讨论

父性的侵入是这些不幸的后果之一，尤其当母亲因为多种原因而显得虚弱的时候，但这也有可能是由于父性的秩序被他的妻子即孩子的母亲所接替，而她不能有更好的办法或者不想对此表示反对。当她表达的时候，父性的侵入就会被解释为儿子们要面对的过多部分，这可能是俄狄浦斯问题所囊括不了的。后来拉康有一个经典说法，根据这个说法，分析的企图就是“在可利用父亲的条件下省去父亲”，具体地说，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掏空所有享乐的准度。当然，根据被精神分析的框架、设置所支持的不同模式，这个准度是被分析家和分析者所分享的。不过，分析的活动不也是服从于一个准度的吗？

从这里开始，也许就有了这两种情况间——表现为父性功能的准度的东西，和我們也可以用分析的活动来衡量其准度的东西——的平行或者是交流。虽然它们之间本身是有距离的，我们仍然可以建立起一些交流。

我们还记得弗洛伊德曾经强调，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教育是不可能作为职业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能够找到母性功能的组成部分，

我特别想到的是伍林科特所说的珍贵的、精神的安全感，我们也可以指出，所涉及的是父母双方都可以去实施的功能。)

情况一

首先，为了说明拉康这个说法，我在自己的经验中找到一个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翻译^①的案例。他在对阿拉伯语的评论中指出，这种语言在最近的这些年里有非常重要的变化，它适应了短信、博客、电邮等语言。这种变化在与如此固定和持久的地道阿拉伯语的关系上，就像是对父亲的谋杀。谋杀部分地解释了阿拉伯社会近期由于一些变迁而导致的变化，因为变迁总是从语言这个内部开始的：在阿拉伯经典语言中遇到的不也是拉康说法的问题所在：在可利用父亲的条件下省去父亲？

总之，主体所有的假设、所有的呈现都伴随着变迁，有时是新词的创造。我们注意到在很多环境下，创造新词获得了去表达主体无法表达的一部分的力量。我想到了阿贝德拉蒂夫·柯西胥^②的电影《躲闪》。该片汇集了一帮郊区的年轻人，通过让他们演法国经典喜剧大师马里沃名作来教他们说法语。结果这些人发明了动词化的“气氛”表达一种引诱的氛围，从而产生了一种表达方式，如：“气氛一个女孩”！

拉康也是某些新词的作者。这些新词表达了在弗洛伊德非常父性化的理论内部的一场小革命。这场革命在于拉康所进行的移置，即围绕话语和语言这个对子的整个理论的重组。拉康关于父亲的说法如此天才，就好像模拟了莫比乌斯带在不放开其对象的情况下实现的翻转一样！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分析的工作的确是非常丰富的。有理由展现一种分析的语法，其中，不恰当的形式、空间和经验就好像是不完整的；这种精神分析体现出来的有限的客观化，甚至模棱两可，当

① A.Hlebel dans le film de Nurith Aviv, Traduire, 2011.

② 阿贝德拉蒂夫·柯西胥又叫阿布戴·柯西胥，1960年12月7日生于突尼斯，电影导演和演员。主要作品是2004年导演的《躲闪》以及2007年的《谷子和鲮鱼》，获得多个凯撒奖。——译者注

然还有分析过程中需要描述的其它经验，在分析领域中同时是构建和解释的承担者。^①

我们的目的——即试图拉近父性功能和分析行为——带领我们去询问（为了表明我们的意图）享乐的尽头（这是分析行为的假设），以便使一个理解突冒出来，而贯穿拉康的这个享乐的概念，起作用的主要是分离；说到底，享乐是一种实体，一种造就了词与身体的真正的实体；这种实体，当它被中断的时候，一个分离就发生了，因此，尤其是精神病人就要重建思考的官能。分析的行为，同样注定要做分离，这难道不是跟一个父性的功能很接近吗？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在实践中深受精神病人世界的影响。拿一个近乎粗陋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问题。这是这样一个女人，她面对着一个侵入性很强的父亲。对这样一个父亲，母亲没有任何反对，她常年就面对着她的伴侣一会在场一会消失的事实。这个女人具有的父亲和男人的形象是令人厌恶的；父亲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阴影笼罩着家庭，当他回来以后又化身为侵略者引发女儿的恐惧。这个男人，少言寡语，行动就像个暴君，永远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他的辞说里，没有任何事任何人是顺眼的；他贬低五个女儿，她们稍稍表现出任何一点女性的迹象，他就说她们是妓女。女性性被他用所谓的道德秩序早早地压抑和诋毁，而他本人却毫无道德可言。这个女人是他五个女儿中的第四个，即将40岁，对所有能体验到的感性之物都表现冷淡，除了一个领域，那就是萨尔萨（Salsa）舞。她每周都会去跳好几次，在她看来这似乎是因为她不缺少陪跳的骑士。然而这个“萨尔萨”在言说着。在我看来这个词本身在法语的回声中好像可以包括了她的童年的能指：salle a！“salle”这个词实际上属于她多次听到的父亲的辞说。

这个能指在她身上的复活就好像是父亲内投的回音；这是一件令人

① Guy Dana, Quelle politique pour la folie ? Le suspense de Freud (STOCK).

惊奇的事情。但是通过萨尔萨这个词，我认为典型享乐实体的表达以语言的方式存在于人类中，因而在分析的工作中就假设了要切断、分开或者再次抓住享乐，把它编入清晰的承载物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分析是对于享乐实体的调查。这个病人，不管怎样都无法和一些事情分离，无法和作为男人的父亲和解！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在这里给她建议，为了最后与男人们共舞，就不要把男人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或者要停止她在身体里面所携带的战争！

理论

因为涉及到内投的问题，让我们回到分析的结局，以及谈论它、理论化它的不同方式，特别是回到最近一段时间我所思考的分析方法本身的内投，或者其经验的内投。在这一点上必须强调这种方法的独创性，即它服从于自由联想的偶然性，也就是说首先要服从于偶然情况、突然产生的念头（德语 Einfall）！

分析尤其影响到对不可预料之事物的接待。在分析的进程中由于偶然情况反复出现的体验，使得这种接待的防御性质很少。一个停止总是伴随着一个悬念，偶然情况结构化了基本动力，在分析的设置框架和被讲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它等待着效果 / 主体，以及其不同方式的出现；分析的框架在结构上再造了能指 / 所指的二元，但是这种运动、这种动力超出了此二元，并且能够清理出一些功能。在这些功能被赋予父亲或者母亲之前，它们在这种方法的使用中找到了一种现时意义，这让我想起拉康曾说过，分析是一种懒惰的艺术。懒惰，意思是说它是这样一种工作：分析者所受到影响虽然是归功于此方法，但认真倾听的分析家，作为经验的接收一方，并不必要要在工作中表现活跃。

实际上它产生于有利于自由联想的语言和转移。就转移而言，除去精神病的情况不谈，典型做法是要重现一种转移的神经症，矛盾的是，这种转移的神经症作为各种精神冲突之上的加码而加入进来，而同时又

将自己扮作这些冲突的范式。这就是为何在分析家所处的位置上必须从一开始就预计结束！

就我来讲，我相信在经历之前就会获得一种对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基础，而且会产生决定性的后果，比如对沉默的使用。分析者用一种在场的亲切感来衡量使用沉默的效果。我相信分析家都必须警惕这种经历被一个过度在场或者一些不适时的干预所毁坏。这个艺术的和谐性容不得迟疑犹豫。关于转移，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弗洛伊德本人不就强调了节律、分寸和对祖先信仰的等待吗？

所有话语的表述都与创造性相关联，在分析的领域中，表述与演奏乐器这种事相似，因为表述一上来就既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实现。我们每个人都记得，弗洛伊德说，当分析者组织他思绪的时候，分析家^①的任何一个不恰当的干预都可能会引起不可根除的恐慌。因此，根据美国精神分析家科特·勒温的说法，在分析的设置中，内容的自由都来自于程序的固定。我想必须要理解这种程序的固定是一个倾听所有间隙的机会！从一个形式的固定开始，通过支持这个间隙，这个说法强调了在间隙里面起作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精神病的临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不在这里对精神病的工作做过多的阐述，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工作，但对于精神病来说，支持间隙、未知、分析家的被假设知道和这些情况导致的所有替代，是不可能发生的。和精神病一起，我们就处在一种替代的病理学当中。

但由此，除开精神病人让我们面对的扭曲，一个孩子在脆弱时期里所面对的侵入现象已经可以被理解了。这个脆弱时期穿透童年，就像一个留下痕迹的事件，给他造成一个无法根除的恐慌。伍林科特说一个孩子有多么依赖就有多么敏感，但是这个侵入也像 Schreiber 谈论的那样，是灵魂的杀手，孩子不一定记得住它，但是如果这段早期经历引起了一

① S.Freud, *Sur l'engagement du traitement in La technique analytique*, Paris, PUF, p.125.

个疯狂的恐惧、一个分裂的恐惧、一个崩溃的恐惧的话，那么就需要在成年时期重新演绎、重新解开这段经历。

情况二

现在我想给你们讲两段治疗过程。至少它们中的第一个可以用到伍林科特的图示。这个病人分析工作的长期性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我是他的第三个分析家。需要注意的是，前两个分析家，一个是比利时的同事，另一个是法国同事，他们名字相同但拼写不一样，这个固定性必然凸显了父姓。这个固定性唤起的是精神分析相遇的偶然吗？还是在这些相遇中真的存在的偶然？显然，我不这样认为。你们会理解到，这种固定唤起的是这个分析者的问题。

我们暂不赋予这种延期太多意义。对于我来说，这个病人身上存在着一个固定的主题，这是我以前从来没遇到过的。该病人在历时多年的所有分析中只谈论他的父亲！当我说他只谈论他的父亲时，指的是他除了谈论他在外国生活的时候所体验到的一些快乐时刻之外，其它都是谈论他的父亲和父亲的教育体系。他很少提及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或者他的工作。在意大利、美国时，借助于语言的改变，他重新找到了话语的另一个空间。这让他解脱了。试想，这个法国某重要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他现在退休了但还继续着他的分析，他将会在分析中度过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但他却无法从他的客体即他的父亲那里脱离开来，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吃惊的事情！

当然不管我怎样自问这个病人的结构是如何的，我提及的也只是某种我不能确定的东西：对他来说，分析难道不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的地点吗？简单地说，他是一个精神病吗？主体在分析里支撑着他的真理，但我们也可以说支撑着他的姓。分析中也存在着不能与这个陈述的地点分离的不可阉割性，在这种陈述中不断涉及到他的父亲和他、他和

他的父亲。然而这个病人两年前突发了一次心肌梗塞，中断分析的间隔对于他来说难以忍受，以至于他提前结束病后休假，并纠缠他的心脏病医生允许他回到分析中来，以此重新获得这个话语和抱怨之地的永久性。尽管并不少见，但这种殷切是在提问，而梗塞反映的是只有身体才能够做的猛然停止，这种事更少见！

然而，这里又有对于必须摆脱父亲的担心。对于这个父亲来说，任何在其每个孩子选择的意义上的倾听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不可能谈论的父亲，哪怕是一条缝的隐私之门也不可能打开。通过用一种类似他在企业中所用的权威语言，他在一套缺乏人性的、相当严厉的体系中树立起他给孩子们的教育。

在这个故事中使人吃惊的，是一个最平淡无奇的俄狄浦斯图示。在家里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的他，在弟弟，也就是家里的最小一个孩子出生之前的五年中，跟母亲有一个田园诗般的关系。由于小弟弟的出生，他就被送到别处去居住，他说那个时刻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对他来说，这个时刻由一个怪物的噩梦代表着。他完全否认了迫不得已的“断奶”，认为他母亲放弃他不是因为小弟弟，而是为了嘲讽父亲的体系！在剥夺他受的偏爱的位置的同时，母亲也把他暴露在父亲的凶狠之下。他感到母亲的双重的背叛，于是他抱怨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没有一个分析家能成功缝合他的伤口。在第一个分析家那里7年，第二个分析家那里8年，但他对父亲的控诉丝毫没有缓和。没有哪个解释真正起作用，他沉溺在或强或弱的愤怒中。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一个癔症的结构，但是它不能令人满意地去理解一个面对无法“去主体化”的、过度的父亲的个案。父亲同时是极端的能指和创伤的代表，在根本上他是一个迫害者。我们接近了让·雅克·卢梭的问题！

情况三

现在为了结束，我想讲讲一个9岁时失去母亲的男人。他是家里的

老小。因为比他年长的兄弟姐妹都渐渐离开了家，所以只有他跟父亲单独相处。他的母亲在长期住院之后去世了，之后不久，跟他同住一个房间的兄弟在美国因车祸去世，这使这个事件的严重性愈演愈烈。

当这个男人不得不与父亲面对面时（这从来没有过），他身上产生了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绝对的无能。本来可以弥补这个双重悲剧的祖父母也缺席了，这更让这个房子里的这种特殊的对话雪上加霜。实际上，回荡着的是一种持续的刺耳声音、不可修改的决定、不可预料的任意的怒火，到最后这又是一个父亲的过度在场。这次儿子明显不适，而他的父亲无法支撑他的位置，他的儿子需要某种照顾，但这个父亲没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他不得不躲在沉默和自卫当中。后来，这个男人在与一个女人的特殊关系中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她毫无疑问具有癔症性的性格。她急切地在各个地方寻找石祖，从而产生了由于童年期与父亲的关系占据优势而导致的同样的混乱。

如果男性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亲那里的石祖，那么这是假设了在某种程度上父亲的确既可以给出症状也可以接受症状。这种被接受的瑕疵相当于阉割。一般说来，如果父亲不表现出放弃的迹象，如果他不实施一种空洞的在场，那么他只不过发出了一些毫无意义又无效的噪音而已；说到底，石祖不属于任何人，它是绝对无法发出声来的。因此，欲望矢量必须在“一个女人在爱情中能够做什么”的谜题中实现。另外男人为了确保他男人的状态，特别是为了成为父亲，必须要支撑对于其男性位置的一种不可能的客观化。

这种非现实和非客观化，同样也能在精神分析活动中分析家的在场和缺席中找到，后者被拉康概括为：客体小 a 的位置，即是说缺失的客体。如果它存在的话，那么就是毁掉分析者工作的那个东西。这个分析家的去石祖化，这种假装的工作，这种玩耍躲闪而不是把分析家具体化的方式，与一个男人为了拥有石祖而必须放弃成为石祖极为相似。这样，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于“在利用父亲的条件下省去他”的莫比乌斯式的论证。

结论

这样，我们试图清理出在对父亲位置的结构性和对分析行为之任务的分析之间的三种亲缘性：分离、分寸或者非侵入，最后是支撑“什么是一个男人”的不可能的客观化，这传递了一个阉割。为了一个儿子作为男人的生活得到支撑，阉割是唯一的途径。

为了成为父亲的五个梦

菲利普·瓦伦^① / 著

罗正杰 / 译 吴蕤、赵旻 / 校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一名分析者的五个梦，呈现了分析者能够成为父亲的过程。分析者认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相像之后，由感到痛苦逐渐转变到能够去认同自己的父亲，并且在接纳自己父亲的同时也逃离了自己父亲的命运。他在像或不像父亲之间，找到了另外一个父性的答案。

【关键词】个案 梦 父亲 欲望

我将通过一个我以字母P（法语“父亲”的第一个字母）来命名的病人所“报告”的五个梦，为你们展现五次分析。在选择对其的叙述形式之前，很长时间我都犹豫着用什么方式来写这个（几乎未加工的）发言。

这样的犹豫有几个理由，它们将作为我发言的开场白。

第一个理由，我不希望通过抹去那些要不就是没有分析、要不就是枯燥分析的那几年，将这几次分析转换成美妙的治疗故事，从而让它们带给我的自恋性满足占据我。临床不是一个秃头广告，它没有一个“之前”和“之后”，它有的是转移的“当下”，即一个已经开始的、已经进行的和已经实现的“此时和现在”。因此，这是父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们今天齐聚在成都）突现的一次具体经验，我将尝试和你们一起来分享它。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

第二个理由，我想要通过几个真实的引语来避免用理论裱贴这个“梦的故事”，以便我十分规矩地进入到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真传弟子行列中。在你们面前这样说不会没有些许非法的感觉。事实上，我越来越怀疑，父性的功能是否是把我们将创立为主体的“法则”的唯一精神动力。根据无数的迹象，我所认为的坚实（的观念）被动摇了：父亲（对母亲和儿子）规定了“法则”，他的形象——西奈山上的摩西——由此呈现为一种石祖中心论的构造以及从中所引出的符号秩序，并以此作为与男性统治相联结的一种历史解决办法。

一个世纪以来，在东方以及西方的所有社会中，给予父亲们的权利的剧烈震荡是否指示着两个父亲的共存：一个家长制的形象，尽管它继续在产生它的影响却完全不再是它曾经的样子；一个还没被稳固安放的父亲，但他已经在为一个崭新的符号秩序的出现做贡献了（这个符号秩序并没有以例如对孩子的照料种类的划分作为依据），很难确定其对主体的创立的影响。非洲谚语告诉我们“蛇在蜕皮期是瞎的”，我们没有解释它的理论依据。

第三个理由，非常个人的，且不是少有……在我开始书写关于父性我分担的部分时，我自己的父亲企图自杀，我们关系的某些情况出乎意料。此前，我一直是我父亲的儿子，也是我儿子的父亲……面对我父亲的慌乱（他一直说不能承受衰老的毁灭），我仿佛觉得不再能够思考父性是什么（也不知道写什么），因为我经历着一个独特翻转。简而言之是我被变成了我父亲的父亲，我把这概括为翻转。

P 的五个梦

生命中最为沉重的时刻

是我突然发现我父亲的侧写的时刻

——Cesar Vallejo^①

^① Cesar Vallejo, *Le moment de plus grave de la vie. Poèmes en prose* (1937). Traduit de l'espagnol in *Obra poetica completa*. Mosca Azul Editores. Lima, 1974, p.190.

第一个梦

“我梦见我对我的父亲和我的妻子说‘我爱你’”。正是从这几个词开始了第一次分析，这次分析标志着与一个病人进行了12年的工作的复苏。这个梦没有产生任何形象，它凝结在“我爱你”中和它的两个接受者那里。

要明确指出：由于定期吸食鸦片制剂（海洛因和各种包含鸦片活性成分的药物）和酗酒的原因，P曾到我所工作的成瘾特殊治疗中心做过咨询。需补充的是：他还偶尔吸食印度大麻和可卡因。

他40岁左右，从15岁就开始吸食毒品。其间，在持续了25年的同时，他终于能够或多或少地控制他的吸食（特别是通过使用一个医生开的一些鸦片类替代药物），这使他能够继续承担一项规律性职业工作，也使他避免了社会的边缘化。因此，在最近的这12年里，每当他担心失去对吸食毒品的控制时，他就断断续续地来见我。尽管有多次戒断的尝试，他却一直未能，也不愿抛弃这些产品。但是他尤其执拗地拒绝定期的工作，而同时又遵守我向他提出的分析框架。

2010年年初，在与他约定的会面中，我向他提起定期工作的建议，这一次他同意了。

听了这第一个梦，我立刻想到了十多年前的一次会谈（当时处于医院的戒断期），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谈起他16岁时父亲的死亡。

他和他视之为暴君的父亲相处得并不融洽。他用一个高大的、英俊的、瘦高的、金黄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男人来描述他父亲，他同时也绘制出了自己的肖像画，并且，我理解到了他遭受着与他父亲相像的痛苦。他补充了一个他从父亲那里知道的小故事：在战争期间，他父亲穿着华达呢时就像一名党卫军军官，那些德国兵向他致意仿佛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不像他父亲，他特意改变着装，留朋克派的易洛魁人发型，竭力排除在外表上强加给他的“纳粹”之美。然而他一直遗憾没能在他父亲过早死去之前和他说这些。

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想起他父亲。在10年之后，通过这个梦，父亲回来了，并且他能对他说“我爱你”；这句话允许他在同样的时机去对他妻子说“我爱你”，对那个现在他也只在梦中对其说这句话的妻子说。

在会谈的最后，我问他是谁使他下定决心同意我的建议并与我联系。“很简单”，他说，“我和我妻子相互谩骂，就一下子，我把她按在墙上……我差点打了她，我害怕我自己。在那时以前，酒精和鸦片制剂都还能让我控制我的暴力；而那次，却已不再起作用了。从次日起，我就完全停下来了，包括替代疗法。我花了一个月来戒酒，这是我第一次做到这样。”

第二个梦

在接下来的那次分析里，P带来了另外一个梦，同时把他能重新做梦的喜悦告诉我，以便接着补充说明印度大麻妨碍做梦……

这一次，场景中有一些形象。他在一个地方面对着他的母亲，这是什么地方并不太清楚，但它“奇怪地”包含着一些我办公室的元素，这些元素表明了我在梦中的在场。这是一个有明显大梁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大长沙发（他对我说“像这个一样”）。那里光线昏暗，他们低声说了很长时间。他母亲对他说她生病了，她得了癌症。P感到很伤心，也同时感到宽慰——他终于能说出他的心里话和他的爱。我自己记下：在我的办公室、一个与他母亲相遇的地点，他给了我父亲的位置，但是，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没有什么向我显示，我在那儿是为了传达乱伦的禁止，还是为了回应连接他的父母的欲望？

P向我明确说道：他母亲没病，但自从他父亲死于……癌症后，他就再没能真正地和母亲说话。突然，他对我说他又和妻子吵架了，他想到一个我很久前曾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向我转述如下：您说您爱您的妻子，但是您对她说过吗？所以他在厨房里对她说了“我爱你”，这结束了他们的争吵，也消除了他的暴力。他接着说他又感到了他对妻子的欲望，还说毒品曾打破了他的欲望。此外，他补充说：“当我们没有欲望时，

就不会遭受拒绝”。为了稍微阐明他说的这些，我补充一下：15年以来，P与同一个女人夫妻般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关系经常不好，还时不时地分开。他们也是一个7岁小女孩的父母。

第三个梦

这次梦到——与前面那些梦一样，它启动了分析——在一个海岸的岩洞里，他面对着他的兄弟和他的父母。他的父母在一条独木舟上，而他和兄弟在另一条上。水非常清澈却又深不见底。出乎意料地，他的兄弟很缓慢地沉入了水里，P试图去抓住他，但他的兄弟在他的双手间滑过并无情地沉入了水底。

P被他在梦中溺死的兄弟所困扰，并否认希望他死。我对他说“不应该按所说的去理解梦”，这时我出现了一个口误，我本来想要用“按字面理解”的这个表达来要求他不要局限在梦的显意上。而我所使用的“按所说的去理解”这个表达，（在法语中）有一个要求人们去做所说的事情的意思。从这来说，这个梦同样能够被当作同性恋(homo)^①的梦来理解。P相当快地听到了我在不知不觉中所给的这个解释，并对我说他仍然能感到他杀害兄弟的负罪感，接着承认：在他与弟弟打架时，他感受到的他那些“最初的性躁动”。

然而，在这个梦中让我震惊的不是这样的“同性恋问题”，而恰恰是在家室内部，两条独木舟上儿子们与双亲的分离和父母干预的缺席，这个缺席签署了无效，而且不仅仅是父性的无效。

第四个梦

这个梦发生在乡村，P手里拿着一个水雷——一个相当大的黑金属

① “同性恋”(homo)是“按所说”(au mot)的同音异义词。听起来没有区别。——译者注

盒子——，它有随时爆炸的危险。他想尽量把它扔远，因为他不想让他身边的孩子们受伤，但他们却妨碍他这么做。终于，他发现一块没有孩子的空地，他将水雷扔到了他感觉够远的池塘（时间？）^①里。这个梦没有带来任何联想，并且它的隐意也没有说出来。P 离开这个梦而去谈他的戒毒：他已经快 6 周既没有吸毒也没有酗酒了，并且惊讶自己并没有感到难受。

我重新回到他的梦，问他是否能回忆起一些他还没有提及的细节。

“没有”，他回答，“也许除了一件奇怪的事：我把水雷抛出了九百米，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两分钟的沉默后，我重复了两遍“九百米”（neuf cents mètres）、“无主人的新人”（neuf sans maître）。灿烂的笑容出现在 P 的脸上，他无比快乐地对我说：“对，就是它，我是无主人的新人，我不受毒品约束了，而它曾是我的主人。”他以前选定这个主人是为了逃避父亲的控制吗？

第五个梦

第五个梦用一个极大的差异将 P 和他的女儿聚集在一起（为了实现他的欲望，也可能为了伪装他的欲望而被他引入）。现在，他的女儿 7 岁，而在他梦里她是 10 多岁，不再是一个女孩子而是一个小姑娘了。他梦到在整理过的小卡车里（这种卡车后面可以睡觉），P 与他的女儿（她具有女人的身体）去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地方旅行，他的妻子，也就是说他女儿的母亲没有去旅行。在一次停车时，在这个小卡车的后部，他与他女儿做爱。

“讲这个梦并不容易，我有点羞愧，这是个乱伦的梦，然而它很纯洁。”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前，他补充道。然后他给我讲：上周，当他的女人去外省看她的母亲时，他单独与女儿在一起，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

① l' étang（池塘）和 les temps（时间）在法语中的发音一样。——译者注

他说：“这是第一次，跟她一起玩、对她说话我都感到快乐。以前我总是强迫自己跟她玩、对她说话，而我却心不在焉，我感觉不到我是个父亲。当时我们相处得很好，以至于我都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但我仍然没让她太晚睡觉。”

这不是他第一次提起他作为父亲的无能感。在他女儿出生时，他曾对我说过“我没有感到像所有父亲那样因为成为父亲而有的幸福”，他说“我知道我将像我父亲那样，由于病毒性感染在很年轻时就死亡，我知道我不能活过40岁，而成为父亲需要时间。”

过了几年，在一个治疗后，病毒已检测不出来了。他终于能带着惊讶说出他的慰藉：他逃离了他父亲的命运。那期间，他很少谈及他女儿，而且我向他提的几个问题也都落地无声。我感到他为女儿担忧，甚至不安，但是他只谈教育的普遍性问题，也总是与自己的情感隔离开来。

在这个乱伦、炽热、纯洁的梦之前不久，他找到了成为一个小女孩的父亲的能力。这个能力同样是能无拘束地与女儿游戏的能力。也许因为在像他父亲或不是父亲之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父性的答案。通过找回做梦的能力和欲望（而他以前一直禁止自己去欲望）的能力，通过找回说“我爱你”的能力，他能够投注这个双亲的功能（对他来说，这个功能在母性一方还是欠缺的），以便成为一个不受责任分配（这个分配把父亲的话语从身体以及对孩子的照料中切割出来）所约束的父亲，一个可接受的父亲。

通过执行一种崭新的双亲功能，我们同样可以成为父亲的父亲，并且感到：“我生命中最沉重的时刻还未到来。”^①

① Cesar Vallejo, *Le moment de plus grave de la vie. Poèmes en prose* (1937). Traduit de l'espagnol in *Obra poetica completa*. Mosca Azul Editores. Lima, 1974, p.190.

不对称的切口

理查德·阿彼波^①/著

张涛/译

【内容提要】本文以作者自身的一个梦，引出了父姓形态中呈现出来的债务问题。借助于拓扑学的操作，梦中的能指要素以及所引出的债务问题被更为形式化地表达出来：基于基准面上的长方形剪纸所做的变换，莫比乌斯带的扭转与切割可以得出两个公式： $\varphi - \varphi = 0$ ， $P - P = x$ 。债务的产生，既是被加倍（至少是两倍）的，也是被抵消的，它给了我们数倍于真实遭遇的偿债压力，而且它又是不可能完全被偿清的；父姓则阻止了债务的被全部抵消。

【关键词】梦 债务 父姓 拓扑学 莫比乌斯带

梦

黑手党勒索我和我的未婚妻（或妹妹）。这就发生在一家赌场的出口，我常光顾那儿，身上没带够钱。我清楚自己家里还有足够的票子。他们不愿让我走掉，虽然还显得很客气，但我仍然难以了却这个事。最后，他们把我的未婚妻-妹妹作押（还是十分斯文），如果我没按时付款的话，就会对她动粗。我知道我还有足够的钱，这不是什么问题，而且索要的

^① 法国精神分析家，拓扑学家。

金额也并不过多。他们就放我去了。

前段时间，我看了 Gabriel Le Bomin 拍的一部电影，叫《毋庸置疑》，里面一对年轻大赌徒，化装成兄妹，给一位富有的正值壮年的先生设局。做这个梦前的那个周六，我没有足够的钱买前往中国的机票了，因为我的信用卡已达到当日的支付上限，尽管我账里还有足够的钱；我感受到了极度的罪恶感，就像是我犯了什么法一样。我当然很清楚没有这种事情。另外，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这个问题通过电话就处理好了。奇怪的是，在周一到周二的那个晚上，我却做了以上的梦，当时一切都已上正轨了，所有问题却仍然在那里。

归根结底，这与下面这句话一样出奇：债务是无可估量的。现实中的债务唤起穷尽一生都无法还清的符号债务。我应该在刚提过的电影上花上更多的工夫，而不是想想而已。我目前记得这对情侣是两个孤儿，他们是在同个寄养家庭中相识的。恰好，对于他俩，表面上没有债务堪忧，而且还没有双亲。相反，他们认为社会该给他们点东西：譬如他们失去的双亲。啊，对了，他们不是什么江洋大盗的徒弟，但是他们等待着命运送还这笔从他们那儿掠走的财富。在赌场，事实上，我们能赢得的钱既不是勤劳工作的成果，也不是非比寻常的馈赠；它只能是偶然结出的果实。那么，当一个成年的有钱人被年轻女人吸引，从而出现掠夺他的机会的时候，这时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道理。正是天公以此作美，来偿还被掠走的童年。

我想到黑手党的手下还真有点这种极端风格：他们打家劫舍，见钱就夺，眼睛都不眨一下，因为他们将这些当成是笔欠款。债务摆在了社会那边。就这样，我在梦中制作了黑手党人物。我没有在我对黑手党行为的分析中找出其合理的理由，我只是说我的想象就是这样运作的。

与此相反，对我而言，债务是在我这边。我该偿还。确实，我感到一种威胁，但我并非是因此而服从它的：我是被说服来相信我应该（偿还）。可是，有一个悖论存在：我把自己认同为赌场的这些年轻赌徒，同时也是黑手党的受害者。为了那个并非必要但却有趣的旅程，我事实上刚刚

花费了很多,也不期待回收哪怕丁点儿的好处,可能它并不是风水宝罐吧。

尽管如此,债务看来以父姓形态中的一种呈现了出来,如同弗洛伊德在鼠人个案中所分析出来的。那个个案涉及的是儿子无法偿还的父债。这样,日常生活中哪怕再少的债务都会唤起这个无法衡量的负的遗产,并且使得对最早款项的偿还变得不可能。就像我总是说,做梦总比制造一个症状来呈现同一个问题要好。因为在鼠人的个案中,不可能偿还的债务,导致主体在他的生活和空间当中迷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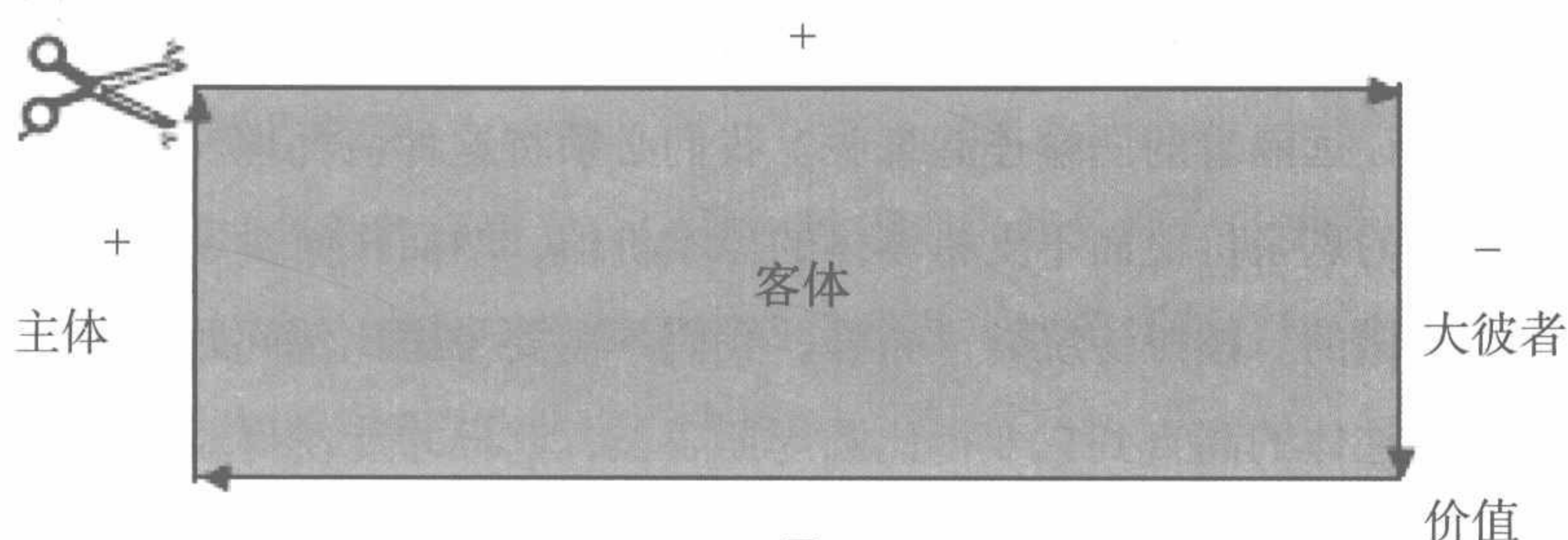
相反,对于我,如同对很多其他人那样,债务给出了一个方向:很简单:赚钱。这为学业、求职、升级的期望等带了个头。对我来说最为特别的,就是我的名:Richard^①。它肯定不是偶然起给我的,这是给我一个使命,去重振曾经拥有过但之后被爷爷 Auguste 搞丢的家业,他的名字也包含在我的名字中间。在早年,它更多地模糊了我的视线:18岁的时候,我坚定地背转了身,当时,为了确定我的方向,我去找能找得到的已失去价值的所有道德箴言,例如福音书、马克思主义、甘地的教义。很幸运地,我很快明白在仅仅以道德箴言为导向的人生中我走不了多远。精神分析对此有功,帮我理解了我是如何被父姓的意义所抓捕的,确切地说,是如何被我的父亲参照他自己的父亲而给我取的名字所抓捕。

最少的债务指明了方向,在它指示着一个它将会被偿还的意义上。在某种意义上,债务赋予了生活以意义,即使它的呈现并不总是以金钱来往这样清晰的方式。有时候,人们自称与自己的祖先相称,至少挽回了耻辱的脸面,而我要做的那个事情总是或多或少地取决于他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不管是在相同还是相反的含义上。

拓扑学就这种作用给出了一种十分普遍而抽象的书写。试想一条被放平的纸带。我们给其边界一个连续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在基准面上的^②长方形的剪纸规定出剪刀的连续路线。

① 作为名词,法文有大款、富翁的意思。——译者注

② 一个任选的参考水平面、参考面。——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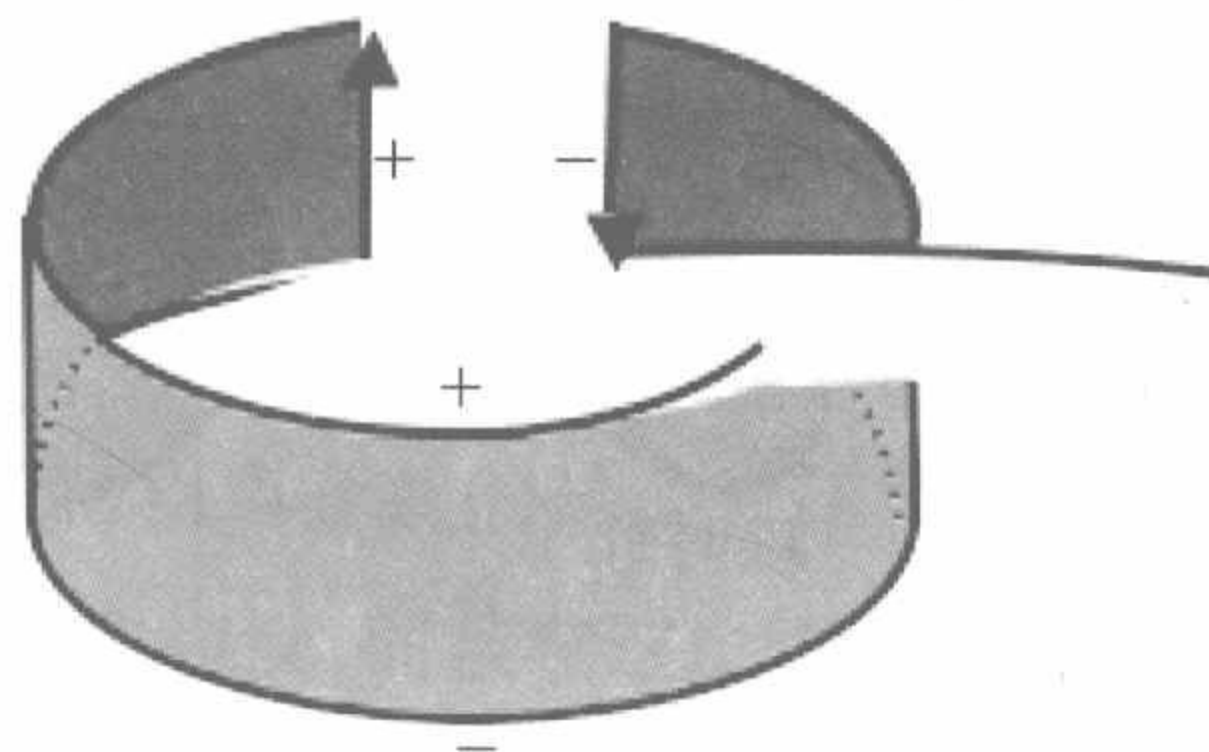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来想象涉及的金钱循环的一种书写，这也是债务循环的书写，也就是力比多的书写。中央的面积（客体）代表或买或卖的物件或者服务。这个客体受价值条件的限定，就是说其轮廓的分割已被划定。虽然我们已经画出了连续的方向，但从我们的视角看，右边和左边的箭头方向是相反的，顶端和底下的箭头也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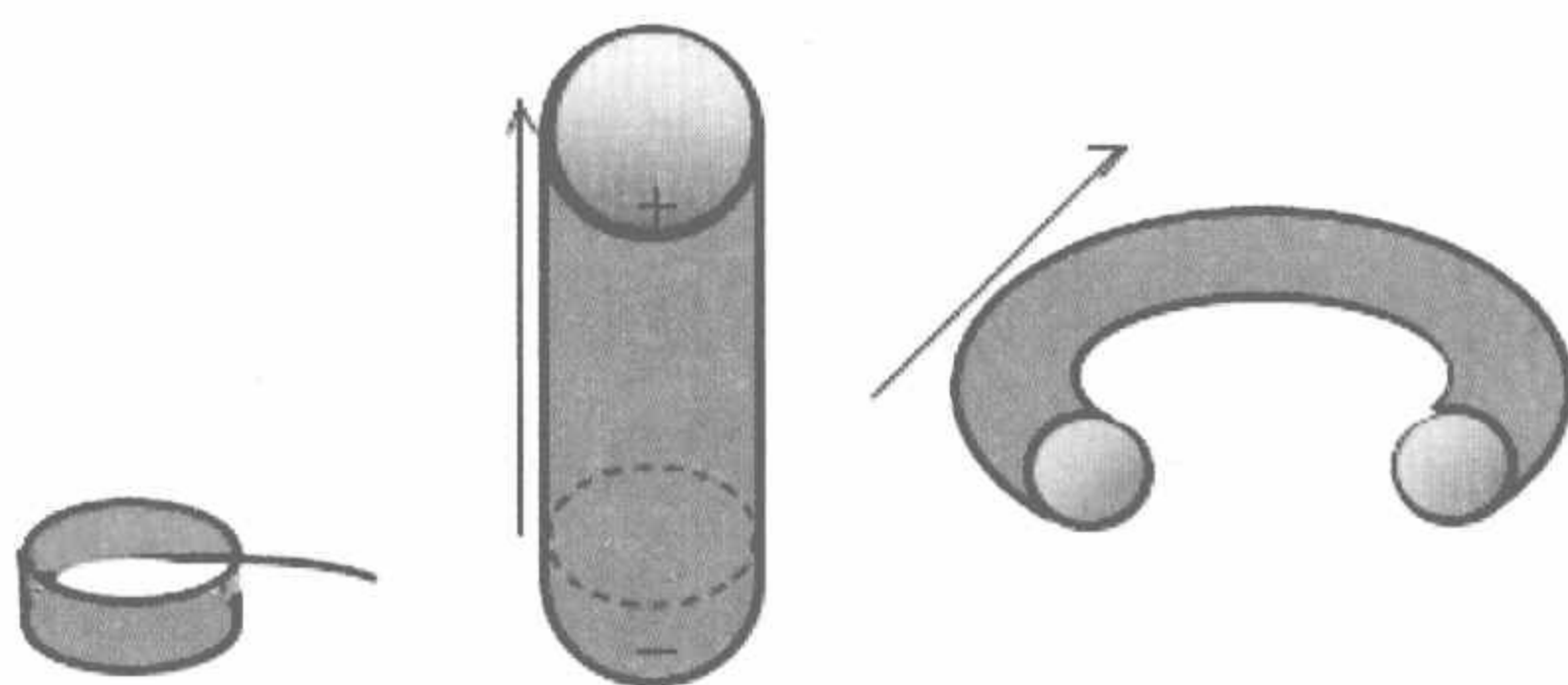
这里想说的是，利益在一面被获取，而在另一面丧失掉，然而我们注意到：客体的客体性只建立在两个主体性的结合之上，这两个主体性就赋予客体的价值达成了一致。客体同样能够在主体和彼者之间流转。

这些边的不同长度的延展可以这样予以解释：为了买出，我们需要先借钱，这使我们可记为金钱的收入（+），伴随着管理费（-），接下来是它的开支（-），同时要知道为了抵消借入的钱就要用到我们手头上已有的那些钱（+）。总之我们可以参考马克思来搞懂这些，并把剩余价值算在长方形的短边上，它被加进到整个客体的转变中，而客体的原初价值为长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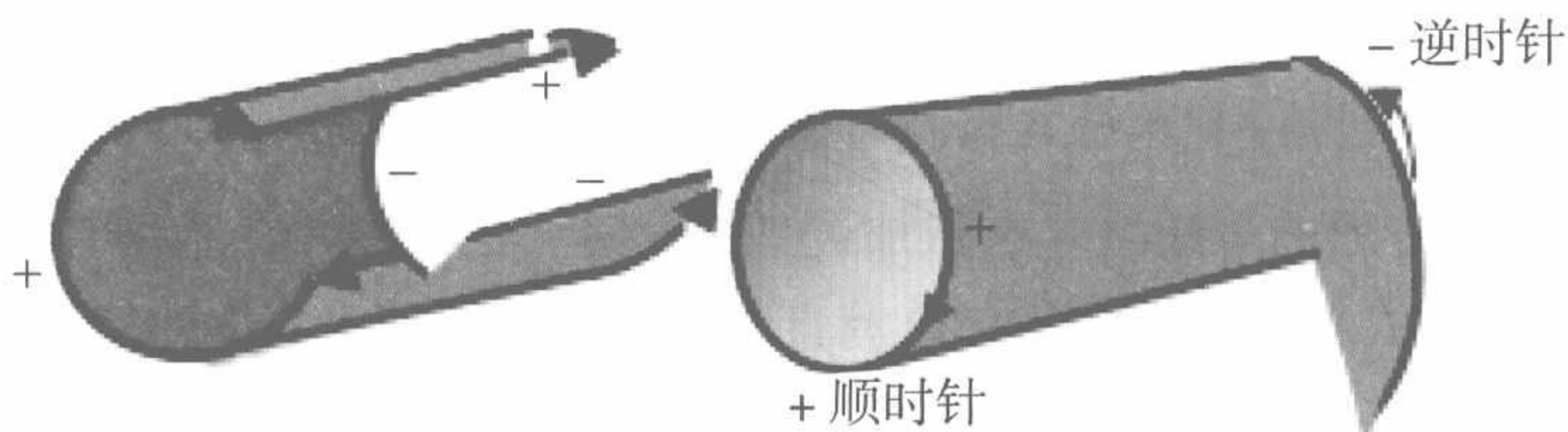
如同在所有管理得好的账户中一样，收入的钱抵消掉支出。我们可以通过由正号与负号的叠合来表示这种情况。从短边开始，这样看起来方便自然，而且这与需先付利息的惯例相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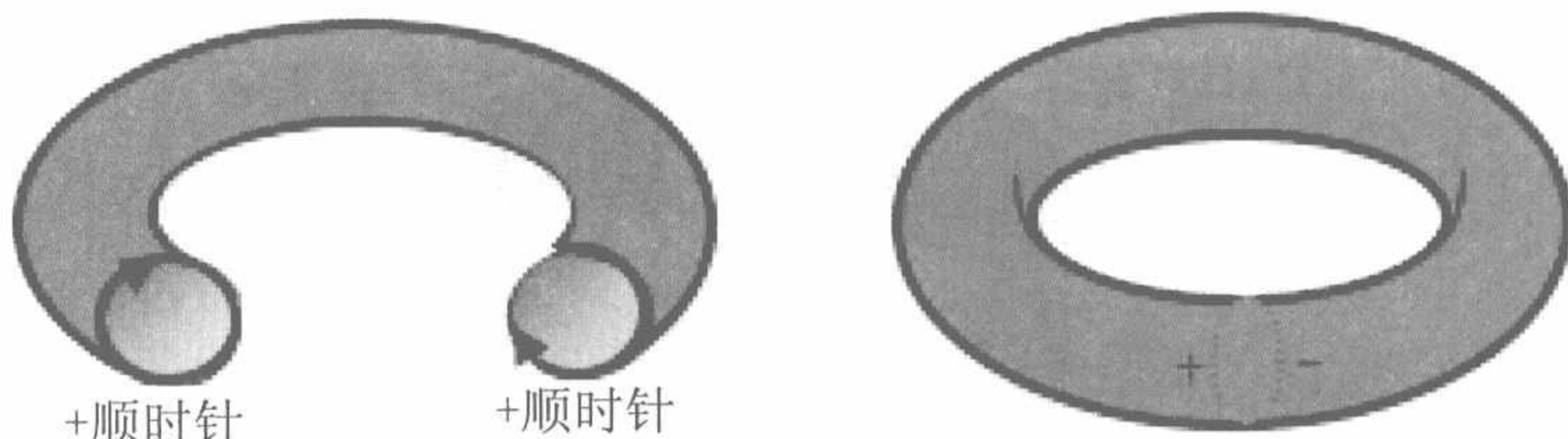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维持我们的这个已变成圆柱体的多边形的比例,如何才能让远隔着的两端连起来呢?我们必须将这种情况理解为:只支付短边上的剩余价值而不支付客体的原本价值,然而任何卖家都不会允许这么来做的。按照传统数学拓扑,我们不需要考虑比例问题:我们延伸这个圆柱体的高直到它变得比圆周还要长,这样才能使得对接的扭转成为可能,就是说,债务在纯粹意义上得以解除。



这就是说,对于卖家(他以此售出)而言客体变得一文不值,对于买家(他为之消费)同样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基本假设不允许出现这种无限增加利息或者剩余价值,直到大量的偿还远远多过资本的操作。因而,我们必须由长边开始,这和首先偿还资本相对应:



……这,允许我们更简便地规定短边为债务,也就是说利润或者剩余价值:



半圈: 方向指向一致

大于半圈: 方向又倒转过来并合并起来

这就给了我们某个看似轮胎、救生圈或者更优雅地说像是戒指的东西；它被称作环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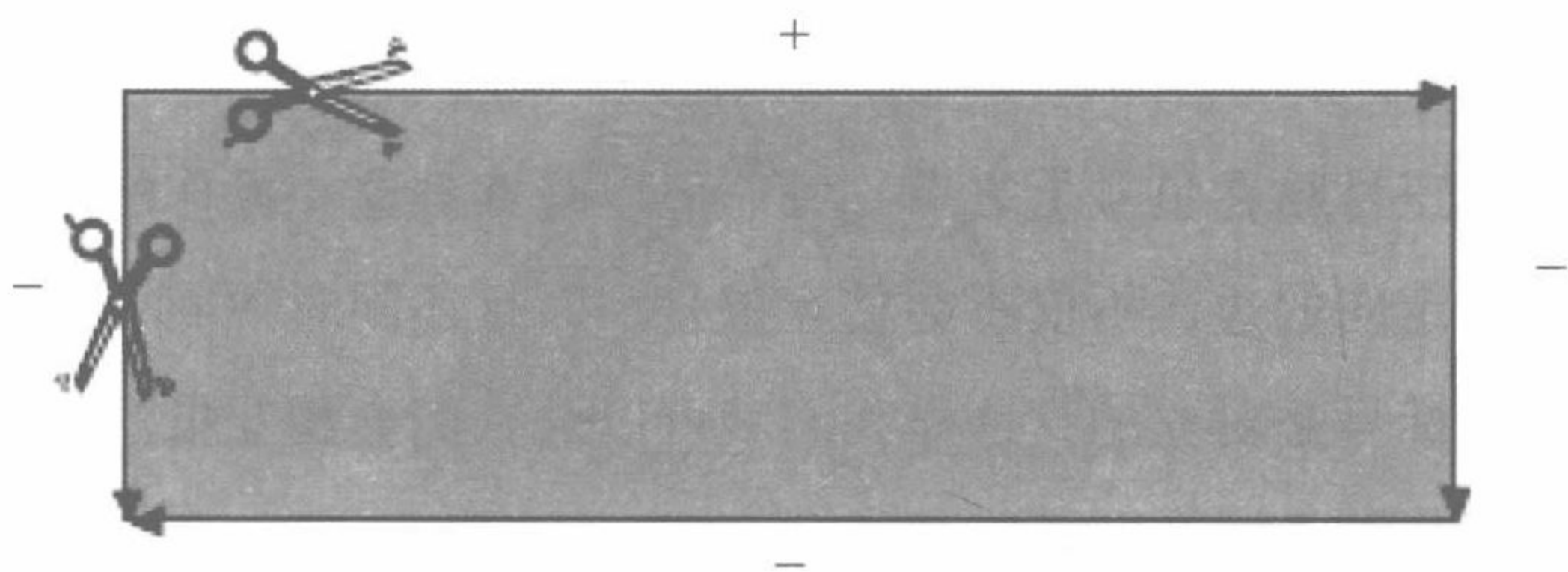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这是一种管理得好的账户的书写，或者说，一种身体形象，在其中流通的东西符合规范地循环着，每顿饮食和每次脉搏都填补掉了规律性地排出之物。

在这些负正盈亏间稳定的张力，保持着体表的稳固，就像保持着体内对于生命循环必需的空腔。而且，我们在内外之间有了一种划分，也就是说在自我和彼者之间，这允许对交流互换予以规范性地调节。

但是在我的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刚刚在现实中解除了债务，我的梦却仍旧认为还应为此付款！

应该比较一下那些考试的梦。所有人总有一天会做上那么一次：我们该再通过一次考试，可是，我们很清楚地晓得在现实中我们已成功地考过了。这可被理解为如果我们考砸了，那么我们在梦中表达出要再给自己一次成功机会的欲望。同样，如果在现实中，我有笔债务没有偿还，人们会想我通过梦找到偿债的途径。但不是这样，情况恰恰相反！

因而，价值交换的环路受到了一种干扰。怎么来对此加以考虑呢？在我的梦里，这么说吧，通过扩张，在所有这些考试的梦中，如同在鼠人的谵妄中一样，所经历的就好比我们下面这个长方形，它有一个边的方向被倒转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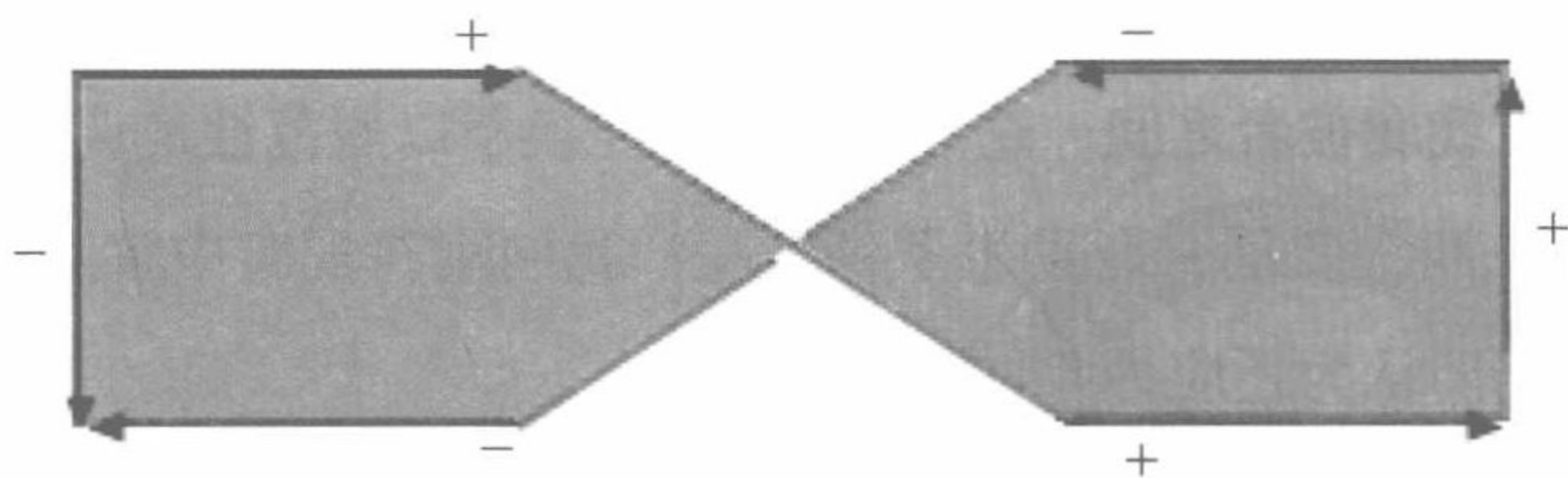


从手工的视角来看，相当有趣的是，要注意与第一个模型中连续一次剪出不同，这两剪的方向相反，而且在这里这是必须的。一次误会、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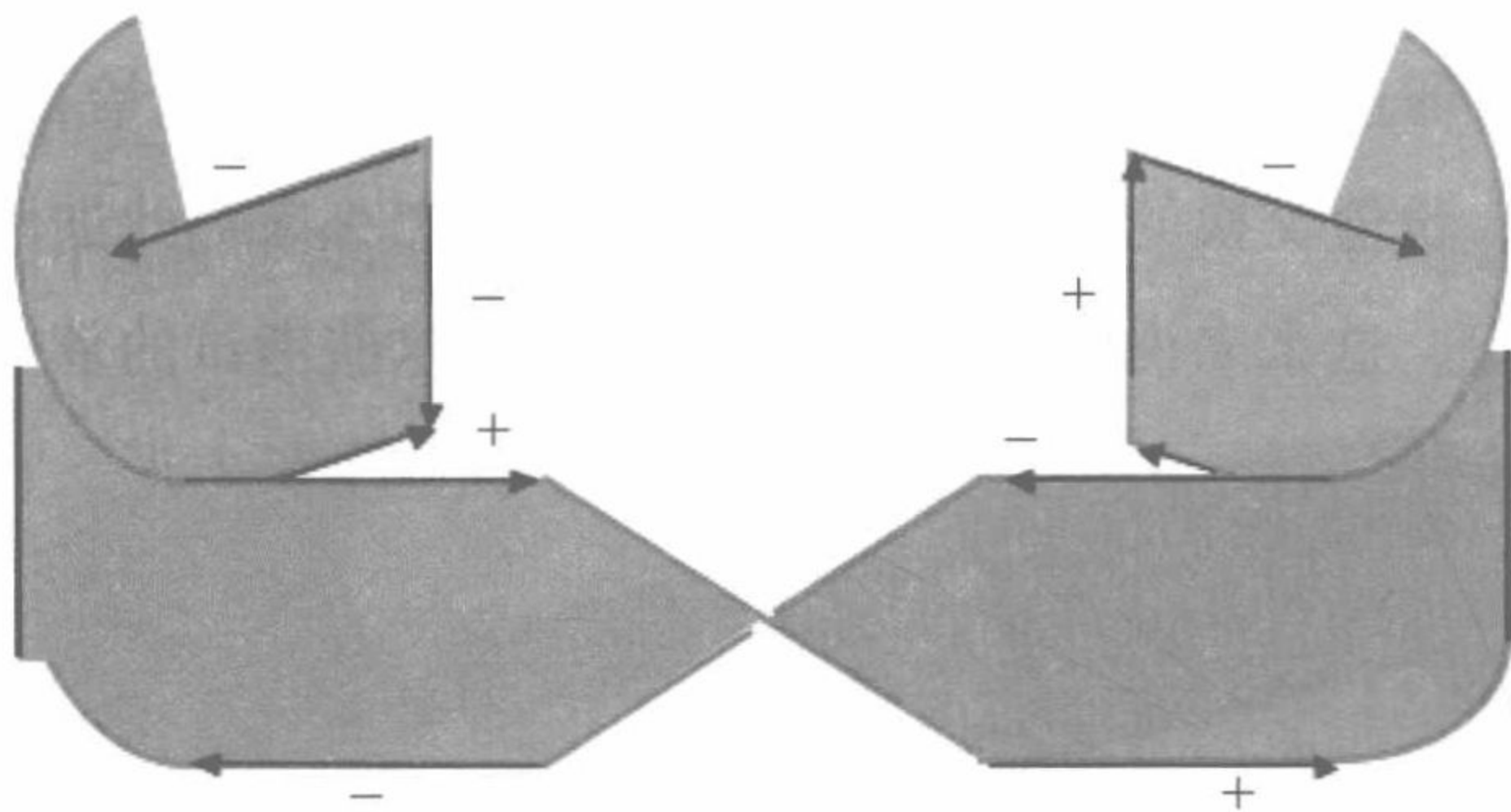
失误、自欺，账户的短缺，拒绝给出某个东西或者一种罪恶感，好比是觉得自己必须双倍地赔偿……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如前所述的方法来再次合拢上我们的这条带子，正号就不会叠在负号之上。

反过来，一笔额外的债务会添在前一笔上。偿还债务因而必然会招致一种额外的努力，这种情况我们能用一条扭转的纸带形式来写出来：



这样，通过两次额外的扭转，如前所述，我们能再度按照正号叠在负号上的方式来合上这条带子。



在把正号粘在负号上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操作的继发效用：另外两条定向的边，不仅不会相互重叠，而且还同时找回了连续性，并且相互的标号是对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它们会相互抵消掉吗？就如同债务及其偿还的关系那样？

或者相互增加？又或者这些会在不可判断下继续保持？从拓扑学的视角看，短边的对接引发了这一维度的取消，但是我们能说在长边上也同样如此吗？

想要保住我们已规定基础上的相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处在要实现这一边叠上同一条边的不可能性之中，而且它变成唯一的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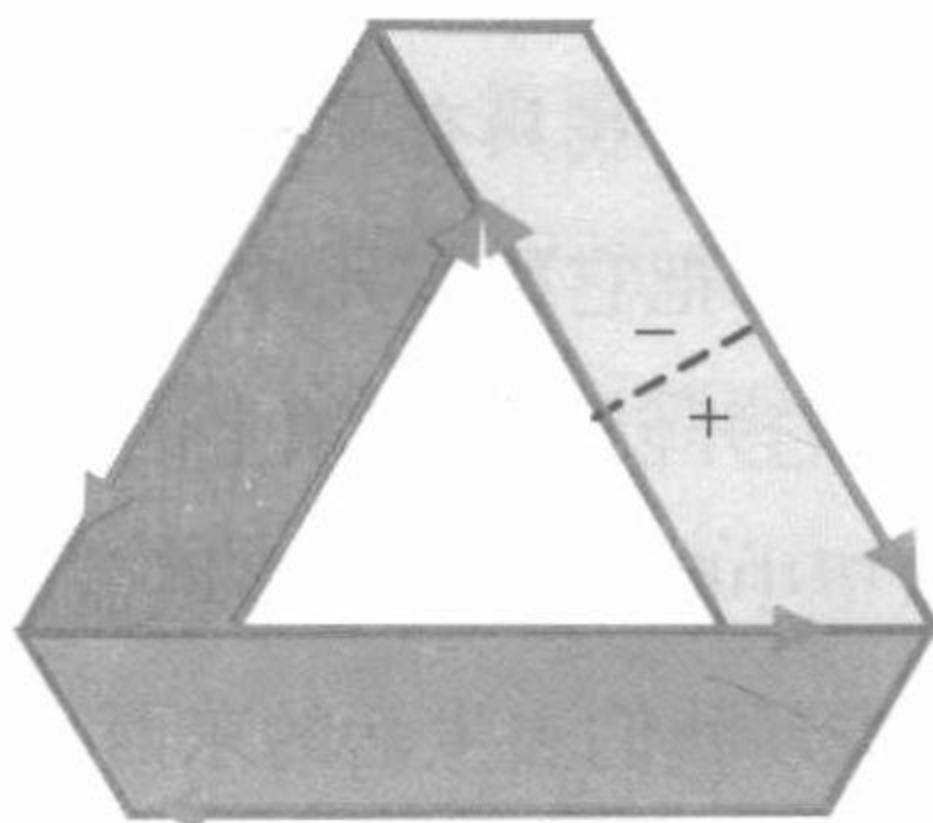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想要完全地与这个模型保持一致，我们就该注意到短边的抵消同时是有效和无效的。总体上看，不再有要去偿还的边（但变成了双倍长），但是局部地看，这个面总是还有两条边。

解释自然就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偿还实际的剩余价值，这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扭转）局部地增加到祖辈给我们留下的资本中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偿还原始的债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的具体总额到底是多少。

更糟的是：它的长度的双倍化迫使我们重复至少多一倍的偿付款。而且还更为糟糕的是：在这些剩余价值上，这并不是没有后果的。从一种视点来看，这些剩余价值确实是相互抵消了，但是由于这个基准面，从局部的视点来看，却仍然存留着，毫发无损。

确实，我们可以说这和我们在环面的实验中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抵消并不是什么也没留给我们，而是留下一枚戒指（环）。后者同时是买卖的客体和账单，这样一枚相互交易的双方带着的戒指。

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压平这个手上的东西，就会认出这是条莫比乌斯带，也就是说，要考虑这条带子的三次扭转，这样我们就能看出它的构成方式：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环面，要对接起来，两次半圈的扭转是必需的（事实上是四次：每边分别两次）。这里，三次扭转是必需的。

为了找回覆盖(+ -)的地方,我们必须再添进一种颜色,黄色。因为,如果我们把正面染上绿色,反面染成红色,我们就不能说出这第三“面”的位置:

它同时是正面与背面,在它这个局部中表现出了莫比乌斯带整体上的特征。

事实上,正面全部反转为背面,因为我们已经给了它们连续性,但是在放平的这一部分,这以确切方式写了出来。

在另外两个局部中,我们看到“正常”的价值流通,这以表面来表示:收入-绿色将覆盖支出-红色,红色在下面。

这一切好比客体的表象,即表面,它将两者之间的交换计算在内;卖出方,收钱的一方(红色),买入方,支出的一方(绿色)。

客体自身只有在科学的视野下才是客观的。作为在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客体,它展示出……至少三个面。一种是不确定的,我们不清楚这一面的属性(这是黄色那面)。这一面它代表着将令人不满的客体送回:对于买家,在满足的短短时间之后,就总会发现有点失望,并且想念着之前的客体,对于卖家,已在算计着要在下一笔赚更多的钱。

我们已在我们作为基准的多边形中简述过了,方向的偏转使我们要做出额外的扭转,但是这种扭转并没有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偿还一种债务,但就无法还另一种了。

这一债务的增添,或者是,当哪怕一点霉运掉到我们头上之时我们想要将它加进苦痛中的倾向,我只有一种方式来解释它:它表达了源于代际的基本缺失。弗洛伊德把它称作死冲动,拉康则将之称作父姓。它建立了重复和欲望,因为它开创了不可填上的缺口。我们悄悄地亏着本,而且这不是用我们在欲望中赚得的东西来填盖的。矛盾的是,这种讨厌得要命的不满足,正是推动我们去生活的东西。

可是,没有性差异就没有代际,也没有性欲。事实上,我的梦告诉我的未婚妻被扣作人质。因此,她同这个债务问题连在了一起,而且如果没有偿清的话,在我与她的关系中,我就不能再发挥我石祖的作用。

这就是阉割。可能同样出于此，黑手党把威胁罩在了她的头上。这里可能牵涉到一种儿童思想的模糊记忆，根据这个记忆，可以说女人们都遭遇过“最糟的事情”，就是说阉割。因此，威胁同样笼罩在我的头上。

黑手党，就是父母的象征，更深一层来说，是这种世代的象征，也就是我们欠祖先的那个东西——父姓——的象征。

它总是要求更多，因为这个债务是无法衡量的：我们不知道如何来衡量它。毕竟，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它所牵涉到的是实物还是虚物/无，是正面还是反面，是我们带着感激欠下的既是金钱也是符号遗产的一笔款项，还是我们觉得被欠下的并且耗尽一生去讨的一笔符号的款项，因为我们看重的是没有给予我们的那些我们自认为有权去期望的东西。

有些人揭开一边的封口（重复无止尽的答谢，几近牺牲）；另一些人，则揭开了另一边（乐此不疲的索取，几近勒索），但是，在所有人那儿，这种强调某个侧面的方式始终是一种错觉，一种掩盖问题的根本模糊性的方法：掉子儿也算几颗子儿。^①

石祖，我们大概对它心中有数：它的在和它的不在，这都被孩子视为两性的差异，好比沿着莫比乌斯带的边上的那些箭头，它们处在相反方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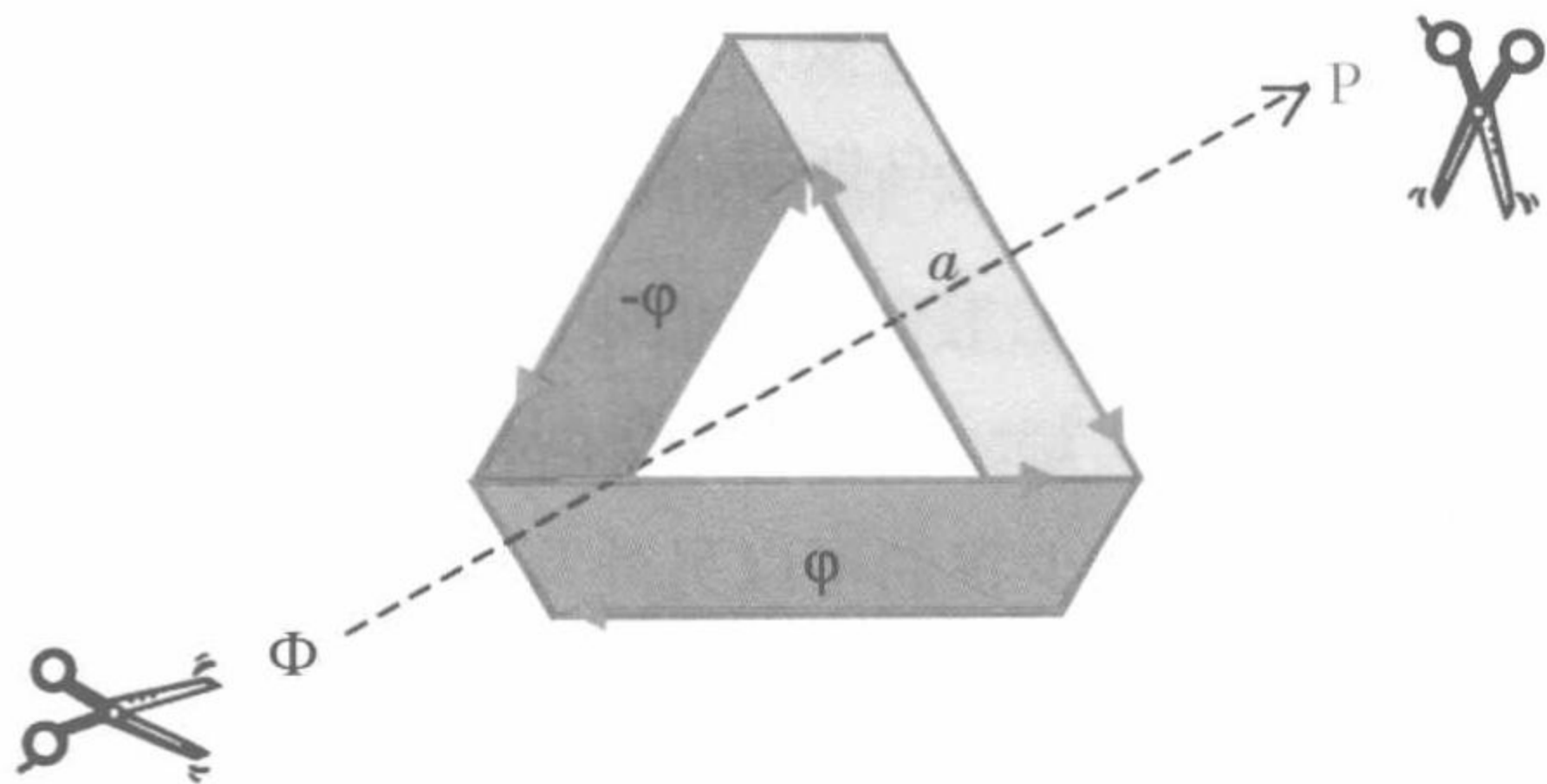
等式可以明白易懂： $1 = 0$ ，或者还有： $\varphi = -\varphi$ ，这是最糟糕的东西，笼罩着的威胁，阉割。至少我们可以另外写出等式： $-\varphi/\varphi = -1$ ，这至少为我们构成了一个认同的底座。但是这联系着另一个解答的等式，其中等式的一端留有一个完全的未知数。按照弗洛伊德的等式：阴茎 = 孩子 = 钱 = 大便，来填补一个缺失的，就是石祖的等量物 = φ ，它是缺失的基准，因为它在身体上显示出来。这是从局部看的莫比乌斯带的读法：在局部上，它总是一面正与一面反。

^① 原文：“un déçu vaut des sous”，词语游戏。déçu（落空，失望）与 dessus（正面）发音相同，des sous（钱）与 dessous（背面）发音相同，vaut（值，等于）直译为“落空也值几个钱”，同时表达了正面与反面的相悖又相互翻转的关系：“正面就是反面”。——译者注

但是，我们欠祖先的、比原本的要多得多的东西，只有在从艰涩的话到铭文、到由被遗忘了的语言（如同尚波力翁之前的圣书体）写出的最难读懂的、经由岁月摧残而风化的，甚至类似于一些从未传入文字阶段的原始符号的、耗尽心血才能被破译的东西当中才能读出。

这里是那个作为超我的命令出现的東西，莫洛克神永不满足人们为他而祭祀的受害者数目。 $\varphi/x = a$ ：石祖被未知变量所除，在拉康那里得出了客体小 a ，就是说客体的那个无法抓捕到的部分，残留下来的部分，它不停地为欲望上着发条。

从整体来看，莫比乌斯带具有唯一的一个边：正面，就是反面。分割^①（除号 /）的操作者，第一剪，就是父姓，即 P （必要时可以是：父性）。石祖分割的操作者（/），是相反方向的第二剪， $-\varphi/\varphi$ ，我们称之为符号石祖， Φ （必要时可以是：男性性）。两剪刀方向的矛盾，阻止了分割的这边或那边刚好全部剪尽。



大部分的时间阉割的 $-\varphi$ 都是无意识的，如同一个预算中的洞，它被意识上对一种石祖信用收入的呼唤所覆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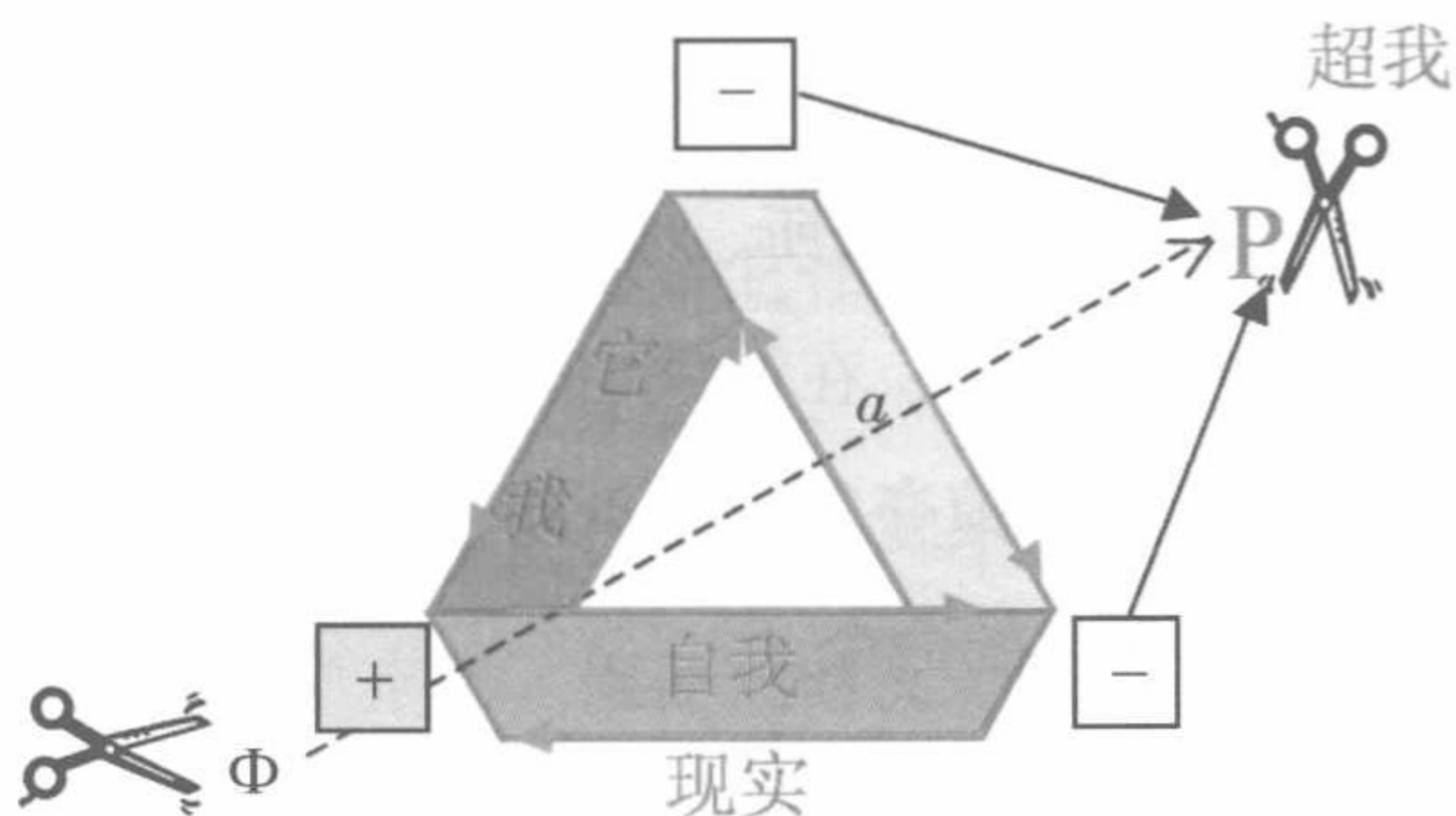
通过书写的定向区域正反面的等值，它们想象中的等价得以标记出来。然而，这种分割却受到了干扰，这是因为与它相连的另一种分割，即父姓引发的划分，阻止债务被全部叠盖抵消，如先前所做的环面中的

① 分割，这里也有除法的意思，因为用莫比乌斯带剪刀所做的分割和拉康公式的除法是一个操作。——译者注

例子显示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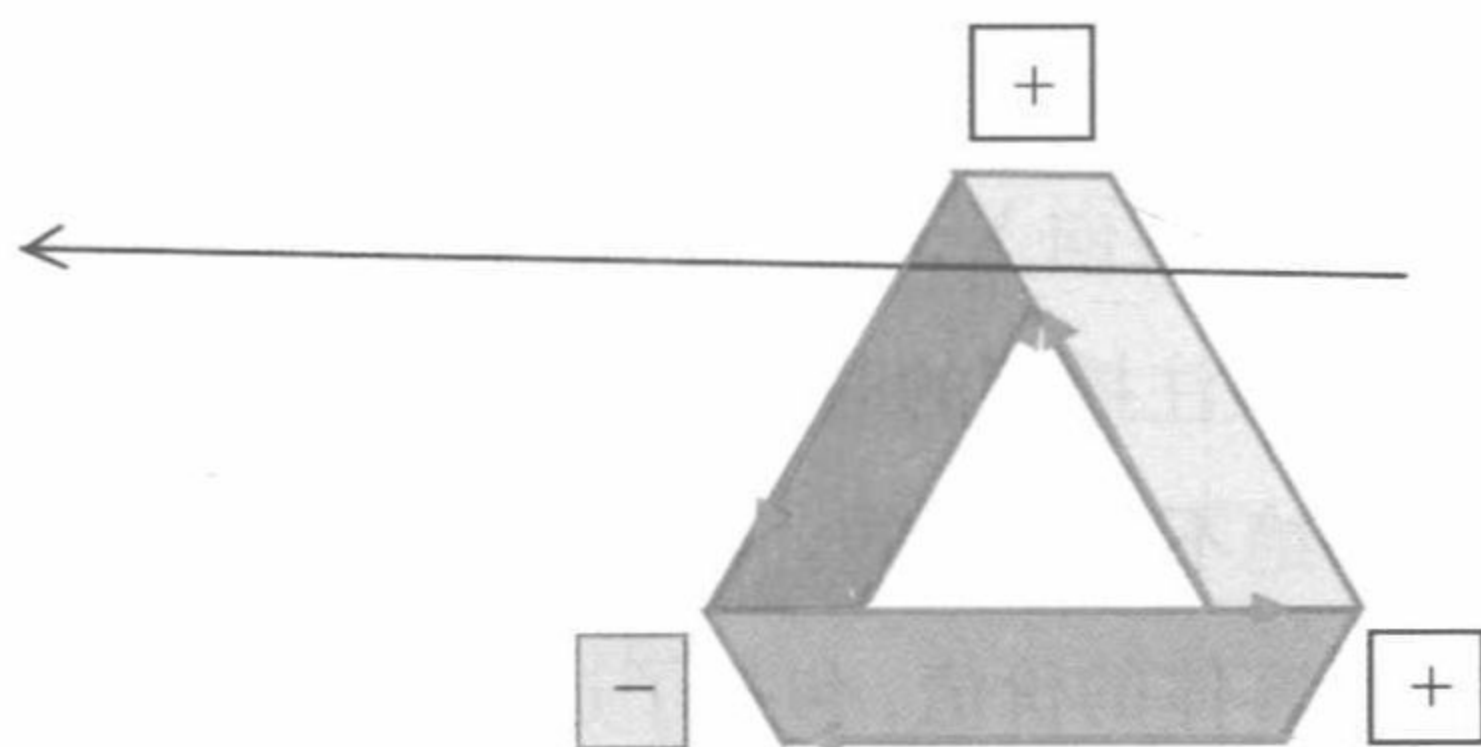
方向迷失的那个面 a （同时是正反两面）禁止了 $-\phi$ 完全消失在 ϕ 表面之下，这就给出了压抑终归失败的理由，弗洛伊德曾很好地指出过，这个压抑的失败就是我现在为止一直用债务的抵消来做隐喻的东西。

一切源自被压抑范畴的，都或多或少在这个阉割的标记之下：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它我了，而与外部现实相联系的这个区域却是强加的，因为在欠下祖先的债务——就是说父姓（P）——之后，受支配的自我在超我命令的督促下压抑了阉割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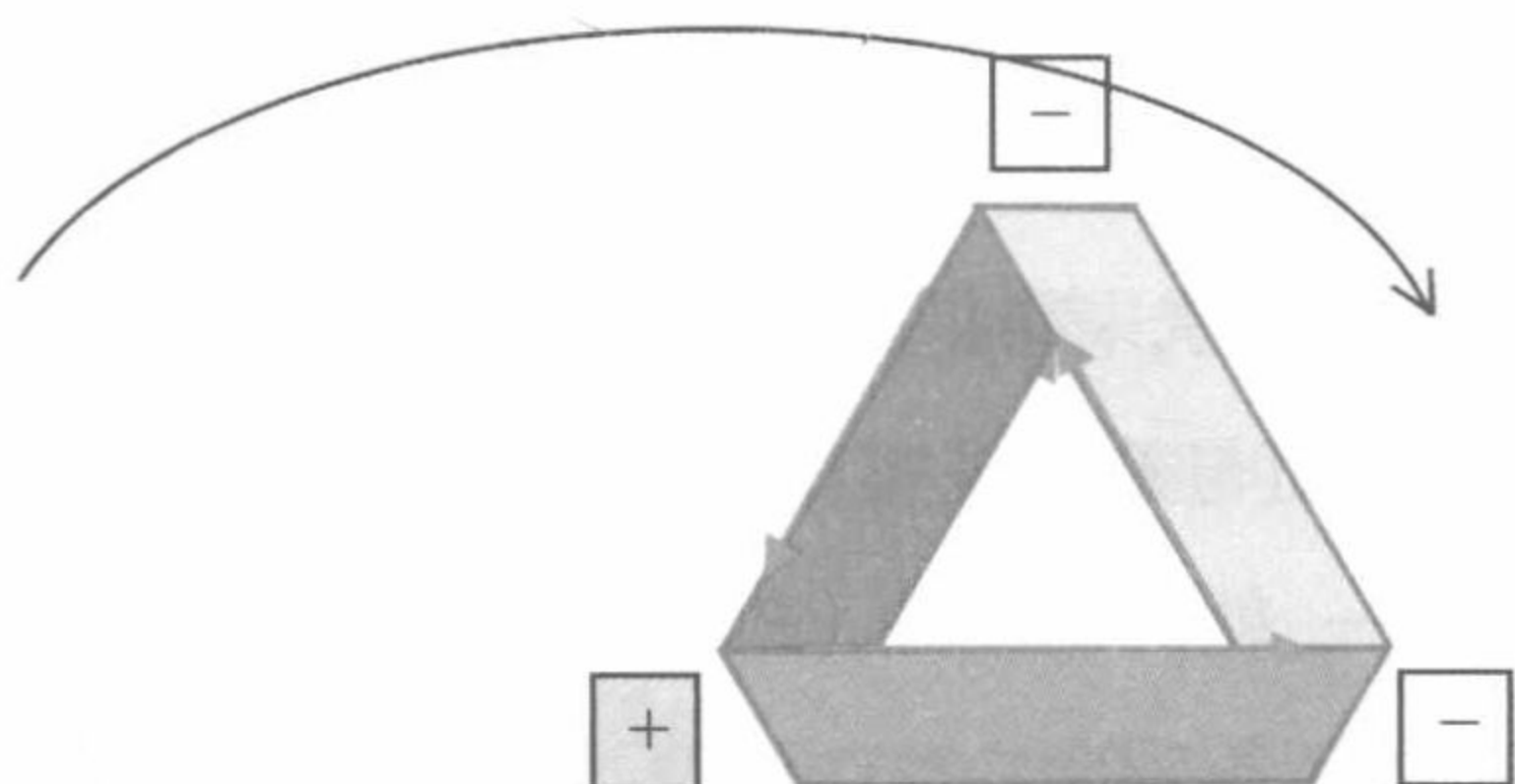


要完成这个形式化，我们可以从莫比乌斯带的书写中抽出一个十分有趣的特征。

如果给出任意一个方向，例如反时针，我们看到两个扭转处是朝同一个方向的（正面到背面），而另一个朝相反方向（背面到正面）。一个负号对着两个正号。我们在那儿就有了对无法估量的债务的书写。



通过选择顺时针方向，我们得到颠转的对照图，一个正号对着两个负号，代表无止尽的讨债：



这并没有涉及两种结构，而是恰恰在同一个莫比乌斯带上观察到了两种不同的视点。每种视点因场所、对话者以及时机的功能而有所变化。

我的梦凝缩了两种视点：在讨债中，我是个赌徒，如同在赌场或者在某个替代中（替代要去掠夺的父亲）期待偶然好运的年轻犯人；在债务中，我希望履行黑手党的命令。

正号和负号的不对称对应着我们引入基准多边形中的异常：我们描述了在联结 Φ 与 P 关系中的不匀称。

为什么在这种不对称的对立中没有再认我们两次原始的剪切在方向上的差别呢？

不匀称显然是与正号和负号的变换相一致的。 Φ ，是一次扭转， P 则是相反方向的两次扭转。债务总是至少两倍于它本身。那里就是梦中再度偿还已还过金额的必要性所在，也是再进行一次已成功考完的考试的迫切需要所在。在另一个方向上也是同样的，就是说面对给予我们的不公道，追讨的总是其它东西。

扭转总是代表转账（转向），即弗洛伊德的 *Verschiebung*，在对彼者的力比多的或金钱的投注摇摆的时刻。假如这个术语是弗洛伊德从银行用语中借用的话，那绝不是偶然的。

涉及的是我们赋予客体的价值，包括了这些爱的客体，即：别的主体。

如同他曾给我们指出的，一方面，力比多总是摆动在自我和外部世界（自恋 vs 性力比多）这两种事物之间，另一方面，也摆动在外部世界的多种客体之间，因为，从结构上讲，任何一个都不会显得令人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时间维度中的扭转运动：偿还债务、借出款项、客体更换，都是力比多的出色表象。

如果 Φ 和 P 是函数，即除数，那么在拓扑学书写中它们就不能被客体所表象。它们是没有被写出的东西，处在那个环绕着被表象客体的洞的第三个维度之中。

这些扭转，虽然只能被分离了正面与反面的边缘所代表，却给出了一种书写：运动的轨迹，已经做出的或者将要产生的，但是时间的运动之所以不可能书写出来，是由于这种轨迹本质上的静态特征。我们在这些边缘中认出能指的轨迹——即字母，它作为话语的记忆被写下来，而这些面上写下了这些能指所产生的所指。

因而这就是语言的结构。在此结构中，一个能指根据上下文（边缘的相反方向）可以朝向一个方向，但是同时又朝向另一个方向，或者朝向不同扭转变换的方向，如同莫比乌斯带的结构所展示的那样。

能指并不等同于其自身，而整个文本则表现为一个不包含其自身的集合。如果 $\varphi - \varphi = 0$ ，那么 $P - P = x$ 。一个能指总是反映着另一个能指，而不是某个确定的所指，这可以写成： $[S \rightarrow S']^P_\Phi$ ，并且我们可以沿着莫比乌斯带的边去阅读它。

被阻碍的雄性气概

帕斯卡·阿苏^①/著

石岩/译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一个中年男性同性恋分析者的个案，呈现了在该分析者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禁止、母亲的拒绝——阉割——的缺失，如何使他不知道如何成为男人，也不能成为男人，如何阻碍了他雄性性的建立。此外，在分析的过程中，分析家通过游戏场景帮助分析者理解了幼年场景与当前场景，同时也目睹了分析者的父性与男性性的进展。

【关键词】个案 阉割 雄性性 倒错

我曾是我母亲的儿子

我想成为我父亲的儿子

父性——男性性。这两个词中的每一个都回到其自身当中。我从男性问题出发而使二者相交，这个问题是由我的患者雅各布提出的。为什么是这位患者？因为，为了询问他自己的男性性，雅各布询问他父亲的父性和雄性的立场。我发觉我笔尖流出的是“雄性”（viril）这个词。我将保留这个词，因为它比男性性这个词更好地表示了和石祖及阉割的关系。但愿我们可以认为从一者到另一者，从父亲的雄性性到儿子的雄

①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

性性，有一个连续性。这是雅各布的心愿。我们将会看到不可能用连续性来思考。正相反，传递的问题被提出来了。你们知道，传递这个词有两个方面：连续性，例如一种遗传疾病的传递，和不连续性，在这个词的文化传播意义上的传递。我们打算说，在父亲和儿子之间有一个传递。这个传递对儿子的雄性性是否有一个冲击？如果是，我们谈论的是哪种传递？这个传递由什么组成的，它又是怎样运行的？传递的目的是使一个儿子成为儿子，然而到何时儿子的雄性性和父亲的雄性性才被牵扯进来呢？在这个传递中，母亲又是什么角色？

我们最常从其病理方面进入这个疑问。人们来见精神分析家是因为有问题。我们同每一位患者学习。和雅各布的相遇使我能够触及男性身份的危险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这个男孩与父母精神上的倒错（一个被动的父亲和一个主动的母亲）相对质时遇到的。一个没有提供阉割的父亲和一个因为太亲密而没有提供阉割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男孩如何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vertical）^①男人？我之所以用这个词，是因为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雅各布的请求的中心。这使我有机会重提“雄性性”这个词，它很适于我要研究的问题：雄性性这个词指成年男人身体的、性的特征。它也指人生的一个阶段，青少年期的结束，在人生的这个时期，一个男人触及其全部力量，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让他担起责任。^②这和成熟同义。它不仅仅涉及身体特征，还包括在文化上赋予成年男人的一组性质：坚定、勇敢、有力、魄力。它指示着与男人相称的一种态度或雄性行为。^③

因此雅各布请求精神分析家帮助他走向“顶天立地的”男人，即走向其雄性性。

雅各布是一位非常吸引人的患者。他依恋他的分析家。他用其全力

① 这是本人的一个联想，是中国理想的男人形象。原文 vertical 指竖直的。——译者注

② A. 德布罗格利（1868年）：“法律通过要求他对其所有行为都担起责任的方式，对其雄性性表示了更多的尊重”。

③ 强调是我加上的。

依恋她。他从没有缺过一次治疗。他“玩游戏”、带来梦、对我生气，把他的焦虑、他的问题告诉我，试着用最准确的词来表达他的混淆。他不断地对我说他一文不值，他是个懦夫，他仅仅是一个废物，但是我知道他远不是他所说的这些。雅各布刚刚失去一位朋友，他死于艾滋病。雅各布一直陪伴在其左右，直到最后都没有抛弃他，这显示了仁慈和勇气。他是一个工作的男人，是一个承担危险的男人。在治疗过程中，他越过了一个坎：尽管他被一家药店所雇用，他还是买下了一家药店，并担起责任。虽然不是没有焦虑，然而他还是这么做了。正是他，在其分析路程的最后决定独自面对他的人生，尽管他害怕把自己托付给自己。

雅各布这位患者抓住了我，因为我看到他在和自己内心的恶魔战斗，我看到他为他的那些矛盾坐立不安，我看到他试图给我设下陷阱。尽管有时他的转移性投射非常消极，例如我是一个全能的、虐待狂的女人，但我还是感到他爱我，我感到关系的存在。我感到在我们之间有着情感的和情绪的真正交流。当有这个联系时，我就可以依靠它来引导他走向分离或抛弃。然而他对我有一个要求：我告诉他我凭什么占据分析家的位置，我凭什么允许自己要求他正视缺失和挫败。他询问我的分析家的欲望。他测试我的可靠性。他力图赶走我可能藏在后面的那些伪装。这完全不是一个静止的精神分析……他使我前进，在某种意义上上说，我们一起前进。在治疗过程中一项工作在进行：在他那边，他继续他的思考，在我这边，我通过写下治疗材料而思考。对我来说这像是在做第二次治疗。今天和你们一起，这像是第三次治疗……

雅各布来找我做分析时有 40 岁左右，他来找我是因为他的前任分析家刚离开他去外省了。这就马上告诉我，他需要一个彼者在场以便解决他的问题。有时候没有精神分析家的话他无法单独待着。

他说他在性关系中被动的同性恋角色让他受够了。他希望成为一个异性恋者，或者能够获得一个不是那么被动的、“竖直的”位置。

他在突尼斯的整个幼年时期——那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和父母有一个分离：在 5 岁的时候他妈妈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把他送到一个儿童

之家待了6个月，对此他感到非常痛苦。这个分离因第二个分离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他爱上了一个女辅导员，可他必须离开她，因为他父母来找他了。分离、爱的欲望、诱惑全都混杂在一起，好比温情和性纠缠在一起，^①并带给他极大的窘困。第三个分离在他10岁时发生：因为他妈妈生病，他被送到法国一段时间。第四个重要的分离在他17岁时发生，那时突尼斯独立了，所有法国人被要求返回法国。这次的分离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是一种流放。在法国他再也没有找到童年时故乡的声音和气味。为了回应他父母的欲望，同时也因为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学什么，他学了药剂学。这给他留下了一个中心问题：我究竟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我父母而学药剂学？

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家庭一样，这个家庭非常团结，祖父母和父母住在一起，叔叔们和婶婶们在楼上住，堂兄妹们在楼下住……几代人在同一屋檐下，这带来了好处和限制：杂乱、没有隐私、每个人对其他人不断注视、几乎参与父母的性生活、家庭内的出生和死亡、父母的争吵或歇斯底里的反应到处蔓延，进餐、宗教仪式、隔开家和学校的那条路。沿途有密谈、有恐惧、有震惊、有勾结。雅各布在这条路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被禁止的、复杂的事。雅各布在这条路上逃避监督、尝试有罪的性诱惑，并且熟识了他的同性恋。

雅各布把他的父亲描述为一个虚弱的人，不知道怎么对抗他自己的父亲（雅各布的祖父），那时祖父要求他父亲放弃学业接手家族的商业事务。他把他描述为一个残废。

雅各布把他母亲描述为一个比他父亲小很多的女人，被生活所吸引，却从没有也不敢去品尝。他说他母亲如何地依恋年幼的他，并且现在都还依恋他。

在雅各布的回忆中，我选出其悲剧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段。他说他想起当他还很小的时候，他想要去父母的床上找他们。当打开房门的时候，

① 我参阅了S. 费伦齐的“言语的混淆”（« la confusion des langues »）这篇文章。

他惊讶地发现父母正在做爱。孩子很惊讶、震惊。他逃了。他母亲回到他身边，并且为她所做的哭泣。雅各布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的不是看到这一场景带给他的冲击，而是强调他父亲对这件事什么都没说，他父亲一直沉默。他说：“我多么希望我父亲把我赶走，赶回我自己的床上，并把妈妈留在他身边。”为了让这个片段成为基础的、结构性的，雅各布还应该加上，“我父亲应当让我离开，告诉我那没有我什么事。”然而事实相反，父母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对不起他，而小雅各布又能把妈妈带回身边。这一场景是真实发生的，还是作为一个屏蔽记忆而被构成？不管怎样，它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男孩没有遇到一个禁止母亲的父亲时，他将来如何成为男人？当父亲被动、母亲主动时，当父亲不是阉割者，母亲也不是阉割者时，他将来如何成为男人？即使雅各布能经历第一次排除，这第一次的经历也无法保证结果，因为他父母并没有承受它。第一次被排除在父母的性场景之外，当父母并不否认它时，这第一次排除就具有阉割的隐喻的价值，并可以是符号性生成性的。阉割的符号性参考系的产生是以父亲代替（pour）母亲为基础的。我们理解为什么雅各布在他的分析中不断地试图和我“谈话”，这是为了确认在我身上有一个可以给他界限、禁止的“父亲”，并且我可以用比我更强的、不仅仅是一时兴趣所在的某物的名义来承担起这些界限和禁止。我可以以代际传递的名义来承担我的话语，即认可对直接享乐的剥夺，以便在亲子关系中给出一个位置。

在分析中，我愿意加入他的游戏（如果不这样就没有分析，因为没有重复），我愿意和他在他的场景中游戏，但是我会保持一种不对称的位置。我将在我的位置介入。尽管分析的空间成为一个场景，有点像戏剧的场景，尽管我们在这个游戏中是搭档，他还是理解了我们不是从同样的地方开始做游戏的。只有位置的不对称被理解了，代际传递的条件才能产生。通过拒绝所有混淆和还原的尝试，我极大地保证了位置的不对称，这允许他在他的幻想表达中走得非常远。

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提到游戏和游戏场景。我们的谈话采用这个

基调，是因为他的神经症的倒错维度。这个倒错维度追求在治疗中获得享乐。它使精神分析家成为倒错的帮凶，使他成为剩余享乐——讲述基于一种倒错的方式——的享乐证人。实际上，雅各布在他的治疗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维度：顺从拥有一个享乐的收益。精神分析家可能被卡住，病人也同样如此，因为精神分析家是法律的所指对象，病人通过……接受其法律……而有直接快乐的奖赏。这样一个忍受法律的位置是直接享乐的位置，直接享乐剥夺了法律在未来构造一个男人的希望。能够给雅各布最大帮助的是他能找到某个可以较量的人。我重述一下德布罗格利就雄性性所说的话：“法律通过要求他对其所有行为都担起责任，对其雄性性表示了更多尊重。”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布力争精神分析家要求他为自己的行为担起责任，同时希望在雄性性方面得到发展，这正是他想要在他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然而，尽管带着这个要求，但通过无意识地变成这个法律的客体，雅各布走入了法律的阉割及结构性维度的歧途。他没有成为法律的主体。

引入场景这一维度既是引入享乐以及创伤性因素的在场、重复，又是引入另一个可能的立场……因为游戏有规则。引入场景这一维度，就是允许倒错神经症的在场，而不是说唯一的回应就是这种在场在分析家那里引起的防御。实际上，这使得精神分析家可以不受分析者想要引诱分析家、变为“一”的企图的诱惑。这并不是任意一个一，不是欲望的一，而是混淆的、无法区分的一，享乐的一。通过完全依赖于我的目光，雅各布试图使他和我们像同一个人那样行动。在他和我们之间，在他把自己的意愿说成是别人的，并把源自他那里的行为转移到别人那里的意义上，他童年时遇到的颠倒在不断地重复。例如，相比说他抛弃，他宁可说他感到自己被抛弃。

我在分析中所追求的，是让雅各布在拥有自己身体的意义上能够作为和妈妈分离的人而生活。自己的身体意味着一切都不是在同一个地点、不是在妈妈的地点发生的，而是在两个地点：孩子的地点和妈妈的地点。言下之意是在两者之间既有一个边界，又有一个可能的通路，因此就有

两者之间的循环。精神生活是在内外之间、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循环的可能性。正是在这里，转移概念获得了其全部的意义，因为如果有转移，就必然有两个场景：幼年场景和当前场景。对精神分析家来说这个概念越清楚，幼儿期场景就越有可能没有危险地在当前场景中重现。场景的框架允许在双重模式（经历模式和游戏模式）下处在异化经历中。雅各布和我，我们处在一个逐步写成的场景中，他是这个场景的首席作家，而他和我是这个场景的两个演员，每个人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例如在转移中，我是允许他承受自己性别的母性的 / 女性的在场，因此我是一个允许他承担他的焦虑的女人 / 母亲。然而我也是他与之争斗的母亲，对雅各布来说，这个母亲想要他全都属于她……

雅各布需要在当前场景中再现幼年场景，在那里，他任凭自己投进小彼者的享乐里。对他来说，在正向转移之处必然存在激情的、妄想狂的、投射的负性转移，在那里被爱变成了迫害，在那里一切成为了信号。即使这个转移被如实地向他指出、揭示，而且即使精神分析家被迫处于负性转移中，他仍需要感受到负性转移。对一些地点（那里有对新命题制作的阻碍）的逐步揭示比对其位置的澄清更有效。

看上去雅各布甚至没能渡过青春期，因为他说，“为了从小孩的场地到大人的场地，为了背弃孩子，我需要一个身体来‘包-含’我。”他还补充说，孩子有一个意义，此意义属于父亲-儿子这一秩序，然而成为青少年就是要撇开他的起源，脱离父母，创造自己的意义。实际上，雅各布对我说，要抵达男人的位置就需要有身体。哪种身体？注意，精神分析家不是没有身体的，他的身体很重要！

我们回到雅各布情况的复杂性上来：当雅各布的父亲不能够作为一个给予他阉割的父亲时，雅各布就去他父亲那里寻找阉割，他就将在他父亲所在之处，即在痛苦中寻找。怎么理解占据雅各布的这种长久痛苦？这种痛苦变得受欢迎。怎么理解他的受虐狂？我认为因为缺乏传递，这种痛苦不仅仅是倒错，也是过渡、桥梁。它搭建了与父亲的联系。它是对父亲的呼唤。

为了主体得以构成，必须存在与大彼者的最初的享乐关系。在对大彼者的享乐中，有第一个基础的关系。虐待狂力图制作的正是这个关系。雅各布在之前的治疗中对我说过，他甚至想要在治疗的焦点中找到痛苦，以便这不仅仅是精神的一再重复，也为了“您存在”。他又说“我向您保证我的痛苦。”用登山的术语来说，用绳索保护某人就是放置牢固的登山钉，并用一根既柔韧又牢固的绳索拴住他，使他能够在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跨越这个空。因此雅各布对我说他的痛苦是一种相互保险。他的痛苦充当了与大彼者的粘合剂。如果大彼者没有牵住他，雅各布就有跌落的危险。因此他的首要任务不是为自己存在而是使大彼者存在。

然而为这个关系付出的代价难道不是雅各布的雄性性吗？难道雅各布没有无意识地牺牲其雄性性以维持与父亲的关系吗？难道雅各布没有为了对父亲的爱而牺牲其雄性性吗？在使自己成为男人的男性品质与在女性的被动位置获取享乐的方式之间，他感到强烈的不协调。他将这种不协调体验为一种双重身份，如同我们说的“双重代理”，这个代理到处弄虚作假。他像一个造假者那样生活。这就是他为什么强调真相。他的真相又是什么呢？雅各布不是直接询问其雄性性，而是询问其真相，因为他知道他的雄性性并非和他的真相无关。每个人都有与享乐分离的问题，以及面对孤独的问题。他说：“谁制作了我的真相？为什么我要在我之外寻找它？为什么我宁愿选择抛弃而不选择分离、不选择孤独的危险和差异的危险？”因此雅各布必须能够分离，以便这个分离是结构性的。雅各布无意识地害怕离开他父亲的这个事实，不仅仅会把他自己的生活置于危险中，也会把他父亲的生活置于危险中。我们也看到，对雅各布来说分离仍是创伤性的。我们看到雅各布缺乏父亲的话语，因而不能跨越由原始场景的最初排除所打开的空间。我们看到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告诉孩子，相比父亲而言，他才更多地是她欲望的客体。我们看到家庭环境是乱伦的。我们看到雅各布喜欢听凭自己被其他人的欲望和享乐工具化。小彼者的诱捕性享乐比他自己想要性化、想要分离的欲望有更多的利益。

我们看到雅各布已经放弃了。会是永远放弃吗？不是，因为如果那样，雅各布就不会来找精神分析家了。雅各布尤其没有放弃的是他的男人的尊严。虽然这是折磨。难道这个折磨唤起的不是拉康在结束其 1948 年就侵袭性所做的发言时说的我们的“兄弟之情”^①吗？当然是。我补充说，这个折磨不仅仅唤起我们的兄弟之情，它还给分析行为一个庄严的维度。雅各布说，一个性化的男人，就是“获得话语 / 发言”，不是发彼者之言，从彼者那里获得或拷贝它，而是在承担他自己话语的风险的意义上发言。

很久以来，我都问自己，为什么每次与雅各布的谈话之后我都要做这样一个文字的和思考的工作。我认为，为了转换其话语、治疗经历以及所出现的享乐，这是必须的，这是要转换所有这些东西，给它们一个形式、一个话语行为的价值。就我自己的思维活动的转换来说，就像我对雅各布说的，他不仅仅是其他人的生活的盗贼、下家，他也可以带给别人思考的活力。我还对他说或许最终他会成为由我们两个人的思想交织而被改变的他自己。怎么称呼这个思考功能？它属于谁？属于母亲？属于父亲？属于全人类？

为了让儿子能够服从于父亲的法律又不因此放弃他自己，不因此屈服于它，该怎么办？父亲不应该把儿子看作终结，而应将之看作传递链中的一环。在某种程度上，父亲应该知道儿子不归他所有。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链条（从本质上说它自身就假设了分离）的话，那么儿子就不能服从于父亲的法律，因此也不能给他带来意义。换句话说，父亲应当能够给儿子提供一些可以获取的东西，比如石祖，而不是就此被放弃。这意味着，父亲和儿子之间时空不同：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和时间中。父亲强制执行他的法律，这是为了给出一条通道。当孩子在他父亲那里找到使此道路成为可能的权威和温情时，他也可以转为男人。

① 拉康：“当他来找我们时，我们所接待的正是这样一个动人的受害者，他打破了使现代人献身于最可怕的社会苦役的律令，不负责任地逃到别处。我们的日常工作正是要以一种默默的兄弟之情来给这个虚无的存在打开一条新的意义之路，而面对这一工作，我们总是力不从心。”《L'agressivité en psychanalyse》，in *Écrits*,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6, p. 124.

当父亲不给儿子石祖，当他像雅各布的父亲那样把自己携带的死亡给了儿子的时候，儿子该怎么活下去？这正是我给自己提的问题。有一次我对他说：“别管您父亲。您自己、您亲自构造一个父亲，并对他说：这是我父亲。”这样一个建议，甚至是命令，会有用吗？我相信，在那一刻，雅各布感觉到了我的提议所包含的东西。他感到一方面我支持他，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一定了的，他自己仍可书写他的历史篇章。如果按照拉康所说，乔伊斯的书写是把握他父亲的方法，拉康称之为圣状，那么，我们不就可以假设雅各布通过继续书写他的历史篇章，也能用自己的方式使一个有生气的父亲存在？

他还需要和他身上色情的被动性（父亲那里的死亡在此并非毫无用处）做斗争吗？或者他应该接受它？这是困难的问题。分析家不必定要回答它，尤其是不能在雅各布的位置上回答。相反，分析家的角色是就雅各布费心于成为小彼者的欲望客体这一行为提问。整个分析的推进都是要使他放弃认同于一个废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认同还不够。它不仅不够，而且还会堵塞冲动需要跨过的空间这一问题。原则上冲动不触及客体，而是围绕着客体旋转以便重新回到主体那儿。冲动切割客体的位置，然后客体就可以掉落。然而，雅各布通过成为小彼者的欲望和享乐的被动客体、通过认同于废物使得冲动短路，并阻止冲动切割客体，阻止其掉落，堵住空。这样客体就不再能是缺失的客体，也不能再担负起由石祖价值标记的、作为欲望原因的客体小“a”的功能了。我们来听听雅各布说的：“找到身份就是在他的欲望中存在……我离开了形象，就发现了我无法跨过的一个洞。这个形象抓住了我，然而我那时没有找到办法离开它。获得自己的身份就是要离开他的形象。”雅各布很好地表达了他是如何必须去承受可能面对一个空这样的危险，以便从一个循环的（他在看着他的那个形象中看自己）自恋结构过渡到一个不是被形象支撑而是被性冲动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小彼者的相异性被保持住了）支撑的、被称为“继发”的自恋中。

尽管远远没有穷尽我和雅各布之间的谈话，我的报告却是必须结束

了。它浏览了一个男人在父性和男性性之间独特的缓慢进展的一部分。

我试图描述父性——男性性这一联系的某些方面。还有许多其它方面，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儿子为了成为男人不得不询问和试图修复父亲的诸多缺陷。

感谢你们的倾听和关注。感谢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给我机会让我为精神分析的传递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位母亲梦中的父性与男性

肖洪秋^①/著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一位母亲的梦，展示在母亲欲望中的儿子的成长。个案中的母亲，在与她自己的父亲有了一个分离之后，才与自己的儿子有了一个真正的分离。这正如拉康所说：父姓一直在那里，等着母亲“交出”孩子。儿子有长大独立的欲望，当足够强大，他会主动推开母亲。

父姓是一个分离的原则，这位母亲一直未接受这个原则，以致结婚后无法对丈夫有一个开放的接纳，儿子也就完全处在母亲石祖的位置上，无法与母亲分离而朝向父亲。通过分析，这位母亲放弃了对她父亲的幻想，获得了一个主体性，接纳了丈夫，处在了女人的位置，然后才真正处在了母亲的位置上。

只有接受了父姓规则，女人的女性欲望才可能指向父亲之外的男人，才能不把孩子当作她全部的石祖，孩子也才有朝向父姓的可能性。

【关键词】梦 父姓 母子

背景

三年前，这位母亲带着对儿子歉疚、负罪的心理来请求分析。她说：

^①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预备分析家。

“在儿子七个月时我去了外地工作，直到有一天晚上，梦见儿子因一场意外失去了双腿，因此，内心很恐惧，然后就回到了儿子身边，那时儿子已经三岁零七个月了。”

去年她儿子从外地体能训练回来了。上学期间，学校发生了一场风波，儿子发短信给她：“妈妈，学生们在策划造反，反对新校长，拉电闸，晚寝时疯吼，到处贴大字报，搅得我心神不宁，我怀疑这次考试要砸了！”在收到短信后的第三天，她儿子出现了癔症发作。由此她建议儿子也做一个分析，她同时也放下一切的工作，开始做全职妈妈。

她曾在分析中谈到：“自儿子从外地训练回来后，我感到他不再是以前那个乖巧、听话、温顺的孩子，而常常感到儿子变得陌生了，感觉他头脑里有太多我所陌生的东西。一直以来我认为作为母亲，应该给他足够的物质的满足。我回到他身边，他三岁多，那时工作特忙，陪他的时候很少。生活上我尽力给他创造一个不错的环境，让他得到很好的照顾，但又总觉得欠他很多。有一次我竟然梦见儿子前世是皇太子，我是他的奶妈及保姆。这次他严重的发作吓坏了我，我不得不建议他去做一个分析。”

她还讲到，儿子一次发短信给她，说：请原谅，妈妈，我不爱你！其实我更爱爸爸。

第一个梦

我与儿子去办事，在路上遇到黑帮组织的头目及其同伙，他们一路放暗号（也就是设骗局陷阱），最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与儿子发生了冲突，儿子倒地，地上有一摊水。一会儿儿子起来后吐了很多的脏水，然后不服气就打了那个人。

我和儿子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头目的女人拿了一把枪过来，扔在我与儿子面前，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先让我出屋去见头目，我心想：“一会儿儿子就会被他们处死的。”那个女的说：“还不至于。”

在一个类似审判庭的地方，两个头目坐在桌子的正面，两侧坐着帮手。我站在头目的对面，扑通下跪，哭求他们饶了我的儿子。有人告诉我其中的一个头目是我丈夫的学生，我就直接叫着他的名字，问是哪一位，帮手们指给我看，是长得最有男子气概的那位，我向他求情。他们心软了一点，免了儿子一死。但是儿子从此就得听从他们的，即成为黑帮的一员，学习他们的所有规则。我陪着儿子，他有一个身份编号，是“018”。

在一个休息的地方，有一个很长的棉垫，铺放在两张拼在一起的桌子上，又象是在两张床上，这是给黑帮组织成员睡觉的。头目正教儿子做功课，功课最后的内容是如何杀人，是直入心脏的一招。我不愿意他们这样教他，心想：教什么都行，不能教杀人啊。但是又很无奈，因为儿子已经成了他们的成员，永远摆脱不了了。我有点侥幸的是儿子没被处死，活下来了。

梦的联想：

(1) “头目”，她说头(tou)的发音让她想起(dou)，她父亲名字中一个字的发音。她谈到自小在家，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是校长，她记得初中时，语文老师曾说父亲身上有一股正气。家族里所有的大事总由父亲说了算。而从小父亲就宠爱她。六、七岁时，一点儿小病，父亲也会背着她去医院，邻居们就会说：“真是百姓爱幺儿。”她心里就乐滋滋的。十一岁时，父亲用所发奖金的一半给她买了一双很贵的红色高跟鞋。在她心目中，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时，他们每天去她父母家吃饭。她说直到那时，她的心才稍稍稳定下来，感觉终于让儿子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她说梦中“头目的妻子”是她自己，然后讲了两个与她父亲有关的梦。

A: 梦见烈日当空，她母亲躲在一把大伞下，她慢慢靠近母亲，希望与母亲一起分享那把大伞（她说其实就是想与母亲一起分享父亲）。

B: 梦见儿子学校的校长调到她所在的学校任职，暂时就住在小时

候她们家老屋的一间房里。她与校长的相处保持着一定距离，她带着害羞、沉默、安静的态度，而内心有一种窃喜，希望与校长有更深一步的交往，想引诱他。而校长对她视而不见，又有点若即若离的态度。后来校长的妻子来了，她就与校长的妻子闲聊。之后校长外出接他的孩子回家来。他有两三个几岁大的孩子，这些孩子活泼好动，跳来跳去，很开心。她这时知道她不再有机会引诱校长了（她说梦中的校长就是她父亲）。

（2）“儿子的代号 018 (ling yao ba)”，她说这是儿子“宁要爸 (ning yao ba)”。因为儿子说到“更爱爸爸”，也就是他想离开妈妈。

我的理解：

（1）黑帮头目在梦中实际上代表着“父亲——丈夫——儿子的分析家”三个典型的父性形象。而“她下跪求饶”意味着她对“父姓”有了一个屈服。

（2）“侥幸儿子没被处死，活下来了”意味着她内心接受了儿子，希望儿子活下来，也就是真正接受了她自己是一位母亲。

第二个梦

一个广场上有很多人在集会，四周拉起了警戒线，有人守护检查。在广场的右上角，我为了混入人群中，假装逗别人的孩子玩而躲过了检查。

广场上发生了一场战争，人们相互开枪射击。儿子自己报名去参军加入了其中。战场里死了很多人，我很惊慌地躲在一边。停战了，走道的一边整齐地堆放着很多死人，广场中间是幸存下来的人。我与丈夫去寻找儿子，在幸存者中间没看到他的面孔，我们就走到死人堆去找。有一个女的清场人员在死人堆旁边。丈夫无比镇静，平静的说：“儿子已经死了。”意思是接受这一切吧。

清场的女员工在死人的遗物堆旁，问我们是否在找儿子，我们说是。她拿出一个缺口的纸杯，杯上印着儿子的头像，她给我认。我当时就想：啊，我的儿子真的死了。但女员工却说：“他没死，还活着，只是这会儿去供人休息的演艺场演戏去了。”然后她说：“你儿子年纪小，他现在太累了。”我与丈夫就去到演艺场，看到儿子与一些人正在演拿枪棒的类似川剧那样的戏。领演的人在前面，带着他们从地下一个厚厚的麻布袋一样的地毯里艰难地钻出头来。

梦的联想：

(1) “我为了混入到人群中，假装逗别人的孩子玩而躲过了检查。”她说想到的是刚从大学毕业时，对自己的那份工作不满意，接着结婚、生子，之后丢下儿子去了外地工作。或许在那时，儿子于她仅仅是融入社会的一个借口而已。

(2) “一场战争”——她说是她内心的一场战争。儿子做分析后，当众表达“我更爱爸爸，我不希望你在这里陪着我”，即希望她离开，她感到儿子背叛了她。之后不久，她曾梦见一个带罪的男孩到她的单位，她想自己改造他。她说自己处在交出了孩子、让他去做分析后，又想要回孩子的矛盾中。

(3) “清场女员工拿来一个缺口的纸杯，杯上印着儿子的头像”，她说梦中有缺口的纸杯或许代表她自己是不完整的母亲。自生下儿子之后，她变换过好几次工作。她的生活重心就是工作，唯一目的就是多挣钱，给儿子更好的物质生活，日常生活上对儿子的照顾比较少，因此一直感觉自己不是一位合格的母亲。

(4) “领演带着他们从地下一个厚厚的麻布袋一样的地毯里艰难地钻出头来”，她说表示希望儿子在分析的帮助下有一次真正的重生。她谈到当年与丈夫是闪婚，婚后两个月，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就去医院做流产。而医生得知她是第一次怀孕，就说以后可能习惯性流产，永远怀不上孩子。她当时被医生的话吓着了，只好决定生下孩子，而那时根本

没准备好当一位母亲。

我的理解：

梦中“印着儿子头像的缺口纸杯”表示她欲望着用儿子来填补她的缺失。

她与丈夫一起，找到了死里逃生的孩子。即当她真正处在女人的位置之后，孩子才有了一次真正的诞生。

第三个梦

一次她在分析中说：“小时候，周围邻居都是点着煤油灯时，父亲让我们家点上了沼气灯。晚上一家人在明亮的灯光下，父亲只要有空，就会吹笛子或拉二胡，母亲就伴唱。我们小孩子就做作业或者看小人书。”当她在分析中谈到小时候的这个情景时，突然哭了起来，并且说道：“只有母亲才是父亲的女人，我只能是他们的女儿。”这之后的分析中，她谈到下面的这个梦：

我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我请他带一下孩子，他说他要去上班。我说上班也可以带孩子的。他不很情愿地答应了，然后我帮他把孩子放在他的背上，用一个背带系住小孩，他背着孩子上班去了。

在小时候住过的老屋里，我站在房间门口，丈夫在外面那间屋子，我跟他谈话，他说要外出办事。我看见儿子（六、七岁的样子）跑过去牵着他爸爸的手，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跟着一起出去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一个人唱起了一首歌“小雨中的回忆”——“我时常漫步在小雨里，在小雨中寻觅，小雨像一首飘逸的小诗，常萦绕在我心里，在没人的雨中更显得孤寂，但我脸上并不流露出痕迹，每当小雨飘过总唤起我的回忆”，唱完后，我感到无比的落寞、忧伤、

孤单、惆怅，也感到有一点诗意。

梦的联想：

(1) 她说梦中唱歌的地点就是小时候父母喜欢一起唱歌的地点，在这个地点，儿子跟着父亲走了，离开了她。

(2) 她谈到儿子的两件事。一是最近他在学校参与并组织学生及家长联名反对校长组建“精英班”，取得了胜利。另一件是儿子喜欢上了他们班上的一位女孩。她说儿子终于长大了。

这位母亲说她小时候就爱做梦，并总在早餐时间惊奇地向全家人讲她的梦。终于有一天她母亲不耐烦地说：“又是梦梦梦……吃饭时不准说话！！”从此她不再谈她的梦。她说遇到精神分析后，她才又可以说她的梦了，她说“梦，总在黑夜里讲话！”

结论：

母亲这边：

(1) 父姓是一个分离的原则，这位母亲一直未接受这个原则，以致结婚后无法对其丈夫有一个开放的接纳，儿子也就完全处在母亲石祖的位置上，无法与母亲分离而朝向父亲。

(2) 通过分析，这位母亲放弃了对她父亲的幻想，获得一个主体性，接纳了丈夫，处在了女人的位置上，然后真正处在了母亲的位置上。

儿子那边：

(1) 青春期遇到来自彼处的大彼者（体校的教练），唤醒了朝向父姓、想认同父亲的欲望。

(2) 学样反对校长的风波，引发了关于父姓的询问，导致癔症发作。而症状恰恰是孩子的主体性建立失败的表现。

(3) 通过分析, 儿子获得一个主体性——独立的欲望, 从而离开了母亲, 认同父亲, 走向男性。

只有接受了父姓规则, 女人的欲望才可能指向父亲之外的男人, 才能不把孩子当作她全部的石祖, 孩子也才有朝向父姓的可能性。

从“鼠人”个案看男性与父性

吴蕤^①/著

【内容提要】本文借助拉康的思想来讨论弗洛伊德的“鼠人”个案，对个案中涉及的“男性”和“父性”概念进行分析，将困扰鼠人的亲子关系和爱情之间的矛盾展示出来，并指出隐藏在背后的谜题：成为一位男性意味着什么？怎样成为一位男性？最后，通过对拉康“（想象的）石祖”图示的分析，重新思考了（想象的）石祖的意义，并提出一个问题：（想象的）石祖是否可以摆脱母子的三元结构，而仅仅成为主体自身的欲望对象？

【关键词】石祖 男性 父性

一位婶婶的死亡，让鼠人不得不直面父亲已经去世这个事实，从而引发了他的症状：一个位于父亲的欲望和男女爱情之间的困境。这样的强迫特征，常常在爱情和代际关系之间的冲突中显现出来，而在男性那里又显得更为频繁。在这里，我们尝试借助“鼠人”来讨论这个冲突的结构，并在其中探讨男性与父性的关系。

①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预备分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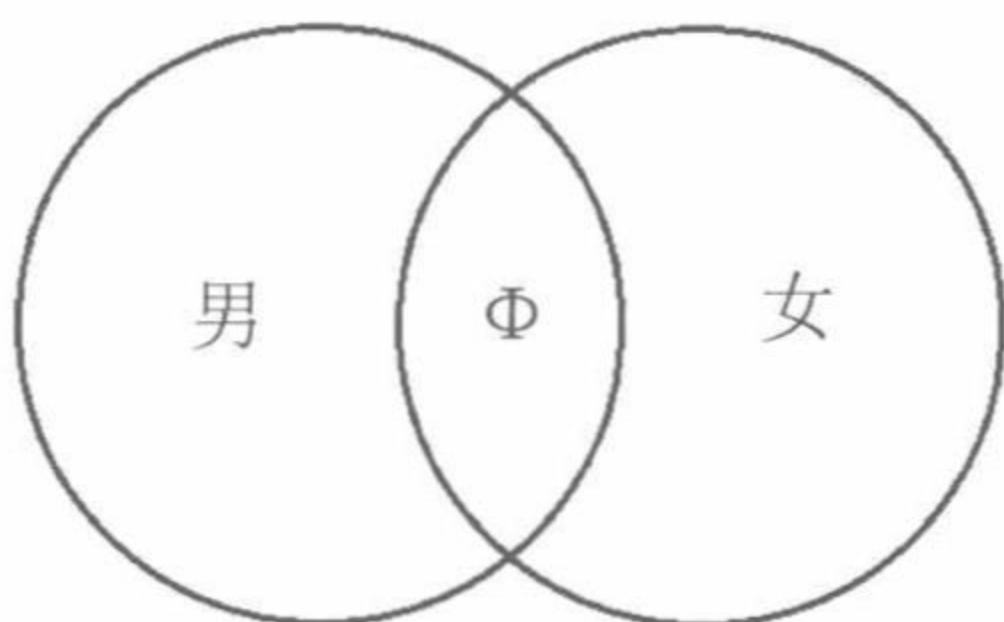
1. 父性与石祖的功能

“他发现——或者说自以为——自己现今的处境和他父亲在婚前的处境相同，他能够认同父亲的做法。换句话说，在他现阶段的疾病中，死去的父亲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①

通常来说，“男性”和“父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被安置在两性关系和亲子或者工作（特别是中国文化）关系中，并且分别和“女性”与“子性”组成对子。但是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又发现，二者是不能完全隔离的，它们常常在语义上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男性”和“父性”的定义：比如，我们会用“父亲”的含义来定义“成熟男性”，以此来让对方摆脱“子性”的位置；而“父性”得以和“母性”区分开来，首先就是因为背后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因此，理论概念上的简单性往往阻碍了我们对临床的解读，而鼠人向我们展示了临床的复杂性，这敦促着我们对简单理论进行反思。

2. 男性与（想象的）石祖

在鼠人那里，身为一个男性的他，不能完全满足女士的欲望。在两性维度之外，女士有一个对于石祖的欲望。在拉康的图示中，确实，石祖作为一个锚点建立了两性关系：



^① 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73页。

但是对于拉康来说,这个关系如同母子结构一样,是一个想象的关系,它成为了主体接受父性的障碍。鼠人(想象的)父亲的死亡成为一个转折,它引发了想象关系向符号关系的旋转,而在同时面对女士和死亡的父亲的时刻,这个矛盾的结构使他痛苦地驻足不前。

弗洛伊德发现,鼠人的强迫症中体现出了一对无法融合的冲突:父亲的意志与本人爱情之间的冲突。^①我们随后会看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由父亲的欲望所指向的工作和爱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鼠人希望迅速与情人达成两性关系,获得在两性关系中男性位置的肯定,另一方面,在一个父权的男性群体结构中,他希望得到男性的位置。在症状中,两种关系以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

“于是,病人脑中生出了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某种不幸降临他头上,那个女孩就会喜欢他的。然后,父亲的死亡就作为这种不幸的一种可能而自发地进入了他的脑中。”^②

“在病人之父去世数年之后,病人第一次体验到性交的乐趣,但在那个时候,也有这样一个念头强行进入了病人的意识:‘这真美妙!是值得为此而杀死父亲!’”^③

那么,主体要成为男性,这意味着什么呢?在两性关系中,人类被分成了男性与女性两个集合,而两个不同集合中的主体仅仅因为相异性就可以达成关系吗?拉康说:不,因为女性欲望石祖,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必须放入(想象的)石祖才能建立关系。在经验的维度,我们可以说,这个石祖意味着重要的客体——社会地位/权力和金钱。对于鼠人来说,面对着女士的超越于他自身之外的欲望,他急于要确立自己男性的位置,于是一个想要盗取石祖的欲望以杀掉父亲的形式出现:

“当时他已经爱上了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女士,但却因物质原因而没能接近对方。然后那个念头就来了:父亲的死可能让他变得足够富有,

① 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② 同上,第157页。

③ 同上,第174页。

让他有能力迎娶那位女士。”^①

在幻想中，通过杀掉父亲，盗取（想象的）石祖，鼠人希望建立起与女士的关系。但是这时一个矛盾展现出来：女士是欲望着石祖还是欲望着拥有石祖的他本人呢？这个让所有男性焦虑的问题在鼠人那里顿时出现，而对于这个超越了自身、指向它物的欲望，主体并非没有恨意，从对于女士的矛盾行为（移除路上的石头随后又将其归位）来看，鼠人无意识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而另一方面，鼠人还希望在男性群体中获得自己的位置，而标记这个欲望的，是父亲的欲望所指向的司法考试，此时，父亲的形象不再是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男性的障碍，而是保障。因此，在准备考试时，鼠人呼唤着父亲的在场。

“他曾有过一段时间是一边在准备考试，一边沉溺于自己的一个幻想当中的。在他那时的幻想里，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并且随时可能回到他身边。……其父在世的时候，他是个有点懒散的学生，这一点时常令其父感到难过。”^②

是父亲的欲望（这里弗洛伊德将其命名为“父亲的意志”），准确点说，是死去的父亲的欲望将作为儿子的鼠人锚定在认同父亲的欲望的结构中，因此，鼠人希望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想象的）石祖，这是在男性的群体中认同父亲。

“分析通过这个超越了二元关系的主体的言说而前进，并且除了主体不认识的绝对大彼者，这个言说没有遇见任何东西。逐渐地，他使这个言说返回他本身，即最终向着在那里的绝对大彼者言说……”^③

拉康说，男人将拥有石祖。作为一个客体，石祖在想象的关系中标定了父亲的权力。如果嫉妒父亲的权力而通过杀掉父亲来抢夺这个客体，

① 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② 同上，第177页。

③ J. Lacan,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4-1955, texte établi par Jacques-Alain Miller, Editions du seuil, février 1978, p.312.

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如《图腾与禁忌》神话中那样，杀掉父亲的儿子们痛苦地发现，就算继承了石祖，他们仍然是儿子，而如果他们想成为父亲，只有将父亲放在大彼者的位置，从而通过认同父亲来登上父亲的位置。

所以在当鼠人混淆了想象的石祖和石祖的功能的时刻，这个想象的石祖遮蔽了石祖的功能和父性。

所以，最终鼠人意识到：如果仅仅是获得石祖，那么（想象的）父亲的死是最好的结果，他将不费吹灰之力继承遗产，另一方面，如果接受父性，参加司法考试，他将认同（符号的）父亲，因此他不断地否认父亲的死亡、在幻想中呼唤着父亲的在场。但是如果是这样，复习考试将花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将不能和女士在一起。因此，鼠人尝试着一箭双雕：

“因为他的心上人离开，他在数个礼拜里都无法继续他的学习；而那位女士的离去，是因为要照顾她那重病在床的祖母。可偏偏病人当时正对他的学业满怀着一腔热情，于是一个念头突然闪入他的脑海：‘这个指令，叫我在学期末第一个考试期里参加考试，是我所可以接受的；那么，若是面对另一个指令、叫我用剪刀割破喉咙的指令，我是否应该接受呢？’”^①

这个无法完美解决的困境让鼠人不得不面对事业与爱情之间的排斥性。一方面，如果说，“获得石祖”是成为男性的必经之路，那么石祖本身却是歧义的：在母子与石祖的三元关系中，是母亲欲望着石祖，而男孩希望成为母亲欲望的客体——石祖，在这里，石祖作为女人的欲望客体，暗示了它将成为今后两性关系中的锚定点；另一方面，当主体来到符号界，进入与父亲的关系中时，石祖意味着认同父亲、与父亲欲望。这样，石祖处在想象关系和符号关系的交点上，这个时候，被歧义的石祖所定义的男性也就具有了双重性：

“在那次军事训练结束之后，他曾长久地举棋不定，拿不准是该返

^① 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回维也纳还是该留下来完成自己的誓愿。这一过程其实是将他自记事起即有的两种内心冲突表现了出来：该不该对父亲保持顺从？该不该对情人保持全心全意的爱？”^①

歧义的石祖作为中介，连接了两个互斥的关系，而鼠人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儿子与父亲、男人与女人，虽然都围绕着石祖，但本质上却是两个不相容的结构。同时，石祖也会遮蔽父性：鼠人盯着它，希望拥有石祖的父亲死去，同时他也发现石祖处在枢纽的位置上：

“在为运行而等待的水平上之石祖功能的消散，正是阉割焦虑的起源。”^②

通过由石祖（想象关系）向父性（符号关系）的旋转，最终，鼠人在想象关系中产生的老鼠幻想消失了。

3. 男性与女性

我们看到，拉康和弗洛伊德认识到，石祖男性被定义为强有力的，但是，由于石祖指示着超越了主体自身的客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男性是否有自身的独立维度呢？

弗洛伊德谈到，鼠人认为女士不爱他，是因为他没有石祖，于是产生了想让父亲死去从而盗取石祖的幻想：

“当时他已经爱上了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女士，但却因物质原因而没能接近对方。”^③

“他幻想自己变得富有并另娶了一个妻子，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去拜访那位女士；他想用这种办法去伤那位女士的心。”^④

① 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② «L'angoisse», 1962-1963, texte établi par Jacques-Alain Miller, Edition du Seuil, mai 2004, p.324.

③ 同上，第1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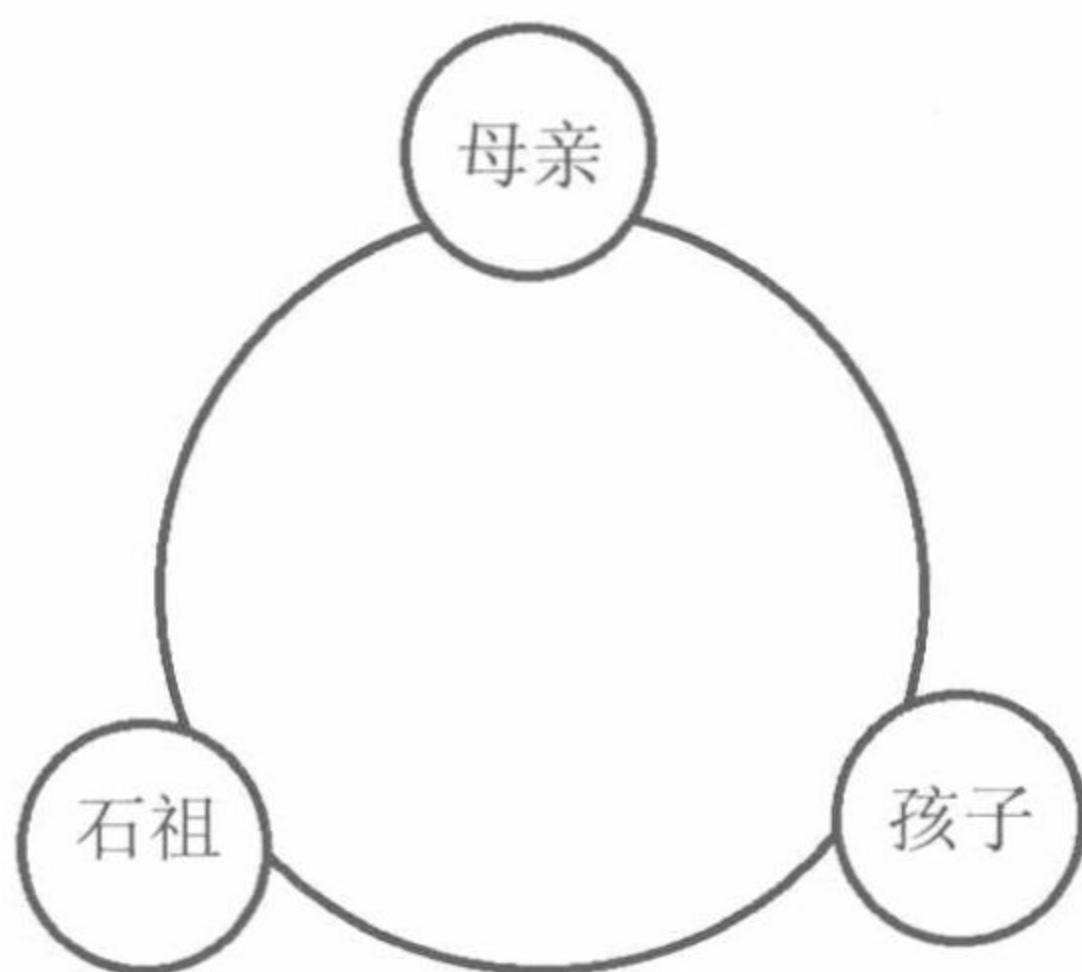
④ 同上，第161页。

“他认为他的情人会很看重追求者的社会地位……”^①

在幻想中，鼠人直指石祖与父性。那么男性本身有没有自己的维度呢？弗洛伊德同时也提到，鼠人长得不好看。在想象中，一个良好的形象毫无疑问对于欲望来说具有非常大的诱惑，而且它也是双重性的：在同性集合中，理想的形象是同性认同的对象，而在两性集合之间，它则是欲望选择异性的标准。

因此男性具有符号界中功能性的定义——石祖的功能，也具有符号界和想象界相交的定义——石祖，还有想象界中的形象——男性的形象，而符号的父亲作为一个社会规则的锚点，仅仅作为一个名字在场就足够了。

进一步，在鼠人那儿缺失的男性形象，却在大量的游戏中被发现：男性用相貌或者身体诱惑着女性，并且交换女性拥有的客体。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文本中虽然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对男性和女性的描述稍作研究，就会立马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性的定义是多元化的，如果我们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其中有一个定义就是将男性描述成“没有石祖但是自身是石祖的男人”，在俗语中则被称为“小白脸（小鲜肉）”。



在拉康（想象的）石祖图示里面（上图），孩子的欲望是因为母亲

^① «L'angoisse», 1962-1963, texte établi par Jacques-Alain Miller, Edition du Seuil, mai 2004, 第 169 页。

的欲望不在他身上而被激起的。为了重新将母亲的注意力吸引到自身，孩子不得不首先获得这个超越了自身的客体，因为母亲的欲望指向它。因此，他人的欲望主宰着主体的欲望，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主体是具有惰性的。特别对于“小白脸（小鲜肉）”来说，他们天生就因为自己的形象姣好而吸引并持续占据着母亲/女人的欲望，那么他们是否还有动力去获取石祖呢？或者他们获取石祖的欲望相比普通人来说是否有着质或量的差异呢？目前精神分析的文献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最后，我们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拉康的图示中，石祖并不是主体自身的欲望客体，而是彼者的欲望客体。我们欲望着它是为了最终将彼者的欲望安置在自己身上，那么，石祖有没有可能是主体（男/女）自身的欲望客体呢？如同弗洛伊德对欲望的定义那样，它是一种主体精神结构内部产生的欲望所瞄准之物。如果我们暂时将石祖所指之物限定在“鼠人”案例中所指的，即“社会地位（权力）”与“金钱”，我们可以说，在很多主体（男/女）那里，获取这两类客体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欲望，达成两性关系，它们有着更为基本的意义：对于人生的掌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们无法在这里展开这个讨论，但我们可以从中总结的是：成为一位男性或女性，首先，这是同时相对于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而言的；同时，除了一个纯粹的男性和女性的形象之外，其它的维度也参与了对两性位置的定义，它们隐藏在两性能指的背后，比如“男（石祖）”，“女（母）”；最后，获得石祖可成为男性或者女性，但石祖并不必然为达成两性关系的道具。

参考文献：

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4年。

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

精神分析文献翻译专题

精神病：经由言语与转移的诊断^①

丹尼·诺巴斯^② / 著

张涛 / 译

1. 为什么要诊断？

在拉康的著作里，他坚持认为，在不同的精神组织之间存在着差异，分析家有认识这些差异的必要性，而且……他认为分析家有义务采用差异性的治疗方法。“拉康派的分析家”必须将一些基本的疾病分类牢记在心，并且应该在临床过程的最早阶段予以诊断。分析家在治疗中的立场应该按照病人的精神结构而有所不同。对于病人的最初的评估不仅是做个登记这样简单的问题，而且还基于它具有重要的临床结果这一事实。

像拉康的临床理论的许多其它层面那样，在精神分析治疗开始之前加以正确诊断的重要性，也是以弗洛伊德探讨精神分析技术的那些论文为依据的。在“论治疗的开始”中，弗洛伊德主张要有一段大约一到两个星期的尝试性会谈（Probezeit，试用期；Erprobung，检测期；Sondierung，试探期），他举证说这是极其费力但却是有必要的诊断程序（这是这种会谈的主要理由之一）。直到他的事业结束前，弗洛伊德始终相信，精神分析的这个标准方法对于患妄想痴呆症的人，或是对某些种类的精

① 节译自：Dany Nobus, *Jacques Lacan and the Freudian Practice of Psychoanalysis* (Makers of Modern Psychotherapy 系列，第一版) 第一章。

② 心理学家，英国布鲁内尔大学教授。

神病来说，是没有用处的。这使他提出要求，认为精神分析家应该在尝试期就识别出这些禁忌症。假如精神分析家没有识别出来，或是犯了诊断的错误，那将会是个灾难。因为有些病人（若把神经症者错误地诊断为妄想痴呆症者）将会被不正确地排除在治疗之外，相反，其他的病人（若妄想痴呆者被错误地认为是神经症者）将会错误地被予以接纳。

跟弗洛伊德将神经症与精神病相对立比较起来，拉康的疾病分类架构显得更加精细了一些，它对这两种疾病进一步加以区分。弗洛伊德将精神病者称为自恋神经症（而将神经症本身称为移情神经症），拉康则将神经症与精神病定义为两种根本上不同的精神结构，并且带有不同的因果性。

在弗洛伊德做出神经症与精神病两类区分的基础上，拉康还补充了倒错来作为另一类区分性的精神结构，而弗洛伊德对后者——如施虐狂、受虐狂、暴露狂、窥视狂等等——只是在纯粹的现象学层面来加以描述。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明确地区分精神病与倒错症，而且他对于倒错症与神经症的唯一的正式区分，基于的是他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否定的重要论断。例如，在《性学三论》中他曾对此进行过辩护。拉康则是将弗洛伊德的诊断范畴合理化与系统化，最后建构出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症的三元类别，其中，每一个都代表一种单独的临床实体。

而且，在拉康派的分析里，这些范畴对于临床的影响不再是病人是否可能进入治疗，而是集中在精神分析家在治疗里被指定的立场，以及他如何较为有利地处理转移。因为拉康不像弗洛伊德，并没有将精神病视为不适合于精神分析。这意味着，对于拉康而言，弗洛伊德的处置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正确的，而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临床假设能够且也应该被修正。但是这些假设并不因此就丧失了力量，因为这是为了能够接待不同种类的病人。

2. 诊断的标准

那么，分析家实际上如何才能完成诊断呢？在“论治疗的开始”中，

弗洛伊德并没有直接提出如何区分神经症与精神病，不过，他确实警告他的读者对这种临床表征的欺骗性不得掉以轻心。

“经常地，当我们发现，一例癔症性症状或者强迫性症状的神经症，其症状并不明显且仅持续很短的时间时，我们一开始会将这些形式看成是适宜于治疗的，同时我们还保留一点怀疑，并且询问这个个案会否对应着被人们称为早发性痴呆（布吕尔称为精神分裂，而我则提议称为妄想痴呆）的初期阶段，而且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他是否会出现一种这类情感障碍的表征。”

弗洛伊德主张说，夸张性的神经症的症状（例如，难以捉摸的身体性疼痛与冲动的行为），并不应被视为是潜在神经症疾病的毋庸置疑的迹象，无论它们可能有多么引人注目。精神病可以隐藏在神经症的面具之下，而且精神分析家不应该被临床的伪装色彩所迷惑。对于许多当时的分析家来说，弗洛伊德的警告一定显得很奇怪，而且它们似乎被用来判定某些症状与某些疾病之间的严谨对应关系。那个时代的临床医生也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依然相信光凭幻觉就足以诊断为精神病，或是他们相信持续的违规是精神变态症的特定病理特征。

不过，弗洛伊德最初的这些消极性的诊断规则所说的乃是，我们不应只看症状的表面。精神组织必须与可观察现象区隔开来，而且分析家被要求去悬置他们的判断并且寻找出更为可靠的标准。定义这些标准比起揭露那些误导性标准的谬误来说实际上任务会更为繁重。

弗洛伊德坚决主张，精神分析的过程是无法被预测的，而且分析家的最初诊断有时能够随着治疗的过程被证伪。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析家应该愿意去修改他们关于病人的精神经济学的看法。悖论性的是，即便是最正确的精神分析诊断都是精神分析家在治疗的结束时才能够清晰说明的东西，而很不幸的是，那时候就已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整个诊断的事务让弗洛伊德想起中世纪时用水施加的酷刑，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处于受害者立场的是分析家而非是病人。

尽管他因坚持“动力学的诊断”而产生了种种难题，但弗洛伊德确

实提出了至少两个正面诊断标准。根据神经症患者与精神病患者的替换性列表,即弗洛伊德分别称为转移性神经症与自恋性神经症的那些东西,第一个诊断标准就能够被推论出来了。一方面,弗洛伊德将焦虑性癔症(即恐惧症)、转换性癔症与强迫性神经症,列为转移神经症。因为在这些个案里,联系病人跟分析家的情感关系,“具有特殊性,而且对于治疗而言,具非常核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遭受自恋神经症痛苦的病人——即早发性痴呆、妄想症或内因性忧郁症病人——“没有转移的能力,或仅是转移不充分的残留物”。当面对区分神经症与精神病的任务时,分析家应该研究病人是否能够发展或维持一种情感性的关联,如果缺乏这样的能力就表明是精神病,并给予分析家足够的理由来将之排除到精神分析的治疗之外。

在此,弗洛伊德将“把症状解释为征兆”作为基础的客观诊断标准,替换为依靠对关系的评估、对是否能够互为主体性来作为诊断的标准。

可是,转移不是弗洛伊德区别神经症与精神病的唯一的,甚至不是最为重要的标准。在其原心理学的论文“无意识”中,弗洛伊德将精神分裂症与癔症与强迫症对立起来,他所依据的理由仅仅是病人的言语活动。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精神分裂病人的言语带着一种惹人注意的细心讲究,经常带有矫揉造作的表达,句子变得散乱,词语跟身体奇怪地混合在了一块。

精神分裂症病人使用的似乎是“浓缩后的言语”,因为他们思想的整体意义在这些单独的词语里找到了出口。因此,这些词语就具有大量的意义,并且跟身体器官或身体运作连在了一起。弗洛伊德将这些特殊的精神分析的词语特征,归为精神病的词语的连接压倒了对物的连接。在精神病的病人那里,弗洛伊德所说的“词表象”与“物表象”之间的关系被切割开来,导致了形成症状的词语连接的封闭性环路。病人不再关心词语在特殊的语言中所代表的实际的“物”,它们在它们那里仅仅是跟它们的言语内容有关。

在精神病那里物表象有强烈的惰性,一个女孩提供了例子。她抱怨

说她的眼睛已经被拧伤（Augenverdreher）^①——这是弗洛伊德从维克多·托斯克（1919年）那里借用的一个案例——因为她的爱人是一位真正的“拧伤眼睛”的人。在德语里面，Augenverdreher的意思是花言巧语的人。虽然这个女孩知道这个意义（物表象），但是她不能接受它。她仅使用“拧伤眼睛”的字面意义（词表象）。通过这一意义，她下结论说，她的爱人已经在生理方面拧伤了她的眼睛。这位女人确信，她正在遭受被拧伤的痛苦（她的症状）。这是由于词表象与物表象之间的关联被中断造成的。虽然她知道物表象，但为了取相对化后的字面意义，她不用其物表象的含义。

这类语言机制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同事跟我报告的。报告涉及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威胁要破坏精神病诊所中央空调系统，他要放火烧掉整栋建筑，以便报复那些冷落他的其他病员。像那位女性病人一样，这个男人无法接受“被冷落在外”的这个表达对应的物表象，虽然他完全知道“被冷落在外”是某些人要降低他身体的温度，所以，他仅感到被排斥和抛弃，从而想要报复这些坏蛋——你们冰冻我，我就把你们做成烧烤。

表面上来看，神经症病人会遭受与精神病同样的症状痛苦（眼睛被拧坏，生理上感到寒冷），这确实也是弗洛伊德打算要展现的。但是，神经症的症状回应的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经济学。在神经症者那里，词表象并没有跟物表象隔离开来，词表象被压抑了。词表象已经被从病人的意识驱赶进无意识中。结果是，词表象施加其影响，而病人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产生了这些症状。

在神经症那里，症状是由被压抑的无意识表象所决定的，而分析家的工作就是要将病人带到这个点以便让这个被隐藏起来的因素能够重新恢复。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一定程度上遭受着“欠缺词语”之苦，随

^① Verdrehen 可以是生理上的扭坏拧伤之意，也可以是对某种观点加以歪曲、曲解。因此这里我们分开翻译。后一种意义和 augen 眼睛一起运用的时候，构成花言巧语的含义。——译者注

着分析的过程他能够重新获取这些词。在精神病那里,事情是完全不同的。虽然症状也是被词表象所决定,但后者并没有被压抑,物表象也没有。

神经症的病人无法找到构成其症状的建筑砖块,而精神病的病人则没有隐藏任何东西,所有的材料都暴露在外面。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分析患精神分裂症的那位女人时,他观察到:这位病人的评论具有分析的价值。这些评论同时让我们明白精神分裂症患者之“词语形成”的诞生与意义。当然,戏剧性的是,在精神病中,病人所表达的“分析的价值”同症状的不稳定性没有丝毫关联。

弗洛伊德对不同诊断的考虑构成了拉康鉴别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症的核心。在拉康派取向里面,精神结构就临床来看并没有差异,差异是基于言说和语言,而且关乎主体跟他的伙伴、家庭成员、同事、情人、治疗师等等的关系。

拉康在其早期探讨妄想症的著作中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两个标准,但是,直到1950年代,它们才作为他“回到弗洛伊德”的部分而获得重视。拉康渴望恢复言说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价值。或许,这是由于他作为临床精神病医生而研究精神病人的结果。因此,对于精神病的精神结构,拉康强调说要详细地列举出这些标准来,对于倒错症他倒是没讲得如此明确。

而且,在讨论不同精神结构时,他通常强调言说与语言的特征,并认为转移的本质是这些特征的效果。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精神病区分于神经症的那些言说与沟通方式。

3. 精神病的沟通

在其“罗马演讲”中,拉康开始在精神分析的治疗内部重新评估言语的功能。当观察到精神分析学正漂向某种启蒙的行为主义的时候,他主张说,精神分析迫切地需要承认,他们的临床实践是作为一种“谈话治疗”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个谈话治疗有益的效果就基于言语的力量之上。

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真正的革命在于发现：词语具有判定、产生与消除生理与心理症状的潜力。可是，精神分析却越来越排斥这个结论，反而赞同前语言的“行为主义的工程学”。在赎回弗洛伊德的遗产时，拉康主张说言语的力量并不是什么魔法，而是基于下面的事实衍生出的特质，那就是人类的法则就是语言的法则。语言的符号结构操控着人类，由此人们不仅仅获得了他们的言语，还获得了他们的整个“人性”，当然也包括他们特有的难题。

当拉康以这个结论，也即 1953 年的演讲的核心与主要论据，来重新组织环绕着言语与语言的精神分析时，立即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相同的方式融合到这些结构性的成分中去。拉康甚至说在特殊的主体身上，言语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彻底地悖论性的。

关于此的第一个例子是疯狂（folie）这个广义的临床范畴。在此，悖论是，为了建构极端精致的妄想系统而毫无禁忌地玩弄词语，人类能够自由地谈论困扰他们的相关事宜，他们有弹性地在运用语言。同时，他们却又完全无法占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拉康指出，在精神病中，与强烈的言语自由相匹配的乃是被说出的词语的缺席。因为被说出的词不再针对另外一个人来言说：“主体被讲，而不是正在讲着”。如同在 1946 年跟亨利·埃的讨论中，拉康已经强调过的，精神病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能够想见的最为自由的个体，可是，为了获得这种极端的自由，他们需要以身体与灵魂为代价。

直到 1955-56 年，拉康在研究施伯法官的回忆录与弗洛伊德对于这本书的分析时，才更进一步地指明，在精神病中言说与语言的独异特性。在第三个研讨班的开头，拉康便主张，言说通常是针对别人来言说它本身（对话者与言说者，包括它自身）。可是，他马上就补充说：除了这些别人之外，言说也牵涉到大彼者。

大彼者只是那个言说者始终并不知晓的彼者，因为他接近这些人靠的是语言。语言在言说者与对话者之间竖立起了一扇墙壁。由此使得其他人（小彼者们）变得有些深不可测。换句话说，就对话者被说话者（当

成另外一个自己、另外的自我)认识 and 了解而言,彼者就代表着对话者。另一方面,大彼者涵盖这位被言说者的被认识的,可是又永远没有充分予以确定的层面。

为了说明这点,拉康提到,比如“你是我的主人”这样的一个信息,被一位个体传送到一位所认识的彼者(即在句子里的这个“你”)。送信息的人并不能够确实知道,这位彼者是否确实是主人,或想要成为主人。

在此,交流并不是两个对等的代理者(发出者与接收者)交换信息的简单过程。而是在两位或更多位个体与大彼者之间的三重互动,在其中假设得以形成,而共识正待寻求中。的确,语言在言说者与他的对话者之间建立的墙壁,是要求人们为了要定义与控制相互立场而树立起的边界。这个墙壁并不仅禁止接近完整的彼者,它也促使人们去对在这个互动里彼此的特定贡献进行一些安排,并且将他们自己参与到符号盟约的建立之中去。

将此动力学运用到精神病患者正在发生的情况中时,拉康赢得了这样的关键性的洞察,即在精神病那里大彼者被排除在外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与言语消失了——因为,精神病者的确有时会侃侃而谈。但有时他们确实保持沉默,那经常是因为他们被高度的滔滔不绝的声音所侵犯——但是,那种交流已经丧失掉了它具有的这种未知的维度。

对于一位精神病人,正在被传递的东西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确定的,句子是单一的维度,一个词语除了就是这个词语自身呈现的东西之外不带有任何其它意义。这显而易见地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例子:眼睛被拧伤的女人。对于她,接受那个词 *Augenverdreher* 是不可能的(那个词也意味着,主要意味着“欺骗者”)。拉康在重新阐述这里的精神机制时说:“能指自身(而不是它所指的)即是交流的目标”,这个目标涵盖着对整个的语言结构(符号代码)根本的修正。

这个被改变的精神病的语言系统见证了许多的特殊性。按照拉康的看法,精神病的“新符码”现象中最主要的一种,关系到它所包含的新语言的形成,“在形式上……与用法上是语词新造式的表达”。施伯对

于他自己的“新符码”的设计，这个 Grundsprache（基本语言）就是形式化的语词新造的例证，因为它并没有归属在共享的语言领域当中。

他能够将 Seelenmord（灵魂谋杀）的观念称为语词新造式的运用，因为它把一个已经存在的单词转变为妄想的背景来予以使用。两种语词新造所传递的都仅仅是它们“命名”的意义。拉康陈述说：“对于主体，这个能指的高电幅数降了下来”，换句话说，这个能指被解除电荷至仅剩一种单一的意义单元这样的程度。结果，表达将它们自己强加于精神病人身上，如同流行歌曲的副歌一样；它们以相同的方式一再地反复出现。

因为，当人们感觉他们先前的表达并没有充分地传达所意欲表达的意义时，或是当感受到别人会错误地理解他们用意的危险时，他们显而易见地仅是被迫地去使用不同的文词与词语。当这样的危险并不存在时，歧义性已经被排除，那么运用不同的词语就并没有必要了。

从语言系统的这些改变出发，精神病者还会展现出信息层面的癖好。借助施伯在他的回忆录报道的各种例子，拉康指出精神病的信息总是包含着对所牵涉到的那些搭档的一种挑战。例如，施伯描述说上帝的形象如何日夜地折磨他。他们讲出不完整的句子，例如，“现在我自己正在想……”与“你应该……”，他因此被迫要用合适的结尾来填写完成这些句子，对应上文分别加入的是“……要面对我是一位白痴这个事实”与“……作为否定上帝的且耽溺于淫乱的感官享受之人而被揭发，尚且还不提其他的那些罪过。”

根据拉康的描述，这些信息最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被送出的代理者，他仅停顿在句子的这个前面部分，这个部分本来会让信息的内容明朗。被送出的代理者将这个信息化约成了相互对谈的语法形式。施伯的声音表达的这些成为片断的句子依旧拥有着唯一的意义，是“信息”作为自身的意义。被中断的那些信息并没有意味别的，除了是被语法决定的这个事实：它们正在被用来针对某个人进行言谈。这些信息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施伯必须根据他对于这个符码的知识为基础来补充他自己的那部分——每个开始的句子都有着跟它相适的结尾——以便恢复它们沟通

的价值。用拉康的话来说，这些信息是“幻觉性的挑衅”，因为它们煽动并且强迫施伯产出他所知道的东西。此外，施伯无法控制不去加以反驳，他的回答也并没有让这些声音平息下来。无论是上帝的干预，或是施伯自己的回答，都不受他个人的掌控。这证实拉康的观念：精神病者正在被讲而不是在讲。

4. 精神病的起因

在第三个研讨班中，拉康并没有满足于去描述精神病患者在交流上的这些主要特征——大彼者的驱逐、语言的语义“肤浅化”、已经变作信息的符码、还有被化简为它的符码的信息、乃至交换的冲动性的本质——他还尝试去描述这些特征的原因。

假设大彼者的维度与定义在特殊交换位置上的可能性是被语言所强加的墙所导致的，那么拉康必然获得这样的结论，即精神病那里，这个墙因为某种原故并没有被竖立起来。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语言并没有被锚定。

非但不是被牢牢镶嵌的坚固结构，它还是一种自由漂浮的、平坦的可被穿透的帘子。透过参考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的词表象与物表象已被撕裂开来的观点，拉康把这种语言的未-镶嵌定义为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锚定点的缺乏”，因为这样，精神病本身将对父姓的脱落负起责任。

在第三个研讨班的最后一堂课上，拉康建议把“脱落”作为是对弗洛伊德的术语“Verwerfung”的绝佳翻译。在弗洛伊德的著作里，“Verwerfung”几乎无法被看成是个概念——提到这个术语的段落非常少。当拉康将“Verwerfung”概念化为精神病的特定精神机制时，他主要是从弗洛伊德在研究“狼人”个案时的以下句子引申而来：压抑（Verdrangung）是某种跟谴责性评判（Verwerfung）非常不同的东西。

因此在1954年到1956年之间，拉康尝试将Verwerfung跟“压抑”对立起来予以定义，而且也跟弗洛伊德曾在论文“论否定”（1925）中

讨论到的“Verneinung（否定）”与“Bejahung（肯定）”的精神机制相关联而予以定义。最后，拉康得出这样的结论：Verwerfung与Verdrängung的差异在于它们的影响的不同：在压抑的影响下产生的东西会再回来，因为压抑与被压抑物的返回仅是相同硬币的两面。被压抑物总是在那里，它在症状与许多其它的现象中以非常清楚的方式表达出来。相比较起来，在Verwerfung的影响下发生的東西，具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在符号秩序被拒绝的任何东西，用Verwerfung的意义来说，会重新出现在实在界。

拉康在此给予“Verwerfung”这样一个意义——某个事物透过在实在界的重新出现（作为幻觉）的一种过程。这个意义符合弗洛伊德在研究施伯的案例中对于精神病的症状形成的精神机制的描述。依照弗洛伊德，遭受幻觉或迫害妄想的妄想症病人，从属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内部的知觉被压制，而……它的内容以外部知觉的形式进入意识。”

起初，弗洛伊德称这个过程为“投射”，但是由于人们规律地将他们的心灵状态归于外界而不是内在的原因这个事实——这也应该被称为是投射——弗洛伊德逐渐怀疑他自己的指称：“假如我们说，内部被压制的感知被投射到外部，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真相在于……内部被废除的东西从外部返回。”拉康当时一定曾注意到，弗洛伊德白费力气地在寻找一个适当的名称来描绘精神病的精神结构。这激发他指出这个精神机制乃是“Verwerfung”，而且他牢牢记得弗洛伊德自己曾经构想的Verwerfung是跟压抑截然不同的东西。

当拉康最后选择将“Verwerfung”翻译成“脱落”时，他重新强调精神病的精神机制的语言本质。的确，虽然“脱落”是一个司法术语，表达当一个人没有行使被分配的权利时，这些权利的终止（例如，离婚之后，合法地看望自己的小孩），但是拉康是从达姆合（Damourette）与皮雄（Pichon）讨论法文否定词的本质的论文（1928）中获得这个观念的。法文的否定词通常由两个部分组成——如同在ne...pas以及ne...

jamais 中那样——达姆合与皮雄重新定义第一部分是不协调的成分，而将第二部分定义为脱落。他们观察到，后者比起前者更加类似于简单的逻辑否定，在某些情况中，前者会被省略，而不会丧失句子的意义。

他们也将“脱落”看作是，一种要排除某个事件的存在或再次发生的这种可能性的欲望的语言索引，一种他们将它类比为某个知觉从视野内剥落（scotomization）的现象。拉康并没有把自己限制于法语否定词的这个特定结构上。他用“脱落”来替换 Verwerfung 的其它翻译，因为依他的看法，这个运作描绘的是语言元素（一个能指）而不是“内部知觉”的被排除。至于这个能指的确切本质，拉康在第三个研讨班探索了各式各样的途径，最后拉康从 1957 年到 1958 年探讨精神病的文本开始把它称为父姓。

在 1953 年的“神经症的个人神话”的讲课中，拉康引入了父姓的这个概念，以便将现实的父亲、血肉之躯的人跟符号的“父亲功能”区分开来。他解释说符号的父亲功能，是事物的自然秩序之上的文化性所决定的规范。在同时期的“罗马演讲”中，他更进一步地指出“在父姓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符号功能的支持，自古以来，符号功能的支持已经将父亲这个人，跟法则的形象相等同。”

因此，在拉康 1950 年的理论中，父姓这个能指跟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所理解的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具有明显的类似性。耶和华是一位作为支撑也具有要求性的却从未显露其真实面貌的代理者。他是一位抽象的、可是会言说的创造者，他承诺给予救赎，作为交换，则需要严格服从神圣的法则。这个神圣法则的第一个准绳就是割包皮。这是一种抽象的无形原则，赋予以色列民族一种替代的符号秩序，它重新塑造了他们的自然生活的面貌。

拉康的父姓的概念传递着一种类似的意义，因为它被认为代表着自然储备物被赋加上的超验性，带着更高秩序的精神与社会的功能，虽然拉康的概念背叛了它的宗教背景，他将它的运作延伸出了该领域，并把它构想为是每种社会文化组织的指导原则。类似于摩西的上帝，父姓因

此始终保持着一种根本性的语言的原则，这倒不是因为它言说的这一事实，而是因为拉康将它视为共享性的语言系统的基石。他还指出规范的父亲功能的表象在大部分的文化以及历史中，被看作是真实父亲的工作之一。他们跟儿童的关系，并不像与真实母亲的关系那样无可辩驳。

精神病那里父姓的脱落意味着，个体被排除了一种可能性，即用被文化决定的符号盟约（包含命令，禁止与容许）替代没有被污染但却混沌的自然情况。依照拉康的观点，精神病人实质上是一个非法之徒，因为他没有接受语言文化的法则。如同在第12页所描述的，结果并不是语言完全被根除殆尽，而是语言不再作为在个人与环境之间所竖立的一个阻碍了。父姓的脱落与随之而来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缝合点的缺失，也意味着，词语的意义不再能被改变，而是凝固，其程度达至词语在符码自身的层面被石化。

当我们考虑到缝合点的缺失似乎意味着所指（物表象，被文化所强加的意义）在能指（词表象）之下永无止境地摇摆，而坚固建立的缝合点则指示固定的意义被分配给特定的能指之时，这看起来似乎是古怪的。

可是，依照拉康的看法，缝合点的缺失预先包含着语意的模糊性，因为模棱两可预先就假设说至少要有两个不同的意义才能够互相对抗与平衡。这反过来就会要求至少先有一个意义已被设立。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词表象与物表象之间关联性的安顿，指涉着词语的字面意义能够被用来跟比喻形象的意义相抗衡，相反，这样的关联的缺失会让这个过程变得不再可能。

在拉康的理论里，一个令人特别为难的问题在于：谁或什么会为父姓的脱落负责？在1957年到1958年探讨精神病的论文的最后几页，当转入这个问题的时候，拉康极度小心地来展开他的论述。

首先，他排除这样一种观念，即脱落起源于父母互相竞争，为要赢得并维持儿童的爱，例如，母亲经常会在儿童的面前习惯性嘲笑父亲。拉康强调的不是这种对父母中的一位（尤其父亲）产生伤害的双亲竞争，而是在跟小孩的关系中，父母双方应该给予父姓以符号的地位，以这个

方式，他把经典的俄狄浦斯的母亲-父亲-儿子的三角地位，分解为两个次级结构：母亲-儿童-父姓，与父亲-儿童-父姓。

在这些次级结构的每一个里面，父母的代理应该保证这个超验的符号的父亲功能得到承认。这意味着父亲与母亲需要用明确的词汇让小孩知道，他们都隶属于这个他们无法予以改变或控制的符号秩序。父亲与母亲都需要承认他们并没有具体体现法则，而是法则本就超验于他们而存在，他们自己都被迫要同意这些法则，就如同其他人一样。用更加具体的术语来讲，这导致父母告知他们的孩子：他们被期望去遵守特定的社会规则（例如，乱伦禁忌这一基本的“弗洛伊德的规则”），而且尽管他们处于父母的位置，这个期望也运用到他们身上。如同拉康所强调的，“对于那些拥有立法功能的父亲而言，这样一种特权可能形成严重的困难”。

自不待言的是，拉康把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三角解构为两个区分性的三元组，却并没有勾勒出父姓脱落，以及在儿童那里随后浮现的精神病结构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儿童的父母中的一位不尊敬父亲功能就足够了？还是说，父母应该成为不尊敬的同谋呢？而且假如父姓被双亲去除了根基，那会自动自发地导致儿童的精神病？还是说，还需要某个辅助的条件才行呢？

有时，评论拉康理论的人们会争论说，母亲拒绝接受父亲的权威就足以让精神病发生在儿童身上，因而借此，他们将拉康复杂的俄狄浦斯图示缩减为简单的三角形起源，而且他们也重新用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加以安排：即儿童的心灵的正常性基于通过父亲以及同步的“三角剖分”的介入，这造成他跟前俄狄浦斯的母子二元关系的分离。

拉康的研究并不允许我们去从事这类推测，甚至也未曾暗含有对此难题的好的替代性答案。雅克·阿兰·米勒（1987）曾经提议要将拉康的模式复杂化，以便考虑儿童自身的参与。当米勒明确地规避拉康理论的结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观念时，他依循拉康1946年的文章“论精神因果性”来加以申论。在那篇论文里面，拉康曾主张说精神病最后

安顿于“存在的深不可测的决定”上。

根据米勒，“脱落的公式”让对于疯狂的辩论陷于瘫痪的境地，以至于我们不可能阅读支持这个公式的东西。当人类变成精神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有毒的父母态度的被动受害者，而且还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决定”要拒绝父姓，就好比神经症者（而不是他们的父母）压抑了某些创伤性的事件。

可是，拉康的论述同样强调探索该“决定”的确切特性是不可能的。虽然脱落无法在没有支持性的主体情况下运作，然而，该成分以什么方式、在何时何地，会进入或是说将会进入到这个运作中，则始终是个谜。由于它的难以探测性，该决定既无法追溯，也无法加以预见。同样地，关于这个决定是否暗含自由选择，或者已经被别人的要求与欲望所塑造，又或许它是否可以被修改，我们都只能对之保持沉默。

5. 精神病的转移

虽然精神病那里的语言紊乱对应于一个核心诊断意义，拉康仍很想强调，精神病并不是“纯粹而简单的语言事实”。父姓的脱落不仅影响个人的言语活动，而且会影响他的性别认同，还有与别人的关系。

拉康的观点是，父亲的功能——作为象征秩序的基石——重写了人类的“性欲”的自然属地，并且将之引入到一套规范中，这规范指示了成为男性或成为女性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定义了男人与女人应该做什么，假如他们想要被看作是属于某个特定性别的话。

符号的性别秩序的原则就在于符号石祖（ Φ ），它代表这些能指之间的差异性标记，包括男性与女性的那些差异。当父亲的功能脱落以后，石祖无法让自己在符号秩序里立足。这将导致这些能指的特殊“混合”（这

被拉康称为“单字句”^①)，而且它也模糊了被文化安置的男女之别。在精神病那里性认同所构成的挡住不同性别的符号塞子被抽除了，这样男性性与女性性开始互相融在一块。

施伯坚信他的身体正在被去势，因为他最后将转变为一个女人，经过神圣的代理者的授精之后，这位女人将会产下一个新的人类种族。在某种意义上，施伯的坚信并没有让精神病的性别差异的坍塌成为范本，因为它已经是他尝试的部分与成分：他尝试要将某个秩序——虽然是种妄想的秩序——引入到他的混乱的体验里。虽然如此，它确实指示出他并没有担负起公共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性身份的区分，而屈从于性的基质中，这里，不同范畴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关于精神病跟他人的关系，拉康注意到一个事实：大彼者的排除引导个人进入到与他人的奇特纠缠中，敌意与竞争性弥漫其中。神圣的代理者侵入施伯的身体与心灵，就如同他侵入他们自身的世界一样，这指示着他跟他的折磨者的关系被持续的竞争性所标记。

虽然施伯必须同意神圣的章程，神祇见证了一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性，由此他们的存在同样依赖于他，就如他的存在依靠着他们那样。施伯跟他的世界拥有一种镜像反射的关系，他自己身体的瓦解也反映出神的身体的碎片化。好像施伯的迫害者仅是他自己的虚构影像，假如没有他，这些人物根本就不会存在，但他们的在场让他不能探索与掌控。

跟他人的严密的想象关系在转移之内严重影响到精神病的立场。与弗洛伊德不同，拉康并没有排除精神病人跟他的分析家发展转移关系的能力。可是，他将这种精神病的转移跟神经症的转移区分开来，对此他遵循的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① 在拼音文字中，单字句指涉一个单词代表一句话的意义，这在自闭症还有精神病患者那里常见，例如当第一次看过大海之后，会以说“海水”来代替：“我想去看大海，就像上次那样，很开心。”甚至更广泛地进而代表一切第一次看大海的感受与欲望，例如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就说“大海”。这也意味着开放的语言的能指被变成单纯的符码。此时只有跟说话者一同经历当时情景的人才能了解到该单字词的含义。这是符号法则缩减为想象关系的一种指征。——译者注

在 1950 年代，第一个方向被落实在他所建构的作为分析过程的动态模式的“L 图”的背景下。在这个时期，拉康认为符号与想象的转移之差异在于：前者是有效的有益的一类，而后者则仅是充当这个阻碍的功能。

符号转移预先假设了病人的言语针对的是小彼者与大彼者二者，这意味着，某个人接近分析家来言说他自己，这一方式牵涉到某种程度的无知（大彼者作为未知）。在第一个研讨班的结尾处，拉康甚至竟然说无知是让（符号的）转移发生的基本条件。

“假如主体专注于追寻真理本身，那是因为他将他自己安置在了无知的维度中——他是否知道并不重要了。这是组成精神分析家所谓的‘对于转移的准备’的元素之一。在病人那里有一种对转移的准备，他单方面将自己放置于在言说中承认自己，并且在终点处去寻求其真理的位置上，而这个终点就在精神分析家那里。”

在病人这边无知的缺席也会敞开转移的大门，虽然转移的风格是想象的、竞争性的，而且具有潜在的摧毁性。这确实就是我们能够在精神病人那里预期到的想象的类型，虽然他们被大彼者的驱逐与透明的小彼者的幻象所统辖。一般来说，精神病人并没有证实对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或关于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某种程度的无知。

相反，他们根据牢靠建立的知识、根深蒂固的信念，以及他们所遭受痛苦之本质的确定性，来采取行动。在第 11 个研讨班上，拉康主张“非信任”（*Unglauben*）的现象统辖着精神病人，因为信任（无论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总是包含有怀疑的成分，后者在精神病人那里完全不存在。这个根深蒂固、坚固的精神病的知识的必然结果，就是小彼者只能作为一个替代性的自我、一位支撑、维系并让个体的确定性得以生效的想象的替身而得以接近。

后一点导向拉康区分精神病与神经症的转移差异的第二个标准。在第 11 个研讨班里，他将精神分析中的转移安置到 *sujet-supposé-savoir* 的功能上，换句话说，即被假设知道的主体，或是更加准确地说，“被假

设正知晓的主体”。拉康这样提及：“对于主体而言，无论这个功能何时被镶嵌到具体的某个人身上，转移就已经建立了。”从他自己的无知出发，一位神经症的病人会来到精神分析家的面前，以便把他作为被认为正知晓的主体来询问，这就意味着转移的开始。

可是，精神病人并没有丝毫理由将精神分析家——或就该事宜而言的某个其他人——当作这种被假设正知晓的主体的功能来加以投注。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一切所需要知道的东西（并被这些所占据）。虽然神经症者拼命地想要找出某个掌握了他们所欠缺知识的人，进而去测试那个知识，但精神病人坚定地相信在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之外，没有任何要发现的新东西了。当他们跟精神分析家谈话时，他们并没有假设他是知道的主体，而是将之当作某个会理解并证实他们经验的人。总之，他们尝试找的是“迫害的见证者”。

从这一事实出发，他们就提供给精神分析家（在语言的紊乱之外的）第二个非常可靠的诊断标准，而这些精神病的特殊转移特征，给解释与转移的标准分析技术着实泼了一瓢冷水。如同弗洛伊德充分认识到的，正统的精神分析设置无法应用到精神病人的身上，对此，拉康则补充说，假如我们将精神病前期（拥有精神病结构，但是还没有触发“精神病现象”的人们）带到精神分析中，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充分发展的精神病。一方面，这些警告让精神分析家更加迫切地想要正确地诊断精神病的病人——而且还需要尽可能地在分析进程的早期阶段；相反，另一方面，当他们冒险以分析性的方式去探索精神病的时候，这些也迫使它们要重新思考他们的技术。

在拉康看来，精神分析家不应从精神病面前退却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将给予某些指示：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如何将这个激励转变为众多的技术性修订与建议的，它们多半有赖于拉康自己所提倡的一些最低限度的准则。

6. 倒错的诊断？

我们讨论倒错的部分将必然会比对另两类的讨论更为零碎，因为拉康讨论倒错症，并没有像评论精神病和神经症那么精细与一致。而且下文主要是我自己对拉康的著作的诠释，而不再单是追随他的论述。

拉康于1953年的“罗马演讲”中辨别处于言语同语言之间的这第三种临床矛盾时，并没有冒失地给出倒错的分类范畴一种替代性的定义。相反，他把这第三类矛盾的人描绘为“在客体化的话语中丧失他的意义的主体”，这种话语展开在一个更为形而上学的观点里面，即探讨主体与自我之间的敌对关系。拉康把“倒错的伪装”——还有“性格的谈话兵器”与“自我-惩罚的封印”——放到神经症的旅途包间中，把它们作为是精神分析的阐释能够加以解析的三种“神秘元素”。

拉康将倒错的品质界定为混杂的临床结构时的犹疑不决，弥漫于他的许多1950年代开始的著作里面，并且其根源在于，弗洛伊德在先的对该议题的精神分析探索中困扰他的那些理论的不兼容。对倒错概念的使用，当时医学与法律对这些性的现象的理解里，预先包含着的是：进行性器官结合的成年人与（或）牵涉到的对象乃是不同性别的两人。弗洛伊德在他的个案研究《杜拉》，与《性学三论》中主张，所有的精神神经症者都具有强制性，虽然这是种压抑的倒错倾向；而且小孩的性别构成，由于受到未组织化的部分冲动的统辖，都会呈现出多形倒错现象。结果，倒错的范畴被扩大到包含小孩与成年人、精神神经症者与“真正”的倒错者，而且弗洛伊德自己也看到了他面对着如何区分真正的“积极倒错者”（本体的倒错者）与虚假的“消极的倒错者的替身”这样的问题。弗洛伊德在抛弃了性行为特性与幻想的内容之后，最后坦承说，真正的倒错固着于性的客体但却倒错性地丧失了性的目的，他将这些过程归为体质与意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当然，固着与排除都是就量的方面而言，这并非质方面的标准，这很可能解释为什么弗洛伊德要去继续寻找

更为可靠的方式来对倒错者与神经症者加以区分。

在《恋物癖》（1927e）中，他建立了否认（Verleugnung）这个标准来解释一位男孩何以发展为一个恋物癖者。当面临性差异的现实时，这个孩子透过说服他的母亲其实是有阴茎的，以此来否认阉割（即母亲阴茎的欠缺）。作为母亲的这个令人痛苦的丧失阴茎的替代，恋物癖得以构成是为了维持这种精神反应，并且导致孩子自我的分裂，因为它同时象征化了精神的胜利与阉割本质的威胁。根据弗洛伊德，这种分裂也能够解释当恋物癖者面临他的客体时采取的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虽然这是关于（恋物癖）倒错者的合适的质的标准，类似于神经症者压抑的标准，然而，弗洛伊德把“否认”这种心理机制肆意地应用在性行为的本质与幻想的内容上。因为就在他过世前不久写下的《精神分析纲要》中，他强调过在非-恋物癖的主体那儿有“否认阉割”的可能，那不但让恋物癖的特殊性限于丧失的危险，而且也让倒错的整个范畴的特殊性濒临瓦解。

在1950年代早期，拉康接受跟弗洛伊德相同的对倒错的定义，而且他开始从事一个类似的计划，以便区分出儿童的多形倒错行为、神经症（以及精神病）的倒错行为，以及真正的倒错者的精神结构。在第一个研讨班上，他提出假设认为，倒错者的结构性特点是透过对想象关系之主体间性的认识来对“符号”登录予以缩减。

由此他的意思是，倒错者尝试将他们的性伴侣缩减为仅存的客体、工具与玩偶——这并不是要在理想化的无生命客体中来寻求慰藉，即这些客体的唯一功能是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而是带着让顺从与支配的关系能够突然地予以颠转的申请，因为这样，原本的主人变成奴隶，反之亦然。甚至，这个观察表面上让拉康将真正的倒错者与我们所谓的倒错性的性“现象”区分开，而依据则是“排除性的角色扮演所执行的层面”，它并没有经受住幼儿性欲的考验。因为在同一个研讨班上，拉康承认说，假如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将多形倒错的特质赋予小孩的这种或那种行为模式或症状，那是因为倒错症暗含有想象的主体间性的维度。在第四个研

讨班上，拉康又回到了这个议题，在那里，他进行了一年之久的对儿童的前-俄狄浦斯期同前-生殖器期的客体关系的理论分析，特别针对那些支持将儿童的多形倒错状态看作是想象的主体间性的人们。在此，他以这样的创新观念来辩护说，儿童与母亲的前-俄狄浦斯的关系，根本就没有受到想象的主体间性的统治，因为他们总是准备被已先在于人类而发挥其功能的符号世界所驻居。

对于拉康，这个原初的母子关系并不是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符号关系，而是受到两边的紧张、冲突与误解所支配的、根本上就是异质性的领域。

透过批评巴林特的将原初的母子互动作为完美和谐互惠交换的观念，拉康宣称，母亲爱（滋养、看护与养育）她们的小孩，并不仅是因为小孩构成了她们珍贵而易受伤害的后代这个事实，而是因为小孩呈现给了她们额外满足的源泉。换句话说，母亲爱她的小孩，并不是因为她根据自然的母亲之本能在采取行动，而是因为她无意识地使用孩子来掩盖她的符号欠缺的享乐，并且透过任意与自私的方式来获得这种补充性的满足。用拉康的术语来说，那就是在母亲那里，对于孩子这边总是有石祖的要求，由此孩子或多或少都会对之加以象征化或者予以具现。

就孩子自身而言，拉康主张他（孩子）经验到精神危机，是当他发现为了获得母亲的爱，所需要的东西不仅仅是“在那里”就成的，为了维持她的爱，光是提供他自己是根本不足够的。孩子也是作为母亲欲望客体“石祖”的这一事实，就儿童的欲望满足而言形成了一道无法被克服的阻碍，该阻碍就是试图要成为母亲的欲望的排他性的对象。

孩子能够用两种不同方式来减弱这个冲突。一方面，透过认同为石祖（母亲的欲望对象），孩子能够尝试维持他自己的欲望满足（成为母亲的排他性的对象）；另一方面，孩子能够承认与母亲在社会文化层面有着充分令人满意的关系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同时承认给他某种不同的、未来的满足。在前者的情况中，孩子努力满足母亲所有的欲望，因此将他跟母亲的关系安放到了想象的轴线上。这意味着，没有私心地互相依

靠与严格的互惠；而在后者的情况中，孩子接受跟母亲具有禁止关系的符号传统，他接受他的欲望基本上始终不会被满足而且尝试去追寻替代性的满足。拉康主张说前一种解决方式会导致恋物癖，即“倒错症中的倒错”，而后者则是将儿童引入到神经症的结构当中。

尽管有这样的呼吁，这种倒错症的详尽解释仍被证明跟先前的解释（即将符号缩减为想象的主体间性）同样地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它对倒错者如何不同于精神病患者这个问题进行了闪避，因为拉康也曾将精神病定位在符号约定之外。

拉康的解答也没有回答如下问题，真正的倒错症者是否不同于也会表现出“倒错行为”的众多神经症者与精神病患者。当拉康解释这些神经症与精神病的“倒错”行为时，他经常论及“悖论性的倒错反应”，倒错者的“突然发作”与“付诸行动”，承认说它们也有赖于对主体与他的满足性的客体之间的符号性规范的距离的缩短，而考虑不全面的分析家可能很容易不知不觉地在分析的治疗过程中被诱向这些微缩图景上。

为解决倒错者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区分这个问题，拉康回到弗洛伊德1919年的论文“被打的孩子”，宣称倒错者并不像精神病人，他们遵循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模式。

倒错症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还没有被俄狄浦斯的神经症的机制所建构的冲动——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幸存者，无法得以化简的部分冲动的持续存在。相反，在这篇原初的论文“被打的孩子”中，同样还在许多其它的情况下，弗洛伊德充分地指示说没有哪种倒错的结构化，无论我们认为它是多么的原始……被表达的时候……不会没有俄狄浦斯情结的这个过程、这个组织、这一表达。

一年以后，拉康使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来描述倒错症的俄狄浦斯特性。可是，这时，他会转过头来再度面对倒错症与神经症被等同的难题。

要放弃这种倒错症纯粹且单纯地是冒出来的冲动这样的观念——弗洛伊德在撰写《性学三论》的时候，倒错症并没有被看作是冲动的纯粹

而简单的呈现——，它被证明是跟辩证的背景密切相关的，该背景跟神经症一样的微妙，一样是复合性的，一样具有妥协性，一样地暧昧模糊。

在同一研讨班的后文中，拉康提出了倒错症与神经症之间结构的类似，进而宣称压抑的神经症的精神机制同样也适用于倒错症，因为它也会把它自己呈现为一种症状，而不是作为纯粹而单纯的无意识欲望的表现。

提出这个神经症与倒错症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时，拉康接下来的行动就是要以神经症的动力结构：享乐，欲望，对象 a 以及幻想来定位倒错症。这个新的差异的基础在第六个研讨班中得以完成。在那里，拉康主张这种幻想标志着每个人类的激情都具有我们所谓的“倒错”特征，虽然在“倒错症中，强调的是客体小 a，神经症者则是被定位在其所强调的幻想这另一术语之上”。

在工作的其它时间里，拉康将幻想这一标准当作区分神经症与倒错症的工具。例如，在第十个研讨班，他陈述说倒错症的结构严格来说是这种幻想颠转的效果，因为他是“在遭遇到主体的分裂时将自己确定为客体的那种主体”。

不幸的是，我们更加容易强调这些引述而不是去解释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拉康的论点要旨似乎在 1960 年的“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中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一文中予以概括了，在那里，拉康写道：假如它并不会以一个特殊的方式使得大彼者感兴趣的话，倒错症（对享乐具有特权的位置）会增添一种原初根本不会出现的石祖的回收。只有我的幻想公式能帮助我们揭示，正是于此主体让他自己成为大彼者享乐的工具。更为重要的乃是……要掌握在神经症的个案中这个公式的意义，确实是因为神经症篡改了它。

假如倒错者通过俄狄浦斯情结，如同拉康从弗洛伊德处学习到的，那么他们必须经历石祖享乐的丧失，如同神经症者（强迫症与癔症）一样。就像神经症，倒错症也必须着手去重新获得那种丧失掉的享乐。这个计划的结果将会组成主体完满的复苏。因此，倒错症对这种原初根本不会

出现的石祖的回收，是出于同神经症一样的机制。

区别倒错者与神经症者的东西，就是倒错症的大彼者尤其牵涉到对这种丧失掉的享乐的恢复这一主体过程。我已经解释过，在拉康的术语下，癔症的主体尝试要跟符号的阉割（享乐的丧失）达成妥协。他呼唤并且维系大彼者的欲望。就某个意义言，癔症者通过让他们自己被欲望而获得了满足，但这并不是享乐的满足。

在处理癔症者时，我们经常发现他们极其吸引人却又完全令人乏味，而这确实是他们想要达成的。对于癔症而言，大彼者的享乐就是不计任何代价地要去避免的东西。以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强迫症者凭借将大彼者的欲望保持中立来尝试克服符号的阉割。

强迫神经症者获得的满足源自与大彼者的纠缠，并且把感知到全然的孤立作为自己最辉煌的成就。强迫神经症者无论多么讨人喜欢，他们都没想要被人欲望，更不用说想要被别人享乐了。因此，面临大彼者的欲望时，尽管策略不同，癔症与强迫症都想逃避大彼者的享乐。他们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成为大彼者享乐的客体。

这着实就是同倒错症结构分叉的地方了。从拉康的观点来看，倒错症获得满足凭借的乃是遵循大彼者的享乐，因此将自己转化为“大彼者享乐的工具”。当从召唤大彼者身上的享乐来获得满足的时候，倒错者想要毁灭阉割的效果这一策略，既没有牵涉到把东西从大彼者那里要回来（如癔症所做的），也没有忽视这种丧失（如强迫神经症者那样），而是创造一种让享乐在那里得以拥有骄傲地位的替代性的符号秩序。

倒错者通过缩短符号法则的影响而超越了神经症者那里享乐与欲望之对立，而且将享乐建造到大彼者的核心处。用这样的方式，倒错者实质上倒错化了神经症的法则，依照该法则，享乐会被那些如此言说者所拒绝，倒错者则相反，他主张有权去获取享乐的话语。神经症的经济学区，享乐是被排除、被禁止的特权，在倒错者的意识形态里面，享乐则是可运用到日常生活情况的每个人的法定普世原则而得以提升。在第 11 个研讨班中，拉康将这种倒错的解决方案指明为幻想的颠转。

正常来说，在神经症者那里，幻想包含有面对完美胜任的亲切客体的至福图景。神经症者的幻想赞颂每个可以想象的、被禁止的性活动（而且还不仅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它会被称为是“倒错的”，以符合前面提到的对倒错症的经典定义。

相比起来看的话，倒错者的幻想被引向纯粹而且没有被污染的，可是却是有缺陷的且令人狼狽的客体之上。在幻想的层次上，倒错症并没有欲望那些淫荡的而且丰满的风流男子（或者悍妇），而是那些夸张地单纯、性纯洁的天使。因此倒错者的幻想比起神经症者的倒错悖论性地看来并没有那么“倒错”，不过要附上的是，倒错者非常渴望去败坏被幻想的客体所珍惜的那种道德感。

在拉康的教学的前十年里头，逐渐澄清了对儿童的多形倒错、神经症者与真正的倒错的混淆，给出了对独立的倒错症结构的描述。后者相较之下不会作为性行为的特殊类型——特别是所有那些超越成年异性生殖标准的性行为，而是更多地作为一种处于主体、客体与符号秩序之间的特定关系——而出现。

虽然如此，倒错者似乎建构了一种替换性的“享乐的法则”，以便让他们特别容易沉溺于那些在文化方面被禁止的性行为。换句话说，拉康理论暗含的是，倒错的行为——如上所定义的——并没有神经症者、精神病者与倒错症者的区别，虽然倒错者很可能在那些被宗教的、道德的或法律的标准所禁止的性行为中找到强烈的慰藉。

与其对于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反思比较起来，拉康对于如何在精神分析方面治疗结构上是倒错的病人的建议是极其有限的。我们透过病人的言说与转移，以此为基础来诊断倒错症是可行的么？倒错者如何跟知识与真理有所关联的呢？他们受症状的影响吗？假如是的话，他们又是如何经验到它们的呢？是什么驱使一位倒错者来找精神分析家的呢，而且后者会被作为是被假设知道的主体来靠近吗？正在与倒错者工作的分析家可以使用与神经症相同的解释技术与处理转移的程序吗？这些以及其它的技术性问题基本都暂时被予以搁置了。有些作者曾

经嘲讽拉康对倒错症病人的分析治疗的沉默，但这不应该让分析家太过于操心。因为倒错者很少会前来跟分析家会谈，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性满足的客体与方法非常满意，要么是因为他们害怕治疗会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一分享乐。

也曾有人在那些对个人分析感兴趣的倒错者那里取得了进展，但他们更多的是来寻求如何继续他们某些不合法的做法但又可以保持守法的“正确面”的，这仅是一种对额外享乐的秘而不宣的要求。从这些观察的观点来看，拉康派分析家的注意力经常地从掌控倒错者的分析治疗，转为朝向对在神经症者与精神病人那儿出现的所谓的“倒错症的特征”（恋物癖的做法，同性恋的客体-选择，自虐狂的幻想）的管理上。

虽然从结构上讲，分析家接待属于倒错症的客源人数极少，但是重新展开根据言说与转移的基础如何引导治疗，或更有意义地如何去诊断倒错症这样的议题，确实是值得努力的。的确，我们可以合理地去假设说，某些倒错者，尽管他们在自己接纳的符号秩序里靠近了令人满足的性客体，他们仍可能因为经验到焦虑或沮丧的重复发作而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

对于实践者来说，倒错病人如何进入精神分析，包括技术性与诊断的指导方针，被安德烈（1993）用一种启蒙的方式予以描述过。当把目标朝着探索倒错者的言说与转移的特殊性质时，这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主张说：倒错症在转移内部是有所踪迹的。它是透过跟大彼者关系的倒转，且对被假设知道的主体位置的强烈颠覆而呈现出来的。当我们听见倒错者言说时，我们体验到的不可能是对一种不正当的行为的表达；我们总是觉得倒错者的话语有点令人反感……这是一种倒错的方式在宣告幻想。[倒错者拥有]经常是凭借挑衅来展示他们的幻想的倾向。

这个片段包含分析家用来诊断倒错症的所有元素。不像神经症，倒错症描绘性幻想没有任何困难，他们的描绘还带着其古怪而卑下的细节，似乎是为了通过使精神分析家感到尴尬，使其感到惊吓或者兴奋来获得享乐。这就是他们跟那些弗洛伊德以“孩子被打”的幻想为基础而描述的神经症故事所牵涉到的病人之间不同的地方，因为弗洛伊德的病人表

达的他们手淫式的幻想，是带着犹豫、不确定、抗拒、羞愧与罪恶感的。此外，倒错者并没有把分析家当作是被假设知道的主体来咨询，而是将其当作被假设享乐的主体。这意味着，当他们自身正在或拼命地寻求这个满足的时候，他们认为分析家着迷于相同的事情，或者拼命地去寻找精神分析的专业并未容许的，而他们自己正在促销的这种满足。与其他每个人一样，倒错者会激励分析家放开他的限制性道德标准而且要成为盟友，或至少认可他的享乐的生活与法则是吸引人的。他并没有对着被当作假设知道的分析家在谈论，因为倒错者把他们自己当成被假设知道的主体来呈现。

这个倒错的知识关涉到通往享乐的途径，而且他们将会说服精神分析家，他们期望他会备受煎熬，因为他顽固地不愿意遵循他们所相信的、通往快乐的皇家大道的普世价值之途径。

可是，当来客正好是一位倒错者时，这些诊断性的指示并没有给精神分析家提供多少指引，就他们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的临床工具而言。在一次对倒错者分析的罕有的吐露中，并且还跟该情境下的专业复杂性形成强烈对比，拉康坚持说倒错者“着实是可以清晰表达的、可以解释、可以分析的某种事物，是跟神经症者确实处于相同层面。”在此，他重复弗洛伊德的信念，即积极的倒错者（倒错症本身）也可以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

弗洛伊德将他的主张建基于这样的观念之上，那就是“积极的倒错者”在婴儿期的性倾向的固着与退行必定起源于主流的性发展的退行，后者跟神经症的核心精神机制是一致的。当拉康对弗洛伊德进行阅读时，他认为这表示的是倒错症根基于俄狄浦斯情结之上，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倒错症的个体跟神经症者一样服从于符号阉割，这导致了分裂的主体（\$）、欲望、幻想、与丧失的享乐的安顿。情况既然是这样，拉康的重点似乎是，在相同的（俄狄浦斯）水平上，神经症与倒错症确实能够被分析。

可是，在倒错症那里幻想颠转的效果，被形式化为 $a \langle \rangle \$$ ，这构成了

另外一个对分析家的重大挑战。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反映出了依照拉康在1960年代的末期所构想的分析家自己的位置。因为在第17个研讨班所建构的分析的话语那里，拉康也让分析家作为客体 a 来运作，而分析者则充当分裂的主体功能（这是分析的癔症化效果），这暗含着分析家的欲望与倒错症者的欲望之间有一个明显的结构的相似性。

这种整齐的对等至少引来两个基本问题。首先，究竟是什么阻止分析家不会成为一个被体制化的倒错者？我们又如何能区分分析家的持久献身与倒错者典范性的投入呢？其次，当假设说在分析家与倒错者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的时候，当他们的病人代表他们自己的一个形象的时候，分析家如何有效地进行干预呢？这位非-倒错的分析家如何能够与一位具有个体性的、分析性的倒错者进行工作的呢？

这些临床问题，伴随着对神经症者与精神病者的分析一块出现，将会在本书以下的（即分别处理拉康学派的分析家在治疗中的位置、处理转移策略的立场以及分析性解释的技巧的）章节中得到讨论。



其 他

身体形象、字母和中文：引论

许丹^① / 著

【内容提要】本文以精神分析中的身体形象概念为着眼点，从身体形象中的“形”和形声字汉字的“形”的链接出发，讨论作为话语治疗的精神分析在中文语境下的可能性和独特性。身体形象本身是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之间的概念，它对应于拉康的“想象界”和自我到主体的转折点，它连接着符号界和语言的缺失功能。拉康在晚期借道汉字的“文”即字母（lettre）来进一步发掘语言的结构化功能。也许恰恰可以借助这一文字的独特性探讨中式精神分析的困难、特点和抵达。

【关键词】身体形象 阉割的想象功能 缺失 语言 文

1. 身体形象

“身体形象”（l' image du corps）是隐含在弗洛伊德的经典理论到拉康的革新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很早就阐释 Imago 的重要性，关注儿童的多尔多提出了“无意识身体形象”概念，擅长治疗精神病的班蔻夫则围绕着“身体形象的动力化结构”构筑其临床，而拉康的“镜像阶段”程式更是独树一帜，在精神分析史和临床应用上都具有标志性

① 精神分析家（巴黎），法国心理学博士，法国国家临床心理医生，现任教于法国巴黎七大精神分析研究学院，巴黎七大精神分析、医学与社会研究实验室研究员。邮箱：danxu2012@yahoo.fr。

价值。

一方面，“身体形象”概念很容易让临床工作者联系到拉康的“想象”维度，因为临床的具体工作离不开想象维度上的开展；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在精神分析中被广泛应用的基本概念，很多分析家援引并拓展它，以此构建、阐释或传递他们在与精神病人、边缘状态病人或者儿童，乃至孤独症患者工作中的临床独特性。

想象、符号和实在构成拉康思想的拓扑学，其中想象是自我的领域。拉康“想象界”维度的发明，首先是借助于他早年所创建的镜子阶段理论，他由此澄清了弗洛伊德概念中“自我”形成的模糊性。自我通过一个镜像的纳入而形成，同时被这个镜像异化。身体整体形象-他者的纳入构成了对未知、对自身的陌生性及对意外经历的最早整合操作。之后，实在和客体小 a 的概念允许把这种整合放置在一个丧失的效应中，这个丧失效应可以追溯至在临床上一直给予实践者灵感的、在场-缺席游戏与进入语言的关系的例子（比如弗洛伊德著名的 Fort-da 观察）。正是对理论和临床相互对照的要求使得人们赋予“身体形象”这一概念以独特光彩，本文作者也因此选择这个概念作为本篇论述的起点。

临床的操作不可能不经过想象界，然而，拉康派精神分析强调的是修改主体和实在的关系。换句话说，想象界提供了平台，允许一系列材料的展开，包括话语、各种中介的引入，以至于更确切地说，它更是一种功能，是拉康所命名的“阉割的想象功能，而非代表一个形象或想象的效益。

因此，身体形象位于负 ϕ ，即负性石祖 ($-\phi$) 这边，这是拉康在 1960 年“主体的颠覆和欲望的辩证法”^①一文中所指出的，也就是说，石祖的镜像符号化了享乐的所在，它不是石祖本身，也不是形象，而是被欲望的形象的缺失部分，即能指的缺失功能，拉康在 (-1) 指示了。(-1) 正是从想象到符号过渡的支撑，是从石祖形象的负 ϕ ($-\phi$) 到不可能被

^① Subversion du sujet et dialectique du désir, J. Lacan, *Écrits 2*, Nouvelle édition, Editions du Seuil, 1999.

否定的符号石祖——石祖享乐的能指——的过渡的支撑。

在这个意义上，想象的功能，被弗洛伊德定义为对自恋客体的投注，一方面，它不同于符号功能，另一方面，它在遮盖符号功能的同时赋予符号功能以工具。这正是借助携带着“阉割的想象功能”的负 phi ($-\varphi$) 实现的。

阉割不是幻想，拉康说：“现在涉及的是这个阉割是什么意思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幻想，因此从这个操作中没有欲望原因的产生，而幻想统治了欲望的所有现实，这个欲望的现实就是法律。”^① “身体形象”位于幻想的序列中。幻想的能力，是由“负 phi 的行动”实现的开放性，是对一包含母性大他者和主体之间隔的空间的整合，在这个空间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运作被允许。

如果存在一个涉及形的身体形象，那么是身体的“享乐”本质上构筑了身体的形：“我由自恋关系这个原则性的转折所得出的身体形象概念，连接于一个在力比多经济学中根本性的属性，它被考虑为身体的动机掌控。人类从来没有移出一个被如此定义的平面，这个平面对人禁止了一个中心区域，这个区域恰恰是享乐区域。”^②

享乐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被语言标志。正是能指切割了身体，直至产生客体小 a 的掉落，同时分割出了享乐的空间和身体的结构。因此，身体被看作是相对于它的“洞”而存在，“洞”构成了其根本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丧失的客体是作为欲望构成性的缺失，来自于大他者领域最初的满足经验。

对于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这涉及的是一个实在享乐的脱离，不再栖息在与想象和实在相接的链接里，谵妄来到想象或类似者（小 a）的位置上，暴力地填充了幻想的必要构建。就像拉康所说的，由于“客体小 a 在其（精神病患者）口袋里”的事实，因而没有分离，没有缺失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 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Editions du Seuil, 1991. p.149.

②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 *L' angoisse*, Editions du Seuil, 2004. p.305.

掉落的效应，没有构筑性的客体。整个符号界是实在。享乐被积聚在身体本身里。语言的效应不再是丧失效应。词粘在身体上，以幻觉和谵妄的形式呈现着。

那么，这涉及的就是“制造”身体从而去“拥有”一个身体。身体不是一个天然的，生物学的身体，而是一个一上来就被语言这一人类特有功能所标定的身体，一个结构化了的身体。为了能够生存，为了支持一个“存在（être）的持续性”^①，必须具备一个或多或少充分相匹配的幻想基础。

此外，是否我们可以说身体始终是一个替代？一个幻想的舞台，一个症状的工具，一个享乐凝结的场所？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不存在“非压抑之物”返回的压抑，只有通过无意识衍生物的摄取和研究，我们才能接近无意识。难道身体不也是通过“身体形象”才可被描述和阐释的？难道不是通过绕行症状我们才更进一步地触及我们的身体吗？

因此，身体是“其结构本身使之成为不可能”的语言的效应。正是“不可能性”（缺失）支架着实在，在符号界构成一个洞，主体的幻想和欲望由此出发被组织。本文想要通过强调结构的“否定性”来结束关于“身体形象”的部分。正是这个“否定性”允许“存在”（être）的“动机掌控”。这个“否定性”的术语也用来指示实在在知识中的运作，和语言结构所给出的“不可能性”，正如拉康所总结的：真理始终是半说。

2. 从汉字之形到主体之文

本文的题目结合身体形象、字母和中文这三个词，是因为字如其人这句隐含了“字”和“人”的中文俗语，翻译成法语就好像直接包含了字母（书写）和存在二字。

^① 著名机构心理治疗的代表人物，精神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家 Jean Oury 认为，精神病涉及的是制造一个“支点”，这个“支点”通常在精神病那里是一些由精神分裂和身体分解的事实导致的身体的碎块。

中文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它产生于公元前二世纪，是唯一至今延续其起源的文字。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最初的符号都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图画，象形符号和象形符号的组合。公元前一千年字母的出现在西方的书写中标志了一个颠覆性，但中文的特性却在它传承的连续性中。中文的变革涉及的是千年来的渐趋成熟，和在历史进程中随不同时代的一些变化。

没有经历一个字母化革命的中文始终保持着一个形象的方面，即形。然而，不仅人类学已经证实：“在图形文字中最异样的是，保存了的形象外表（让人想起符号的世界），但却完全不再是图形。”^① 并且精神分析也指出：“书写可以是形象的，但它始终作为语言，是符号性的。”^②

中文文字的演变服从于三个主要原则：指事，即为了创造新字而产生的系统性衍生，如象形字上加上符号来表示某个词：日，月，上，下；同音假借，即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如：右-又，背-北；会意，是用两个或几个字组成一个字，把这几个字的意义合成一个意义，如耳+口=听，三个人=众。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发明一种新的更普遍应用的书写类型就成为了必要，即形声字，以特定属性的字根表义，结合不同的字根表音，以近似完全相同的发音（有的只有声母），表达不同的事物，如射（she）=shen+寸（矢，flèche），抱（Bao）=手+包（bao，envelopper）。这种类型的造字结构是汉字里最普遍应用的方式，在由许慎编写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里占据百分之八十之多。在这种字形中，很有意思的是，不仅字根形（即部首）是表示意义的，而且表音字根也携带着或多或少的语义，语义比发音占优势。换句话说，汉字构造的基础并不是声音单元，而是在意义产生的水平上的语义单元。这个特点也表现在携带着意义的

① Brigitte Bartandier, le texte en filigrane, in *Du corps au texte, approches comparatives*, édité par Brigitte Baptandier et Giordana Charuty, Edition société d'ethnologie, 2008. p.14.

② J. Lacan, *Écrit*, Editions du Seuil, p.470.

口语表达上。

那么，形的部分，就像我们以部首命名它一样，成为字的关键部分。这个视角在整个书写的行为中铺展开，尤其是在书法中，再就是在水墨画中。中国书法，不是一个和西方普通誊写者的工作相连的二流艺术，也不是像阿拉伯书法一样的装饰艺术。它被认为是“造型艺术中最精妙的艺术”，“允许书法家通向意义世界的全面性”^①，以至于它成为书法家本身的质的因素，后者常常同时又是一个文人。由此可见，汉字的形是如何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意义和链接的载体，它还是一个身体参与其中，同时又限定了身体投注力的形，这一点在比如书法行为中表现得很直观。“字如其人”恰恰表达了每一个独特个体和其独特书写的对应性，而这个类比又是在汉字具有形的基础上得以充分传达的。形不仅是图形，而是身体形态，是力比多组织和投注的组合；它不是身体形象的直接投射，而是包含着被语言化了的身体，无意识和冲动运作的形之体。

那么形和文是如何关联的？

拉康在他的第十八个讨论班里通过参照许慎的《说文解字》提到文：“称之为说文的，也就是，所言之物是文，因为文也正是书写（écrit），不是吗？”^②他提出，文这个字，在中文里也是文明的字符。从拉康打开的视角来看，文，等同于“在书写表象之前就已经有的词表象。它所包含的，是说文解字的先生在我们的纪元之初就已经发现的。文字最根本的源起之一。”^③换句话说，语言之源为文，而文与书写紧密相连，文和言（话语）的切换在中文里又以或多或少更明显的方式被指出着。

书写和言（话语）不同。书写承载着和话语不一样的功能：“如果书写可以用于做什么，那么它恰恰是不同于话语的——不同于话语是可

① Léon Vandermeersch, *L'écriture en Chine*, in *Histoire de l'écriture, de l'idéogramme au multimédia*, sous la direction d'Anne-Marie Christin, Flammarion, Paris, 2001. 本文的文字学材料主要来自于此书。

②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Editions du Seuil, 2006. p.86.

③ *ibid.* p.87.

以着重的。”^① 如果通过话语某些东西被书写，那么被固定的是所指。在分析中被听到的话语固定了什么？能指？以汉字独特形体作为载体的话语是否在被听到的时刻和身体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是否在中文的能指中，身体因为汉字中形的载体而更加在场？

拉康对汉字“文”的兴趣，是想要由此阐释字母（字之母），即法语所处的字母文字中最基本的单元。他称之为“lettre”的概念，不是字母本身，而是指示作为语言之源功能的文字-语言功能。拉康说，“无意识，是‘言在’（parlêtre）所享乐之物。”字母（lettre）是在其与享乐的链接中“能指的迫切”。字母首先是一个能指，因为它来自语言。一方面，字母“根本上是能指局域化的结构”。^② 它是具体的话语从语言借来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在无意识中运作的属于字母序列的东西处在意思之外。字母处在一种欲望的换喻的序列里，在其中意思并不通过隐喻的途径被产生。它是包含了最初的满足痕迹的最后储备（比如与母性大他者的关系），正是在这些最初的满足中主体在大他者之处找到其奠基，但是他也因此被排除，这个储备因这个原初双向运作而从未停止在存在中产生其真理效应。书写的功能正是在那里，在于执行一个享乐的局域化，在其中投入一个不能通过话语产生的身体参与。然而，无论是作家式的书写（小说，散文，日记等等），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谈话、闲聊、演讲等等），都与在精神分析设置里分析家的倾听和分析者的言说关系中所呈现的文-字母的维度不同。

那么是否可以说在字母文字中（如法语）有一个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分割，而在中文书写中却更多的保持了一个连续性？一个能指，所指，身体形象和享乐的凝缩？这个汉字能指和所指的单元更进一步的表达了一个对字母（lettre）的迫切抵达吗？一个与语言更根本功能的显在连接吗？中国书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法构成了一个享乐身体的延伸，通

① J.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I, D' 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 semblant*, Editions du Seuil, 2006. p.82.

② J. Lacan, *Écrits*, Editions du Seuil. p.501.

过书写的一笔一画标记举止，在承载着其结构和独特性的个体存在中确保着主体（sujet）。这就是为什么中文书法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一个治疗效应，可称之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化”（acting-out）。

那么以汉字为基础的言说是否构成抵达欲望的另一种途径？或者是否因为其形的着重，有着强化想象界以至于使主体停滞或扩展在一个“想象”（Imaginaire）世界里的风险？换句话说，是否因为以形为特色的言语根基（langue），会使得一个中文分析临床工作偏向拉康尤其在其早期所批评的“想象”的分析，即更多的导向对意象、影像、游戏本身或其它材料的工作，导向分析家与分析者之间自我与小他者之间（a-a'）的工作，而忽视大他者（Autre）作为能指宝藏之地，作为第三方的语言法则之地的重要性？是否如果说汉字构筑了另一个时间和空间，因此制造的是另一种身体^①（比如不同于法语的），那么，精神分析中要见证的会是一个无言的形的身体？

也许汉字的基础允许与类己者（小他者）形成不同于字母书写背景中的另一种关系，因为形的基础，使得这个类己者如此地相似，如此容易与他者建立的是共同点而非异质性，以至于主体通过这个形的中介紧密地粘连在其形象的着重上。然而，在文化的多样性中否定性的功能也可以以非常柔韧的方式被支撑。在中文的框架中“负（-）”的运作或否定的运作比如表达在书写或水墨画中的空白中。在中文精神分析临床中，涉及的是一个对于语言的结构化功能的支撑，一个借助于形-身体形象的特色而抵达主体之文的工作。如果说存在一个形为桎梏的精神分析临床，那么涉及的是如何主持符号化的工作，如何立足于缺失的运作，从而发明一个由无言到言说的转化，或是另一种穿越“想象”维度的言说或半说之“道”。

① « (Les textes) des taoïstes sont considérés comme des souffles originels, des écrits cosmiques, des signes invisibles qu' il s' agit d' absorber pour sublimer son propre corps. » Brigitte Bartandier, le texte en filigrane, in *Du corps au texte, approches comparatives*, édité par Brigitte Bapandier et Giordana Charuty, Edition société d' ethnologie, 2008. p.18.

《精神分析研究》约稿

《精神分析研究》是由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硕士点（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方向）、社会学与心理学系主办，四川省哲学学会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四川省心理学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协办的综合性学术读物。

本书海内外公开发行人，凡是有关本领域的研究成果，均欢迎赐稿。本书所刊用文章均为作者之研究成果，文责自负，不代表编委会的观点。

来稿请提供电子 Word 文本。同时，请另附作者的联系地址、邮编、电话以及电子信箱等信息，以方便编委会与您联系。

本书编委会的主要联系人：谷建岭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心理学系

邮政编号：610064

联系电话：13730852099（谷建岭）

E-mail: plainy@163.com

来稿规范说明

1. 来稿应包括论文题目、内容提要（2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作者简介、正文等内容，字数一般控制在 5000-10000 字。

2. 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一律用脚注。对正文的注释性文字说明，也一律用脚注。为了查考的需要，外文文献不译成中文。

3. 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分完全格式和简略格式两种。

4. 参考文献第一次出现时，应用完全格式。完全格式的构成：

著作：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页。

J. Lacan,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1966, p.53.

译作：作者、著作名、译者、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47页。

S. Freud, *Two Case Histories ("Littles Hans" and The "Rat Man")*,
Trans. by Anna Freud, Assisted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100.

载于期刊的论文（译文参照译作格式在译文题目后加译者）：

霍大同：“无意识思维的两种形式——梦与汉字的比较研究”，《汉字文化》，2001年，第1期。

载于书籍的论文（译文参照译作格式在译文题目后加译者）：

霍大同：“无意识象汉字那样构成的——无意识的剖理”，载《精神分析研究》，霍大同主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

M. Guibal, “Un barbare en Chine, Brèves remarques sur la voix au pays de la Voie”, in *L'indifférence à la psychanalyse, Sagesse du lettré chinois, désir du psychanalyste, Rencontres avec François Jullien*, Textes recueillis, présentés et publiés sous la direction de Laurent Cornaz et Thierry Marchaisse, 2004.

5. 参考文献在文中第二次及其后出现时，可用简略格式。简略格式可采用如下二种：

第1种 只写作者、书（文）名、页码（文章无此项），这几项的写法同完全格式，如：

J. Lacan, *Écrits*, p.53.

M. Guibal, “Un barbare en Chine, Brèves remarques sur la voix au pays de la Voie” .

第2种 紧接同一条文献, 中文只写“同上。”字样, 西文只写“ibid.”字样。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5418-5



9 787100 154185 >

定价：58.00 元

封面图片：© 视觉中国